

傷害

趙文滔
著

Hafaiyi Publication Ltd.



Zwt80@126.com



五十年代



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古稀难友



前左起：殷毅、李凌、杨崇道、丁金葵(女)

后左起：李承欧、赵文滔、沈志庸、陈义章、朱正、舒湘芹(女)

Injure

By Zhao Wen Tao

Published by Hafaiyi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 Ltd.

P.O.Box 47497 , Morrison Hill Post Office,

Wanchai, Hong Kong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伤 害

责任编辑 江 海

著 者 者：赵文滔

编辑出版：夏菲爾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摩利臣山邮政信箱 47497 号

电话：852-2838 6492

传真：852-2834 8703

E-mail: frontline_mag@hotmail.com

承 印：民众印刷有限公司

字 数：200000 字

版 次：2008 年 5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出版日期：2008 年 5 月

国际书号：ISBN 962-938-065-X

目 录

序	朱 正(1)
读《伤害》后想到的	孙觉民(6)
走进懵懂	(8)
整风	(27)
阳谋?阴谋?	(41)
劳动驿站	(54)
从拓荒到大跃进	(72)
魂断于家岭	(90)
走出大墙	(122)
逃离死亡——回家	(140)
黑色风暴	(156)
鲁班门下	(170)
残酷的株连	(182)
沾了尼克松的光	(190)
新词儿——“改正”	(200)
罪恶的档案	(214)
十年琐记	(222)
四十二年才有了“改正书”	(233)

半个世纪的一次通信	(239)
-----------------	-------

网上文章：

不是《刑法》，胜过《刑法》的“劳动教养”	(256)
中国的“劳动教养”是怎样教养右派的	(263)
1957年究竟打了多少右派？	(273)
小议1978年给右派“改正”和反右“扩大化”	(277)
一部悲凉的《宪法》	(282)
他还是个孩子	(290)
后记	(293)

序

朱 正

今年是反右派斗争的五十周年。许多人都在反思这一历史事件。像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胡启立就上书要求对此重新评价,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朱厚泽撰文论证反右派斗争对中共自身也是一场巨大的伤害。在民间,更有一些自发的纪念活动,好些地方都有当年的受难者发动签名,或者要求经济上的赔偿,或者要求对这事的是非“给一个说法”。正好在这时候,赵文滔兄的这本回忆录脱稿了,赶上了这五十周年纪念。

文滔兄写的,是他个人几十年间的遭遇、见闻,以及他对这些的思考,却生动而且深刻地反映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主线。书中写的第一个政治运动是反胡风和紧接着的肃反运动。这是反右派斗争之前的一场对知识分子的最大迫害。这一场运动打击面广,(据胡乔木撰写的《人民日报》1957年7月18日社论提供的数字,立案审查达一百四十万人),错案率高(据前引社论,错案率高达百分之九十四以上)。到了1957年整风鸣放期间,对胡风一案和肃反运动的质疑就成了一个议论纷纷的热门话题,而那些诉说冤苦的肃反对象,就成了右派分子的一大来源。

那时,文滔兄在第二机械工业部教育司工作。那里的肃反运动是怎样进行的呢?一位在美国留学,学兵工专业的留学生,回国以后分配在二机部所属的学校里任教。肃反运动中被定为“特务分子”,关起来整了好久,和他一同从美国回来的妻子经受不起这折腾,抛下丈夫和两个年幼的孩子,自缢身亡了。在机关宿舍里,还发生了跳楼自杀的事。

就说他们这个教育司,不过三十来个人,就“肃”出两个“汉奸”来。文滔兄当时就提出了质疑:1945年日本投降以前才会有汉奸,日本投

降以后就不能再有汉奸了。现在的这一名肃反对象，在1945年才十岁，他能当什么汉奸呢？可是党支部书记却认为文滔兄的这发言“对运动起了极坏的作用”。

在肃反运动中，有一些在校大学生也受到审查。二机部决定，所属六所院校里学生中的肃反对象，一律强行转学到其他非国防性质的院校去学习。有的已经三年级了，专业课都差不多学完了，也不管。这不但对这些学生是一大损害，对于国家的教育资源也是一大浪费。

就是文滔兄自己，也是很有成为一名肃反对象的危险的。教育司的党支部书记就一心想把他做成一名胡风分子。他看见文滔兄在看契诃夫的小说，就追问：这齐合夫同胡风是什么关系？你看过胡风的书吗？你认识 and 胡风集团有关的人吗？

文滔兄躲过了肃反运动这一关，却没有能躲过反右派斗争这一关。就凭了整风期间他写的三张大字报，给他戴上了“极右分子”的帽子。读者可以在本书中看到这三张大字报的存底，他都说了些什么啊？他批评了高级干部的特权，如用大笔公款装修自己的住宅，考不上大学的子女可以免试入学，小干部因“流氓行为”开除团籍者有之、判刑的有之。而一名副局长诱奸了二三十个女人却还有人为他辩解。他批评了教育司肃反运动的偏差。就凭着这三张大字报，文滔兄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在这以后二十二年的漫长岁月里，成了可以任人欺凌侮辱的政治贱民。

这顶右派分子的帽子虽说只戴在他一人的头上，那重量却是必须由全家分担着的。第一个受到连累的是在北京师范大学二附中任教的妻子，学校里给她开了几次批斗会，贴出了批判她的大字报，还把她的教研组长职务给撤了。正在天津大学机械系二年级的弟弟也受到了株连，一份黑材料放进了他档案袋里跟随了他二十年，使他要调动工作都找不到愿意接受的单位。还有原来在太原教书的姐姐，也因为弟弟是右派的缘故，在文革中下放农村，小孩跟着下去，学业也荒废了。

文滔兄所受的处分是“开除公职，劳动教养”。这使他深思了“劳动教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说它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条制定的,而《宪法》这一条的原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完全不能援引为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根据。国务院的这一决定是对《宪法》第一百条的文字和精神明目张胆的曲解。相反,《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劳动教养,就是绕开法律程序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手段,是完全违宪的。

文滔兄在书中记下了他在清河农场三分场和于家岭分场劳动教养的情形。每天劳动时间之长,劳动艰苦繁重的程度,书中都有很具体的描写。他引用了德国哲学家和法律思想家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的一段话:

刑罚是一种报复。罪犯劳动,实际上主要是以惩治和折磨犯人为目的的劳役、苦役。

……其劳动仍然是对肉体的摧残,也是对精神上的折磨。因此,仍然是不符合人性的,不人道的。

我可以以当年劳教人员的资格作证,黑格尔说得十分中肯。叫我们干的,并不是以创造财富为目的的通常意义的劳动,而完全是一种让你不堪承受的惩罚。

就在把这些右派分子送去劳动教养的时候,“大跃进”开始了。这两件事,不仅是在时间上是同时发生的,而且有内在的深刻的联系。可以说,“大跃进”是反右派斗争最直接的后果。毛泽东 1958 年 9 月 5 日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事实正像他说的一样,这时,能看出点问题,敢提点意见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大都被划为右派分子,剥夺了发言权。种种离奇的幻想都可以付诸实施了。文滔兄的书中举了一个清河农场旱地改水田事例:把六千亩眼看就可以收割的小麦犁掉作肥料,不计工本地投入大量劳动把它改造成水田,播下一百万斤稻种。结果是颗粒无收!这不过是全国许多类似事例中的一例。“大跃进”造成了对农业、畜牧业的大破坏,跟踵而

来的就是大灾荒,大饥馑,大死亡。在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们,除了苦役的惩罚之外,又补充了另外一种更加难以忍受的饥饿的惩罚,真是雪上加霜。当时饥饿的程度,人们在饿死边缘的种种反常的表现,书中都有极其具体的描写。在农场,没有病死的人,只有饿死的人。据估算,农场右派分子饿死的差不多有四分之一。这真是一叶惨绝人寰的历史。

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林林总总的人物群像。像郭荣昌,这时候他已经是山西省外贸局的副局长了。他经过许多周折找到了文滔兄,想帮助一下这个过去的同事改善一下处境,可是办不到。后来文滔兄作了木工,也遇到了不少好心人,像史建德、仲连顺、顾静华、张学禄、吴士孝,……他们正直,善良,有是非之心,都给了受难中的文滔兄不少的照顾和应有的尊重。这样的好心人,就是在农场的管教队长中也是有的。一位张姓的队长表示,知道这些右派分子“犯的是言论错误”,不过,“我当个队长,权限有限,有的事在我的职权范围内的,我会帮助你。”他还真说到做到,后来总场批准一批人回家养病,他就趁此把文滔兄放回家去了。

书中也写了另外一种人,那些丧尽天良的打手。这种人,在平日,业务工作什么也做不好,一到政治运动来了,他们就精神百倍,像疯狗一样,到处咬人。就凭着这种积极表现,升官发财。像当年划他右派的党支部书记,后来做到了中共郑州市委统战部长,一位反右时给他无限上纲的打手,后来做到了北京市高教局大学处处长,另一位打手在一个什么单位当上了人事处长。既然当打手有利可图,当然在运动中勇于冲锋陷阵,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都敢做了。这样他们也就成了这种体制今天的社会基础。腐败,低效率,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要治愈这痼疾,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辨明历史的是非。讳疾忌医,就无法救治了。

文滔兄是一位有历史使命感的人,发愤写了这本书,给历史留下了一份真实的记录。写的虽然只是个人的经历,但是从一滴水可以看见一个世界,其中包含了许多治国平天下的经验教训,按其这一性质

来说,也可以称为“资治通鉴”的。我希望有更多的难友也像文滔兄一样,写出各人的回忆和思考,作为我们对社会,对国家最后的回报。

二00七年五月十八日于北京旅次

读《伤害》所想到的 孙觉民

人老了最喜欢回忆过去，过去的事是喜，是忧，是痛，是苦，是甜，是涩，是过关斩将，还是麦城败北，都会展现在记忆的心扉里，一幕一幕，像连续剧一样演映。

回忆是最珍贵的财富，特别是对于颇有阅历的人更是如此。这笔财富不仅属于自己，如果连缀成文，编辑成书，奉献给社会也是功德无量的。

作者八十高龄，他以耄耋之年，弱病之躯在电脑键盘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敲了近二十万字的回忆录——《伤害》。记述自己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这个沉重的饱含辛酸的故事，只是五十五万个不幸者和他们家庭亲属遭遇的一个侧面，一个片断，但也真实、具体地反映了我们共和国历史上最悲痛的一页——“反右派斗争”。

作者是中国第一代大学生，他思想开阔，专业扎实，热情奔放，毕业后正信心百倍地投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之时，谁知风云突变，一夜之间从美好的人间跌进深不可测的地狱。从此，炼狱之灾，炼狱之苦，命运改变了他的一生。这些故事，令人费解之处在于，这么多“右派分子”不是被外部的敌人，而是被他们信赖的党“引蛇出洞”揪出来打翻在地的。这群人从此脸上、心上都打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烙印。报上有名，广播有声，臭名远扬，家喻户晓。每个人档案袋里无一例外被塞进一卷黑材料，魔影伴随终生。摘帽以后，仍被称为“摘帽右派”，政治歧视没完没了。说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水浒传》中的“林冲发配”的场面，林冲和其他面烫金印的发配者，充其量也是“个案”，而我们则是五十五万，二十二年的千古奇冤。“反右”打击面之大，株连之广，社会影响之深，可谓大矣哉！

1957年，他还是个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幼稚、单纯、天真无邪，党让帮助整风，自然积极响应，必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把所知所感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他那里知道这是“上边”特意下的套，请君入瓮，

让你挨整，岂有他哉！

从他被错划的依据来说，只有三条，哪一条不是出于善意？哪一条够得上“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要说我们现在感到这原由太荒唐，太可笑，就在当时，有良知的人也心知肚明，虽知不对也不能说，不敢说。在批斗中，说你是啥就是啥，谁敢辩解？最后，就按这荒唐的理由，把一个朝气蓬勃的有为青年打成“右派”，陷入万劫不复之地，让他在炼狱中悔改那说不清道不明的所谓“罪行”。庐山会议上共和国元帅彭德怀不也是只有挨批之功，无有申诉之权吗？彭老总性格倔强，面对“钦定”大案，他也只得俯首听命。

对于“反右派”，中央已经作了结论：“扩大化”，并归咎于领导决策失误。其实单位领导也不能没有干系。第二机械部属于国务院的部级单位，在反右运动中的政策掌握显然荒诞，根本原因恐怕在于体制、运行机制和人员水平。

1978年“右派”改正时，作者已经从一个二十八、九岁，风华正茂，出成绩，创业绩的黄金时段沦落到了知天命之年，宝贵的青春年华已经付诸东流。对他自己，对国家、社会都是巨大的损失。

我的这位老同学多年来总有一个心愿，要把这一段不幸的历史写出来奉献给社会，奉献给世人，让大家都记住这沉痛的教训。在他八十高龄之际，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断断续续，终于在夕照余辉里写出了他的回忆录——《伤害》。我鼓励他早日印出，以饷同好。这也是他应有的社会责任，这本书除了反映他曲折、坎坷的人生道路之外，也展现了那个扭曲时代悲剧的形成历程。

我和文滔是总角之交，上世纪三十年代日寇侵华，我们这群十三、四岁的孩子，背井离乡在一个战时中学由初中读到高中，同住一个宿舍，朝夕相处两千多个日日夜夜，经历了艰苦生活的磨练。切磋课业之余，也曾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高中毕业，他去深造，我则投身军旅，作编辑、记者，从朝鲜回来后侧身教育界。我们多年来保持联系，补叙半个多世纪的交往，说明我对这位老同学知之较多、较深，写此读后感当无画蛇添足之嫌也。

走近懵懂

人之生也,与忧俱生。

——庄子

1954年底,可能是为了推行中央集权制,中央决定撤销大区政府。因而,我所工作的单位-----政务院(今国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宣告撤销。所有的人员,除了一部分分配华北各省市,极少部分分配西北,绝大部分局、委的人员,都调到国家相关业务的部、委了。惟独我和两位处长被以“支援国防工业建设”的名义,调到第二机械工业部。

我们仨原来在华北行政委员会贸易局工作。高、华两位处长以往一直搞经济工作,我是经济系毕业生,本来我们都可以说是“学用一致”,没想到,来到这个二机部却让我们改行作教育工作。那位华处长脾气挺大,坚决不干,坚持要干就到生产工厂,经过一番吵嚷,最后只好分配他到了618厂。高澎处长被分配到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担任党委书记兼校长。我这个科员则到了部机关的教育司工作。反正都让我们大改行。

我很留恋华北行政委员会的环境和人事关系。机关地处颐和园附近,清静、幽雅,空气清新。那里的人员一半是老干部,一半是51、52、53年毕业的大学生,160余人各占一半。学生刚参加工作,保持了他们的单纯和真诚;老干部则刚来自老区,依然是革命传统,彼此相处和谐。(从改革开放,恢复了人与人的正常关系以来,我们这批当年的老同事尽管大家都成了古稀老人,而且差不多一两年,两三年要因为“走人”而减少参加者,但不管有多少人,每年聚餐两次,一同叙旧,坚持至今,依然保持了纯正而深厚的感情)。特别是当时的一批领导干部,作风淳朴,平易近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记得有一次,我们的局长李哲人周六下午从外边回来,他的ЗИМ车驶向楼门口时,我正在门外,车停下来,(那时候老干部都兴“过礼拜六”,夫妻团聚)我知道李局长是接他的夫人来了。车门一开,出来的竟是一位“小脚”老太太。我不由得笑出声来,李局长

走过来在我背上拍了一下,说:“小赵,笑什么你?你的思想有问题,你要懂得这是社会问题,你说说,我要现在离婚,再找个大学生行不行?我不能那样作。你说你这个小年青的,哪儿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思想问题?!你呀!你。”他一边说,一边微笑着走进了楼门。我被他的这一番话说得很是尴尬,不知道如何是好。心想:这一下可把局长给得罪了。忽然他又回头冲我喊道:“小赵,汽车后备箱里有一筐苹果,叫几个人,拿进来给大家分分。”这一来倒给了我一个台阶下。“好了!”我答应一声,忙向汽车跑去。他并没有怪罪我。

后来,单位撤销,李局长调对外贸易部任第一副部长(部长叶季壮长期生病不能上班)。再后来,在冀朝铸向毛泽东提出,应和资本主义国家也作贸易被斥责后,李哲人又向毛泽东提出和资本主义国家作贸易的建议。(当时中国的外贸只和苏联、“新民主主义国家”作生意,不和资本主义国家作生意)这一次惹得毛大怒,责骂李是“曹操”,挨了一顿整。后来调物资部任副部长。文革中,这位工作能力很强,平易近人的好人,被造反派批斗,后患病致死,这些都是后话了。

有一天,我和原来的一位同事一道去我们原来的副局长,后调为商业部部长助理的戴冀农家去,在华北行委时我们很熟,一方面去看看他,另一方面也想和他谈谈我的情况。那时候他住在西四兵马司胡同。当他问起我的情况时,我就把我们大改行的事和高澎处长当了校长的事讲给他听。然后他说:“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可是挑的都是局里的好干部,既然已经调去了,先干着看看,刚到新工作单位就提调动工作的问题不太好。以后再想办法。”接着,他告诉我们,不久,要成立一个城市服务部,他将去那个部担任部长助理。

“城市服务部是搞什么工作?”和我一道去的,原来华北行委的同事老黄问道。

戴助理说:“简单说就是管城市的吃、喝、拉、撒,管的就是什么旅馆啦,饭店啦,等等。说实话,这是新成立的机构,我还没完全搞清楚。”说罢,他笑了。

“哎!你们吃过烤肉没有?”接着他又问我们。

当时我们哪儿吃过烤肉,就老老实实告诉他:“没有。”

“走!我今儿个请你们吃烤肉,西单,‘烤肉宛’,咱们这就走。”

我们满以为他要打电话到单位要一辆车,他没有那样作,一边穿衣服,一边说:“走,坐电车!”

因为原来在华北贸易局时,戴局长是单身,常常约我们年轻人一起出去玩。玩罢,他比大家收入多,也就常常请我们吃东西,付划船费等等,所以他这天提出请我们开荤,我们也就习以为常了,一点没客气。

50年代北京还有有轨电车,戴助理也算年长者,和我们从西四乘着叮叮当当的电车到了西单。我第一次到“烤肉宛”这种地方吃饭,好在我们都很熟,戴助理一边给我们讲北京烤肉的特点,我们俩年轻人一边狼吞虎咽地猛吃。看得戴助理直笑,说:“哈!年轻人真行,好好吃,好好吃。”

饱餐完烤肉,我们把戴助理送回家。

晚上回到宿舍,躺在床上想想大改行的“支援”,越想越不愉快,很晚了才郁郁睡去。

第二机械部是国防工业性质的部,也就是兵工部。当时有1800多人。人员不少,实际上是官多兵也多,机关里人浮于事,上下脱节。古人云:“官吏浮冗,冗员为忌,最为天下之大患。”既然人浮于事,为什么还要从其他单位再要人大改行地来“支援”?难道还嫌喝茶、看报的人少?人多,还要要人,这可真是官僚主义啊!(在我1958年被处理后,1959年这个部整个被撤销,说明我的此说“不虚”)。

由于这个部是保密单位,人员注重政治条件,有不少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原来都是军人,部长赵尔陆原来就是司令员。从整体来说,所谓政治条件好的人多,军人和工农干部多,知识分子相对较少。有些干部认为在保密单位工作,有一种自命的优越感,原本文化素质不高,还高高在上,无所事事,这可真是培养官僚主义,养懒汉的所在。

那个时候,我整天为了学非所用的问题,安心不下来,天天只是应付着工作。每天下了班,从机关所在地——北河沿大街,走到东华门大

街,买两个火烧,一头钻进王府井的新华书店,直到书店关门才回宿舍。

到了五、六月份,在文艺界忽然发生了“胡风事件”。我也买了一份《文艺报》消遣,那一期还附有胡风的“三十万言书”。看完了也根本没有重视,我认为这不过是文艺理论的争论,也看得出其中夹有个人之间的不和。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为对于文艺界的事毕竟是外行,既没有重视,也搞不清楚。

后来没有料到毛泽东亲自写了《人民日报》披露材料的按语,胡风的问题竟被定为“反革命”。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中说:“……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作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的统治为任务的。”

不就是一些左派文学家和周扬闹点意见吗?不就是文艺界的不同意见争论吗?怎么就全成了特务、叛徒?乃至于要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怎么能扣这么大的政治帽子?我思想上有点想不通。这算怎么回事?这就是政治?

万万没想到的是,在这运动即将到来的时刻,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这个新来的“支援者”竟被共产党的支部书记盯上了。有一天下班了,我没有回宿舍,还在办公室看小说。

书记梁心明走进来了。按职务说他是书记兼高教处处长,我们办公室摆着他的一张办公桌,可他经常不使用他的办公桌。他不是副司长,更不是司长,除了老在司长办公室耗着,泡着。不知道他天天在哪儿,也不清楚他天天在干些什么工作。

“你还没回去?”他推门走进办公室后问我。

“回去也没事,看看小说。”我一边回答,一边出于礼貌,合拢书本,站了起来。

“胡风你知道吗?”他突然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

其实我来以后,从来没见过他看书,我想,要不是最近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登关于“胡风集团”的材料,肯定他根本就不知道胡风其人。现在从报纸上知道发生了一个“胡风事件”,凭经验他似乎捕捉到一种政治风向。大概从这事上“能捞到点什么”是他的主导思想。

“知道呵。”

“你怎么知道的胡风?”好象别人都和他差不多,现在知道胡风是件新闻。

“报上天天登,天天看报,谁还能不知道?”

“你看过胡风的书吗?”他又提出了问题。

“没有。”

“你那么爱看书,就没看过胡风的书?”这架势似乎不是随便聊天了,谈话好象“直切主题”,爱看书也成了问题。我不由得注视着 he 那张瘦长蜡黄的脸,落腮胡子挺重,象在蜡黄的脸上又涂了一层黑色的亚光油彩。目光狡黠而严肃。嘴巴半张,几只黄褐色的长牙不整齐地排列着,半露着。实在说,从这张脸的形象上看,有点儿象旧社会“烟民”的脸。忽然,我下意识地有一种想法——好象来者不是善意。

“梁书记,我们是国防工业部门,不是文艺单位,而且我是学经济的,为什么非要把文艺界的书都看过?”

“你现在看的是一本什么书?”似乎依然不放松,一句紧跟一句。狡黠的目光死盯着我手压着的那本书,好象我会把那本书象变魔术一样变没似的。

“我看的是一本小说,契诃夫写的小说集。”

“齐合夫?他是什么人?齐合夫认不认识胡风?他和胡风是什么关系?”他的眼睛一亮,似乎发现了点什么,抓住了点什么,问题越来越问得出奇了。

“我想,胡风知道契诃夫,而契诃夫绝对不知道胡风。”我也给他来了个故弄玄虚。

“噢?!你怎么知道的?你说。”话锋似乎有点单刀直入,他那面部语言告诉我,似乎他感到越来越要捕捉到问题了。

“因为胡风是文学工作者,他应该知道俄罗斯著名文学家契诃夫。而胡风大概还不到十岁,契诃夫就去世了。从这一点来说,你说契诃夫怎么可能知道胡风呢?是不是?”

“!?”此时,他才明白过来,齐合夫怎么搞了半天不是中国人,是个俄罗斯人?俄罗斯人,那不就是苏联老大哥吗?怎么能怀疑老大哥呢?脑子里转了一个弯儿,没有再提问题,浓密的落腮胡子的腮部凸起来两下,估计是牙齿咬嚼了两下的反应。头脑里潜意识的没说出口的话大概是:“好你个小子!原来我还以为抓到一个‘猎物’,没想到你小子给我来了这一套!”

似乎还不甘心,他又说:“你好好想想,认不认识和胡风集团有关系的人?”

“我不用想,我和胡风集团的人一点边也不沾,我又不是学文学的,更不是文学工作者,我也不认识作家和诗人。”我心中不免十分恼火。

梁书记没有再说话,转身走出了办公室。我估计他的头脑里大概明白了点什么。看样子好象有点生气了,至少是不太愉快。

我很纳闷,这算什么事?难道他还想在第二机械部也抓“胡风分子”?固然这批人被定性为反革命、特务了,但那是文艺界的事,也不能“风声鹤唳”,见人就想打成胡风分子吧?他对我的这一番阴阳怪气的谈话究竟想干什么?搞不清楚。

虽然我来了时间不久,我们的司长李承文给我的印象很好。他是老北洋大学纺织机械系毕业,早年参加革命的。是一个知识分子老干部。

当时,二机部主管着六个国防专业性质的高等院校,而我所在的“高教处”,就是这六院校的管理机构。有一次,我在他办公室随便聊天。我对李司长说:“我们这个处五个人,没有一个是国防专业毕业,有两个是大专生,还有一个高中生,处长是书记兼。实在说这工作怎么能作好?国防院校是我们部所管,为什么不调几个专业对口的毕业生来?”

李司长叹口气说:“唉!我提过这个建议,分配工作的人拿着教育部那一厚本专业目录,他根本就搞不清楚哪些专业都是干什么的,老有专

业不合找到部里来的。至于我们这儿的人,在我来之前就来了,人员的调动谈何容易。”

“李司长,我说句实在话,你也得有个班子吧?这样怎么干呢?比如说吧,我们处的刘 XX 是高中毕业,让他和北京航院的张教务长谈教学工作,你说怎么谈呢?能谈出什么?还有,我们的十几个中等专业学校都有人事处,学校的人事工作,人家自己都能安排解决,和部里基本没多大关系,我们司再搞一个管中专的人事干部作什么?再说,咱们那位搞人事的杨贵星,小学水平,写一个便函能用半本便函纸。”

他笑了,说:“这咋回事?”

“写一张,他自己看着不行,撕掉了,再写一张,看着还不行,又撕了。又写一张,更不用说,又撕了。就这么撕来撕去,半本便函笺都扔进字纸篓,差不多能写成一张便函来。再说二机部是个中央机关,发下来的公函七扭八歪的字像小学生写的,会不会让下边笑话?”(当时司里还没有打字的条件)。

李司长又笑了。他说:“这个人从河北曲阳县老区来,你去过那里没有?那是个山区,山区小学的条件和水平都很差,他进得城来好多事他都不知道,那也得工作,有啥办法?唉,该解决的问题多了,你以为我不了解情况?我完全了解,但有些问题我一个人决定不了,这里每个人的情况我都清楚。可就是我一个人解决不了。”

我终于忍不住提出了自己的工作问题:“李司长,我是经济系毕业生,难道你让我从头再学国防专业?你想办法从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业学院各调一个毕业生不就行了?实话说,我还是想到经济部门工作。”李司长对我笑笑说:“你又讲回来了,先不谈你的工作问题吧,现在咱们的工作不适合问题太多,连我的工作都不适合,咱们慢慢来吧。”

而此时,胡风的“反革命”问题,在全国已形成了重大“反革命”事件。最后触及了 2000---3000 人,逮捕了一批人。没想到由此紧接着,进一步在全国搞起了全国性的“肃反运动”。

司里新调来一位副司长王万春,听说调来前是部队的师长还是副师长。一到任,就和那位整天没事干的书记指挥开展“肃反运动”。此人

有个特点,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冒出来一句:“妈勒个B的”。不管场合,也不顾影响。这大概也是在部队养成的习惯。他对于教育更是门外汉,对工作很难说什么,他唯一能作的工作大概是来了文件,在文件上一批“XX处办”,“XX科办”,签发下去就算完事,这种办法倒也不失为“高明”,而后就是总坐在办公室喝茶看报。有时候坐在办公桌边打个盹,眯眯瞪瞪。

作为正司长的李司长没有过问运动,他还在埋头忙他的业务工作。把运动都推给了新来的王副司长和书记。我估计他对于新调来的这位帮不上忙,离他的想象差距过大的副司长可能有点失望。盼望能调来一个比较理想的助手的希望又落了空,显然心情沮丧,郁郁寡欢。

“肃反”,当然对象应该是反革命分子,这应该是无疑的了。

不知道怎么搞的,我们司第一个被确定为反革命的是一个“汉奸”。党支部书记梁心明给团支部布置了先统一认识的政治任务后,团员就开始开会(当然是背着那位所谓的“汉奸”,尽管他也是团员)。在团小组会上简直是群情激奋,踊跃发言。

有人说:“我们真是政治嗅觉太低,自己身边有‘汉奸’,竟然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必须擦亮眼睛,分清敌我,立刻和他划清界线。”

“看来真是不得了,‘汉奸’居然混进我们中央机关了,这还了得?……”也有人说。

还有人说:“这次我们必须打破情面,这是敌我问题……”

“我们实在是政治觉悟太低,自己居然不知道自己整天和‘汉奸’混在一起工作,这次运动真的是给我们敲了警钟,今后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真正看清周围的人,必须有敌情观念……”

.....

我还从来没有参加过真正的政治运动,在华北行委搞“三反、五反”时,我在办公室整理材料,没有直接参加运动,更不懂得运动是怎么个搞法。大家激烈发言之后,我根据自己的想法,说了我的看法:“……我认为‘汉奸’这罪名是很重的,是一种‘通敌’行为,这种帽子该戴一定得戴;如果不是,那可不是随便能给人扣的。如果说‘汉奸’,1945

年日本鬼子投降前才有‘汉奸’,1945年日本投降后就不能再有‘汉奸’,这是一个前提。按照马世聪(被确定为“汉奸”者)的年龄计算,1945年他刚十岁,一个十岁的孩子,他作了什么‘汉奸’的事?是帮助日本人送了情报?还是给日本人作了什么其他的事?我看我们这样空泛的讨论,不容易得出一个明确的结果来。最好是把他干的具体‘汉奸’事实摆出来,大家才心里明白。什么底也不知道,这样讨论有点讨论不下去……我们总不能‘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吧!”

听了我的发言,有的人说:“这话有道理,1945年以后是没有‘汉奸’了,那么这‘汉奸’是怎么来的?这倒确实是个问题……”

也有人说:“这么说来,这‘汉奸’的事是得搞搞清楚……”。

.....

这次小组会开完,大概有人向书记汇报了,而且书记认为我的言论对运动起了很坏的作用。冲淡了群众的对敌斗争热情。不久他就在开会时不点名地点出:“……有人对这样严肃的政治运动,不但不积极投入运动,还拐弯摸角的说些不三不四的话,他应该好好想一想,这对运动起到了什么作用……”

听了这一番话后,我只好少发言,或者不发言。但从思想认识上说,我认为“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说起来容易,但作起来可就太难太难了。在生活中、工作中如此,在政治运动中更是如此。搞运动的领导人难道不知道他自己“左”?我想他一定也知道,但政治运动和良心是不能相容的。与此同时,他更知道“左”会给自己换来升级和经济好处。在五十年代只要不考虑“昧良心”、“坑害人”,狠下心来往左走,组织上还会加以保护,给他们撑腰。这实在是一个无奈的悲剧。此时,我认为这种不拿出证据来,在一个叫做“肃反运动”这样的政治运动中,就在群众中指明人家是“汉奸”,这是极不负责任的。而且严格地说,立刻开展群众斗争,不许和家里自由通信;变相地失去自由,由几个人日夜公开跟踪,或者暗中监视起来,这种作法是违反1954年就制定的《宪法》的。但在那种形势下,我不能也不敢说出口。对这个运动真是懵然不解。

接着,又确定了一个“肃反对象”,无巧不成书,也是一个“汉奸”。这

是财务科一位将近四十岁的人,听说解放前在日伪时期的大同煤矿工作过。在日寇占领时期工作过,对于这个问题就很难说了。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定等级的,这是一个已经有家属的人,有一个时期不让他回家,让他搬到单身宿舍,日夜派人轮流看着,实际上等于完全失去了自由,也就是变相的拘禁。当时我在思想上一直困惑:一个人还没有确定他是“汉奸”,有罪推定,就拘禁起来,那隆重制定的国家根本大法,究竟起什么作用呢?但在那种形势下,我又敢说什么呢。从此,我以后就很少讲话,心里一直纳闷儿:“怎么三十来个人的司里,就搞出两个‘汉奸’?怎么‘汉奸’都藏在这儿了?是不是在日寇占领区生活过,就是“汉奸”?在国民党统治区生活过就是“特务”?太让人难以想象了!这政治运动还有没有点严肃性?

也叫乱中添乱,紧接着,财务科来自四川财经学院的王XX突然疯了。很奇怪,他坐在办公桌正写着什么,突然就站起来胡喊,起先大家还以为他开玩笑,后来发现他脸色煞白,不知道喊叫些什么,精神状态显然不正常。这时候才意识到他的精神失常了。看着他一边狂喊,一边向人冲撞,还咬人,闹得挺厉害,团支部书记王宝善叫了几个年轻人,楞是把他架到宿舍。但是到了宿舍,他依然横冲直撞,狂呼乱喊。好象精神失常的人具有意想不到的膂力,几个人都弄不住他。最后不知道经过哪位领导干部的批准,部里派了一辆车来,把他强行送到精神病院了。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好端端一个年轻人,怎么突然就疯了?直到“肃反运动”结束,这个人也彻底消失,我都不知道究竟。

过了些天,书记把我找到一个没人的办公室,他扳起面孔,沉默两三分钟,开口对我说:“你想想,你有什么问题没交代清楚?”

“我想不起来。”我没有想到他给我提出这样的问题。

“你解放后参加工作,学生出身,没什么大问题,但政治历史问题应该向组织交代清楚”。他一边说,一边似乎在缓和一下气氛。

“我想不起来,还是请你直截了当讲吧。”我还是不知道他要谈什么问题。

“你回去好好考虑考虑吧。考虑好再找我,你回去吧。”

我从那间办公室走出来,感到很纳闷儿。……

有天下了班回到宿舍,天已经黑了。我发现斜对面铺位的吴学范有点鬼头鬼脑,这是一位上海人,高度近视,大约五、六百度,一边看着一本书,一边抠着脚,不时地把抠了脚的手伸在鼻子低下闻一闻,好象他有一种“脚汗泥癖”,闻完之后,又低头从眼镜框的上方偷偷地窥视我,看看我注意到他这些优雅动作没有。其实我早看到他那付恶心相了,不过我对他的恶心相不感兴趣,而是隐隐约约觉得这个家伙很可能接受了暗中监视我的任务。为了证明这件事,我突然从宿舍出去了,等到他慌忙穿好袜子、鞋,我已经下楼了。楼下是一个灯光篮球场,围着一群人在看打球。我站在人群的后边注视着楼门,突然看见吴学范从楼梯跑到楼门,边扣上衣的扣子,一边迅捷地用他那高度近视眼向左右扫视,根据他的瞬间判断,我很可能出了大院,他立即从楼门口跑到大门外。我蹲下来,躲在观众的后面。没有几分钟,忽然看到他慌张地从大门外跑进来,三步并作两步地又向三楼跑去;还没有两分钟,又从楼上跑下来,焦急地向人群扫视一遍又向门外跑去。这时候,我悠闲地回到宿舍,洗完脸正要睡觉,他满头大汗跑回来了,一进门看见我躺在床上,大概才放下心来。无形中这暗中监视明朗化了。这个家伙实在沉不住气,他气喘嘘嘘的忍不住问我:“你刚才上哪儿去了?”

“管得着吗你,上哪儿是我的自由,宪法你学过没有?”我回答道。

“我随便问问。”

“随便不随便你自己明白!”我看着这个小丑的表演又可气又可笑。后来想想他也是“支书之命不可违”,他也不是党员,好不容易书记给他一项政治任务,这是组织对自己的信任,说不定干完这档子差事,能给点什么奖励呢!哪敢松懈麻痹?我想和这种小人计较实在没多大意思。从这以后,他也总躲得老远,避免被我发现,我也再懒得理他。

我住在三楼,有一天晚上大约八点钟去上厕所,忽然听见楼下“咚”地一声闷响,接着有人打开四楼的窗户大喊:

“跳楼了! 跳楼了! 有人跳楼了! ……”

接着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有些人跑下楼去了。

我从厕所的窗户往下看,只见地面躺着一个人,楼下没有灯,只有从窗户透出来的微弱灯光,我看不清是什么人,只知道不是我们公司的人。

“快骑车到部里要辆车!快!快!快!……”

“不要乱动,先看看伤在哪儿?”

“吐出这么多白沫子,这怎么回事?”

“不行了,还看什么伤!”

“……”一阵七嘴八舌的吵吵嚷嚷。

过了一阵,部里开来一辆汽车,人们把他抬上车送医院了。那时候还没有什么120之类的服务。

我走到楼下,还有两个人站在那里,只听见他们说:“唉!本来没什么,这样一来反倒能让扣一个‘自绝于人民’的帽子,这就成了自找倒霉了。”

我想死者一定是个冤鬼了,人都有面子,平时何曾受过如此凌辱?在运动中压根儿没人管什么叫作人的权利,稍微生性软弱的人,在万般无奈时,最容易走这条以死抗争的路了。岂不知你即使去死,那伟大、光荣、正确的发明家也早给你准备好了一顶帽子——“自绝于人民”。天下的理早就成了积极分子们的专利了。

隔了一段时间,书记找我谈话,他问我:“你是不是有一个同学在湖南衡山县工作?”

“是的,他的名字叫做丰蔚,在湖南衡山图书馆工作,他是我中学的同学,北京解放后,他参加华北大学学习,后来随南下工作团南下,到湖南衡山县工作了。”

“你给他作过什么事?”他追问道。

“没给他作过什么。”好象他是特务,我给他作过特务工作似的。

“你是不是给他翻译过什么俄文材料?”他把问题点出来了。

“他所在的图书馆不知道怎么和苏联某地图书馆建立了友谊交流关系,他们馆没有人懂俄文,所以苏联来的信和写给对方的信就委托我帮他们翻译,这是促进中苏友谊的事(当时中苏关系是兄弟关系),这有

什么问题?”我感到这件事成了“肃反”的问题有点莫名其妙。

“他为什么要找你给他们翻译!?”

“丰蔚知道我参加工作后，曾经在华北行委的俄语业余进修班学习过俄语，所以他就找我帮他翻译。”

“他怎么不找别人，而一定要找你?”

他这问题问得太奇怪，一时真让我不好回答。我想了一下说：“那我以后给他们介绍请你给他们翻译，好不好?”

啪!一拍桌子，他生气了：“你不老实!你这样对待运动要考虑后果!你好好考虑考虑，老实交代你的问题，你不是没有问题，是态度不老实!”我心里也非常窝火，这算什么事?这运动要是总提这类的问题，真是让人难以回答。

那一段时间，书记和几个积极分子常常出去外调，究竟是调查谁，不得而知。实际上他们这样空对空地搞运动，搞几天没具体内容，就搞不下去了，他们肯定是去外调，去搜集材料去了。

那时候我心里曾经有过一个极不严肃的想法。既然运动如此的不严肃，我们索性就不严肃到底，我也开个玩笑。他们的外调实际上是带有旅行性质的，既然要旅行咱就来个好地方，还不如我给他们编点故事，提供个好地方让他们去逛去。我曾把中国地图集翻了又翻，打算编一个故事，把需调查的地点选在诸如西双版纳或者西藏，编造一份交代材料，让他们到远方不毛之地好好逛逛。后来想想，万一惹火了他们，让他们反过来当真给我扣上一顶破坏肃反的反革命帽子，这玩笑可就闹大了，没有敢那么作。

两个月后，书记又找我，说我参加过一个反动组织没有交代清楚。我仔细考虑，觉得没有没交代清的问题了。后来书记对我说：“你初中一年级参加了一个反动组织——‘同志会’，你是不是还担任过什么职务?”

“那是抗日战争时期的1941年，我生活在阎锡山统治区。当时按国民党教育部的命令，鉴于抗日战争有许多儿童失学，所以在非沦陷区的陕西宜川县农村，办起了一个专门招收‘沦陷区’（即日寇占领区）失学

儿童的中学,管饭吃,一年发一身衣服。我当时就考了那所中学,叫作山西省立第二联合中学。因为学校归阎锡山的教育厅主管,在阎的统治下,一人学必须集体参加他办的一个遍布机关、学校的反动组织-----‘同志会’。因为全体学生都得参加,自然我也不能例外。再说,在1941年抗日战争年代,作为一个十三岁的初一学生,我根本就不懂得共产党、共产主义;也不知道国民党的反动,头脑里只知道‘抗日’。参加后,我也没有作什么坏事。1945年日寇投降了,我转学到另一所学校,就自动脱离了关系。这一段历史我一参加工作就作了交代。我没有担任过什么职务。”我比较详细的作了说明。

“你再好好想想吧。”说了这句话,他转身走了。

又过了些天,他把我叫到一个办公室,态度突然变得和蔼了许多,他说:“哎,我们了解到你代替过两个月‘小组秘书’(相当于团小组长,每两周主持七、八个同学开一次会),嗨,十四岁的孩子,那算什么问题嘛,你赶快承认了,咱们就结束了。这算什么问题?我还参加过‘蓝衣社’哩,你的问题比起我那问题那算什么呀!”

“梁书记,‘蓝衣社’是什么组织?”我问道。

“这你还不知道?你不是生活在国统区吗?怎么连这也不知道?那是国民党特务组织。”

“我只听说过中统、军统是国民党特务组织,没听说过兰衣社。”听了他的话,我真是出了一身冷汗,怎么?共产党的书记曾经参加过国民党特务组织?既然是国民党特务,又怎么能混成共产党的书记的?这,这……这个人可真够神秘的!再说这肃反运动怎么共产党叫一个参加过国民党特务的人来搞?参加特务组织是大问题,是不是应该审查他才对呀!这背后究竟是什么文章始终搞不清楚。

“嗨!我说你就承认了就完了,那天我不是说了,你那问题和我比起来算什么?”过了几天书记又找我谈话。

“我们那时候是抗日战争时期,学生的家都在山西,而我们在隔一条黄河的陕西。同学的家,大都在日寇占领区,学生一般是回不了家的;再说,学生也没有生病的。寒、暑假也回不了家的,那几个当‘小组秘书’

的同学既不曾请假离开过学校,又不曾生病,我能代替谁去?谁又能让我代替?这事我可以找出证明人来。”我极力说明事实。

等到运动需要结束了。书记总结性的发言说:“运动嘛,呵!在运动中有些同志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之前,组织可以怀疑他有问题,这一点大家是应该理解的,也可以说是合乎情理的。现在查清没问题,这不是也好吗?也就是说,我们运动开始的作法是合理的,到结束的时候也没有给谁戴上什么反革命帽子,这也是正确的。这就叫辩证法,呵!……”。对那两个“汉奸”没搞出个什么名堂来,可是最后却说运动中表现不好,稀里糊涂调到外地掩人耳目去了。给我来了个运动中表现不好,还有点历史问题交代得不很清楚。建议团内给予警告处分。什么“建议”?分明是书记的主意!凭什么这样干?这算什么事?这可真是“有权压死人!”真是能把人气死!

差不多整了快一年,这个运动草草收场了。按人民日报社论的“总结”：“被查的人一共有 140 万人。查出反革命 3800 人。”那就是说,查一个真正的“反革命”,需要 368 个人来陪绑,作为肃反对象而被整。同时,全国机关团体、厂矿、学校……所有的群众上千万人通通放下工作,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投入胡批乱斗,严重影响了工作,浪费了大好时光。也许是思维方式不同,1954 年不是刚制定《宪法》吗?为什么有法不依?党的组织就成了执法部门?要公安局干嘛?当初让公安局调查被怀疑人,既合乎情理和司法程序,又不那么大量无根据地有罪推定,整人,侮辱人。偏偏要这样乱来?大家所向往的合理社会就是这样?再说那 3800 就当真是 3800?,我想起刚参加工作不久,记不清是“镇反”还是“三反五反”。在华北行委时,局里一位辅仁大学毕业姓邢的同事被宣布为“反革命”,并被立即逮捕。他的名字后来还上了人民日报。当然大家百分之百地相信党和单位(政府)。没想到他被捕四、五个月后,又回到机关,若无其事,我们也不好打听。既然能回来,那就是弄错了。可当初是被“逮捕”的呀!还上了报的呀!事后不免思想上反倒陷入懵懂,为什么有的事非要搞成运动?这样劳民伤财还整人,侮辱人?

至于他们这些积极分子,在运动后,每人升了一级,这升级不是考

核工作成绩,考量工作能力,而是在运动中谁能给人胡分析、胡上纲、胡扣帽子、胡糟蹋人、胡编问题,就叫做批判肃反对象时表现出色,谁就升级。这叫什么事?这就是毛泽东和共产党对积极分子的政治犒赏。

气愤之下,不久我就提出要求调走,由干部科长叶学运和外贸部进行了联系。过了不久,外贸部来电话说,分配我去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工作。也叫做“天不遂人愿”,就在该公司来电话催我快去报到,要去广交会之际,我患了急性肺炎。住了医院。等到过了一周,我病好了,这期间国务院下发了一个文件,规定各部之间不许人员调动,只能在部系统内调动。联系好的调动工作竟然意外告吹。把我又落在这个二机部动弹不得。

有一天,我在办公室楼道里看见从太原机械学校(兵工中专)来了一位姓张的老师,人有四十岁以上了,瘦瘦的脸上架一副近视眼镜,左右手一边拉着一个孩子。后来旁边“中教科”(专管中等专业学校的科)的一位同事告诉我,这位老师是解放前到美国留学,专门学兵工专业的。解放后,从美国回来,被分配到太原机校教书。这次运动中被定为“特务分子”,关起来整了好久。他的妻子也是从美国回来,她哪儿经受过这种整法,想不通,撇下两个孩子上吊了。等到审查完,张老师根本不是“特务”,但这个家也就真成了“家破人亡”了。临了儿那位同事调侃说:

“人家唱戏,秦香莲受冤,拉着一儿一女,他倒好,半大老头儿也拉着一儿一女,这日子怎么过?听说部里为了照顾他,把他调来要重新安排工作。”

几天之后,我听说组织上找他谈话,为了表示关心,问他生活上有什么要求,他的要求是:

“我要求组织能给我一个好一点的瓷罐,瓷罐上刻上我妻子的姓名,我好把她的骨灰放在里边长期保存在身边。”

这就是一个知识分子被整得死去活来,家破人亡以后仅有的可怜要求!

有位同志说,毛泽东主席多次讲过:“…知识分子可以说都是资产

阶级知识分子,要泼他一瓢冷水,才会像狗一样夹起尾巴来。这话到了底下,就又变了,不是泼水了,是扣屎盆子。”

“泼完屎盆子,发现错了怎么办?”

“弄错了?那好,我给你洗洗。”

“给洗干净也行呵。”

“想得倒挺好!问题是他不用肥皂,清水给你洗。”

“那怎么洗呀?”

“他拿尿给你冲,撒泡尿给你冲冲。”

“?! ”

肃反基本接近尾声了,二机部所属的六院校报来一批学生名单,这些名单所列的学生是肃反中被审查者,他们将被报高教部,分散分配,强行转学到其他非国防性院校学习。有的已经三年级了,专业课已学得差不多了,再转到其他专业岂不浪费?有个别学生找到部里来苦苦哀求,语带哽咽,恳求把他们仍然留在原校。其实,他们刚解放时也不过是个中学生,他们能有多大的问题?但这是残酷的政治运动。看了材料,接待了来访者,我只能在心里同情这些无辜的学生,谁敢擅自帮他们的忙呢?他们还没有走向社会就只有低着头,夹着尾巴,痛着心到新分配的院校去了。谁知道那里有没有人歧视他们呢?将来又会怎么样呢?可怜的年轻人呀!

过了一段时间,我正在办公室,李司长叫我。

“赵,(这是一种既不说老,又不加小的叫法)来我办公室一下。”

我走进他的办公室,他说:“坐,坐,再过半个月部里要开‘部属高校院长、副院长、教务长会议’,到时候赵部长要讲话,咱俩研究一下,得给赵部长写个讲话稿。”

“这是不是该刘智(赵部长秘书)写?”

李司长说:“他平时根本不了解教育部门的事,还得咱们写。”

“让叶英写吧,他比我高一级,(肃反完升了一级)当然水平比我高。”我想推给那位积极分子。

“哎,他能干了什么,他能干了什-----么?我还不知道?来,来,来,

就咱们写吧。”李司长坚持他的意见。

接着,他讲了个提纲,我们交换了一些意见。问我:“三天写完行不行?”

我说:“尽量争取快吧。”

当天,我晚上回去加了个班,第二天上午整理、修改了一遍,交给了李司长。两个小时后,他就叫我去他办公室。

“挺好,我原来估计你可能得三天,没想到这样快。我刚才看完就拿去给赵部长汇报了,部长同意这个讲话稿。咱们交卷了。但是还有个问题,赵部长要求用大小相当于两张信纸的白纸,用毛笔抄写成一平方公分大的字。这事怎么办?”李司长好象有点作难地说。

“这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

李司长笑了,他说:“嗨,赵部长是老花眼,钢笔小字他根本看不见”。我明白了:“好,我去办。我还是初中时练过毛笔字,多少年来我也没有动过毛笔,试试看吧。”

回到办公室,我找好纸和笔,整整齐齐抄写好,又拿给了李司长。因为一般人早就不用毛笔,也不练毛笔字了,我的毛笔字多少还有点点基础,这一下有用处了。后来他拿给赵部长,部长也点了头。自然,也等于李司长给上级完成了任务。

李司长还说:“我拿到部长办公室,刘智问我这是谁写的,我告诉他是你写的。”

从那以后,我认识了刘智。

后来李司长几次找我去他办公室商量工作问题,有时候还闲聊一些工作以外的话。有一次我对李司长说:

“李司长,肃反运动中,给我糊里糊涂扣的那叫什么问题,你说那算……”我话还没说完,他就说:“这我全知道,要不我就叫他们(王副司长和梁书记)去搞运动了,你不看我就不参与。唉!别提了,别提了。没法说。没法说。”也许他真有些看法,作为司长他没法说。

又有一次,我们正在他办公室谈一些事,和我同一个办公室的叶英进来说:“老赵,你的电话,去接一下”。没想到,他刚一开口,李司长就手

背向外一溜儿地连连扇动着手,冲着他耗不客气的说:“去,去,去……”。

这一来搞得我很为难。这位叶某是书记的红人,是党员,又是积极分子,不管怎么说,他来叫我接电话还是好意,却无缘无故,让司长给了一个难堪。(他心里肯定在怨恨我:“我好意来告诉你,有你的电话,你坐在那里,让司长给了我这么大的难堪!”)我赶忙对李司长说:“你刚才那么作,是轰他走,他会不高兴的”。

“嗨,他能干了什么?你说他整天在干什么?我这个司长当得就够累的,我不高兴的事多啦,还管他高兴不高兴!”李司长没好气的说。

我从司长办公室出来,心想:唉,我把书记、组织委员、得罪了,这回又得罪了党员积极分子,将来就凭这些人的肚量,他们将来一定不会善罢甘休.我看只能用北京人通常说的一句话来预测未来了,那就是:“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那个部属高校院长、副院长、教务长会议如期召开了,根据部长的意见,讨论了计划,我把讨论的情况和问题整理成材料,交部长办公室,各院校实际关注的是能得到部里给予更多的经费。

大约又过了一个月,李司长叫到我他办公室,对我说:“我要调走了,调到纺织工业部”。

我知道中央机关司局级干部是受中共中央组织部管理的,他们的调动不受国务院“各部之间不能调动,只能在本部系统调动”文件精神制约。

“祝贺你,相信会合乎你的意愿。你工作安排定,我会去看你。”我说。

“国务院有文件,暂时你调不了,就先在这儿干着吧,将来看机会再调吧。”他似乎在给我说宽心话。

“好在还在北京,会见面的。司里有的人不知道这事,我没给大家说。”他进一步解释道。

.....

不久,我听说他担任了纺织工业部纺织机械研究院院长。

整风

人的天职在勇于探索真理。

——哥白尼

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的暴行以后，国际上出现了多数共产党谴责斯大林，要求民主、自由的高潮。面对国际共运的动荡，毛泽东一开始也是谴责的，不主张苏联出兵匈牙利，过后不久，他就强调不能丢掉斯大林的“刀子”，认为匈牙利事件的祸根在“裴多菲俱乐部”，是“镇压不力”，应该军事干预，并且派刘少奇亲往苏联力主出兵镇压。

1956年底，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讨论波匈事件。会上毛泽东提出要整风。实际上自从苏共20大以至中共中央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口号后，回顾建国几年来政治运动，思想高压，强迫命令，待遇不公，特权盛行，在群众中引起了不满，同时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理想和现实的对照，显然差距很大，在群众的头脑里实际上也有了动摇。因此，这种情绪在一些地方也就暴发了出来，出现了一些罢工、罢课和请愿。

一直到了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这个文件说：“党在实现自己目标的斗争中必须同时改造自己；而执政党的地位使许多党员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一部分人还沾染上了特权思想。因此决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这时，群众心中已经蕴藏了许多从解放以来积累下来的诸方面的看法。只不过不敢说出来。那么整风是不是就可以说了呢？

说实在的，1943年，抗日战争我上高中的时候，在“外国地理”课上，老师讲起《德、苏协议》，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和法西斯蒂希特勒合伙瓜分了波兰。并且用强权把波罗的海三小国并入苏联版

图。这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所作所为？日寇投降后，苏联又在中国东北掠夺中国物资，在民间抢劫、奸淫，这都留下了恶劣的印象。

但是，共产党一直宣传着一个理想——人间最美好、最理想的社会主义天堂。青年知识分子都深信并向往这个天堂，因此，对苏联公然的侵略恶行，解放后只用一句“那是帮助他们（波、匈等）早日进入社会主义”就轻松地取得了理解和信任，对其恶行也就渐渐淡忘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的罪恶，这就使人对苏联以往的所作所为，重新有了新的认识和看法。

解放以前，北京旧官僚的住宅是有限的。解放以后，高官越来越多，按规定，副部级都得住独门独院，没收了旧官僚的房，用“经租房政策”收缴的好房大院也不少，随着高官的增加，越来越不够分配。为了照顾高级干部，还成立了“特供处”，供给他们质好价廉的紧缺物品。这些情况都引起了群众的意见。

对共产党来说，那个年代有些党员在“我们的天下”的思想指导下，工作作风，生活作风，道德品质，思想方法诸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当时我还认为中央的某些规定也值得推敲，比如有人议论的：“人分三六九等，饭作大中小灶，房有高中低挡，墓划二四八区。”把已经划分为多级、多种阶层的每一个人的生活、工作、饮食起居，直到死亡都分等论级规定了下来。原来说要消灭阶级，消灭一切不平等的等级制度，这样一来，人与人之间的分等论级的不公平岂不是比阶级社会更趋复杂化？共产党革命时还有所谓“背叛剥削阶级”，现在可倒好，从生到死你属于哪一级人，都要固定下来，统治者成了终身制，人民永远还生活在底层。难道这就叫共产主义？

共产党员被说成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但在机关团体，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党员能力不行也当官，群众能力再强，也只能作他们的手下，听他们的指挥，有时还是瞎指挥。这无形中就形成了群众动手，党员动嘴。群众干活，党员发号施令。高唱着为人民服务，实际上好象有了党员这块牌子就可以享受各方面的优惠，处处特殊化。说的是解放全人类，实际上是打下江山，享受胜利果实，如同改朝换代，当皇帝，封

侯封爵。

现在虽然中共党员要整风了,谁知道是怎么个整法?从学习材料中所说的:“和风细雨、不打棍子”,“不扣帽子”、“摆事实,讲道理”看,不知道能不能办到。

我从思想上认为所谓整风,也不过和他历来的作法一样,还不是走走形式,对这个运动没有太高的兴趣。好在毛泽东说了:“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走着瞧吧,能不参加最好了。

有一天,王万春副司长对我说:“现在党开始整风了,各高校已经动起来了,司里决定这段时间派你到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业学院了解整风动态。到校党委听听情况,看看大字报。两三天回来汇报汇报情况。有什么问题随时回来谈。”

“那我每天就不来班上了,直接从家里去了。”我说。

“好,你自己安排。”王副司长说。

领了这个任务,那几天每天早上我直接去了西郊两校。整风一开始,两校贴出少量的大字报,内容集中在住房和困难补助分配不公的问题上。有些教授住房很紧张,又要不到房;而行政干部,只要有“长”字,(比如科长、副科长)不管大小官,都可以分到宽敞的住房。同样,困难补助也是行政干部拿的多,教学人员则极难领到。

我认为这些意见都是对的。本来学校就应该以教学为主,当然也就应该以教学人员为主。分房和困难补助也应该照顾教学人员。只有把教学人员生活环境安排好,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全身心投入教学,才能提高教学质量。但是解放以后,教学人员成了思想改造的对象,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反胡风、肃反,几次运动把知识分子整得真是“夹着尾巴做人”,应付改造,无心教学,生活上的福利谁敢去争?与此同时,大量的行政人员进入学校,非但人浮于事,还增加了一些“官”职,什么院长、副院长、处长、科长、副科长……把学校搞得如同衙门。这些官员人浮于事,不但挤占教学人员的福利,还严重影响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

那天,我回去汇报工作。简单地对王副司长谈了大字报反映的是住房和困难补助问题。

王副司长说了一句:“妈勒个B的,意见还不少呵!”

我真不知道该对这位军人出身的副司长再说什么,默然走出他的办公室。

后来,我到了北京工业学院的人事处。该处的干部王无敌对我说:“部里光是检查我们的工作,实际上有些问题是部里的。你说我们要检查冤不冤?这不就成了‘代人受过’了吗?”

“什么问题?你说说看。”我笑一笑对他说。

“你看,薄一波的女儿,没考上大学,张连奎副部长一封信送来了,你说我们收不收?收吧,违反规定。不收,行吗?将来作检查,我们还得说我们违反了规定。你说,这事该怎么算?”

“我回去向部里反映,这确实是个问题。”

“你以为就这一档子事儿?象这类问题哪年没有!”王无敌又补充说。

回去以后我没有也不能对王副司长说,我一说,他必然会来一连串的“妈勒个B”。我更不能去找张连奎副部长。只好先压在心底。

机关发下不少学习材料,我看到:“4月30日,毛泽东主席对民主党派负责人的谈话。”他说:“大学生如果对党委制有意见,可以考虑取消;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从这些话看,似乎毛泽东是真打算听取意见要整风。

大约5月初,早晨上班,机关大门外站着许多人,不知道是作什么的。因为上班时间已经到了,我没有停留下来看,匆匆上了办公楼。

进得办公室还没有坐下来,王副司长就把我叫到他办公室。焦急地对我说:“啊呀!你来啦!发生问题了,四局有一个北京航空俄语专科学校,现在师生来了七八十人,非要见部领导。”

“那你就先见见他们吧!”我说。

“不,不,我不能见他们,四局是怎么搞的,我不了解,见了他们没法谈。这件事交给你,你想办法把他们支走,让他们回去。”王副司长推

托着不去接见他们。

“让叶英去吧！他可能了解情况。”我想推给那个党员积极分子。

“不行，不行，还是你去，尽量想办法说服他们，让他们回去，有什么意见留下来，以后答复他们。”

“我和四局没打过交道，根本不了解他们的情况，还是让叶英去吧！”我不想参与这类麻烦工作，认为这类事应该让具有“特殊材料制成的”身份的人去作。

“还是你去吧，事情很紧急，就快去吧。”王副司长还坚持让我去。

“我只能试试，因为我对四局的情况也不清楚。”我心想，碰到这种工作就让我来作，怎么那些积极分子生来就光会搞运动？工作一来就成了缩头的乌龟？为什么不让那些党员和那些溜须拍马，巧舌如簧的积极分子去作。

我匆匆下楼到接待室，会见了来访的师生代表，他们的校长也来了，看样子是一个老实忠厚的老头。通过他们的说明，我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原来四局成立这个北京航空俄语专科学校的时候，一直没有办妥教育部的批准手续。已经毕业了两届学生，分配工作之后，单位都不承认他们的“大专”学历。眼看又一届要毕业，针对这种情况，不但学生无心学习，人心惶惶，连教师也不安心教学，因为这也关系着他们的教师资格，究竟是“大专”老师，还是中学教师？当然，他们的理想是能够批准学校能为一个正式的“大专”。

其实这都是四局局长不按国家政策办事，根本不属于他职责范围的事，他随意作出决定，满不在乎，想干什么干什么，惹来了麻烦。

我很同情他们，但我明白，不要说司长，就是部长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为批准的权限在教育部，第二机械部无权批准。不过我认为，四局是部的下属机构，出了问题，找到部里反映问题还是正当的。我简单说明了情况，让他们在接待室等一等。回到办公室，我把情况告诉了王副司长，并且说：“他们坚持一定要见部领导。”

王副司长立即和我去找杨春甫副部长。

我们汇报完情况，杨副部长说：“赵，（这是他的一种既不说老，又

不说小的叫法)再去作一作他们的工作,把问题留下来,等咱们和四局研究以后再答复他们不行吗?”

“我已经再三给他们说清楚了,批准权在教育部,部里根本没权批,可他们非坚持要见部领导不可,看样子再谈也没用。”我向杨副部长解释说。

“好!那见就见吧!”杨副部长一拍腿,从沙发上站起来。对着他的秘书李翔说:“通知开开第六会议室,准备茶水。赵,你把他们带到第六会议室。”

“通知四局宋局长,马上到部第六会议室来,马上!”杨副部长给秘书李翔又着补了一句。

我随即到楼下,把那位老校长和师生代表领到第六会议室,一千人坐定,服务员倒了茶水,而后,我请来了杨副部长。

“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杨春甫,今天大家来我很高兴。咱们开门见山,我想先听听大家的意见。”

师生代表礼貌地站起来鼓掌,然后坐下来开始轮流发言。有的言辞虽然稍显激动,所谈的内容无非是没有大专资格,要求解决资格的问题。

“大家谈了许多,是什么问题我已经明白了。”杨副部长说到这里,四局宋局长接到李翔的电话,风风火火赶来推门进来了。他一坐定,杨副部长就冲着他说:“现在四局的宋局长正好赶来了,我认为大家反映的问题是对的,要求也是合理的。但学校当初是四局办的,不是部里办的。当初你们四局办‘专科’为什么不向教育部备案?问题存在了几年,也不积极向教育部申报,你这工作是怎么搞的!?……”

“我们申报了,教育部没批。”宋赶忙为自己辩护。

“你先不要解释,现在既然师生找上门来,部里就要负责。但这个权力又不在部里,而是在教育部。那么,现在当着师生代表的面,我责成你马上报教育部,申请报批大专手续,派专人去办。一有结果,马上通知学校。这个问题拖了几年,含含糊糊,影响同学,影响学校,这个官僚主义的责任完全在你!……”

杨副部长当面训斥了宋局长，宋连一句话也没说，只是不住的点头称是。会开到这里，师生代表都很满意，全体起立鼓掌表示感谢，高高兴兴的离去，结束了这场会见。

他们走后，我们一行人又回到杨副部长办公室。杨副部长笑一笑，对着宋局长说：“老宋呵，你不要绷着脸不高兴，这件事你说我不训你训谁？我不把你叫来这样说，他们肯走吗？”

宋局长哭丧着脸：“我作为一个局，能直接报教育部吗？本来就该部里报。”

“你也没往部里报呀，你想成立就成立？来一个先斩后奏呵？现在再报教育部不批，你自己负责，这我可管不了。”杨副部长笑着又说：“嘻，一上午什么也没干，就办了你这件倒霉事。哎，有的学生嘴巴还满厉害的。老宋，这事可就看你的了！”

“看我的，局能直接报教育部吗？”宋局长不愉快地说。

“你们别埋怨了，你们这叫‘该着’，别忘了，今年可是闰八月呀！”（民间有闰八月不吉利的说法）坐在一边的部长助理钱志道的这句玩笑话，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这一天，我看到了王副司长对比他大的副部长是那么的谦恭唯诺，对照他对下级的粗暴无理，俨然判若两人，我原以为他是个军人，作风习惯了生硬，没料到他也精于谄媚，对上一套，对下又一套的手法竟玩得如此纯熟。不禁使我感到做人的微妙。

这批天真的学生和那位老实忠厚的老校长得到副部长的承诺，并且责成局长亲自办理的满意结果，抱着美好的希望，高高兴兴地返校了。此后，我就再也没有听到过他们的消息。不知道一个多月后，他们是平安无事？还是背上了“集体闹事”的罪名，师生全被打成了右派？事后回味起来，这可真是郑重其事的演了一出戏。

接着，部里的整风运动忙了起来，传达、报告、学习文件、开会、座谈……

我也就不再去那两个学校了。看样子，毛泽东那个“自愿参加”的许诺，没有一个人敢于一试。即使你不是党员也根本没有人敢予提出

不参加整风,我只能是乖乖地参加共产党的整风运动。

机关从北河沿搬到三里河四部一会大楼不久,为了不把洁白的墙壁弄脏,部里决定不许在墙上贴大字报,集中了许多黑板,成立了黑板报编辑委员会,谁写大字报就写一个底稿交给黑板报编委会,稍加整理,找一些人抄在黑板上。

过了两天,书记梁心明通知我:“现在在部党委宣传部高部长领导下,成立了黑板报编委会,一共六个人,其中有你。有事听高部长的。”

这是谁决定的?也不告诉我。这一来,更不得不打消“群众可以不参加整风”的想法。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想让我干嘛就干嘛。真是莫名其妙!

紧接着又是学习,又是发材料,又是传达各种精神。我觉得毛泽东所说的:“摆事实,讲道理”,好像是一句真话。

周六,青年团开会,内容是响应号召,帮助党整风。既然整风,那就该对缺点、错误提意见了。我谈了在北京工业学院听到的张连奎副部长写信保送学生免试入学的事,紧接着就有不少人也谈起了这类问题。

一位叫做刘国海的,操着舌根发紧的山东胶东口音说:“这个事儿不新鲜,要说有的是,谭政的儿子,胡仁奎的姑娘。彭萃华的儿子……”

“彭萃华是什么人?”有人问。

“军委,军委训练总监,这官儿都小不了。”刘国海话说多了嘴角漾出了一些白沫。

刘增智发言说:“一说领导干部特权,就给人家扣平均主义大帽子。那天黑板报批评杨局长装修房子浪费的问题,张连奎副部长看了看说:‘胡闹’。究竟谁胡闹?浪费 13000 元装修费不浪费呵?那不是胡闹呵。”

“乖乖,13000 块,这可是一个处级干部九年的工资呀!”葛普神速地算了一笔账,吃惊地伸了一下舌头。

刘国海又操着胶东口音特有的韵味发言说:“张连奎副部长亲戚朋友的孩子没考上大学,他可以写信叫免试录取。录取了他送的,就要

挤掉人家该录取的,要说这是个缺德事。他要叫你去办,你思想搞不通也得办,不然还说你‘固执’、‘不听领导的话’、‘不好领导’这玩儿叫人怎么说呢?……”

……

大家七嘴八舌议论了一阵,有人说:“写一篇东西给黑板报,写一篇,写一篇。”本来我推举团支部书记王宝善写,后来多数人让我写,无奈之下我只好答应。第二天就写了一篇短文给黑板报:——

胡闹和特权

几个月前,黑板报揭发了杨局长一家五口,住房 300 多平米,公家还特意花了 13000 余元装修费之后,张连奎副部长说这叫做“胡闹”。

张副部长说的是黑板报在“胡闹”,我们认为杨局长一家五口住房 300 余平米,浪费 13000 余元装修费才真叫“胡闹”。

杨局长为什么能这样“胡闹”,而且得到张副部长的同情呢?显然这是官官相护各自的特权思想。

在旧社会,特权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愚蠢浪荡的少爷小姐,只要闹到一个特权者的“面子”,就可以免试进入最好的学校。但是谁又会想到今天仍然还有很多类似的怪事呢。

1956 年,外贸部办公厅主任胡仁奎的女儿没考上大学,张副部长的一封信,就免试送进北京工业学院的第九专业,遗憾的是,这位小姐太不争“面子”,暑假大有留级的危险。

如果留级,白学一年,就等于白白浪费掉 12 个农民一年的劳动所得。说起来这种事还多得很,诸如,谭政的儿子,彭萃华的儿子,薄一波的女儿不都是靠“面子”入学的吗?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当我们接受了这种上级交给的特殊任务的时候,如果稍稍流露出一点不满情绪,领导上还会指责你“固执”、“不服从领导”、“不好领导”……让我们蒙受一种莫名其妙的冤屈。

看来“特权”可以代替真理,这才真叫“胡闹”。

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危害很大，特权思想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但愿在这次整风中能真正整掉特权思想，不许特权者再“胡闹”。

这篇短文上午在黑板报登出之后，下午一上班，干部司领导干部科科长盖剑英来了。盖是山东人，老党员，长期作人事工作。为人诚实忠厚，工作认真负责，尤其是具有山东人特有的直爽豪情。

他的工作岗位，使得他知道不少领导干部见不得人的事。此前因为他在工作中坚持原则，拒绝通融，几次和司长王彬争论得脸红脖子粗，充分体现了他的为人和品德。

“嗨！你们知道吗？就数看咱们那篇文章的人最多，都说说到点子上了。”一进办公室他就大声说着，而且使用了“咱们”二字，自动地加入了我们的行列。

“老盖，你知道领导干部的事最多，也给咱来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嘛。”我们的团支部书记王宝善知道他了解许多事，给他来了个激将式提问。

“有些事不能说，也没法说。”他倒来了组织性，纪律性了。

“现在整风，怕什么？”有人催他说。

这时候部长赵尔陆的秘书刘智来了。一进门就对我说：“黑板报我看了，好，好，可是不行，还得来一篇。”

“你就来吧，黑板报欢迎。”我笑着对他说。

“太不象话，二局局长张召乱搞男女关系，搞了二、三十个，才给个劝告处分，什么事这叫？这也太不像话了。”

我笑笑问他：“你从哪儿听说的？”

“什么叫听说，部党组讨论定的，开会讨论我作的记录，那还有错儿。你们问他。”刘智说罢又让领导干部科科长老盖来作证。

“人家王彬司长说了，在国外愿意和谁搞就和谁搞，中国是因为有封建思想才不能随便搞的，我为这事和他辩论过，可人家是领导，咱有啥办法？人家还说我想一棍子把人打死，咱一点办法也没有。”老盖证明了确有其事。

“我们司武某某在公共汽车上要了一次流氓，又没有搞发生关系的事，结果留党察看一年，行政降一级，还把他调到陕西工厂去了。这和张召比起来差哪儿去了？”坐在一旁的余恒不平起来。

“喂，喂，你们干部司那个副科长，跟女同事开了个流氓玩笑，不是也受了处分了吗？”刘国海问老盖。

“别说那些处理完的事了，眼前这件事够不像话了吧？”刘智又把话带回来了。

“这事儿是够呛，是该说搭说搭。”

“这事儿也该写一篇文章，赵，还是由你写。”刘智说了半天又推到我这儿来了。

我不想写，争着说：“刘智写，你写，你写，你了解情况。”

“我事太多，这件事还没办完，那件事又压过来了，真的忙不过来，喂，你就写吧。”刘又推回来了。

这时候大家说：“老赵写，写吧，部长办公室事多，你就写吧。”我只好勉为其难地按照大家的说法写了第二篇短文：——

呼吁部长维护国法

绰号叫作“西门庆”的二局副局长张召，干了一连串诱奸、通奸的犯罪勾当之后，竟逍遥法外，对这件事谁不气忿？

奇怪的是，王彬助理却挺身而出，给这个罪犯作辩护律师。说什么：“在国外愿意和谁搞就和谁搞！”，“中国是受封建思想的影响，才不那么随便。”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甚至无理地给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扣上一顶帽子——“你的思想是想把人一棍子打死！”

“外国”不知道王彬指的是哪个国家？如果是指资本主义国家，乱搞男女关系，除了少数荒淫无耻之徒外，正直的人们是会同声谴责的；如果是指社会主义国家，那简直是污蔑。把新中国、党所维护的共产主义道德说成是：“因为受封建思想的影响”，更是天大的污蔑。

身为党委委员兼干部司司长的王彬，对那种“封建思想的影响”大

概是深恶痛绝的。但是,他又念念不忘另一种封建思想——“刑不上大夫”,在法律面前不能人人平等。因此,在这位辩护律师的庇护下,像张召、樊雨生等不少这类罪犯才得以逍遥法外。

犯错误就应该受到处分,比如教育司某科员,因为流氓行为受到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行政司某科员,不但被开除了团籍,还被判了徒刑。这是维护共产主义道德,对犯错误的同志进行教育的公正处理。然而有的领导干部犯了加倍的错误,又是一贯的,却只给了似乎起点缀作用的轻微处分。这说明有些人是受了王彬的庇护,同时也不能不令人怀疑,参与研究过这类问题的大部分党委委员跟王彬有着同样的思想。

毫无疑问,王彬和具有和王彬一样思想的部分党委委员,已经不配处理这类问题。

我们呼吁部长、副部长以共产党员的党性来维护共产主义道德,维护党纪,维护国家法纪的尊严。

几天来,连日开会,让大家提意见。其实那个支部组织委员杨贵星也一直跟着大伙儿说了不少这不合理,那有问题的意见。也还讲了些别人不知道的事实。

整个部机关热闹了起来。黑板报又增加了几块,工会有位老刘,在黑板报上配了一些漫画,形象地讽刺一些没有病却申请医疗补助,大买营养品的人。一楼大厅看黑板报的人熙熙攘攘。

我们和国家经委在一个大院。经委也是怕把新楼的白墙弄脏,在院里栽了几根杉篙,然后钉上蓆子,让大家把大字报贴在搭起的这种“草蓆墙”上。我们可以过去看他们的大字报。红红绿绿的大字报好象比我们热闹些。

同一个处的刘增智写了一张关于肃反的大字报,在开会之前,让我们几个人看,要大家提提意见,后来有人说没力量,主张干脆让我给改一改,我推托不过,帮他加了第一段,也上了黑板报:

拿破仑思想

法国专制皇帝拿破仑说过一句狂妄的名言：“朕即国家”。拿破仑已经呜呼一百多年了，岂不知今天在一些党员、党员领导干部头脑里还有着阴魂不散的拿破仑思想。他们自诩：“我就是党，党就是我”。于是乎有人就倒了霉，你对一位党员领导或党员有意见，就会说你是“对党不满”、“打击党员”、“诽谤领导”、“对抗组织”……

教育司有个马世聪，平常爱谈论领导的缺点，对问题好发表不同的观感，有时确也掺杂着一些牢骚怪话。比如他说过：“部里规定15级以上的干部才给房子住，部长真没有群众观点。”

其实大家也有同感，可是谁能想到他的这些言论在肃反时竟成了“证据”和“活材料”。领导者高声大喊：“大敌当前”，说他“打击领导”、“涣散组织”、“挑拨离间”。对他的一言一语都加以分析，追寻其中的“反革命”动机。

经过近一年的穷追、斗争和调查，他的这些言论虽然被整理出几十条，可一条也不能证明他是“反革命”。最后只好按家谱定罪，说他是“地主思想”。

老马带着沉重的精神创伤“受了处分”，相对地降了工资，被调走了。我们从中懂得了一个新道理：有意见就憋在肚里，免得遭殃。也许这就是领导所谓的肃反后的新气象。

可是，时间长了有人憋不住，对领导干部的意见不自觉的又从嘴里流了出来，可好，又是“对党不满”、“对组织不满”……

直到现在，领导上还认为对马世聪的作法是：“当时是正确的，现在也还是合理的”。还美其名曰：这叫作从实践中证明了的，真正的“辩证法”。其实，倒不如叫作糟蹋辩证法的“诡辩法”来得妥贴。

这一次我们想帮助党整风，党当然会欢迎我们。但是提了意见之后，那些领导者会不会在他的思想账上又给我们记上一笔“反党言论”账，秋后给我们算账呢？很难说。

已有若干事实证明，我们怀疑这些拿破仑式的领导者一点也不奇

怪。

他在大字报里说到的这位马世聪就是在肃反中被称为十岁当“汉奸”的人。他们都是我来之前的老人,已经同事几年了,平时大概比较了解。这张大字报反映了刘增智当初肃反时,压根儿就不相信马世聪是什么“汉奸”,并且认为肃反中领导的作法是错误的。特别是对“领导”整错人不承认,还诡辩,还要再处理被害人有看法。实在说,大多数入也是同样的看法,只不过共产党前几次运动把人都整滑了,有心眼儿了,有话不说。当刘的这张大字报拿给大家看时,也都是一片同意声。

此时,各部门都动了起来,大字报多,看的人也多。和国家经委通着,人流来来往往。

这个时期,社会上的整风运动也进入了高潮。部机关的大字报也进入了高潮……

“阳谋”？“阴谋”？

“自我批评”一变为“检讨”，再变而为“认罪书”，你就等于自动地掉进了“阳谋”或“阴谋”的陷阱中了。

——傅雷

中国有些事情总是那么政治魔术变幻莫测，这种复杂的政治，实在不是一些天真热情的青年人所能料到，所能对付得了的。他们绝对没有想到，二十世纪文明时代，所谓政治上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发起的这一运动，一夜之间成了“敌我矛盾”，进而成为片言折狱的“阳谋”。

号召鸣放还不到一个月，6月8日，《人民日报》突然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从此，鸣放来了个急转弯，说是提意见的是“猖狂进攻”，成了“敌我矛盾”。

12日，楼道的大厅里贴出了通告：“……13日下午一点，在部食堂召开全体职工批判右派大会……”。

开始批判“右派”了。

13日批判大会那天，进入会场，我才知道新技术推广所所长，著名的机械专家，曾任广东中山大学机械系主任，中国机械学会理事的李文尧先生，第一个被划成了第二机械工业部的“右派”。大会就是批判他。

当时食堂和礼堂是共用的。开会的那天，全部干部的座位占了一大半食堂，我随意地坐在后边的凳子上。无意中往旁边看去，李所长就坐在离我不远的左前方。他是一位归国华侨。在五十年代来说，他的穿着算是很讲究的。夏天他戴的细草草帽，当时，我除了在报纸的图片上看见朱德、刘少奇戴过之外，在北京差不多可以说极其少见。那时候不要说男人，就是女人也很少有人戴戒指，他却戴着考究的闪闪发光的戒指。尽管是专门针对他召开的批判会，他似乎并不在意，坐在那里还翘着二郎腿，搭在另一条腿上的脚，皮鞋锃亮，还不停地有节奏地晃动着，叼着的象牙烟嘴里不时飘散出卷烟的袅袅轻烟，完全是一副若无其事

的样子。

讲台上积极分子上上下下,轮番上台,念着他们早在会下准备好了的批判稿。高声喊喝,不时还喊几声口号。因为天热,窗户都敞开着,声音的效果极差。从断断续续的讨伐声中,我听着好象批判他的罪名是“技术第一”、“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

新技术推广所就在我们办公室的楼上。那天开完批判会,这个所和我很熟,见面总要说话的美术编辑老胡走到我身旁时,他没有说话,只是冲我摇了摇头,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过了几天,楼下贴出了一份通告,内容是:“……右派分子李文尧经过大家批判后,对自己的罪行没有正确的认识,态度极差,特决定,立即停止其一级教授、专家的待遇,并停止使用上下班接、送的汽车……”显然,这是给他来的一个下马威。

这以后,还组织了两次批判会,无非是讲了多遍的没有实际意义的车轱辘话,然后就转入“所内批判”,在新技术推广所内部开起了旷日持久的小型批判会。我上下楼常常看到他。虽然上下班没了汽车,李所长依然是昂首阔步,若无其事的样子。

使我没有想到的是,第二个全部大会批判,戴了右派帽子的竟是部党委宣传部高部长,怎么?他是部整风领导成员之一,还是整风黑板报的领导人,怎么?怎么他也成了右派?

在食堂兼礼堂的大厅里开了三次批判会,我才弄清楚他的罪行是,在审查群众给黑板报写的稿子时,出于感慨,在稿子上批了一些话。比如:“有恨铁不成钢的情绪”,“我们以往是忽略了群众的正当要求”,“以后我们是应该注意一下特权思想了”……根据这些批语,就把他定了个全部第二号的右派分子。在批判大会上虽然他作了几次狠批自己的检查,那时候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得到“检查深刻”的评语。永远是不老实、态度不好、检查不深刻。后来这位在解放区当过编辑和记者的老干部,没多久,就被接连不断的内部小会批得精神状态好象大病了一场。脸庞立刻消瘦了下来。

紧接着,行政司的罗钰被点名成了右派。工会在黑板报上画漫画

的大刘,也因为画了讽刺领导干部没病申请医药补助大买营养药的漫画被点名为右派。劳资司的小谭也被点了名。八局的小张……

过了几天,我们司在支书的布置下,在司里开了一个针对我的批判会。这个会倒也气氛平和,和平常的小组会差不了多少,因为批判我的人,正是在整风座谈会上,议论大字报所说的那些问题的人。大字报他们应该也有份儿,因此,从思想上还没有联系到“反右”上来,也许当时他们还有一分“良心”。还没有想到“嫁祸于人”的政治手法。这时候倒真是“和风细雨”。尽管党支部书记作了布置,一时态度还没有转过弯儿来。他们先是指出我有错误,说什么:“对领导干部提意见不应该那么提”,“对肃反有错误认识”……还没有拿出“右派分子”的帽子。

我记得很清楚,1956年11月,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刘少奇明白白的说:“……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

谁来监督?如何监督?群众提意见不正是监督吗?国家领导人不是号召大家对官僚主义、特权思想提意见吗?为什么大家提了意见就拿斯大林给布哈林扣的帽子——“右派分子”来收拾群众?

不是动员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怎么又变成了“言而无信”了?

不是说过“不打棍子,不揪辫子。”吗?怎么扣起大帽子了?

我从思想上还没有想到这个政治运动的真实意图,甚至以为一切都得遵循:“摆事实,讲道理”的原则来行事。不会再和肃反运动那样胡来,那样“无法无天”。还以为政策是上边制定的,上边会按政策办事,下边总是会偏离政策的。所以一开始我就用说理的态度对付他们。一开会,我就先和他们来“摆事实,讲道理”:——

按照摆事实,讲道理的前提,咱们先摆摆事实:“杨局长一家五口,住房300多平米,合理不合理?花13000元装修合理不合理?这是黑板报揭露的。我写的大字报的内容根据的是黑板报。并没有添枝加叶。这一点有没有问题?”

二局副局长张召搞了二十多个女人,是赵尔陆部长的秘书刘智说

的。他参加了部党组关于处理张召的讨论会，他作的记录。这件事和事实有没有出入可以和刘智对质。

关于肃反内容的大字报，实际上是刘增智写的，可以由他来谈。肃反运动中被定为“十岁当汉奸”的马世聪，肃反以后调走了，究竟是不是汉奸？也没个说法呀。”

我认为我写的大字报没有错，并且极力争辩。他们也知道所谓批判就是强词夺理，因为自知理亏，那批判又是支部布置的，批的一点劲也没有。我还天真地认为这一次应该讲究政策了。所以我在开会时还继续坚持“摆事实，讲道理”。

在所谓批判会上，我强调：“首先查对事实，事实有出入，那是我的问题，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如果事实没有出入，没问题，接下来就该讲道理了。那么杨局长装修花了13000；许多人的子女入学不考试，全由张连奎副部长个人保送；张召副局长搞了二十多个女的。确定有这些事，这些事批评得对不对，应该不应该批评？批评他们的大字报对不对？符合不符合刘少奇讲话的精神？符合不符合整风的要求？”

当然他们支支吾吾也没人能说我写的大字报的内容是虚构。然后我又强调：“既然都是事实。如果属实，而且性质是错误的，为什么不应该批评，不应该提意见？为什么提对的意见还要批判？”

他们无法针对我的发言，他们只是含糊其词，空洞无物地扣一些“污蔑领导”等内容的帽子。争来吵去，乱哄哄，又胡批，又争辩开了两天会。

这以后休会三天，三天以后再开会，党支部已经策划好了，一开会就给我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了。不管你什么事实，也不让你摆了，也不和你再讲什么道理了，根本就不让我发言。大帽子“污蔑领导”，“污蔑肃反”一个劲儿扣过来……

“楚客莫言山势险，世人心更险于山”，在团小组整风会上讲了许多，什么谭政、彭萃华、薄一波、胡仁奎……的子女保送入学的事例，极力推举我写大字报的刘国海，摇身一变竟成了积极分子，在批判会上，满嘴白沫，绞动着他那山东胶东口音的舌技，给我大扣帽子，把他说过

的事例居然反扣在我的头上,这使我非常吃惊。人怎么会有这样卑鄙的?这也做人吗?

在批判我的同时,也攻击团支部书记王宝善,几乎在同时把王宝善也打成了“右派”。王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是一个很聪明、有头脑的人,出身清贫,勤奋好学,原来的李司长也很器重他。可能他对那几位积极分子的乱扣帽子没有积极支持,引起了他们的嫉恨。也招致支书梁心明的不满。早在这里工作的杨贵星,(就是那个整天没事,玩儿“性骚扰”,出差为的是“找对象”的组织委员),自然对有能力而且影响他往上爬的人是必欲剪除。那个被李司长评价:“他能干了什么?他能干了什——么——?”也是借出差找对象的叶英。这些人平时论工作稀里糊涂,看不见成绩,一搞运动,就来了神儿,尽管这两人此前也说了不少“问题”,后来因为是书记的左膀右臂,想必是暗中得到书记的保护,他们讲过的那些“错话”也就不被追究,摇身一变立刻成了积极分子,从党内极力攻击党员王宝善。胡说什么:“青年团作为党的助手,他是团支部书记,不跟着党走,跟着赵文滔走!”那个王副司长就会嘴上挂一句“妈勒个B”,头脑简单,(后来听说他把小裸姆肚子搞大了,也许这是他的强项),全听那个曾经干过“兰衣社”特务的书记梁心明的摆布。反右积极分子队伍的骨干竟是由这么几个人渣组成的。因此,很快就向我和王几乎同时祭出了“右派”帽子,开会大力批判。

那个贼鬼溜滑的刘国海火线升官,免去了王宝善的团支书,立刻把这个家伙委以团支书。当上官之后,此人自知得到了党支书的保护,那就更是如同疯狗一样,乱咬人。

虽然他们祭出了“右派”帽子,我从心里一直认为我没有错,仍然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但此时支书梁心明已经作了布置和动员,已经根本没有辩论的可能,完全是扣帽子,以势压人。我摆事实,他们不让我说话,我讲道理,他们指定积极分子发言,根本不许我发言。除了“污蔑领导”、“污蔑肃反”、“矛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外,就是“态度恶劣”、“猖狂进攻”、“拒不低头认罪”、“必须打掉他的嚣张气焰”、“继续坚持错误立场为自己狡辩没有好下场”、“负隅顽抗,死路一条”、“态

度恶劣,后果自负”……几乎没有一句具有真正内容的话语。

我的确也有知识分子的迂腐,后来中央下来一个划分右派分子的十条标准,我又写材料把我的大字报内容和“十条”套不到一起的理由加以说明。这就又遭到一次批判。谁给你去套那“十条”?谁允许你辩解?谁让你说话?又是一阵帽子扣过来,更加提高了嗓门儿,声色俱厉地嚎叫:

“右派分子 XXX 极不老实!”

“右派分子 XXX 必须地头认罪!”

“右派分子 XXX 污蔑领导,污蔑肃反,猖狂攻击社会主义不容抵赖!”

……

有一天我从三楼下去,走在二楼的楼梯处,干部司的小李正要上楼。我们本来很熟,当时擦肩而过却互相不敢打招呼。他看看上下没有别人,有意地放慢脚步,好象对空气说话一样:“别再跟人家辩论了,这是什么形势了,越辩越落一个态度恶劣,听着点!”这真是在反右运动中的一个特殊形式的友谊忠告。我也感觉到他们已经策划好要把我打成右派,在这种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我知道有理已经没有用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不辩论,硬着头皮听他们狂吼乱叫了。

这时候我才明白这又是一场主要是收拾知识分子的运动,“整风”不过是个幌子。而且比反胡风、肃反运动要厉害得多。这时候全国报纸已经收敛起请求帮助的微笑面孔,推出了大量杀气腾腾的讨伐文章。“众口毁誉,浮石沉木”,大批鸣放过的知识分子已经陷入罗网,处于八方无助,被动挨打的境地。整风运动已经显现出打击知识分子的真实目的。种种迹象显示运动是由上而下的,原来以为上边会掌握政策,下边总是会有所偏离,实际上政策就来自上边。

《人民日报》社论又出来了——《工人说话了》。是的,我也明白了,你们可以说工人说话了,你们也可以说“农民说话了”,你们可以任意说什么人说话了。因为你们有权!这一场运动实际上已经明确地显示出共产党权力的主宰作用了。

接下来就让我在一个空办公室“检查、反省、写检查”。他们则去一

个个批判另外五个”右派”了.我也就落得个清闲,独自一人在办公室,按照他们强定的口径,违心的坐在那里编造什么“检查”、“检讨”、“认罪书”。把想不通的问题通通包下来,在强权之下,已经是只有低头认罪之份,毫无据理争辩之权了。这检查材料还不能写得很快,快了他说你应付,也不能写得太慢,慢了说你不认真检查。既然整人,他就不让你痛快,必须让你难受。有时候我从报上抄一些咒骂右派的新词儿,添进材料里去。把材料凑成一份“集谩骂右派语言之汇总”,让他们再也难于挑刺。写完材料我先不交上去,总在那里翻来覆去的看,并不是在改,而是看这些被逼出来的谎话是不是自己说出来的。一有空,我就坐在办公室一个人喝茶、看报、琢磨这运动的发展和结局。

我也能听到隔壁办公室在批判王宝善。这是个聪明能干的同事,想不到我们竟被几个二流子“反右领导班子”给打成了右派,被他们无理胡批。

刘增智也被打成右派了。这是一个狡猾的家伙,关于“肃反”的那张大字报是他写的,他非让我帮他修改,修改过后竟成了我写的,与他无关了。大言不惭地还要批判我。后来还是一个叫陈金耀的同事指出原稿是他写的,这才不得不“认罪”。陈金耀没有想到的是,反右还没有结束,梁心明书记就说:“这个陈金耀的妻子在一机部工作,她是广东人,家有亲属在香港,叫做‘港澳关系’,不适宜在部里工作”。联系过一机部以后,反右还没有结束,夫妻双双被调到南昌去了。那时候把一个人处理掉,易于宰一只鸡。充分体现了权力的力量。你只要胆敢不顺从书记,就会被处理掉。有点正义感的陈金耀,立刻就被书记给收拾了,这就是代表党的书记的品德。

刘增智使尽了油滑手段,最终还是被批判并划了右派。最后发落到甘肃张掖去了。

刚刚调来还没有一个月的两个武汉大学毕业的邹志勇、邓启仕,还没开始工作就参加了运动,批判我的会上,他们还发言,不知道怎么回事,没听见他们说什么,最后也成了“右派分子”。而且邹竟然和我一样处理的重,也被送劳动教养了。一年后我在茶淀农场见到他,情绪非

常低沉。

有一天,我从楼上下去,经过干部司,听到批判盖剑英。“啊,他宣扬右派分子赵文滔的大字报!……”坏了,老盖也被划了右派。这位领导干部科长是老党员,但他的顶头上司王彬就是倡导:“在外国愿意和谁搞就和谁搞”。袒护张召搞二十多个女人的干部司司长。整老盖没有别的原因,只能是报复。这充分也证明是“权力”的优势。

这时候我从报纸上看到高等学校和民主党派的反右已经很快进入了高潮。整天报上全是大批右派的消息。有些问题听起来很严重,但这些人被剥夺了辩解的权利,宣传机器完全由共产党掌握着,情况搞不清楚。我感到《宪法》已经完全被弃置一旁了,哪里有什么言论自由?

我单独在一个办公室一边写所谓“检查”,一边琢磨,仔细想想,我们好象完全是受骗了。

我自从知道庆祝“国庆”的口号中“万岁”是毛泽东自己加的,就感到他有帝王思想。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所说的平等、自由……越来越渺茫。许多特权,他一句“特权是工作需要”就堵住所有人的嘴。

李先念、彭德怀、张霖之都说过:“第一任皇帝都是厉害的”,他们,恐怕还不止他们也把他看作皇帝。

许多重要事件都显示出他的霸气。政协开会,要通过“共同纲领”,他说:“我们四分之三,他们四分之一,不举手就不给他们饭吃”!所谓“民主集中制”,重在“集中”。从胡风事件就可以看出,实际上完全是他一手操办。

斯大林逝世,党内有人认为,顺理成章地社会主义阵营的大旗将要落在毛泽东手中。他将成为“世界共运”的领袖。不料,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震撼了社会主义阵营,在重大的波、匈事件发生后,国际上英、美共大量党员退党,意共领袖陶里亚蒂对苏共、斯大林进行了一系列理论抨击……

毛泽东大概是在惊愕之后,镇静了下来,意识到面临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不但影响他掌控国际共运大旗,这种民主、自由的潮流也将影响其国内的绝对领导权。他立刻决定拾起斯大林“那把刀子”,运筹

帷幄,策划方略,承担重任。他没有批判斯大林,他不谈造成这种纷纷反抗暴力、压迫、专制、独裁的局势是由于斯大林的暴虐,而是一个拥有知识分子精英的“裴多菲俱乐部”。他总结教训说:“匈牙利镇压不力。”力主出兵匈牙利,他也不谈斯大林、苏联对中国的危害,只是大批“修正主义”,把赫鲁晓夫搞臭。

此时,人们才敢谈一些苏联的问题。

二战以后苏军驻军东欧各国,成了一种合法性。直到组成“社会主义阵营”,似乎不能有国家观念。

从共产主义理论讲,所谓“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International就一定要实现”……都具有“世界性”,也具有“扩张性”。其目的就是不仅在自己的国家,而且要在世界实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因此,在实际行为中的“侵略性”就被认为是合理的,合法的,也是不允许讲的。那么小国占领大国行不行呢?在大国驻军行不行?出兵干涉内政行不行?显然不行,那就是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也要搞“强权政治”。所以,大国出兵小国都是对的。

那么东欧国家能不能有国家观念?有没有主权?匈牙利的纳吉上台仅有十三天,他提出的“普选”,维护国家主权,对于匈牙利来说,难道有什么错吗?

1957年8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为什么要实行劳动教养》,同时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我立刻意识到这个决定是针对“右派”的。我仔细看了这个决定以后,又找了一份《宪法》仔细查对。查对中竟然发现《决定》有一项严重违法之处。那就是它篡改了《宪法》。

《决定》一开始就说它的制定是根据《宪法》第100条。它这里说的《宪法》第100条就是完全被篡改了的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00条的规定,为了把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为了给“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人一条悔过自新的出路。」

这些说法和《宪法》的真正第 100 条，根本就不是一码事。《宪法》100 条的真正内容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

原以为不会像反胡风运动那样荒唐了。现在看来，这一次大概要比之还要荒唐。居然把《宪法》都给篡改了。这难道不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是右派犯罪，还是篡改《宪法》的人犯罪？这到哪儿去讲理去？这还有没有公理？北京中山公园有一个汉白玉牌坊，上面写着《公理战胜》，哪里有什么“公理战胜”？分明是战胜公理！

后来，报上说：“整风进入了高潮”，“中央机关一天贴出了多少大字报云云”。我看了后期的大字报，简直折服的五体投地。大字报名为给党提意见，实为肉麻吹捧，能够把人训练得写出这样的大字报真不容易，“群众”能学会这样写作技巧和水平也不容易。我们这些堂堂正正的知识分子实在是望尘莫及呀！

这种大字报用绳索挂满了楼道（新楼不许用浆糊沾贴）。报纸还连篇累牍地说群众是如何如何提出整改意见，党又是如何如何进入了整改，这可真是一场有趣的大戏。

使我非常费解，《光明日报》的大右派储安平早在解放前的 1948 年就说过：“民主在国民党统治下是多和少的问题。在共产党统治下则是有和无的问题。”（一说此话是胡适所说）。既然他早就知道共产党统治下民主是“无”的情况，那他为什么还要从香港回来？真难解释。所谓“大小头儿都是党员”，本来就是事实，能用什么理由来批他？怎么，明明你就是那样，还不许别人说？这不是在扮演“皇帝的新衣”吗？

我常常独自坐在那间办公室，除了对付那份永也写不好的检查，就是回想这场整风和反右。

1956 年 2 月 24 日，开完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个人迷信及其后果》捅破了这个所谓的竹幕。把斯大林在苏联国内、党内的作法，远胜过沙皇的罪恶揭露了出来。这就给经过多少年宣传在人们心中确立的理想——共产主义打了一个问号。

从国内的情况来考虑,解放八年,随着一连串的胜利和政权的巩固,实际上毛泽东有一定的帝王思想,我听说“五一”、“十一”节日口号中,“毛主席万岁!”是他自己加的。他很重视权力的获得,绝对不允许有丝毫疏忽而影响到权力的掌控。他自己不止一次地显示了其独断专行的作为,整掉谁,拔高谁,都在他一句话。知识分子们满以为解放后中国人民将会一步步走向社会主义的人间天堂,不料变化却是相反的。“生气勃勃的理论,后来会蜕变成法西斯式的专政工具”(顾准语)。胡风问题实际上全是他独自在操纵。办事原则是“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为了严密掌控权力,从来他都不惜错整别人来保全自己。在巩固和严防权力有失方面,他也是“宁可错整,也不放过”。以前有些事不大明白,渐渐地知道了政治的欺骗性,他一再提倡的民主集中制,虽然有“民主”二字,那不过是个幌子,实际上只有“集中”,并无“民主”。“集中”就是他一人说了算。

他在各个运动中,历来依靠的都是文化不高,左得幼稚,头脑简单,只能听话,不会独立思考,只要对自己有好处,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干的人。早期,他搞农民运动时,他在其名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指出:“地痞流氓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

解放之后的历次运动,他都用“保护积极分子,不要挫伤他们的积极性”的政策,把运动中干尽害人勾当的所谓“积极分子”保护下来,作为以后运动中的“打手”。

这部分人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单位往往是工作能力不行,道德水准低下,但在运动之后,却又能升官发财。他们不一定有什么政权意识,他们考虑的是能通过整人获得好处,“毛主席指到哪里我就打到哪里。”平时谁给我提过意见,我对谁不满意,谁得罪过我,这些账都可以借机来清算。借机来整对方。

所以,这个运动上、下有别。毛泽东是为了政权而整人,暗自策划整掉层层他所认为不可靠的人,以巩固他的“王权”。清除他一向敌视的知识分子,达到一声号令,全国无人敢说话的境界。以利推行愚民政

策。进而国内政策和国际形势变化相呼应,为他接斯大林的班,走上国际共运的“宝座”扫清道路,进而成为全世界的“领袖人物”。他一挥手,“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世界就进入了共产主义。

而下边的各单位头头并没有这种“雄心”和“野心”。他们大都着重于借机一方面当打手,可以升官发财;另一方面可以借机剪除不满意的下属。平时工作中有些不听话的,总是有“独立思考”毛病的,总是有“合理见解”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敢于和领导争论的,敢于揭露领导干部问题的,不盲目捧场的……,而这一类人往往多是知识分子。借着政治运动就可以狠狠剪除。从整个运动说,统一叫做“反右派斗争运动”,实际上上、下考虑有别,利益配合“政治”又可以一致。就这样结成了从上到下的打击、惩治知识分子的队伍。然后再借以历次政治运动的那帮“积极分子”。这就上、下合力,“公私兼顾”,组成反右的力量。共同合力把中国多少万无辜的知识分子打成了“右派分子”。

有些有头脑的领导干部虽然对运动有看法,慑于种种压力,为了自身的安全,也不得不违心地随波逐流,摇旗呐喊起来。

最使我困惑的问题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有人格道德观念的传统,为什么一开展运动,平时看来是正常的人,他也对你表示友善,赞成或者推崇你的见解,一旦书记说了话,他们一夜之间就会变成乱咬人的疯狗?解放之前,我没有参加过工作,在学校同学之间都是友善的交往,常常是几十年友谊不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际关系。也许解放前后统治方法不同是重要原因。解放前,著名知识分子清华大学教授朱光潜,由于思想意识不同,可以说:“我不买美国面粉”。你不买美国面粉,但你可以到其他任何地方去买别的面粉。不愿意在这里工作,可以到其他任何地方去工作。而解放以后,政治统治十分严密,深入到任何角落,你离开这个单位,全国没有任何单位敢于要你,有一份档案无形地跟着你,你要吃饭,没有粮票,在全国你一粒米也买不到。立刻把人陷入一种没有饭吃的困境。有严密的户籍控制系统,你不可能随便变换你的住地。你就是到农村去种地,那里也没有你的地可种。它可以把人完全置于绝境,置于死地。大概这种统治方法就好像在

每个知识分子的颈部套了一根绳索,随时可以抽紧,控制着你的生命。这就使得个个知识分子不得不乖乖地就范,乖乖地按照它的指令说话。除非像梁漱溟先生那样不怕死地坚持真理。

反右后期,民主党派的重要成员纷纷落马,所有的大大小的右派都叩头如捣蒜似的检讨求饶,尽管加在头上的罪名并不符合实际,都不敢辩驳,一律低头认罪,大概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经过这次由不厌其烦地说服、动员让人提意见,到迅即转为聚而围剿知识分子,总算让我弄明白了一点道理,理想、信服、景仰……的梦幻破灭了。原来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大公无私,没有自由、民主、平等、公道,什么社会都有“阶级”,数不清的“阶级”,永远是“阶级”压迫“阶级”。

至于究竟是“阳谋”,还是“阴谋”?从历史的情况看,“阴谋”的成分居多。

这时,我和王宝善、盖剑英已经确定是“右派分子”无疑了。刘智是赵尔陆部长秘书,受部长的保护总算逃过了这一劫。(后来听说他从国防工委办公厅主任的岗位上退休,这都是50年后的后话了)。

已经进入冬季,有一天我从窗外看到邓启仕、邹志勇在楼下院里大筐大筐地抬煤。这是对“右派”的惩罚吗?为什么只有他们二人?为什么没有我们?

1958年1月份的一天,我从楼下上楼,在楼梯走道遇见干部司的小李,他依然是光说话不抬头:“行政司的罗钰前天被送劳动教养了”。

我心头一怔,这小李是不是在告诉我:“要被劳动教养了”?因为他不敢明说。

既然提意见是假,被提意见者就会报复,张连奎是副部长,王彬是司长兼助理,再加上有问题的杨局长,张召局长,这些人有权,不报复则已,要报复必然疯狂。想想这“提意见”,不由得哑然失笑,这政治玩笑我何曾见过?

反正国务院那个《决定》已经明显地说明是针对右派的。听天由命吧!

劳动驿站

日子和力量都贡献给了劳动，
而报酬就在劳动本身。

——列·托尔斯泰

1957(丁酉)年的春节即将来临。因为这一年有个闰八月,农历春节姗姗来迟,一直要顺延到1958年的3月20日。

差不多一周了,一直是阴沉沉的天气。那些在反右派运动中的积极分子,都在兴高采烈地购办年货。这一传统节日除了给他们带来喜悦之外,还会得到升迁和奖励的希望。有些所谓中间状态的人,则胆战心惊地暗自庆幸逃过了这一劫,能够平平安安过个年就很不幸运了,看不出他们有什么高兴。言谈话语都透着谨小慎微的样子。而我们这些被戴上铁帽的右派分子哪儿有心思过年?个个愁眉苦脸,家人也一同忧心忡忡,搞不清未来将怎样“收拾”我们。

就在春节前三天,1958年3月17日,又是一个灰蒙蒙的大气笼罩着天空的阴霾天气。没想到这个使我终生难忘的黑色日子,竟成了我今生炼狱之旅的开始。

早上,我从甘家口宿舍步行到三里河四部一会大楼北楼上班。说是上班,其实那时候的上班就是坐等“处置”。走进办公室也就是20分钟左右,梁书记把我叫到司长办公室。那位在部队当过师长,有时候开口就来“妈勒个B”的王副司长站在桌旁,一言不发。梁书记一边把一张表递给我,一边对我说:

“部党委已经批下来对你的处理意见:‘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你签字吧!”。

至于批下来的那份东西,究竟给我罗织了哪些具体罪名?根本不让我看,也不读给我听,完全是“暗箱作业”。递给我的是一张“劳动教养申请表”,只是让我签字。其实,那“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在1957年8月公布时,我就估计到是针对右派的,曾经反复看过

多遍。文件的第三条规定：“需要实行劳动教养的人，由民政、公安部门，所在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或者家长、监护人提出申请，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或者他们委托的单位批准。”明明规定由所在机关提出申请，为什么偏偏要我越俎代庖提出申请？再说，“申请”是个人主动请求，是自愿的。按中国文字的字面意思应该理解为：可以主动请求去，不主动请求当然可以不去。看着他们那种不说理的架势又何尝允许你自愿？分明是百分之百的强迫，而且你还得承认是自愿。还得由你申请，这天下的“理”简直让他们玩弄得瞬息万变，别人都没有和他们讲理的份儿！一张申请表摊在你面前，等于是：“你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此时，你要再去琢磨“申请”、“自愿”等字义，或者探究国务院的规定，究竟该由谁来“申请”？进而与之稍作理论，不痛痛快快签字，说不定又会给你带来莫名的麻烦。其实，我的这种想法也是天真的，他们早报送上边获准了，按照他们的工作惯例，现在只不过进一步逼你走一个“自愿”的过场而已。实际上，我已被剥夺了表述自己想法和公民自由的权利。面对这种情况，我只有签字，别无其他选择。

这一刹那，一下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从此，我被戴了一顶无形的令人诅咒的右派帽子，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了。

我调到第二机械工业部两年来，没有看见王副司长和梁书记干过什么正儿八经的业务工作。平时无非是看报、喝茶，闲聊天。间或办点事，也不过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而已。一到有了“运动”，他们立刻好像被注射了兴奋剂，来了神儿，似乎搞运动、整人才算得上是他们的正式工作，他们唯一的强项。想必他们在工作历程中早已摸透了一条规律：运动这等好事一来，只要被赋予了权力，不需要费脑子，也不需要知识，重要的是抛开道德、良心，必要时来点诬陷和捏造，拼命往左走，即使“左”出人命来，最终获得的依然是提级、升官。好在两年来运动不断，“反胡风”完了就是“肃反”，紧接着又是“反右”，他们可真是：“机遇连连，官运亨通”。不要看他们口头上也挂两句马列，真正的马列书籍恐怕他们压根儿就没看过，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他们的头脑里实际上也是一堆糊涂概念。如今，全司32人，划了6个“右派”，占

18.75%，超额完成任务。此时，他们头脑里唯一的概念那就是：收拾完这六个人就等着升官吧。我是我们司第一个被他们处理的右派。从宣布批示，签字，材料封入档案，用其铁腕办得还算快捷利落。我回头一看，才发现身后已经有一位警察在等着，立刻我意识到人类最可贵的自由竟如此简单地被剥夺，也无须出示任何手续，就完成了这种“文明逮捕”。那时，我才真正体会到列宁给专政下的定义：“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的真谛。作为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特别是失去任何权利的知识分子，面对这些背后有国家机器支持的，靠整人起家的家伙，我只能乖乖地就范。

其实，他们完全明白，这些知识分子没有一点反抗能力，从办公室悄悄带下楼，上了自己单位的车，无声无息地，无人知晓地走了。这种“静悄悄”的逮捕，就连机关里也不会有多少人看到。许多人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个人是如何消失的。把一场十万人以上的大逮捕隐蔽得安安静静。

直到20年后的1979年，落实改正右派政策时，我在新工作单位听一位好心的政工科长张学禄告诉我：“当初二机部送你劳动教养还真格费了不少心思”。

我还挺纳闷儿，我问他：“58年我单位的事你怎么知道”？

他说：“我看了你的档案材料，上面有记载：第一次报送公安局，公安局以‘此人不够条件’拒收。第二次又报送，公安局又以‘不符合政策条件’退了回来。第三次再报，非送不可，公安局才收下了”。

他只简单谈了这么一点，足以说明，当年王副司长、梁书记为了在“反右”中立功受奖，为了积极贯彻落实毛泽东“阳谋”的实现，为了讨好级别比他们高，我在大字报中点名批评了的张连奎副部长、王彬助理（或者张、王怀恨在心，在背后指示他们处理时要‘狠’，也未可知），必然给我编了一些见不得人的“黑材料”。当年不让我看，落实改正右派政策时，新工作单位也没让我看，被付之一炬了。所以至今我都不知道当年第二机械工业部批准对我的处理意见，究竟给我罗织了些什么具体罪名。这些都是1958年后，又过了二十年后的话了。

签完字，梁书记说：“回头我通知你家里把行李和生活用品送去”。

我一句话也没讲。当时，我模模糊糊又想起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斯基》一书中说过的话：“无产阶级专政不受法律约束。”（大意）唉！既然根本就不讲法，还说什么？有道是：“无法的法，乃为至法。”不讲理就是唯一的真理。既然是权力决定一切，我只能是逆来顺受了。

接着，部里派了一辆卧车，把我和那位警察送到二龙路派出所。这里的派车并非对我的“关照”，而是因为当时北京正在施行对右派的大逮捕，如果没有车来作“掩护”，大街上一群群押解着被逮捕的右派，恐怕是“有碍观瞻”，政治影响不好。一路上那位警察没和我说一句话。车到了派出所，他把我带到一个空房间，态度和葛地对我说：“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还有别的人，等他们来了再一起走”。没有人问过我吃了午饭没有。好像我不是动物，不存在什么吃饭问题。

约莫快到下午三点了，又送来一个人，大约40岁上下，哭丧着脸，一言不发。不一会儿，派出所派了一辆吉普车，把我们拉到宣武门外一个叫作半步桥的地方。吉普车沿着一堵高高的长长的大墙，开到一个小侧门停了下来。我抬头一看，高墙之上还装有电网，及至从小侧门进去，走到一幢三层楼近处，才注意到每个窗上都装上了坚固的铁栅，每层楼梯口都有把进入楼层的空间完全封闭的大铁栅，只留一个小铁栅门供人出入，显然这是囚禁犯人的地方。此时，那个在派出所一直没讲话的同类突然讲了一句话：“啊？这是个监狱呀！”

上到三楼，铁栅门口放着一张桌子，堵着多半个门，留着只可以走过一个人的空隙。新送来的“右派”，必须把随身带的钥匙、小刀、指甲剪等杂物交给坐在桌旁的警察。收缴了身上的杂物后，我被安排在312房。进房以后，看见房间里已经是人满为患，一个不足20平米的房间，竟安排了30人。房间中央留了一条大约50公分的出入通道，两边席地住人，简直是人挨人，人挤人，仿佛排列在罐头盒里的沙丁鱼。夜间到厕所去方便，回来就会找不到自己睡觉的位子。房间里的空气别提有多么龌龊了，这些先来的人不要说洗澡，洗脸也不具备条件，烟味、脚汗味、说不出的难闻味道，都闷在这个门窗密闭的房间里。我在北京

机关里工作了六年多，还真不知道北京城里有这样一所囚禁人的地方，这是第一次开眼，也算增长了见识。

这些陌生人都是因为“右派罪行”被送来的，都是一生没来过这种所在的天真的知识分子。谁都没有料到说了些实话竟然罹此横祸，被投进监狱。大家的心情是恐惧、茫然、无奈，每来一个新伙伴，都要围上去焦急不安地探询一番，并且坦诚地介绍自己的情况。很快我就知道了大部分人的情况和来历：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翻译徐鸣珂、北师大讲师吴士俄、北大俄语系助教刘佐汉、建筑设计院工程师李邕光、冶金工业部干部安树大、自然博物馆高光明、生物制品研究所张友梅、石油学院调干生王惠云……。从他们的交谈中，我才知道这里是宣武门外半步桥著名的北京第一监狱。因为对右派实行大逮捕，一时间，北京可以拘押人的地方都被右派分子撑得暴满，没有适当的场所收容，临时借了这所监狱几幢楼，专门收容中央机关和高等院校送来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

经过大家的议论，特别是清华大学毕业的“老北京”高光明的讲述，才知道这所监狱清代就有了。高光明念中学时，是一位绘画、书法爱好者，他在监狱外围的附近，对两个小门楼作过写生，听几位老人说：这两个门楼是清朝修建的，南边的小门楼是监狱的入口，门头有砖刻的“匾额”，上刻“金绳”二字，以儆示被绳之以法的罪犯由此门进入。北边也有一个小门楼，算是一个出口，门头上也有一块“匾额”，刻有“觉岸”二字，以劝戒走出监狱的人。解放前，这里叫做第一监狱，解放后仍沿用此名，也叫半步桥监狱。半步桥的所谓“桥”，实际上只不过是几块堆砌得像一个小板的石板。因为从这里走过的罪犯都带着脚镣，迈步艰难，只能半步半步挪着走，所以叫做“半步桥”。

半步桥呵！半步桥，这名字起得多好呵，在这大千世界，只要有人有意识的推你一把，你就不得不跨过这个小桥，坠入这人间炼狱。

下午五点，给一顿晚饭，抬来一大桶清水煮白菜帮子放在门口，每人发给一舀子白菜帮子汤，再给两个细长的窝头。我真纳闷儿，那么些白菜心哪儿去了？是供什么人吃的？为什么全都是剥下来的白菜帮子？

要专门找这么多白菜帮子,不要菜心,也是件不容易的事呢。

一般人对这顿饭没有多少兴趣,因为大家从机关、学校进入监狱,环境和心理反差太大,心情复杂。不是说“行政处分”吗?怎么抓进了监狱?家里人的生活怎么办?这和逮捕有什么区别?未来又将如何?……心事重重,都有许多难解的问题。那天晚上,因为家人找不到“监狱”,没有送来被子,只好和建筑设计院李邕光挨在一起,身上搭了他的被子,人挤人,只能侧身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一动也动不了。

来到监狱之后,我始终弄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当初我们并不想提意见,是党一而再,再而三地动员大家提意见,等到我们诚心诚意提了意见,不考虑提出的意见对不对,不分青红皂白就给扣上右派帽子。再说划右派党也制定了标准,可又不按标准办事,想怎么划就怎么划,想划谁就划谁。这作法简直是“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搞政治运动哪有这么干的?。我提的意见都是领导干部的工作和生活作风问题,根本就没有涉及党和社会主义。明明是对个人提的意见,非要胡乱上纲,扯不上反党反社会主义,也要给你扣上。不是说“摆事实,讲道理”吗?谁允许你摆事实?谁又是和你讲道理啦?糊里糊涂搞了半天,后来听说是一场“阳谋”。说的是“行政处分”,却送进了监狱。难道说这不是一场政治大骗局?躺在冷冰冰的水泥地上,思前想后,我想起了英国戏剧家毛姆的一句话:“一颗诚实心灵的唯一缺憾是轻信”。

对于茫然的未来,谁也揣测不出将会是什么结局。大家怀着不安的心情惦念着家人,不知道有多少母亲、妻子和兄弟姐妹是在泪水中共度过1958年,这个中国历史上值得思索的春节的,唉!

大墙外的春节热闹非凡,大墙里的我们却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舅)。一舀清水白菜帮子汤,一小块咸菜疙瘩,两个窝窝头。在这苦涩的春节之夜,听着大墙外传来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平添了我对老母、妻子和在天津读大学回来过春节的弟弟的悲愁,通宵达旦,难以入眠。对未来的命运想得很多很多……

同房间的人大都认识了。此前,在机关、学校挨批判,写检查,听候处理,没有人敢和我们讲话,都处在绝对孤立的境地;如今,“同是反右

挨斗人”，一起聚在监狱，说起话来倒无所顾忌了。倒成了真正的“畅所欲言”。初二上午，喝完那碗白菜帮子汤，凑在一起议论了起来。

有的说：“不是说行政处分吗？怎么就逮捕了？”

“这不叫逮捕，不是没给你戴上手铐嘛！”接着就会有人回应。

“《国务院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是不是专门针对右派的？”

“应该是，应该是。”

“这个决定是根据宪法第 100 条制定的，宪法第 100 条的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哪个右派的言行违犯过这些内容？”

“这么一说，既然右派分子没有一个人违犯宪法 100 条的错误，国务院这个规定的依据是不是有点不好解释？这是不是有点‘罚不当罪’？”

“再说啦，《决定》中说的‘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宪法 100 条里也没有这内容呀！这《宪法》能随便加内容吗？……从法律的角度说，这样随便加，算不算下法修改了宪法？”

“既然拿《宪法》说事，那么《宪法》89 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我们也没有经过法院呀？”

“对呀，就因为这一条抓人有点碍手碍脚，所以才来了个劳动教养嘛！这一来，机关、学校就能把我们发落到这儿来，这就不需要什么法律手续了。只要单位头头想处置你，他就能处置你，完全不受法律的约束。这可是一种不得了的权利呀！”

“谁赋予了他们这种特权？”

“当然是共产党毛泽东啰。”

“要知道，不法亦是对你宽大，不是不能法办。你还得感恩才对。”

沉默了一阵，似乎有的人若有所思。接着又一番议论开了。

“听说秦朝的法律还有：‘不得以命令代法律’。”

“你拿两千年前的秦朝说事太离谱了。问题的关键是，这样一来，就等于赋予了所有单位的头头以无视法律的特权。整你的时候，他有

权根据需要任意解释法律,你说什么也没用。”

“嗨!已经把我们划在人民的对立面了,还谈什么法律保护呢。”

那碗白菜帮子汤挺咸的,口渴也没有水喝。房间里还有几位闷在角落里抽烟的,心情自然是烦躁不安,不知道该干什么才好。过了一会儿,一些爱发议论的人又聚拢在一起聊了起来。

“哎,好像苏联有个‘劳动营’的法规,劳教规定是不是从苏联生搬硬套过来的?”

“苏联要有,学过来也够呛,斯大林冤死了多少人?莫洛托夫的老婆,加里宁的老婆不是都被斯大林送进了‘劳动营’吗?”

“不要瞎议论了,那个《决定》肯定是针对右派的,拿着一些流氓、盗窃、诈骗犯当陪衬。到现在了还不明白?说你是流氓、盗窃、诈骗犯,你敢怎么着?”

“说咱是反革命就是反革命?”

“那可不,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

“哎,哎,哎,停止,停止,适可而止。别瞎聊啦,搞不好再给你加点罪名你有什么说的?还想戴手铐(手铐)呀?咱们都长点记性,嘴巴把严点吧!都进监狱了,再不注意就要升级了。”

“对,对,……有道理,有道理。”

“……………”

一阵沉默,大家都不说话了。

忽然,我看到角落里有个孩子,十五、六岁的样子,坐在一个行李卷上。好奇地问:“哎,这孩子是怎么回事?”

“一个中专生”,吴士俄说。

“中学、中专不是不划右派吗?”

安树大说:“说归说,干归干,这就叫品种齐全。好在没有小学生,要有儿童右派,那才叫热闹”。

“那孩子挺老实”。李邕光说。

也许这房间里的囚友又有助教,又有讲师,机关干部也都是大学毕业,还有大学学生,相对而言文化程度都比他高,他一直坐在那里听

大家议论,有时笑笑,有时面容惆怅,说不定是在想家。

3月24日深夜,突然传来命令,让大家起来马上捆好行李。发给每人两个窝窝头和两块腌萝卜条,在房间里待命。

“这回真正是处理我们的时候到了。”坐在我身旁的吴士俄对我说。他长我八岁,解放前西南联大毕业,人生经历比我丰富。此刻,他意识到我们的命运又要面临一个紧要关头。

房间里的30个人像军营里的士兵,快速地捆好行李,不过行李捆成什么样子的都有,谁也不会捆得和士兵一样好,鸦雀无声地坐在行李上等待着又一次可怖的“宣判”……

门打开了,一个管教人员站在门口发布着命令:“听着,听着!每人背好自己的行李,一个挨一个顺序走,不许拉下!听着,不许拉下!”

有些人把行李较快地收拾在一起还凑合,行李一上肩,却东倒西歪的背不动;也有背起来走几步就放下的;怕拉下距离,在地下拖着行李走的……从楼上到楼下,已经累得一身大汗了。有一位因为打架进来的非右派同伴,看了这种情景,说了一句北京土话:“这可是真要知识分子的‘盒儿’钱哩。”有人能听懂,有人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反正没工夫回应,急着从三楼拖着行李往下忙活,生怕拉下距离挨骂。

当我们走出监狱大楼,院子里停放着不少红色的SKODA大轿车,车已经发动了,柴油发动机震动得轰隆作响,车的周围荷枪实弹的士兵林立。安装在楼顶上的探照灯光芒刺眼,照得院里一片通明。猛一回头,一个惊人的画面映入眼帘,楼顶上竟然架着几挺机枪,直对着我们这群手无寸铁的右派分子!一身大汗被院子里夜半的冷风一吹,想着对准我们的机关枪,不由得颤栗起来。背后不知道哪位同类还发出一阵阵微微颤抖的“得得得,得得……”牙齿撞击声。

大轿车坐满人之后,车厢前后各站着一个端着冲锋枪的士兵。车从大院里徐徐开出,在大客车车队的前方,有七、八辆军警摩托车开道;后面有几卡车头戴钢盔,手端冲锋枪的武装士兵压阵。大家坐在车上茫然、惊恐地不敢作声。此时,夜深人静,街上稀少的行人不免驻足,用惊异的目光注视着,在他们看来必定押解的是重犯的车队,大概也

惊叹数量竟然如此之多,这森严的阵势估计他们也是难得一见的。

深更半夜,从车窗往车外窥看,车行路线好像是前门大街,估计是要押往前门火车站。四十分钟左右,果然 SKODA 大轿车直接驶到火车站的月台上。我们被命令从车上下来,在管教干部和士兵的喝斥声中,分别被领到不同车厢门口,排队顺序上车。在列车上安顿好行李,规规矩矩坐定之后,才发现前后门有两位手端冲锋枪的士兵把守,当然,子弹是上膛的。这种阵势对“押解”一词的解释,可比字典里的解释准确而形象得多。

火车刚一开动,押解人员高喊:“一律不许开车窗!听着!一律不许开车窗!谁开车窗就不客气!”想必“不客气”就意味着“开枪”。

安静下来之后,大家不约而同地小声互相探问:

“这是要往哪儿去呀?”

“反正不是兴凯湖,就是茶淀。”

“会不会是白城子?”

“说不定要弄到北大荒哩。”

“要到北大荒,咱这身衣服可顶不住。”

“唉,你不看这阵势?从半步桥监狱出来,那冲锋枪就一直对着你,把你弄到哪儿就去哪儿吧,就别再问了,越问越心烦。唉,说什么也没用,咱就听天由命吧!”

“不许讲话!不许讲话!”押解人员又在高喊了。

车过天津,我感到很累,头靠在靠背上睡着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又被押上几辆卡车,手臂都被反绑着,人人脑后还插着一个写了姓名打着红叉子的黄色亡命牌子。卡车周围挤满了观望的人群,人们一阵阵地高喊着:

“庆祝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

“坚决拥护镇压右派分子!”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

卡车上的右派分子们低着头,满头大汗,我颤巍巍地偷偷向北窥

望,啊!那不是京华印刷厂吗?这是要到菜市口刑场啊!啊!啊!突然,我被人推了几下。坐在我身旁的徐鸣珂一边推我,一边轻声喊:“快醒醒,快醒醒,快到了!”我揉了揉惺忪的睡眠,才意识到在这紧要关头,上帝竟赐给我这样一个恶梦。

凌晨四点,火车嘎然停下,大家纷纷从车窗往外窥望,忽然有人压低嗓音说:“茶淀站,茶淀站,看见站牌了。”接着带队的管教队长命令全体下车。

一出车厢,立刻感到气温比北京低得多,冷风吹来,压得喘不上气来,我们来时穿的冬衣显然挡不住这里的刺骨寒风。手脚很快被冻麻木了。

就在此时,有位想不开的右派难友跑了。他的这一蠢举,害得我们被命令一律坐在车站外土埂旁边等着。这等待实在是一种“罚冻”,许多人坐在土埂旁冻得瑟瑟发抖。有些专门新派到车站“接”我们的骑兵,打着马在我们周围跑来跑去打转兜圈子。说实在的,这位老右也是个标准的书呆子,他光想逃跑,却不去想五十年代已实行了国际上独一无二的户籍、粮票制度,在这种制度的严密控制下,你就是跑到天边,没有粮票,哪来饭吃?没有户口,谁敢收留你住宿?书呆子呀,书呆子!

忽然,管教人员高喊:“起来,起来,往中间靠拢!”

骑兵已经把逃跑者抓回来了。他低着头,被两个士兵架着拉到中间,搭拉着脑袋,一副可怜的狼狈样。一个队长大声喊着:“看见了没有?呵!谁想跑?呵?谁就是这个下场!你们身前身后都有骑兵兜着圈儿巡逻,你往哪儿跑呀?呵?你有多大本事?呵!你跑,不到二十分钟就抓回来了。当着大家的面,马上给他戴上手铐!你们看看,谁跑就是这样的下场!对于不认罪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们有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手段!呵!你们必须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呵,抗拒只有死路一条!……”

听完训斥,大约在摄氏零下十几度的气温下,大家背着行李列队缓缓艰难行进。这样一走,才把已经冻僵的手脚慢慢恢复了知觉,缓了

过来。一边前行，一边极目远望，眼前是一片荒原。

茶淀，隶属河北省宁河县。位于天津市东北，南临沧州。我搞不清京剧《野猪林》中林冲发配的沧州，是不是就在这一带，古代沧州就属天津，据此推想，这一带不毛之地肯定是当年发配犯人的地方。这一大片“海退后地”海拔只有一米左右，地面只生长少量蒿草，连树都没有，是一望无垠的盐碱地。附近的芦台也是无树无草，一望无边的盐场，灰茫茫无边无际。我甚至推想，附近的农民说不定大部分是古代被发配到这里“改造”者的后裔。因为除了他们之外，没有人愿意主动“申请”到这里落户谋生。

不管怎么说，我们被发配到茶淀是已成定局了。我从心里庆幸时代毕竟进步了，不会在我们的面颊上，刺上罪行和发配地名的“金印”了。

一路前行，逐渐有了灌、排水系统的沟渠，一条条运输甬道两旁的大田里，看出来残雪下有绿色的小麦。小麦虽在越冬期，尽管还覆盖着残雪，但这一点点微绿不由得使人心头泛起一丝清新和希望。听同行者议论，解放后，共产党把这里开辟成国内最大的劳改农场之一。农场可以关押五万人以上的劳改犯在这里改造。眼前的这一部分沟、渠、甬道和麦田，大概就是几年来，先后不计其数的劳改犯陆续开垦的。

经过大体上两个小时的行程，我们到了清河农场（茶淀各农场的总称）三分场。稍事休息，队伍到齐，就开始编队分组。百十来人一队，十七、八人一组。每组住在一个用砖植砌的窑洞式房子里，比半步桥可就好多了。这些窑洞东、西、南、北都有，形同一个大四合院，方方正正，中间还有个小小礼堂。南面有一个唯一的大门。我们一千多名右派分子就在这里开始了劳动教养生活，这就是我们的劳动驿站，将来会不会再搞到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

住房的床铺是用砖头砌起来几个支点，上面架上树枝和柴棍，然后用稻草找平。地面有扫不完的尘土，墙上泥皮剥落得凹凸斑驳，稻草中也少不了尘土。此时谁还考虑什么卫生不卫生，一个人差不多有60公分宽的铺位，比半步桥宽敞就是极大的满足。半步桥囚室那个小孩

也分配在我们组。他叫佟信顺。匆忙安排好住所后的第一件事是列队听管教队长的训话。

管教队长个头不高,穿一件军棉大衣,一脸威严。开场白就让我们有点寒心:

“呵,你们这些人已经成了社会不要的人了!呵,你们犯了严重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罪行!你们是党的敌人,国家的罪人!党为了挽救你们,给你们生活出路,呵,把你们收容到这儿进行改造,要把你们改造成自食其力的人!呵,来到这儿就要先把你们在机关、学校那一套收起来,老老实实劳动改造。你们要认清自己剥削阶级的反动本性,呵,你们剥削人民,吃着人民的饭,还要反人民,反党,呵!这一次党宽大处理你们,没有办法办你们,你们应该感谢党,感谢伟大领袖对你们的宽大,呵!今后你们只许老老实实劳动改造,争取重新作人。呵,谁不老实,不要忘了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头脑里要搞搞清楚!呵,……”

“下午安顿住所,呵,明天下地劳动!”

有的事越来越叫人糊涂,我们怎么就成了剥削阶级了?资产阶级最简单的定义应该是:“占有生产资料,剥削工人剩余劳动的阶级。”我,我的家庭剥削过谁?我们是一文资本没有,房无一米,地无一垄,挣的是共产党国家机关发给的工资,怎么就成了剥削阶级的?这,这……这是马列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如果说我是剥削阶级,那恐怕共产党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都成了剥削阶级。这,这和谁讲理去?

再说,为什么要法办我们?我们犯了什么法律的哪一条?是谁违反了《宪法》?……

第二天就出工劳动,每队由两个队长监管,大家扛着铁锹,抬着箩筐,以组为单位下地干活。

劳动的任务是积肥。四顾茫茫的田野,既没猪圈,又没马厩,到哪儿去找肥料?拿着工具站在地头发楞。队长走过来挺不高兴,指定了两个小队长,然后冲着大家喊:

“站在那儿愣什么?看来你们是得好好改造改造,你们吃的都是农

民劳动种的粮食，光会吃，不会干，不劳而获，满脑子剥削阶级思想！脱鞋脱袜子！下河！那河里有多少肥料，你们就是看不见。”

挨完训还是不知道肥料在哪里，小组长走上前，进一步请求队长具体指示，管教队长才说“河底的黑泥就是最好的肥料。现在河里结的冰很薄，用锹一捅就破，冰下只有大概 10 公分水，砸开冰，挖底下的河泥肥料！”

春寒料峭，又有冰，又有水，虽然任务确实艰难，为了积极劳动改造，大家不顾寒冷，脱掉鞋袜，卷起裤管，下到河里去捞那冰冷刺骨的黑淤泥。我下到河里不到半小时，脚已被冻麻木，冰茬把小腿和脚踝拉了许多小口子。淌出的血和泥浆糊在腿、脚上，只感到疼，看不清伤口在哪里。

我们组有位黄若海，是文化部电影局的编导。反胡风时被定为“胡风分子”，可能下乡劳动过，有点劳动经验。他一直喊着让我上岸去，他有长筒胶靴，还有一双手工缝制的高腰棉布袜子，有这两件东西，他站在河底挖黑河泥，既不冻脚，也不沾泥。他把艰难的挖黑泥工作承担了下来，让我们在岸上用箩筐抬走。

黄若海多年从事电影工作。解放前夕，他在香港导演拍摄了电影《小二黑结婚》。他从香港回来是一片赤诚之心投奔共产党的。回来以后，他拍演了电影《英雄司机》。据他说，他和胡风压根儿就不认识，只是他的朋友认识胡风的朋友，结果也把他弄了个胡风分子。对这件事他很不满意，整风时提了些意见。这意见不提还好，一提，给他来了个“新老账一齐算”，又加了一顶帽子——右派。既然送来劳动教养，只有努力改变自己。当时我估计他已 40 岁出头，干起活来很卖力气。他为人热情，乐于助人，心胸豁达，在一年的“劳教同窗”中，和大家处得很好。

我的身体条件属于中等，自然不敢和各大学来的 20 来岁，身强力壮的小伙子相比。从河底上来，我也没条件洗脚，只好坐在那里，靠微煦的阳光把腿脚上的黑泥晒晾得半干，然后用手剥掉。一边剥，一边又怕队长看了训斥，连袜子也没穿，把脏脚伸进棉鞋，顾不得脏，赶忙就

去干活了。正好赶上一道从半步桥来的,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张友梅和我搭配,二人抬一个筐。老张 50 多岁,解放前成都大学外语系毕业,国民党统治时,在经济部驻上海办事处工作。解放后,经过思想改造,在生物制品研究所图书馆工作。他倒好,孤身一人,赤条条没有任何牵挂。我俩搭拌儿抬筐,配合得挺好,从此,我们在一起劳动了很长时间。

过了不久,管教队长晚上训话时,宣布了几条纪律和注意事项:

1.从现在开始,可以和家里通信。这里的通信地址是:京山线,茶淀农场三分场,X队X组。但是写好后不许封口,一律交队部,检查后由队部统一封口发送。(实际上后来家里的来信也全部由队部拆阅后,才发给收信人,没有问题的家人的通信自由,也在这里被剥夺了。)

2.晚上收工回来后,不得走出大门。谁走出大门即按逃跑论处。

3.经向队长说明情况,得到批准后,允许通知家属来场探望被教养者。

4.家里确有要事,劳动教养表现好的,经队部批准,可以给假一周,回家探望。

我们同组的杨路是北京大学数学系学生。人很聪明,体力差点,劳动挺卖力气。他没有在社会上工作过,人很单纯,来到农场后,常常说话口无遮拦。听了队长的训话后,他说:

“我现在发现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要想使人有一点满意或者满足,必须首先把他的一切拿走或者剥夺,然后还给他一点点,他就会满足。也就是说,把我们的一切都剥夺了,还给我们一点点原来就属于我们的,我们也会感到满意或者感激。”这些话不知被哪个好事者报告了队长,队长认为是反动言论。不久,杨路受到“关禁闭”的惩处。所谓“关禁闭”,就是把人关在一个没有窗户,小得只有容下一个人坐在地上空间,让你睡不得睡,坐不得坐。每天只给两个窝窝头,难受而挨饿。杨路没有想到,大家也没有想到这句话就要遭此磨难。本来他就瘦,几天禁闭下来,瘦了一大圈儿。从此,大家讲话都十分谨慎,生怕惹出麻烦。

有一天,我在大院里遇见了二机部的同事罗钰,他是行政司的,认识,但不熟。在机关时,知道他被打成右派了,没想到他也来到这里。小

伙子在机关时比较精干，到了这里可就成了霜打的茄子-----蔫儿了。他的问题因为另有他故，不便细问。

在机关时，我听说有位老干部局长，娶了一个比他小许多岁的妻子。大概是因为“老夫少妻”，生活不协调。罗钰乘虚而入，和人家“少妻”搞上了。直搞得“少妻”和“老夫”离了婚，又和他结了婚。那老干部嚙不下“夺妻之恨”这口气，不断地找组织和领导闹，非要让处理罗钰不可。最后，还是通过法院给罗钰定了个：“判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人还在机关上班”的处分。老干部对这样处理一直不满意，耿耿于怀。这次反右，岂肯放过如此良机？抓住一言半语，加以发挥，上纲上线，新老账一齐算，把他打个右派，那是轻而易举的事。不过他是在“少妻”离了婚才与之结婚的。并不是没离婚，半道儿钺走了人家的“少妻”。搞不清这种风流韵事算不算右派罪行？也许可以算是右派的罗曼蒂克罪行之一吧，也未可知，实在让人费解。

有一个时期，我们加夜班，从很远的地方挖黑泥冻块，三个人一辆车，用车拉回来。吃过晚饭，每人发两个窝窝头，拉着车去十四、五里之外河沟里打冻方（用镐把冻成冰块的黑泥一大块一大块地刨下来，这种活儿叫作“打冻方”）。装满一车，半夜时分拉到中途一个叫作北砖窑的地方，已经是浑身大汗，棉衣湿透，脖子、脸、头上都冒着热气。走到这里，大家常常要躺在路旁避风的田埂下休息几分钟。一躺下来就啃着冰冷的窝头，没有啃上几口就都不由自主的进入了梦乡。也就是几分钟的功夫，热气腾腾的棉衣渐渐变得冰凉了，又把我们从梦中冻醒，揉一揉惺忪的睡眼，接着又拉车上路了。回到住所已是夜半两点，大家疲惫不堪的和衣而睡，清晨六点多，又该是起床的时候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劳动，抬箩筐，拉车，挖沟，打黑泥冻方，从河底抬到岸上装车，肩头磨起一层厚厚的老茧，手掌也常常磨起血泡，手茧也容易裂成血口子。从北京来时穿的衣服，整天风吹、雨淋、日晒，都已破烂不堪。这时候，从我们的衣着、皮肤、外表、劳动熟练程度来看，可以说已经变成一个典型的劳改犯了。

有一天晚上，队长训完话后说：“明天不出工，在家学习”。

“这又发生了什么事？”从来还没有这种事，这……大家对每一件与常规不一样的事都免不了猜测与联想。

第二天早饭后，发现每个队增加了两个队长。原来所谓的学习是：

1.我们来自不同的单位，农场又让每个人写一份详细简历和具体的“右派罪行”材料，从摆放在队长桌上的档案袋看，估计我们原单位的档案都已经转到农场来了。2.一组一组的站在院里，一个人一个人地轮流到队部，在一种表格上摁上自己的十指指印，这种黑指纹印还不是手指正中点印，而是必须左右滚动手指，把指端两旁的纹脉也印上。差不多每个手指指端印成约4平方公分的一个大黑印记，十指齐全地构成一份“罪犯指纹留痕”档案。

人人从队部印完指纹印，揸着两只黑手出来，无不心情烦躁。

在处理右派时一再声明是“行政处分”，和犯罪分子有严格的区别，然而实际情况又使人搞不清“行政处分”和“犯罪分子”究竟区分在什么地方？每个揸着两只手从队部出来的右派分子都沉默不语，都意识到这是一种被列为“刑事犯罪”必须履行的程序，是对罪犯存档用的铁证，心头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疑虑和苦涩。我们这里有些事向来都是很难说的，说一个样，作又是一个样，行政处分变成刑事犯罪又有什麼新鲜的？我们曾被投入大墙、电网、铁栅的监狱，曾被武装押解，被骑兵监视，现在又进一步制作罪犯指纹留痕档案，剥夺了通信自由，一言不慎就要“坐禁闭”，这和对待刑事罪犯有什麼不同？这些事怎麼说呢，和谁说去呢？洗完了黑手，大家都坐在宿舍一言不发。说不清命运又将有什麼变化，心情忧郁而沉重。

而后，又给每人照了一张一寸的照片。右派分子们个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常年不刮胡子，没有一个人带有镜子，没有一个人想过“修饰”，可以想象，那照片洗出来，将是活脱脱一幅“刑事罪犯”的标准相。我不禁为我的档案中增加了这两份特殊材料感到悲伤。我究竟犯了什麼罪？这难道不是一出最大的冤案活报剧？

刑事犯罪分子冬、夏都有农场发给统一的黑色囚衣，看起来还算整齐。而右派分子属于“劳动教养”，不享受这种“待遇”，不发给衣服。

我们来时穿着什麼样式,什麼颜色衣服的都有,经过风吹日晒,早已破破烂烂,活像一帮流浪汉。历史上曾有过“九儒十丐”的说法,如今这批知识分子右派落到这个地步,恐怕和乞丐也差不多了!不,还不如乞丐,乞丐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我们是敌我矛盾;乞丐有自由,我们却被剥夺了自由;乞丐可能通信不受限制,而我们被剥夺了通信自由;刑事犯罪还有刑期,我们劳教却是无期!……

从拓荒到大跃进

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占有，
特别会由于工作日的延长和劳动的强化而提高。

——卡尔·马克思

冬去春来，我们这批右派分子被全部派到西荒地，去开辟新的农场。这个新的农场叫作“584”。为什么叫作“584”呢？后来才知道，1958年处理的右派数量忒大，被劳动教养的右派也相当多。农场已经容纳不下，这就需要在那一望无垠的荒原开垦新的分场。新的分场以1958年的58为代号，建一个分场就以1、2、3……为序，组成一个场名。就叫作，581、582、583、584、585。那时候有没有586呢？有的，那就是大部分当时在农场命归黄泉的右派分子的荒冢——没有任何姓名标记的乱坟岗子。

西荒地是一片寸草不生的盐碱地，没有住房，没有树，没有水，是典型的未开垦的处女地。大家从三分场出发，经过长途跋涉，不知道走了多少里路才停下来，个个口干舌燥，人人疲惫不堪，放下行李，环顾四周的一片荒原，不由得惆怅起来，这将如何生活和劳动？

等到人都陆续到齐之后，管教队长讲话了：

“大家注意了，这里可以说一无所有，这是考验你们右派知识分子的一次机会。一切都要自己动手。呵，先解决住的问题，两个组搭一个窝棚。我划好地段后，各组就派人轮流尽快挖地沟，呵，一会儿拉来杉篙和蓆子，我再告诉你们怎样搭窝棚。呵，现在开始挖地沟！”

所谓挖沟，就是在荒地上挖一条大约50公分宽，45公分深，14—15米长的一条沟，把这条沟就当作窝棚里的走道。两旁没挖的部分就形成了两边的大通铺。然后，再用杉篙搭成一个人字型的顶棚架，盖上蓆子就是顶棚，顶架两端各留一个出入口，就是门，这样就构成了所谓的“地面窝棚”。每个窝棚通道两旁的通铺可以睡20—30人。当天下午就把这种简易窝棚建好了。

这里一滴水也没有。晚饭是由其他分场用马车从十里以外拉来的。水是定量供应,每天每人只能分到一茶缸子水,而且好像是蒸完窝头的蒸锅水,微呈黄色,且有涩味,这点水根本不够喝。人要是缺水,比饿肚子还难受。

已经十多天了没有刷牙,洗脸。有一天早晨,在不远处我发现一个4平方米大,两米深的大坑,这是以前有人打算挖出地下水才挖的。坑的里侧还有计划地留着由上而下的台阶,坑底有一层浅浅的水。我满以为可以弄到一杯刷牙水,下到坑底才发现有些被风吹来的大便纸飘浮在水面。这是因为没有厕所,干把人在旷野随地大小便,大便纸也随地扔的结果。这肮脏的景况打消了我刷牙的念头,咬紧牙关,干脆一两个月不刷牙,不洗脸。

新的劳动任务是修筑防洪堤坝,每天到工地要走七、八里路,工程项目是一边挖灌、排水渠,挖出的土方抬到旁边修筑成防洪堤坝,一举两得。挖土方的都是壮劳动力,他们把铁锹打成半筒状,锹头磨得锃亮,如同刀刃,当挖到表层下的湿土时,一锹捅下去,可以挖出大约50—60公分长,20公分厚的一大条湿土,差不多五锹就能装一箩筐。各高校来的学生,二十来岁,正是年青力壮的时候,在劳动中互相较劲,两人一副抬筐,有的人一次抬三个筐,看了使人敬佩。没有料到的是,我们组已年过四十的黄若海却和一帮年青人也较上了劲。他也抡锹剷土,五大锹下去,也能装一大筐。我们体力差的和他们相比,真是望尘莫及,自愧不如啊!

没有几天,6—7米宽的灌水、排水渠已经逐渐形成,旁边防洪堤的高度也日见加高。然而每天200多斤的土筐不离肩,十几个小时下来,我们这批右派分子都累得人困马乏,天天在地头赶忙吃完饭,回到窝棚,顾不得被褥又湿又凉的难受,倒头就能进入梦乡。我们组年龄最大的是北京青年艺术剧院演员戴涯。1956年,北京上演郭沫若编的话剧《虎符》时,他饰演剧中魏王一角,得到郭沫若的夸奖,在北京也是名噪一时。反右一来,他成了演艺界的大右派,“右派罪行”还上了报纸。如今已届花甲,满头白发,每天劳动归来,夜里睡下腰腿疼痛,总是哼哼

呀呀呻吟不已。年龄只有十六岁的小右派小佟,来自一个中等专业学校。头上戴一顶帽子,帽沿里的衬纸板已经折断,一片歪着的帽沿搭拉在前额,脸上有几片青春癣,透着一种顽皮孩子的样子,却也显得疲惫不堪,整天不说话,累得常常早上起不了床,睡在他旁边的北大俄语系助教刘佐汉得常常叫他:“小佟,小佟,起床了,起床了!”叫罢又觉得好笑,总是笑着说:“这玩儿,搁这儿教养,还得照顾个孩子,这叫什么事?”

这时候吴士俄(北师大讲师)也常逗着说:“快起吧,上学了,上学了”。

石油学院调干生王惠云压低声音对我说:“你说,这中学、中专不是不划右派吗?这怎么把个孩子也整来了?这还有政策没有?”

冶金工业部干部安树大说:“划右派不是按百分比吗?没准儿右派的年龄也有百分比哩。”

“谁知道呢?”我只能这样来回答他。

西荒地受害最厉害的是蚊子。一开始还好,越往荒地深入,越领教了蚊子的厉害。真不明白,荒无人烟的荒野怎么会有这么多可怕的蚊子?当我们修到最远的一段,每天傍晚将要收工时,大家都是只穿一条裤衩,尽管汗流浹背,也顾不上揩擦,浑身水湿,也没法穿衣。收工的钟点一到,必须立即准备好一条大毛巾,夹起衣服,一声“收工”!大家就会展开一场向距离8---9里的窝棚,大逃亡的冲刺。这时候,蚊子竟会如同从某个基地受命起飞而来的飞机,时间是那样的准确,数量又是那样的集中,它们的尖嘴可以穿透衣服直插皮下。此时,尽管劳动了一天,已经疲惫不堪,但蚊子的袭击实在太可怕了,当无数蚊子喻声大作盘旋在你的脸部、背部、手臂、双腿,全方位地向你进攻时,那真是一场恶战。蚊子一群一群往你脸上、身上、腿上糊(一群又一群的蚊子,几乎是一团一团往人腿上裹,所以,北京话叫作糊是再合适不过的),打死一批,立刻又上来一批,没完没了,似乎越打越多。如果你敢站定,就会像站在割蜂蜜的蜂箱旁没有戴面罩一样被动,所以无论你怎么劳累,也不得不挥舞着一条毛巾,拼命遍身抽打,来抵挡蚊子的进攻,否

则,你的神经都可能崩溃。边打边跑,跑慢点就会落得个遍体鳞伤。此时,没有一个人敢闲庭信步。

逃回窝棚也不过稍好一点,但一夜也不可能睡好。实在没有办法,大家纷纷写信向家里求救。不久,寄来了许多邮包,几乎全是蚊帐,这才真正解决了问题。

对我们这批右派拓荒者来说,固然劳动是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活动,但我们实际上从事的并不是这个意义上的“劳动”。实事求是地讲,是“劳役”。“劳役”是一种严酷的惩罚手段。德国哲学家和法律思想家黑格尔在他的名著《法哲学原理》中说:“刑罚是一种报复。罪犯劳动,实际上主要是以惩治和折磨犯人为目的的劳役、苦役。这与人类早期的肉刑为主体的刑罚有了历史性的进步,但其劳动仍然是对肉体上的摧残,也是对精神上的折磨。因此,仍然是不符合人性的,不人道的。”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在修筑防洪堤时,有几次下了瓢泼大雨,原来见棱见角的大堤,瞬间变成了一堆烂泥,按理说已经再没法干活了,从经济的角度讲,把已经修好的堤坝又踩坏,又毁掉,实在是得不偿失,应该停工。可穿着雨衣的队长站在工地,并不下令停工。他们也许早已接受了上级的指示,他们知道,他们执行的是要对这批阶级敌人——右派分子施行“苦役”的任务。执行这种任务只能是无情的,而不能讲究什么经济效益。更不能有温情的因素。所以在瓢泼大雨时,这批右派依然要劳动,不必考虑什么叫“得不偿失”。此时,大家只穿一条裤衩,头顶大雨,继续抬着沉重的泥筐,高一脚,低一脚,艰难地往堤坝上爬,两只脚不时交替地陷入稀泥里。有时,我们干脆脱掉鞋子,免得鞋子被泥浆粘得找不到了。大家使出浑身解数,东倒西歪爬到堤上,箩筐里的泥也被大雨冲淋得只剩下一点点筐底。有的人在堤坡上就滑倒在泥浆里,摔得像个泥人儿,而且还把修得平整的堤面、堤坡踩得一塌糊涂。我们组有一位从自然博物馆来的高光明,解放前毕业于清华大学地学系,老北京人。他哪儿知道劳动教养要干些什么事?来农场竟穿了一双圆口布鞋。这种鞋哪儿经得起强度那么大的劳动折腾?抬土方,没几天就扭坏了

鞋,一时没钱买,只好用一根麻绳左缠右绕地把鞋绑在脚上。干起活来自然十分不便,当然也少不了挨队长的训斥。一次我们在雨中劳动,他在雨水和泥浆中跋涉,没几分钟,两只圆口布鞋就陷入泥浆,找不到踪影。收工后,他只好光着脚跑回工棚,脚底扎了不少刺,别的难友给了他一双鞋才算救了急。这哪儿是劳动?这真是不折不扣严酷惩罚的“劳役”。

堤坝终于修好了。右派分子们由于劳动强度大,劳动工时长,过度劳累,再加从其他分场送的饭菜不卫生,突然大批人员患了急性肠炎,上吐下泻,腹痛难忍,严重者高烧不退,还死了两个人。监管我们的队长也着了慌,担心是什么瘟疫或者是传染病。为了避免传染扩大开来,经过请示总场后,决定将我们全部立即迁回三分场,进行休整。

回到三分场,又重新编了队。组长徐鸣珂和吴士俄、盛强、高光明调到别的组。清华大学学生张仁和在反右时曾跳楼自杀未遂,脚部落下毛病,走起路来一颠一颠的。也许考虑他懂技术,走路不方便,被调到北京北苑工厂(也是劳改场所)。年届40的黄若海也被调走,但没有宣布调往何处。他这一走倒使得大家依依不捨,更不会想到竟是永别。黄若海在组里无论老小他都能和睦相处,平时,无论是休息;还是走在收工回来的路上,他总能给大家绘声绘色地讲些老电影演员的轶闻趣事,以及他们的成名经过。这种闲聊往往成了我们的精神调节剂,在疲劳中得到一点轻松。万没有想到他和我们分手之后,仅仅一年,这位豁达大度,乐于助人,诚实风趣的难友,四十上下就惨死在病痛和精神折磨中。那已经是1967年了,我已经回到北京,原来在战友文工团的难友舒战英也回到北京,住处离我家不远。一次,他来我家聊天,谈起黄若海,他说1960年,黄在农场患了肠癌。手术后,腹部吊一个粪袋,不能劳动,没有工资,窝在家里,面对着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没有积蓄,前途渺茫。他的性格又很好强,思前想后,陷入绝望,趁家人不在时,触电自杀了。听舒此说,我一边惋惜,一边又不太相信,总觉得就他的性格,也许不会走那条路。直到后来在一份忘了刊名的刊物上,看到老诗人聂绀弩的一首诗,我才相信这位难友当真是离开了人间。老诗

人聂绀弩的诗是：

七律《吊若海》聂绀弩

铁骨钢筋四十年，玉山惊倒响訇然。
半生两袖多奇舞，一死双冠够本钱。
不信肠癌能损尔，已无狱吏敢瞒天。
只身携得双儿女，新妇飘零何处边？

这首诗大概是1960年，老诗人聂绀弩听说黄若海在劳动教养中，患肠癌医治较晚不幸去世而作。据说，这首诗当年还成了聂老“怀念右派”的一条罪状。诗的第四句，是一句痛苦中的调侃，意思是：这一死，戴了“胡风分子”、“右派分子”两顶帽子，还算“够本钱”。从诗的最后两句看，当时黄的妻子可能已经离他而去，他作为一个被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胡风分子”，大病在身，没有收入，没有任何援助，还要带着一儿一女，这种雪上加霜的困境对一个性格倔强的人来说，确实是致命的。他这是被迫才走上绝路的。

重新安排了小组之后，队长派我去作小麦产量的普查工作。经过将近十天的奔波，把分场麦田所选的典型田仔细作了产量测算。结论是平均亩产370斤。

与此同时，从总场布置的学习内容和报纸上的消息中，隐隐约约感到“大跃进”的狂风即将吹到农场。几天之后，就传来河北省徐水县农业大跃进的消息：该县小麦由原来亩产200斤，一跃而至亩产3000斤。该县县委书记张国忠豪迈地说：“我们要一步登天，达到最理想的共产主义。”……我们没有种植小麦的经验，我头脑里总想我亲自抽查、测算的亩产370斤这个实实在在的数字。对几千斤的亩产不太相信，但又心中没底。

接着《人民日报》报道了河南遂平县卫星公社小麦亩产7320斤的新记录。不久，又传来湖北、安徽、广东、广西等省的水稻亩产达到了3700斤，4300斤，6000斤，直到130000斤。这么惊人的数字如果大体计算一下，则更加吓人。130000斤稻谷可以装700—800麻袋，光这些稻谷一亩地就能摆得满满当当，哪儿还有稻梗和叶子生长的空间？记

得读中学时,英语课有一篇托尔斯泰的童话《像鸡蛋一样大的谷粒》,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什么鸡蛋大的谷粒了,而是直接从地里长出了堆积如山的稻谷,一亩地就是 130000 斤。这不是一下子进入了一个充满幻想的童话世界了吗?还有一个骇人听闻的蔬菜高产大卫星:“萝卜亩产六亿三,足够全国人民吃一天”。记录在天天不断地刷新,卫星越放越大,报纸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中国只有低产思想,没有低产作物。”我们这批被劳教的右派分子除了积极超时劳动,在学习和思想改造上也得小心翼翼地注重鞭策自己,必须紧跟“大跃进”的形势,服服帖帖劳动改造。

我们一边学习报纸上那些惊天动地的文章,一边还经常挨队长的批评。他总是批评我们思想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伟大领袖毛泽东早在 1958 年 9 月,就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了:‘明年基本上赶上英国,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外,明年都要超过英国,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奋斗!’你们要懂得‘大跃进’的伟大含义,不要老认为自己是高级知识分子,有文化,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培养的知识分子很快就要出现?我们的新知识分子比你们强得多。呵,到那个时候,你们就会被淘汰。呵!举个例子说吧,河南遂平县一下办起了 570 所大专院校,不久的将来,农民基本上都是大专毕业。呵,农民很快都成了高级知识分子,你们这些思想落后的知识分子,如果再不好好改造思想,那时候谁要你们呀?你们怎么生活?呵?为了能活命,你们就必须脱胎换骨,劳动改造不但要触及肉体,还必须触及灵魂,才能跟上社会主义发展的步伐。呵!不要老当落后于时代的右派分子……”

我一时真搞不明白,一个县建 570 所大学可能吗?有必要吗? 570 所大学,要占用多少农田?难道很快就能变出那么多教学楼来,虽然农民学生都是走读,不需要盖学生宿舍?就算每校只有 100 名教师,从哪儿能立刻找出 57000 名大学教师?如果拿全国来说,两千一百多个县、旗,即使每县只办 100 个大学,就要办 2100 所大学;而 2100 所大学,每所 100 教师,就要 21,000,000 名教师。从哪儿能变出这么多教师来?除非孙悟空能变出来。如果当真中国在教育领域达到了如此水平,

那倒真成了世界第一，到时候恐怕就不是我们赶美国，而是美国要赶我们了。会是那样吗？有可能吗？头脑里有许多问题想不通，但我们被时时提醒和敲打着，绝对不敢忘记自己是被改造的右派，只能埋头劳动，慎言慎行，不敢妄加评论。

随着“大跃进”浪潮的不断高涨，农场也开始了大规模行动。首先，把麦穗已黄，收获在望的 6000 亩小麦，全部用拖拉机翻埋进地里当作肥料。然后紧跟着日夜加班，甚至连轴转地大干几个月，把这些旱地全部改成水田，再种上水稻。天啊！这可真是个伟大的创举。此前不久，我刚刚亲自普查、测算了小麦的产量，亩产 370 斤是绝对可靠的。现在埋掉 6000 亩小麦，岂不是把就要到手的 222 万斤小麦毁掉了吗？我冒着被批判的危险，大胆地对管教队长说：“这么一干，那可是要毁掉 222 万斤即将到手的小麦啊！”

还算好，管教队长没给我扣帽子。他“教育”我说：“你看，你们就是跟不上形势，呵，现在是大跃进，要敢想，敢干，呵！你得会算这笔账才行。埋掉 222 万斤小麦看起来很可惜，可是改成水稻，最少也能亩产 2000 斤，呵？用 222 万斤小麦换来 1200 万斤水稻，几乎是五倍半，哪个合算？”

对他那种自信而得意的“模糊数学”，我从心里不敢相信，然而这已经是全国的趋势，我只能沉默不语。那时候好像任何人没有“风险”、“责任”的概念，天大的事都敢说，都敢干，没人管什么叫“后果”。我们是在作“模糊数学”的游戏吗？搞不懂。也不敢说。

差不多有半个多月，多台拖拉机换人不停机，日以继夜地隆隆轰响，6000 亩小麦终于全部埋入地里作了肥料。旱地改水田的艰巨任务也开始落在我们这一千多名右派分子头上了。一边要紧张地学习、改造思想，布置了许多学习材料，一边还要加班加点，“挑灯夜战”地投入了旱地改水田的跃进（要劲）劳动。

1959 年 6 月 15 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篇署名谢春涛的文章《大跃进狂澜》。文章引用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话说：“太阳光射到地表，只要利用其 30%，亩产就可能达到 40000 斤。”作为科学家的理论，

鼓舞了许多人。农场又开辟了一些“实验田”，深挖地，多施肥，搞密植，也要放几个亩产 XXXXX 万斤小麦的大卫星。

旱地改水田工程是相当艰巨的。原来的大面积机播小麦，对土地的要求并不高，而水田则要求每一畦田必须是水平镜面。首先，要把 6000 亩地挖好灌、排水渠沟，然后分成一块块的畦田，劳动量相当大。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经常还要加班干到晚上 9—10 点钟，不时还来个“挑灯夜战”，直干到夜半，差不多每天都要劳动 14—15 个小时。农场对劳动都规定了定额，这定额定得真有点“科学”性，保证大部分人再卖力也完不成。每到夕阳落山，天幕由淡淡的桔红色转为灰色的这一段时间，土地和天际的交接处形成一种背景，就会在西方的天幕上映出一幅令人哀伤的画面。几个老头弓着腰晃动了几下，弯下身子，端了几次，都端不动那十几斤重的铁锹，那黑色机械式的动作，又像皮影戏，也像动画片。其实，这是那些已经劳动了 13—14 小时，仍然没有完成定额的年老体弱，或者是有病的右派。他们虽然力不从心，却仍然挣扎着干。每每看着这一“影像”，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其时，吃过午饭已经过了 7—8 个小时，人总不能不吃晚饭呀，约摸快到 9 点了，队长知道他们也不可能完成定额，高喊一声：“收工啦！”他们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脚步，拼着一条老命也得赶上队伍往回走。此时，他们的脑子已经停止了思维，想的只有晚饭和睡觉，任何事情也不会引起他们的兴趣。

水田的“抄平”更为艰难。先把田畦灌了水，然后大家都得赤脚下到畦里，（穿胶靴下去，靴子会陷入泥里拔不出来，根本无法操作，只能赤脚），把突出水面的土块用铁锹甩到低洼的地方，用水来测量，整得田畦的水平面平得像一面镜子，才算完工。畦田的土里免不了有玻璃碴子、灌木刺等杂物，常常把大家的脚扎破。这都是小事一桩，没有人去涂药或包扎。不知道是谁找来几个本来是牛、马拉的耙子，现在两个人把绳子套在颈肩上就拉，脚踏泥水，在畦里拉来摔去，泥水溅得一身，和泥猴儿一样，尽管如此，仍然拼命在干。有一段时间，整天和泥水打交道，衣服上沾了许多泥浆，哪有时间去洗？大家常常把沾满泥浆的

衣服戳在院里，硬梆梆的，乍一看好像一付古代战士的盔甲，直立在那里。第二天起来，用手一搓，抖掉土，衣服等于干洗过了，皱皱巴巴穿在身上又去劳动了。但是时间一长，有的人得了皮肤病。同组的张志华是福建人，也许他从小习惯了，好一段时间，他干脆天天打赤脚，不穿鞋子，每天劳动来来去去，工作服就是一条裤衩和一条毛巾。

旱地改水田的任务几乎是一环扣一环。一边马不停蹄地突击改造水田，一边在培育秧田。等到水田改好，紧接着就是拔秧、插秧了。

就在我们拔秧、运秧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故。

我们组有一个来自第一机械部的技术员徐大纲。他是上海人，体质较弱，为人诚恳，处人随和。大家常常和他开玩笑，学着生硬的上海话，管他叫“勿来事(斯)”。

那时候，发生了西藏叛乱。我们一边劳动，一边还得学习讨论农场布置的学习材料和报纸上的相关文章。徐大纲在小组会上发言说：“听说西藏和印度接壤的地方全是石头，高山海拔，严重缺氧，气候异常，既不能耕田，又不能放牧，根本没有经济价值。他藏民叛乱跑到那里也无法生存。让他们跑去好了，‘勿来事(斯)(没关系的意思)’！哎！要独立？独立去好了，‘勿来事(斯)’。他们独立还减轻我们的负担哩！再说蒙古不是也独立了吗？一片大沙漠，没有什么经济价值。倒是减轻了我们的负担。”

他的这种言论显然是错误的。但是我们这些右派分子的思想也很复杂，来到农场以后，大多数人认为一起在这里改造，理应互相照顾，帮助。实际上我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一个孤立的、失去了所有社会友情的群体，作为成员，还应该建立感情，以期共同提高，早日摘掉“右派”帽子，回归人民队伍。但是，俗话说：“树大了什么鸟儿都有。”就有极少数人总想方设法采取贬低别人的方式表现自己，在政治运动中这也是屡见不鲜的一种通病。为了早日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劳动教养的目的，对于徐大纲的这些错误观点，不是与人为善耐心细致的帮助，而是无限上纲，说什么：

“你这种思想是和西藏叛乱分子的思想一致的，所以，在这个时候

幸灾乐祸,其目的是在鼓吹分裂祖国。你不但鼓吹西藏独立,还污蔑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这暴露了你极为反动的叛国思想!”

“你作为正在改造的右派分子,不好好改造自己,还坚持反动立场,支持西藏叛乱分子分裂祖国。你这是一种对改造不满,别有用心的叛国思想!……”

“你的右派罪行还没有改造好,再加上叛国思想,这是罪加一等,已经构成了刑事犯罪……”

“……………”

讨论会出现了批判的强烈火药味。中午,到了劳动时间,匆匆结束了讨论会,全组又赶忙下地去作紧张的运秧工作。当时我是组长,特意和徐大纲走在一起,一边走,一边劝他:“大家在小组会上提了些意见,不要计较别人的激烈言词,那些意见可以参考,应该抱着有错就改的态度,想想自己错在哪里?应该怎样正确认识,慢慢就会明白,不要着急,不要害怕。”

他说:“阿拉是学工程的,对于政治、历史个事体弗晓得多少,脑子一热,随便就讲了些错话。经过大家帮助,阿拉也知道自己错了。可是有人说阿拉是‘叛国思想’,这个,这个阿拉接受不了。你说,这不就转化成了刑事问题了吗?”

我说:“那只是个别人提意见,你不要着急。”

我想起去年在稻田拔草时,一个天津大学毕业,不知来自哪个单位的技术员,他可能从小生活在城市,根本分辨不出什么是稻子,什么是稗子。拔草的时候,把稻子拔了,留下了稗子。一下惹了大祸,被说成是有意破坏,扣了个“现行反革命破坏分子”的帽子抓走了。听说最后被判了八年有期徒刑。徐大纲听到这个结局吓坏了,脸色苍白,一言不发。给我的印象是他很胆小。所以,我安慰他几句,为的是不要胡思乱想。接着我就带着组里的难友投入了紧张的劳动。

下午收工时,也是我疏于检点,等回到宿舍,才发现徐大纲不见了。

我一面赶快安排人四下里去找他,一面出于责任,给管教队长作

了报告。天黑了,找他的人回来了,却没有发现他的踪影。

到晚上十一点钟,我还没敢睡觉。一直等着看有什么消息。过了不久,管教队长来了,把我叫到队部。队长心情沉重地低着头,慢慢地说:“总场车队的人发现徐大纲了,他吊死在东灌区水渠边的小树上。看样子他是想跨过灌渠往火车站去。他爱人刚来过不久,也许他思想上想得太多,想回家看他爱人。但灌渠的水太深,过不去,又不敢回来,最后干出了这种蠢事。唉!有什么办法呢!你回去睡觉吧,明天再说。”

我回到宿舍,已经半夜时分,同屋的张志华醒了,也许他也没睡,问我:“怎么样?”我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他以后,他长叹一声,说:“唉!他怎么心眼那么小,又不是没有经过运动,怎么能走那条路呢!”张志华是北大新闻系四年级学生,为人正直、热情,从来到农场我们就在一组,始终没有分开过,相处很好。明天一早还得劳动,为了不影响大家,我劝他赶快睡觉。

躺下来我一直没能入睡,唉!徐大纲为什么要走那条路呢?按理说我们都经历过反右的风浪,已经来到这里,还有什么接受不了的?不过,有些人的上纲确实不够实事求是,为了争取早日摘掉自己的右派帽子,也不该对自己的难友落井下石呀!唉!人呀人。徐大纲是个好人,他的死将给他的家人带来多大的伤痛啊?!一种沉甸甸的思绪久久挥之不去,天快亮了,才合了一下眼,接着又出工了。

到了工地,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后,大家都很惋惜,都没有料到他会走那条路,我不知道那两位给大纲无限上纲的人,有没有一点自责?心里有没有一分愧疚?表面上他们倒好象若无其事。

过了几天,管教队长叫我到队部,对我说:“总场来了两个人,要了解大纲事件的经过,你把情况实事求是的给他们讲讲,不要有顾虑。这件事的责任在我们,和你们没有多大关系。”

走进队部旁的一个房间,桌子旁边坐着两个人。他们并没有自我介绍,估计就是总场的来人。来人问起出事前大纲有什么不正常表现,出事的经过。我原原本本地把经过讲了,他们细心地听,都作了记录,没有再提出什么问题。此后,再没有听说有关的消息。

接着,我们又全力投入到插秧的劳动中,人工和不过关的机器一齐上。我们组在这项劳动上没有一个是能手,劳动指标总是完不成,常常挨批评。看到旁边田畦里推着插秧机快速推进的魏巍(北大法律系调干生),我们真佩服。组里的孔文(北京某中学教师)说:“人和人不能比,他是浙江人,从小见过水稻,说不定干过,咱这北方人,谁见过水稻呀!这就没法和他比。得!尽了力就行啦,挨批评就挨吧,没办法。”也许队长看出我们是尽了力,后来并没有把我们作为落后的典型。

插秧有很强的时间性,尽管我们拼命大干,甚至挑灯夜战,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小时的劳动,不知道流了多少汗水,大家好像脱了一层皮,总算把 6000 亩旱地改成水田,而且插好了水稻秧苗。大部分劳动力投入到灌水、放水的轻一点的劳动,这才松了一口气。剩下来就该是:迎接金色的秋天,抢收那 XXXXXXXXXXXX 斤小站稻的伟大而美丽的梦幻的来临了。

总场为了这一艰巨劳动任务的完成,有一天,派“清河农场京剧团”来演出。从几万名劳改、劳教犯中找些京剧演员是很容易的。再加反右中也有京剧名角落马,被送到这里来劳教,剧团里还拥有叶盛长等名角。找几个操琴师、击鼓师和一些文武场的高手也没问题。还真能演出高水平的戏来。

剧团里有个坤角赵慧娟,原本是京剧大师梅兰芳的弟子,旦角唱得很有水平。她和名老生叶盛长配戏,真格是相得益彰。在劳动教养场所能看到如此水平的京剧也不简单。

不过,从清河农场京剧团却引出一段女人劳教、漂亮女人劳教的悲剧。

赵慧娟的劳教是因为她在和梅兰芳大师学戏时,和她的师兄梅葆玖有了感情。在梅葆玖来说,现代的说法叫作“婚外恋”;而赵慧娟用现在的说法就算“第三者插足”。五十年代这种小事也算大事。对于思想比较保守的梅兰芳大师来说,就成了不能容忍的“家醜”。也算梅、赵二人命运多舛,正赶上 1957 年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艺术大师梅兰芳由于教子心切,却又无方之际,见此《决定》,欣然

根据其第三条：“家长、监护人提出申请”的规定，把儿子和赵慧娟一同送“劳动教养”了。其实，梅大师也没搞清这《决定》的真谛，也不了解这不教而诛的厉害结果。

梅兰芳是京剧艺术大师，他认为农场是一个最好的教育年轻人的学校。并不知道那里是一个政治陷阱。一年之后，他认为儿子该“毕业”了，也该工作了。他以家长的名义把儿子从北大荒劳教农场接回北京。依然唱京剧，依然是大师之后，依然是京剧名家。他回来得如此容易是因为：一方面公安局，共产党，要给大师面子，另一方面则是作出一种姿态，让社会上的人看看，“劳动教养”是一个很美好的教育场所，来得容易，回去也极平常。然而梅兰芳大师却不知道，赵慧娟作为一个普通女演员，和“大师之子”是绝对不同的。她在数倍于大师之子的教养期间，一直也没能离开农场。而且，数年之后，竟落得个被迫悬梁自尽，令人惋惜的下场。呜乎哀哉！

女性的天生丽质是福也是祸。清河农场来了赵慧娟，引起了当时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冯基平的关注。打这以后，每到周日，这位风流倜傥的局长常常来农场视察工作，自然也要捎带看京剧，看京剧自然也就看到了赵慧娟。此后，农场那幢漂亮的白色招待所（局长的夏宫），周日一到，就会传出京剧《玉堂春》中，苏三那凄凄惨惨戚戚，婉转悲恻，百转千回，如泣如诉，凄婉动听的西皮散板和慢板的清唱。局长先生当然是既附庸风雅，又心驰神往。午夜唱罢，一方是主管劳教机关的最高领导，一方是八方无助的“劳教分子”，剩下来要干的事，那不是唾手可得吗？

文革开始，冯局长调到西安市当副市长，他可真算得上是位时代的先行者，五、六十年代，他实际上已经“包二奶”了。不过这“二奶”包得有点不一般就是了。他到西安，把“二奶”赵慧娟安排在陕西京剧团。

不久，冯陷入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作为“走资派”，也频频被斗。“包二奶”的事已近十年，在某种范围内，恐怕也是尽人皆知了。五、六十年代，这种事算是大事，眼看红卫兵打、砸、抢来势迅猛，冯虽然身为副市长，文革中已经顿失官阶权力，沦为挨批，挨斗的对象，自

知前程难保。那“二奶”纵然对他恩爱有加,也是无能为力保护他的心上人了。当时要是被扣上个罪名,也必然是有重无轻。在那种危急情况下,根本顾不得考虑什么工作、生活、爱情,急匆匆赶忙把赵打发回北京。赵回北京一看,红卫兵闹得更凶。所有单位和街道一律破四旧,轰赶地、富、反、坏、右出北京城,一片大乱。一些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纷纷被揪斗。街上也能看到被剃了阴阳头的人,挂着六类分子牌子的人……。她想到自己被劳教的历史,想到“二奶”这种不明不白的身份,想到亲戚朋友的划清界线,想到何处是自己的栖身之地?想到难言之隐的苦楚和即将面对的苦难……心情自然是无比的伤痛。再加孤身一人,八方无助,一念之差,惊恐中竟悬梁自尽,结束了她凄惨的生命。

此时,梅兰芳大师早已故去,当年他把赵慧娟送去劳动教养,无非是为了他的“家醜”,一时嗔怒,想教育教育这两个年轻人。大概他也没有料到,他这一送,竟把一个年轻的,费了不少工夫教出来的徒弟——演员,仅仅是一点生活问题,就推向如此悲惨的境地,这结局恐怕对梅大师来说也是始料不及的。而这种惩罚,实在是“罚不当罪”呀!至于那位冯局长,在四人帮肆虐时代,对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迫害甚重,比他位高的刘澜涛、薄一波等都陷入监狱。恐怕他也难逃牢狱之灾。后来不知道他是否等到了粉碎四人帮,再度恢复工作。

这一段看似风流韵事,实为悲剧的事,大家都知道,但没有人敢说。谁敢在公安局长头上动土?只能是在茶余饭后当作“教养悲剧”的“谈资”,背后说说罢了。如今,时过境迁,赵慧娟去世已经又过了近四十多年了,烟消云散,知道和记得此事的人,恐怕已是寥寥无几,早就被人淡忘了。而此人也就如此这般地从人间消失了。

插完了秧,劳动稍稍轻松了一些。但是,伙食却一变再变,先从管饱变成定量,继而数量一步一步减少;窝头从五个减成四个,又减到三个。接着又是质的变化,由棒子面变成糜子面,而后再变成了白薯面,个头也一步步变小了。生产粮食的农场,怎么突然成了这样?

原来大跃进中,农场的层层领导干部也是失掉理性地狂热起来,头脑里想着,只要朝着伟大人物挥手所示的方向猛冲,天地真的就会

随着伟人随心所欲的意志而千变万化，瞬间就会让大自然的规律骤变，把中国推进共产主义社会，推向先进国家行列的前端。没想到一条小小的小河，仅只是不给送水，就把这丰收幻梦给击得粉碎。大家只顾沉浸在幻想中，却互不通气，信息不灵，各自关门猛放卫星，清河农场作着小麦改种水稻的幻梦时，计划使用的水源是潮白河和蓟运河。哪知道在大跃进浪潮中，地处上游的北京、天津郊区，也在大搞旱地改水田。他们利用地处上游的优势，早把上游的水源截流控制使用了。地处下游的农场落得个无水使用。水稻没有水，那不是全玩儿完？！

一开始，农场还可以从灌区中抽水浇地，维持稻苗的生长。但从灌渠抽的是仅有的死水。灌到田里以后，再把田里的水排到渠里。然后，又把渠里的水抽到田里，循环往复，使用的都是这一渠死水。好像一个人没有食物，一顿饭吃进去，排泄出来，没有别的食物，再把排下来的东西吞下去……一直用毫无营养的东西，吃进——排下——排下——吃进地恶性循环。于是，费了很大工夫栽种的水稻苗，不久就发蔫，变黄，干枯了。一场战略上部署有序，战术上指挥有方，轰轰烈烈的“水稻之役”，没想到竟然彻底惨败，全军覆没，如同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当他们从幻梦中稍稍清醒了一点时，222万斤小麦，100万斤稻种，1200万斤水稻梦，全部泡汤了。毁掉这么大的一批粮食，实实在在叫作“颗粒无收”，令人心疼。对于我们来说，真是灭顶之灾！恩格斯说过：“我们不能过分陶醉于我们对大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恩格斯竟能说出这样准确无误又含义深远的话，看来人类中有些人确实过于自负了。所谓战天也好，斗地也罢，最后无非是劳民伤财落得个惨败而已。这种惨败的戏剧性远远胜过唐·吉河德。

大多数难友只是默默地承受着日渐减少，不断变幻，已陷入饥馑的磨难，却不知道大难即将临头。大家都没有意识到，耗时一年多，花费了无法计量的劳动，消耗了大量的体力和汗水，非但一无所获，而且在上级命令下，自己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前所未闻的大饥荒！当时我们并不懂。我还是在田里放水时，听一位路过稻田，总场的马车车把式说

的。他说农场的稻田很快就会死光，一粒也收获不到。现在农场的稻种、余粮全部折腾光了，大饥荒马上就会降临！这则恶耗委实叫我害怕了。我知道泄露这种消息将会受到重罚，所以一直憋在肚子里，没敢对别人讲。实际上对于未来灾荒的前景也茫然无知，因为我从来没见过饥荒。

让人想不通而又难以理解的是：怎么棒子面窝头管饱吃，是那么多伙食费，只给三个糜子面窝头还是那么多伙食费，给两个小白薯面窝头，一碗粥也是那么多伙食费，后来多少天超时劳动，棒子面加野菜，吃不饱饿肚子总是那么分厘不差地，一样多的伙食费？只要给点吃的，不管你吃饱吃不饱都是那么多伙食费。反正每月工资就那两块钱，其余全都一古脑儿归入了伙食费。这其中的账是怎么回事？有没有贪污？有没有剋扣伙食费的问题？谁敢问？谁敢查？

原来，我们还想从工资中挤出一点钱赡养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没想到在高强度，大大的超时劳动；低质量、吃不饱的伙食条件下，创造了无法衡量的劳动价值。到头来，那30元的工资依然被克扣得所剩无几，乃至一文不剩。试问，有谁知道受我们株连的家属有多少人？又有谁知道他们多少人被断了生路，陷入了“愁肠饥火日相煎”的窘境？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是我们遵循的基本理论，但我们作为接受“苦役”者，没有资格奢谈什么剩余价值和剥削，毫无怨言地接受剥削，在当时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后来，没有料到改造的时间那样长，竟然长达二十一年。我国54年第一部宪法中有明文条款：“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获得赔偿的权利。”这也是一条对“错划”的右派，兑不了现的条文。长期超时劳动，我们用血汗创造的价值换来的仅仅是自己的饭费。这一点可怜的，由他们任意衡量定价值的所谓工资，真的是“血汗钱”。就连那个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其中第二条明文规定：“并且可以酌量扣出其一部分工资，作为其家属赡养费或者本人安家立业的储备金”，竟也是骗人的。这个规定居然直到22年后，落实“右派改正”政策时，竟然是一张永也兑不了现的空头支票。谁也没有见到什么

“赡养费”，什么“安家立业储备金”，纯粹成了一句骗人的鬼话。“赡养费”和“本人安家立业储备金”哪儿去了？积累下的这笔钱，被谁贪污盗窃走了？这去问谁去？这不是国务院的明文规定吗？国务院也骗人？只有天晓得。

这哪儿是什么堂堂正正的泱泱大国的国家最高行政机关颁发的文件？半点严肃性也没有。不知道制定和颁发这个文件的人，对于他们竟然编造出如此荒诞不经的文件作何感想，事后有没有一点羞愧感？

魂断于家岭

人生就是一连串的死亡与复活。

——罗曼·罗兰

就在一日三餐的质量、数量每况愈下之际，三分场突然接到命令，除了极少数留下外，其余大多数“右派分子”立即迁往茶淀农场的于家岭分场。

我们这一群“右派分子”匆匆收拾好行李，当天从茶淀农场三分场开拔，跑了二十多里路，等到临近于家岭才发现，所谓于家岭原来是一马平川，周围并没有山的影子，哪里来的什么“岭”呢？大家只顾匆匆行进，情绪低落，不由得忖想：我们要在平原登上一个名不副实的所谓“岭”，这是否意味着不祥之兆？

来到于家岭，第一印象就使得我们的情绪陷入了迷惘和低沉。首先，它不像三分场那么可以自由出入。更让人沮丧的是，这里也有高高的围墙，围墙上也安着电网。四角岗楼上日夜有荷枪实弹的警卫。这景象不由得使我联想起处理“右派”关押我们的第一站——北京半步桥的第一监狱。有人立刻七嘴八舌地感慨起来：

“我们是不是越改造越改回去了？又来电网了，武装警察也来了。这叫什么事儿？”

“围墙里只差一点儿没架机关枪！”

“该不会又来一回逮捕吧？”

“这么改造下去，还改造个什么劲儿呢？”

“本来给你圈起来就是‘无期’，不是吗？”

“教养哪儿有期？大概这一辈子就要这样没完没了折腾下去了？”

“谁知道呢？这形势谁能看出来？”

“怎么一看到这岗楼，就使我联想起抗战时期，日本鬼子修的那些可怕的碉堡了。”

“嗨！别胡说八道了，这种玩笑千万开不得！”

“……………”

尽管你一言他一语地议论,总的感觉是不如三分场。但是谁也没想到,我们这一来犹如走进了生死场。

一进入围墙,就把我们打乱重新分组。先头已经调来一个流氓队,像掺沙子般地掺到“右派”组里。二十人编成一组,分住在两间房里。所谓“流氓队”,原本是社会上因为打架、斗殴、小偷、被送来劳动教养的人。在处理“右派”的后期,彭真又提出个“水晶球”政策,要把北京清理得如水晶球一样的剔透净洁。于是,庙里的和尚,清真寺的阿訇,教会的神父,开小人书铺的,起义的旧军官、个体小摊贩、在家自己谋生的……凡是街道积极分子说有问题,没在党政机关学校、工厂工作的人,全送来教养了。

监管我们的队长也换了。好象都来自军队。一位姓李,山西人,体质不错,五大三粗,红光满面。另一个姓高,东北人,个头不高。平时他们也常常大声训斥人,但在实际劳动和生活中对人还是比较好的。

我和张睿作组长,他和九个人住一间房,我和另外九个人住在另一间。张睿长我九岁,日本庆应大学经济系毕业,为人忠厚、诚实,是标准的老知识分子。解放前他从北京跑到解放区,解放后,在北京统计局担任处长。整风时,他给他的领导提了点意见,被打成极右,送到这里被劳动教养。他人品厚道,我们处得挺好,更为可贵的是这种友谊一直维持到后来。在三分场就在同一组的张志华、安树大等还在同一组,新添了流氓队的几个人。

来到这里,伙食质量进一步下降,每顿饭只有三个乒乓球大小的白薯面窝窝头。这种窝头黑不溜秋,有一定的韧性,掉在地上能够弹起来。一开始,劳动也还可以,半个月之后,情况就有了变化。许多人感到疲乏无力,力不从心,心慌意乱,不能正常休息,劳动效率逐步下降。以致有些原来劳动好的人,也被队长训斥是“磨洋工”。

因为我们队的统计员朱振寰留在三分场,队长让我作起了统计员(统计员的工作是每天跟着大家出工,统计每人的劳动量,根据劳动量,计算出每人的月工资,不参加劳动)。过了不久,大家情绪低落,我

发现比起刚来时,劳动量可说是一天不如一天。人人都很少讲话,情绪低落。尽管队长在地里走来走去,不时高声喊着:

“改造了快两年了,还不好好劳动呵?你们想干什么?干活!干活!”

“谁完不成定额,谁留在工地别回去!”

“你们就泡蘑菇吧,谁泡谁就别回去!”

“.....”

话虽然那样讲,天黑了队长也得回去。大家只不过比较晚点回去罢了。

后来队长实行了“扣窝头”的办法,(这办法可能是场部统一规定的),谁完不成定额,扣谁的窝头。这是一种很不人道的作法,本来许多人就吃不饱,已经出现了人人消瘦的情况,大多数人肯定完不成定额,把不少主要劳动力的窝头扣掉,必然使这部分人的劳动效率日趋下降。又吃不饱,又扣掉窝头,更得挨饿。长期吃不饱,大家已经损伤了身体,再要减量岂不是要命?

有一个时期,收工回来,队伍拉得很长,走在最后边的比走在最前边的相差几乎一、二里地。实际上队长也知道大家吃不饱,身体支持不了,并不是大家不好好劳动,不过出于他的职责,他违心地虚张声势地喊着:

“快走,快走,干活不卖力气,回家也不卖力气呀!呵?”

“你们还吃饭不吃了?”

“回家也泡蘑菇啊!?”

“.....”

他喊一阵不起任何作用的废话,大家该走多快还走多快,并没有因为他喊而加快脚步,没有人理睬他。他也明白大家都饿得变了样,人到了不得已的时候,才会这样,并不是大家消极怠工。他大概也知道眼前的这批“右派分子”已经快成了饿殍。经常是在收工回来的路上,他匆匆对我说:“你跟在他们后边,催着他们快点走。”他则步履轻捷地赶到队伍前边,带着前面的队伍赶回农场。

有一天,我在后边和拉在队伍后边的难友一道走着,一边聊天,一

几句真话获罪的“右派”，现在面临的是全国都在“大跃进”，要“超英赶美”，在这种大环境下，谁又敢说什么呢？具体到我们目前的处境，大家的心情真所谓：“心非草木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然而有的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来自“流氓队”的人讲话却比我们随便。我们组有一个杜兴昆，原本是北京西苑的农民。五十年代初我刚参加工作，所在的政务院（今国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就住在西苑。那一带很富足，一家几口，有两、三亩地种水稻就够吃饭的，大部分时间是农闲。一般农民都在小街开一个小店，或洗衣服，或卖零食。冬天还可以把收完稻子的地里灌上水，结成冰以后，租给附近学校的学生作滑冰场赚钱。杜兴昆就是在西苑小街开一爿小洗衣店。按理说，他种两亩京西稻，一家人一年四季准够吃，开个小店也不缺钱花，应该说日子过得不错。但是此人的特点是脾气不好，和人交往时，一点小事也能和人家吵起架来。他就是因为和人吵架吵得被劳动教养的。他没什么文化，遇到什么事他都满不在乎。用北京土话说叫做凡事都“满不愠”。

已经有几次了，在工地他不干活，坐在土埕上“捲大炮”。有一天，终于被李队长看到了，马上气冲冲的喊他：

“杜兴昆！杜兴昆！你不干活干什么？你过来！”

杜兴昆慢腾腾站起来，铁锹也不扛着，而是夹在胳肢窝，两只手揣在袖筒里，架着锹头，晃晃悠悠走过来。他的长相还很有意思，一头自来卷儿头发，两道浓眉长得几乎成了一条直线似的连在一起，鹰钩鼻子，真有几分卓别林的样子。一付沙哑的嗓音，满不在乎地冲着李队长说：

“干嘛呀，干嘛呀，你嚷嚷什么？我今儿个在道儿上检了一个烟屁，刚在那儿搓了点儿草末子，想捲个炮，缓口气儿，您这就嚷嚷上啦。干嘛呀！人总得缓口气儿吧。我昨儿个憋了一泡尿，我怕饿，憋到今儿都没敢拉。我要拉了，肚子更空啦！人站着就想拉，可不就得坐着忍会儿嘛。”

“胡说八道！你油嘴滑舌！刚坐在那儿？我早就看见了，贼鬼溜滑的你！”队长也知道和他纠缠得时间长了，他是什么话也摆得出来的。

边对他们说：

“赶快回去洗洗脸，吃过饭还可以休息一会儿，何必把时间浪费在路上，这样晃晃悠悠回去，饭也凉了，又休息不好，这是何苦来呢？”

一位从前和我在三分场同组的黄铁华（曾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北京师大调干生）对我说：“唉，老赵啊，我们相处快两年了，彼此关系不错，我给你说句实话吧，谁不愿意早点儿回去？知道吗？我们已经四个月没吃过饱饭了，四个月了啊！天天挨饿，怎么受得了呀？你现在不干活，体会不深。明天你来我干活的地方看看，你就知道了。”

第二天，我有意识的到黄铁华干活的地方多呆了一会儿。那天正好是拔秧，于家岭的早春时节清晨还比较冷，八点多钟开始，在结有一层薄冰茬的水里拔秧。秧苗很短，大家的身体已大不如前，长时间弯着腰受不了，为了赶进度，只好跪在水里干活，下半身全泡在冰冷的水里。饿着肚子就这样干一天，也真够难为他们的。况且，劳动仍然有基本定额，完不成定额，就得扣窝头。三个乒乓球大的窝头本来就吃不饱，再扣掉一个、两个，那就更得饿瘪肚子了。越是扣窝头，越是不饱，越吃不饱，越完不成定额。也越发成了恶性循环。饿一天、两天，三天五天可以，已经四个月了，谁受得了？看了黄铁华的现场劳动，我很心酸，大家并不是不好好劳动，而是饿着肚子，的的确确干不动了啊！我所以体会不深，是因为一段时间我并没有真正劳动，比起他们来，体力消耗得慢一些。及至看了黄铁华的劳动，我才真正体会到问题的严重性。

过了一段时间，每天收工回来，走在队伍后边的掉队者越来越多，后来几乎达到全队的五分之二。有时甚至达到一半，或者五分之三。他们晃晃悠悠挪动着疲惫不堪的脚步，一瘸一拐地走着。以往，大家在路上还说说话，可现在却很少有人讲话。当时谁也没有镜子，大家都不知道自己是啥模样，但是我从别人的脸上明显地看出，他们大都面如菜色，浮肿肿出了眼泡，眼袋下垂，脸肿得变了形，象面包似的，完全是一种病态的样子。大家都知道自己是改造者，每天只是默默地劳动，不敢有任何议论。谁都深切地了解这是大跃进狂热，毁掉成熟的小麦，盲目推行旱地改水田，把一年的收成全泡了汤的结果。而我们是因说了

训了杜几句，队长就走了。

队长一走，我们组的张志华压低嗓门儿对我说：“哎！这位农民老二哥可真算是个人物啊！我看队长拿他也没办法。”一边说，一边和我笑。

“你笑什么呀！可不嘛，你不饿呀？是不是呀？”杜兴昆冲着张志华打开了话匣子。

“你这位农民老二哥还蛮风趣的呵。”张一边干活，一边和他聊上了。

“什么叫风趣？”

“就是挺逗的。”我给杜解释说。

“嗨！您别叫我老二哥，我这阵儿是他妈蔫儿了的老二，都他妈站不起来啦！”

“你怎么就进来了？”张问他。

“我他妈和人拌了几句嘴。”

“好像谁说你是和人打架的。”张说。

“别操蛋啦，那叫他妈狗带嚼子——胡勒！嗨！甭提他妈这挡子事啦，一提这事，我能气得背过气去。操他大爷的，我不就是和人拌了几句嘴吗？有什么呀？你们学生不就是多说了几句话嘛。我知道，我们家离你们北大不远。操他大爷的，上他妈哪儿讲理去？再说啦，你把我们圈进来，要枪毙，要杀要剐，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嘿——，他给你来个不给你吃饱还叫你干活，往死里饿你，哪个缺了八辈子德的主儿想出来的这损招儿？我操他八辈子祖宗！他们家孩子准没屁眼儿。见天见饿着肚子我他妈都快前心贴后心啦，还嚷嚷着让干活，我干得动吗？我们见天吃什么？他们丫挺的（北京骂人的土话，丫挺是‘丫头养的’的略音，有时可略为‘丫’一个字）吃什么？噢！横着他们丫是又要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什么事这叫？……”

“快啦！下午干完活儿，回去又可以喝那碗马齿菜汤了。”张志华说。

没想到他这句话又引来农民老二哥的不同意见：“我说，我说，我说你们这识文断字的知识分子儿怎么一阵儿一阵儿净犯糊涂呀？那玩意

儿是菜吗?当他妈猪食都不是好料!那是野草,那是菜吗?你们也不想一想,是菜,怎么没人种呀?是不是呀!你说叫我怎么说你们是好,人告你说,自来水比桔汁还甜,你也信?噫!那叫胡咧咧!你说你们是怎么回事儿……”

张志华没敢再和他深说,回过头对我说:“这农民老二哥还真有意思,倒是个写小说的典型素材。”

“他这农民和一般乡下农民不一样。西苑小街紧挨颐和园,西苑大院解放前是宋哲元的兵营。解放后是华大、革大所在地,后来又是华北行政委员会、外语学院。颐和园旁边是马列学院,离你们北大也很近。他是在这种圈子里的少数农民,你是不是觉得他有点油滑?”杜兴昆走后我和张志华聊着。

“他的语言倒蛮有意思。”张说。

“但愿你将来能写成小说,有选择地吸收取舍些这位农民老二哥的语言。”我心想,张志华从福建泉州考上北大,整天在学校圈子里,他哪儿听过这些北京土话?况且杜说的还有一些劳动农民的习惯语。

两个月中,伙食不断的恶化,三个白薯面小窝头,变成了一个窝头,一碗棒子面加野菜的粥。接着,不知道是谁发明了“代食品”,把若干年前脱完粒当垃圾扔掉的陈旧玉米芯,用机器磨碎再炒一下,加在白薯面里。这种东西有点像泡沫塑料的颗粒,放在嘴里,软而嚼不烂,韧性很强。有一定粘度的白薯面,和这种东西还不容易粘合在一起。蒸出来的窝头松松散散,个头虽稍大一点,实际上是“假货”,只能起一点撑大肚子的作用。其实这“代食品”是一种“心理食品”,从嘴里吃下去,经过整个消化系统,在肠胃里转一圈,只是刺激了一下食欲神经,最后又把这泡沫拉出来,根本就不能吸收,拉出来的还是泡沫塑料差不多的玩意儿。不过,把若干年前的棒子芯能翻腾出来,这种不寻常的作法,倒暴露了粮食的确出现了严重危机的真相。大家想法很多,但是都不敢说出来。

收工回来拉在后边的人更多了。原来浮肿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发肿的脸,在最近一个时期,不知不觉中又瘦得变了形。脸上只剩下

干瘪褶皱的一层皮,真的是搞项黄馘,好象不知道风干了多久的皱巴巴的土豆皮,全又成了苍老了许多年的样子。那可怕的样子简直找不出来相似的人形。(若干年后,改革开放了,我在北京看一个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看到奥斯维辛的景象,忽然我发现了曾经熟悉的身影。我不知道那些骨瘦如柴的群众演员是从哪儿找的,当时要拍这个电影的话,我们这帮在于家岭劳教的“右派分子”应该是最形象最好的群众演员了)那时候,我也浮肿了,走起路来两条腿直发飘,不听使唤,好像失掉了一部分知觉,也成了掉队者的成员。

有一天走在路上,在三分场时曾在二组的小佟走过来。好久没见他了,他叫佟信顺,从北京石景山一个好象冶金中等专业学校被发落到农场劳动教养的。刚到半步桥时我就和他在一起,他实足年龄才16岁。从一到农场我们同组同屋了将近两年。因为他小,是个孩子,具有城边接近乡村地区孩子的特点,邈邈邈邈,不拘小节,所以大家常照顾他。听说他的罪行是给艾森豪威尔写了一封信,询问美国的民主是怎么施行的。这封信当然不会寄到美国,而是从邮筒转悠到了学校书记的手中。书记立刻跳了起来:“好!光凭你给我们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的头子写信,就能定你个‘极右分子’!”于是就把这个16岁的少年,以“极右分子”的罪名开除学籍送来劳动教养了。经过两年的劳动改造,如今18岁了,刚刚算进入成年。虽然算成年,也许是营养条件不好,但个头儿还是那么矮小,脸庞消瘦,那几大片少年青春癣好像又有了发展,显得颧骨高高隆起,形容枯槁,又显然不象已经十八岁的成年人。他有结巴的毛病,凑到我身旁轻轻抽泣着对我说:“我——我——我天——天天吃不饱,晚上饿得睡——睡睡不——不着觉。我——我……”见他这样子,我赶忙说:“不要哭,不要哭,让别人看见不好。大家都一样,忍耐点,没别的办法。千万不要乱说话,记住,千万不能乱说话!”他点点头,慢慢拉在队伍后边,又独自晃晃悠悠蹒跚而行。忽然,我下意识地觉得小佟很可能精神有点承受不住了。这个18岁的孩子,好像15—16岁没发育成熟的样子,可以想到,他从孩提到少年,都有父母养育关爱他,没有挨过饿。如今怎么连饭也吃不饱了?怎么走也走不

动了？朦胧中他可能意识到这样下去人是会死的，如果继续这样挨饿的话。

大家熬到初冬，终于开始死人了。没想到，我所知道的第一个死的竟是曾在三分场同组的李老头，李志军。他说过，他是石景山税务局的小职员，山东人，家有妻子儿女，生活困难。他是因为在旧社会工作过，反右快结束时，单位“右派”比例不高，为了超额，把他给“找补”上的。所以他在我们来后，已过了三、四个月才来。来农场时，穿着一件不合体的小棉袄，里边只有一件单衬衫，风可以从短小瘦窄的下摆直吹腹背，所以常常腰间系一根草绳，以求保暖。穿一双家作的布鞋，也是破烂不堪。因为袖子很短，初冬时分，手腕上已经开裂了密密麻麻的小血口子。老头真格是衣衫褴褛，憨态可怜。他干起活来非常卖力，相对说来，像他这样长期挨饿“入不敷出”，极度缺乏营养的人，再加那身无法御寒的衣着，确实很难熬过这种饥饿而寒冷的严冬。没想到进入初冬，死神就把他招去了西天。那时候，我们已经不在一组，有一天傍晚，我看到他们组几个人从房间抬出一个破蓆卷，放在一辆用三十年代日寇侵华时，遗留下来的炮车改装的牛车上，将要拉走。他们组一位难友低声说：

“是老李，中午我们收工回来，他已经在宿舍去世了。”

那架破车上，只有一张破蓆卷着老李。后来听说这张破蓆，把死人送到乱坟岗子，死人滚进坑穴，破蓆还要拿回来再卷别的死人。于家岭的天气已经很冷了，他没有穿袜子，也许他就没有袜子，脏兮兮的脚露在破蓆卷外边，那双破鞋早已不知去向，脚后跟黑乎乎的两只脚，随着车身的震动，僵直地互相磕碰着。在管教极严的大墙里，是不允许聚众对死者作什么表示的，我装着到食堂去打水的样子，跟在“殡车”旁走了十几步，目送着那辆“殡车”，两个纯铁轱辘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慢慢地远去了。看着这种情况，酸楚的泪水情不自禁的充盈了我的眼眶。这大抵也是人之常情吧！老李走了，他有多大罪行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一个憨厚的老头。难道他就应该得到这样的惩罚？他有什么罪过？是谁又是怎样决定采取如此残酷的刑法的？而今就用这种方式让他脱

胎换骨去了？他的妻子和儿女将如何生活下去？谁知道呢？又有谁去管呢？

有人在劳动的半路遇到别的分场的人，听说我们离开三分场，从东北兴凯湖来了另一批“右派”。因为那时候中苏已经交恶，只是没有公开。中苏一交恶，当局就把我们这些“假想敌”往坏处想，认为兴凯湖的“右派”必然会“叛逃”，往苏联跑。为了防备这批地处中苏边境的“右派”叛逃，所以把兴凯湖的右派迁到茶淀，他们到了三分场，我们才迁到于家岭。

说实在的，把我们这些只是提了点意见的人，通通当成“敌我矛盾”，已经属于含冤负屈，落到如此境地，现在看来对我们这些“右派”不赐以“萧斧”，大概是解不了气的。有时候想想也觉得可笑，这些决策人是不是患有精神病？把我们想得那么反动的根据是什么？我觉得很可笑，然而精神病患者的当权者却是认真的。有道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遇到一窝精神病，难道你就能说清？

这会不会就是我们这群“右派分子”未来前途的开始？

面对这一情景，出现了人心惶惶，劳动很不正常的情况。实际上已经陷入了不敢言说的恐怖之中了。

死人的事情在不断发生。首当其冲的是壮年和老年。壮年都是年青的小伙子，他们体力好，是劳动的主力。但饭量也大。在大跃进旱地改水田的劳动中，他们大放卫星，可那时候一顿饭他们能吃五、六个大窝头。米饭能吃三、四碗。现在突然变成乒乓球大小的窝头，四个未必能相当于原来的一个，而且数量还在一步步减少，毫无疑问，发热量也大大降低。白薯面又变成“代食品”，进而变成每人每天二两玉米面，其余都是野菜——马齿苋。三顿饭就仗这二两玉米面，根本把马齿苋粘合不到一起。起先，还上笼蒸，想蒸成野菜窝头，不料蒸出来的是一滩糊糊，炊事员只能用铲子刮起一滩糊状的玩意儿，拽到打饭人的饭盆里。在这对于数量斤斤计较的特殊时期，极易引起野菜糊糊多少的争执。后来只能是作成粥，用舀子发粥。从五、六个大窝头逐渐减少到每顿不足一两玉米面，其余都是野菜，这种状况竟然延续了半年多。大家

一方面承受不了这种从未遇到的饥饿；另一方面精神上也陷入极度恐慌之中，用消耗自己的身体来应对饥饿，实在支撑不下去了。

此时，已经有不少人病倒了。农场开辟了几间病号室，把重病号集中起来。大家思想负担很重，一进病号室，就意味着自己大概不久就会去见阎王爷。而实际上后来死人有一部分确也是从病号室用破蓆卷走的。农场有规定：平时不许串组，串队，只有在每天早上出工列队时，趁着队伍散乱的时候，走出房间的第一件事，就是借机互相探问：“昨天晚上谁又被老牛车拉出去了？……”

两天后，在相互探询中，终于听到了一些消息。

小佟死了。这个孩子终究没有扛住饥饿，可怜他在人间真正享受人生只有十五年，两年多教养，就匆匆结束了他短暂的生命。听说小佟全家都是地道的工人阶级，他的哥哥是个产业工人，前来收尸时，哭得死去活来，一边哭，一边喊着唯一的一句话：

“他还是个孩子呀！——他还是个孩子呀！”……

是的，他的确还是个孩子。然而一个孩子也没有逃脱“极右”的罪名，竟至落得个活活被饿死的可怜结局。

小佟走后，有好长时间，他那削瘦的，有几片少年青春癣，颧骨高耸的脸庞，戴着一顶灰色的帽子，帽沿儿已经折断，那个城边地区孩子特点的影像，久久在我的脑际浮现。如果没有运动，也许他还正在上课，下课回家说不定还会享受父母的关爱。他的父母大概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小儿子竟然会在未成年时被打成什么“极右分子”，最后还被饿死。唉，的确他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啊！恐怕是全国年龄最小的“右派分子”了吧？！

“X组的张心涛昨晚被拉走了”

张心涛是清华大学机械系四年级学生。身体很棒，微微有点小残疾，脖子有点儿歪，听别人给他起的外号不知道为什么叫“申公豹”。在三分场旱地改水田的大会战时，他能一下子抬起四箩筐土来，足足有近四百斤，那力量真是吓人。难道他生来就是大力士吗？不是的，他是在拼命改造，好摘掉自己头上的紧箍咒——“右派”帽子。当然，他的饭

量也很大,从前一顿饭能吃五个大窝头。如今逐渐减成一天二两玉米面,其余都是野菜,这巨大的反差很快就要了他的命。不知道他经过多少个日夜的寒窗之苦,考上了清华大学,想必他定有抱负,也必定有为国家作出贡献的理想,然而,还没有走向社会,一个臆想不到的政治巨浪把他推掀到劳教农场,还没有参加工作,就来了个中国式的“行政处分”,却这么无声无息地饿死了。

“张庆家昨晚被拉走了。”有一天出工回来听说。

在三分场我和张庆家曾在一个小组。他是湖南人,北京华侨补习学校数学老师。三十多岁,人很厚道,大小事从不与人计较。来到于家岭我们不在一组,没想到他也被那辆“殡车”送走了。听到这个消息,有一阵子,我头脑中经常浮现出张庆家那张忠厚、诚实、和蔼、深沉的影子。怎么这位难友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两年前,他在华侨补习学校,绝不会想到两年后他会被一张破蓆卷着,扔到于家岭荒野的浅浅的土沟里,就是他今生的归宿。

对于一些年纪较大的“右派”来说,饥饿是致命的打击。质量低劣的所谓食品,根本弥补不了他们年老虚弱身体的支出,健康状况一天天恶化。因此,除了年轻体壮的“右派”之外,就数老年体弱者死得多了。

我当时已近三十岁,在我近三十年的生活中,虽然清苦,还没有挨过这样的饿。更没有想到饥饿也可以把人的神经刺激得畸形地扭曲。同我在一个组劳动过一年多的,北京一位资深望重的老演员戴X(姑隐其名),那时可能已过了天命之年,他演过不少话剧,在话剧界颇有声誉。因为肃反整他整得有点过头,他不满意,整风时不免有些怨言。新老账一齐算,划成“极右”,送来教养。我们把他尊为长者。他待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劳动也是尽到了力所能及。在大饥饿中他得了浮肿病,不能出工劳动,躺在宿舍休息。同一宿舍的右派家里来人探亲,送来一包饼干。大家出工以后,饥饿把他的神经刺激到了极限,实在撑不住了,竟然把别人那包具有诱人食欲魔力的饼干吃了个精光。等到大家收工回来,饼干的主人也饿得心里发慌,一进门,急着去找那包饼干,

发现饼干竟然不翼而飞了。非常气愤地大叫大嚷：“谁偷了我的饼干？谁干的这种缺德事儿？！”这位资深老演员才从理智中醒悟过来，听了饼干主人的叫嚷，心里十分难过，老泪纵横地哭了。他这一生，直到吃人家饼干的一刹那，都没有想到有个“偷”字，如今这个耻辱性的字眼竟和自己粘上了。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纷纷上前安慰，他才不好意思地说：“我实在是饿得失去了理智，把你的饼干吃了。我好对不起你，我一生都没有偷过人的呀！”然后，他擦拭着眼泪，哽咽得说不出话来。大家说一千，道一万也不会想到饼干是被这位尊敬的长者吃掉的。而饼干的主人也感到刚才的不理智，对不起这位一向被自己尊重的长者，走上前表示道歉。一边是潸然泪下的老者请求原谅的凄楚忏悔，一边是转气愤为友善安慰的年青人的真诚，他也泪水盈眶，双方突然拥抱在一起。大家无言地看着这，仅仅是因为一包价值不及一元的饼干引发的一幕人间罕见的悲惨剧，都感到心情沉重而难过。这令人酸楚的悲剧究竟是谁一手造成的？剧作者又是谁呢？

“盛强昨晚被送走了。”两天后又传出这个消息。

盛强在三分场和我也同在过一个组。他大概接近五十岁了。北京某戏剧学校毕业。解放前一直从事京剧的编剧和管理工作。在前门外粮食店街的“中和剧院”担任过经理。后来到中国戏曲研究院仍然作的是京剧研究工作。就在该单位被划成右派。不爱讲话，不管闲事，情绪低沉。在三分场时总是低头干活，不言不语。我想他的心事太重，一天也听不见他能讲上一句话。来到于家岭没几天，怎么他就死了？

听和他同组的魏巍说，魏家里给捎来一盒猪肉罐头。出工的时候大家都走了，宿舍里就留下病号盛强。等到收工回来，魏巍的罐头不见了。在这饥饿威胁生命的当口，一听罐头的价值，简直仅次于生命。再加魏巍是个急性子，也是在宿舍大声嚷嚷谁偷了他的罐头。同舍的人为了表白自己，纷纷说明大家一起出工，互相都可见证。怀疑的对象自然集中到盛强身上。过了一会儿，盛强起来也哽咽失声，说罐头是他病倒，实在忍不住饥饿给吃掉了。这一来又使得魏巍不好意思了，忙陪着笑脸连连向他表示歉意：

“老盛，我这人你也知道，是个急性子，我以为别人拿了，乱嚷嚷一通，对不起，虽然我们处在大饥饿的非常时期，但那也不过是一听罐头，请你别介意，你有病，吃就吃了，没什么，养病要紧。”

盛强年纪大一些，古人说：“衣食足则知荣辱”，老盛一生从事京剧事业，他是一个非常要面子的人，加以性格内向，恐怕他一生都没有经过这种曠古未闻的饥饿折磨，在理性被饥饿扭曲的情况下，作出了这件连自己都意想不到的事来。现在当理性恢复，才意识到这是不光彩的，丢面子的，对不起人的事而泪水浸满了眼眶，唏嘘得说不出话来。大家既感动又悲伤，一同说：“我们虽然来自不同单位，大家在一起改造两年了，既是难友，也是朋友，一听罐头谁吃了也一样。老盛病了，身体不好，吃就吃啦；巍巍年轻，不计较这事，没事啦，赶快休息，没事啦……”平时对窝头大小都斤斤计较的人，这时又互相谦让了起来。要命的是此事不知道怎么被队长知道了，批评了老盛几句，老盛为人极要面子，这一来，无异于往他心上扎了一刀。

大概因为老盛心事太重，又发生了如此不愉快的事，饥饿依旧，郁闷在心，大家搬到于家岭以后，分场喇叭把他的事广播了。他心中更加难过，终于没熬了几天就撒手人寰。自然也是被那辆“殡车”拉走的。

几乎二十年后，我才知道盛强的妻子是80—90年代走红，深受全国人民喜爱的评剧演员、笑星赵丽蓉。2000年7月，赵丽蓉溘然病逝。而后，赵的朋友张平、郭民杰写了一本《艺苑奇葩——赵丽蓉》，[2001年12月北京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书中有一段关于赵丽蓉去农场探望盛强的叙述：

……看管员问：“你找谁？”丽蓉微笑着：“我来接盛强。”“盛强？他是你什么人？”看管员上下打量着丽蓉问道。丽蓉：“他是我丈夫。”看管员说：“他不在了。他咋会不在这儿呢？”看管员重复着：“这个人不在了。”丽蓉急切地问：“啥？同志，你说啥？”看管员说：“他死了！……”丽蓉惊呆了，说：“他死了？……不，不对，你弄错了，这不是真的，他绝对不会死，他咋会死了呢？不，不，他没死……”看管员：“他是死了，他真的死了，你没接到死亡通知书吗？”丽蓉觉得眼前发黑，双耳轰鸣，她

麻木了，呆若木鸡地站在那里停了好一会儿才说：“那，他的尸骨呢？”看管员说：“死去的人都埋在西边的那片荒地里，坟前有个木牌写着死人的名字。你上那里去找吧。”

丽蓉强忍悲痛，想弄个明白，她镇静地向看管员乞求着：“我求求你，请你告诉我，我丈夫真的死了吗？他到底是咋死的？”看管员被丽蓉的诚心感动了：“你丈夫在劳动的时候，背着烧完的砖，从砖窑里走上来以后，他踉跄地走了几步，突然昏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当时就送到医院，经过抢救医治无效，就这样死了……当时有人问医生，他是什么病死的？那位医生摇摇头说：“查不出来。”

我们到茶淀农场劳动，盛强始终就和我在一个队，同在一组，同住一屋一年多。他死的经过，如今在世的至少有十几位难友记忆犹新。我们同盛强在农场一同劳动近三年，根本就没有见过什么砖窑，我们和盛强从来没干过背砖的劳动。有个早已坍塌了不知多少年的地方已盖了房子，叫作北砖窑，那只是一个地名而已。那已经成了老残队的一批等死的老头病号集中地。（后来，在丛维熙所著的《走向混沌》一书中记述说，翻译家吕荧 1968 年就是在那里死掉的。这位著名而正直的翻译家、美学家、教授，去世时，竟落得冬季里衣不蔽体，骨瘦如柴，夜里御寒的棉被已破烂得成了一团破棉絮，棉絮中爬满了虱子，极为凄惨。）看了作者关于盛强的这一段描述，几位难友谈起来真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这社会已经变得编出来的谎话似乎比真实情况还真，人简直成了地球上最会说谎话的动物了。这已经是离开当年四十年后的事了。真实的经历及记忆和书上的描述竟是如此地迥然不同。真不知道那位“看管员”是谁，他编的那套鬼话，竟把赵丽蓉骗得信以为真了？还是其中另有原因？还是作者想象力超人地丰富，编出了这一段离奇的“故事”？

紧接着情况进一步恶化。恐怖气氛默默地弥漫在农场。我虽然较比年轻，在漫长的饥饿煎熬中，同样，身体也是支持不住，逐渐发展成了三度浮肿，也成了病号，留在宿舍休息。从开始死人，临时来帮忙的医生（这位医生大概也是劳改过的）那里就诊后，给了我一包酵母片

(没有其他药,给所有病号的只有酵母片)。我把这包酵母片像吃糖果一样,一片一片地放在嘴里含化了。好象这不是药,不是治疗浮肿的药,而是治疗饥饿的药。腿依然肿得像面包,用手一压,肌肉上就会出现一个深坑,好久不能恢复,走起路来飘飘然像在棉花上走路,东摇西摆,无法走稳。

这里没有医院,没有医生,没有检验设备和人员。也用不着检查,只要用眼一看,就会知道这个人是不是病号。

沈志庸(北大物理系学生)在的那个队的管教队长,有一种独特的鉴定病情的方法。他走进房间,先叫几个人的名字:

“XXX,站过来!”

“X X,站过来!”

“……………”

叫四、五个人过来以后,说:“褪下裤子,转过脸去!”

他审视完大家的屁股,然后他就会指定:“你,你,你,不要出工了,搬到病号室去!”

他这是一种什么检验方法呢?原来他让大家转过身去,是看大家的臀部,谁的臀部已经瘦得没有肌肉了,只剩下两根像枯槁的玉米杆似的股骨,支撑着一个下陷的皱皮黑洞——肛门,就会被认为是病号,不能再劳动了。恐怕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医院,哪个大夫使用这种方法来检查病情的。在农场有许多事都让我们开了眼。

有一天上厕所,看见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来的徐鸣珂灰头土脸站在那里,膝盖和胸前也弄了一些土。几个月没见,怎么成了这副样子?我走上前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上厕所,站站——站站不起来了,刚刚一站就——摔倒,爬爬爬——在地上,起也起不来,这这——这刚刚爬爬——爬起来,老赵,我们怕是回回——回不去了。”我走上前替他拍了拍胸前的土,忽然,我感到他苍老了许多,面颊上好像贴了一层垃圾堆检的,被弃了很久的土豆皮,干瘪得一点肌肉也没有,灰暗,干瘪,眼眶里噙着泪珠。我看着这位从半步桥就在一起,又一同来到茶淀三分场,到于家岭分开也不过几个月的难友,竟

然成了这个样子。听了他的这一番话，由不得我泪水盈眶，哽咽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是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的俄语翻译，《列宁全集》的卷21是他译的。只因为解放前，他作过《安徽日报》的记者，这就算历史问题。尽管整风时他没说什么，也来个新老账一齐算，划成了“极右”。正在谈婚事的女朋友也被“组织”的政治大棒打得劳燕分飞，不知去向了。家里也没有亲人，孤零零来了两年多，他就落得成了一具饿殍。我给他拍拍土，搀扶他走了几步，这时候我才说出话来：“唉！老徐，听天由命吧！说什么，想什么都没有用。我们得学学佛教徒，把精神集中到一个‘空’字上，不然，我们明天就可能驾鹤西行。唉，最好让头脑停止思维。现在我们这样子，难道不像一个躯壳？……”

此时的伙食已基本定型了。每天二两玉米面，三顿饭就仗这二两玉米面和马齿苋熬成稀里咣当的三舀子粥。开饭时，每队从伙房抬出一个大木桶，盛着这种粥。顺着粥桶排起来一队面如菜色、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瑟缩枯槁，夹着饭盆的队伍。大部分人腰里系一根草绳，瑟瑟缩缩，他们的身体几乎没有什么抗寒能力了，站在院里，不住地双脚变换着踏地暖脚。这情景如同在电影上看见过的，灾荒之年给灾民“舍粥”的景象一样。有些人领到那盆粥，一边走，一边用舌头舔舐着盛粥时滴拉在盆边上的那一点点粥，生怕浪费掉一丝一毫贵如生命的这种东西。有一次，我站在大桶旁看着发粥，粥发完了，有俩人积极主动地要求把空桶送回伙房，我以为他们的精神很好，请示队长同意后，就让他们去送。没想到一经允许，他俩就像疯了似的，立刻扑向空桶，把上半身探到桶里，快速地用手刮取桶壁上留下的那点残留粥。俩人挤在桶里不断用手刮了往嘴里吸，发出“稀——溜——稀——溜”的声音。等到抢、刮、吸完那点残粥，把上身从桶里抽出，衣服和帽子上粘了一些粥，他们也顾不得什么脏不脏，用手从衣帽上擦了又往嘴里舔。天啊！这……这在世界上难于捕捉到的凄惨镜头，真应该“咔嚓”一声留存下来。这情景委实让我在那里看得发呆。这叫什么事儿？他们怎么啦？饥饿竟然把这群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尊严折磨扭曲成了这副样子？只要是一个有良心的正常的人看了这场面，都会流下眼泪来。这些人

的家属如果在此看到如此的凄惨场面,说不定会有人晕倒在地。他们原来在不同单位工作,也是干部、老师、大学生,也是正常的,有礼貌的,体面的,有尊严的知识分子。可现在哪里像一群知识分子呀?这是一个人的群体,可现在这群人怎么了?人常说:“衣食足而知荣辱”,他们现在却斯文扫地,分明是一群贫病交加的特殊乞丐啊!是谁使得他们成了这个样子?他们是怎么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呀!?”

大部分人不能出工了,干活也只是应个景,等于到地里溜一趟。在出工的路上,张志华走过来,一边走,一边跟我聊:

“昨天晚上,一直饿得我睡不着觉,快两点了我才睡着。想来想去我把陆游的一首诗改了,《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你知道吗?”

“我大体上记得,是不是‘僵卧孤村不自哀’的那首?”我说。

“对,对,我把它改成这样了,你听听:‘僵卧寒屋枉自哀,爱国也能获罪灾,夜阑饿听车轮滚;不知死神何时来?’怎么样?”

“你可真是个书呆子,都饿成这样了,却还有兴致改诗,改了这首诗,是不是等于吃了一个窝头,然后就睡着了?”

“还有一点,要是不注解外人根本不知道。‘车轮滚’是每晚都要拉走我们同伴的那辆特殊‘殡车’,局外人不容易了解它的悲惨含意。”

“哈,-----哈哈---哈哈,这注解还不好注哩。”他开玩笑地一阵大笑。

这玩笑实在是苦中作乐,颇象俗话说的“黄连树下弹月琴”。过后,他严肃地对我说:“真的,我们现在已经面临死亡的边缘了,随时都可能命丧黄泉。”

“人到了这个地步,就要想得开,胡思乱想没有用,正如你诗中所说的‘枉自哀’,我看头脑里应该只有一个‘空’字,什么也不要想,还是听天由命吧!”

在地里大家并不劳动,许多人在到处搜寻能够进口的东西,诸如冬眠的青蛙、蛇、昆虫,乃至老鼠;头年收割完拉在地里的白薯根,叫不出名字,也不知道有没有毒的草根……都带回宿舍,找些柴禾,架几块砖就是炉灶,拿自己的饭盆儿当锅,煮着吃。还有的人没有找到什么东

西,于是把自己的皮腰带煮软了吃,还说是学习红军长征过草地的精神。更有两位神经不正常的,把别人家属探亲带来点心,人家吃完点心扔掉的包装纸拿来煮,要把纸上的油煮下来喝。出现了许多想象不到的酸辛怪事。

早晨出工站队,依然是首先探询昨夜什么人躺上那辆牛车走了。人们交头接耳地传着:“XXX 昨晚走了。”“谁呀?谁呀?”“XX 也完了。前两天就起不了床了。”……差不多每天总是有人再也见不到了。大家的心头依然是沉重和恐怖。大家稀稀拉拉不成队形地排队出工,到地里干不动活,躲在避风处晒太阳、聊天,对付到十点多,就磨磨蹭蹭,溜溜哒哒地回来了。队长也知道这群人已经成了饿殍,根本不能劳动,基本上没人管了。走在路途上好像成了一群伤残的败兵。

有一天,杜兴昆家里寄来包裹了。去队部取时,他很高兴,此前他接到家信,说包裹里给他装了吃的。没想到他回来一进门就破口大骂:

“我操他姥姥的!家里给捎来几个火烧,丫场部规定包裹里的东西可以给,吃的东西全部扣下。他们丫扣下你们猜干嘛啦?丫他妈搁干部小卖部卖,全让丫管教干部们买走了!这帮孙子,你们说毒不毒?这是诚心要往死饿咱们,我操他丫八辈儿祖宗!就让丫们缺德吧。你们瞅着,总有一天,丫非遭天报应不可!”……

果然,这确是场部的规定,所有人后来寄来的包裹,都把食品扣留了。有些家属从北京和外地赶来,把从自己家人口粮中挤出来的,可充饥的食品艰难地送到农场来,在茶淀下了火车,还要背负着这些沉重的食品走 20—30 里地才到分场。其中还有不少是年迈的父、母艰辛地送食品来救助自己的儿子。这些远道而来的家属哪儿知道,当他们怀着释然的心情离开农场之后,这些救命的食品最后却被拿到大墙之外的小卖部,卖给了管教干部,实际上竟然落入了别人的肚子。这可真是一个既不合情也不合理,又很残酷的要人命的决定。这无异于从濒临饥饿、死亡的“右派分子”口中夺食,加速我们身体的恶化,加速“右派分子”早日死亡。

下了一场冬雪,天气骤然冷到零下十几度。大雪覆盖了大地,已经

无法出工劳动,场部布置让学习报纸。天特别冷,还刮着6---7级大风。农场不象城市,有楼宇和树可以阻挡大风,每到大风刮起,寒风能够吹透棉衣,6---7级大风,远胜过北京10级的风力。我们这批饿殍真要走出去,必定会被吹得东倒西歪,站立不住,只能蜷缩在屋子里。大家坐在床上披着被子,把脚伸在褥子下边。由于饥饿和身体虚弱,抗寒能力大大降低,一个个瑟缩成一团,不住的发抖。坐在那里,哪儿还有心思学习。

夜晚睡下来,屋子里没有火,冷得如同冰窖,窗户上也全结了冰。大家一动不动地躺在被窝里,双脚冰凉,又冻又饿,真所谓“饥寒交迫”。虚弱的浮肿病躯大大降低了御寒能力。这时候才体会到人在冻、饿煎熬中是睡不着觉的。每个人都不讲话,在死亡威胁的恐怖气氛中谁也没有精力和兴致聊天,连最爱发牢骚的杜兴昆也无声无息,为的是保存自己仅有的一点体能。雪光把窗户照得发白,玻璃好像成了磨砂玻璃。空间是绝对的“万籁无声”。在这寂静的无声之夜,只有一阵阵断断续续的“嘎噠噠-----嘎噠噠-----嘎噠噠……”的一种声音。那就是那辆侵华日军炮车改装的牛拉“殡车”,它一会儿由近而远,过一会儿它又由远而近。大家虽然无声地躺在床上,但心里都明白,它每次远去,就意味着把我们的一个伙伴又送上天国;它每次回来,又将拉走我们的另一个难友。大家静静地躺在床上,静听着这车轮声,我想大家的心脏一定是忐忑不安而又微弱地跳动着。饥饿致死是无声无息,没有任何征兆和表象的,是一种“睡亡”。我躺在床上忽然想到:我们这10个人,明天会不会有人再也不会起来了!?! 这情景不由得使人想起叶塞宁《冬天》里的诗句:

茫茫的雪原,苍白的月亮;

殓衣盖住了我们这块大地。

穿孝的白桦哭遍了整座树林,

这儿谁死?谁?莫不是我自己?

.....

唉! 这儿谁死? 谁? 莫不是我自己?

这是1960年12月的严冬。我们这群被所谓“行政处分”发配到茶淀的“右派分子”被置于绝境。没有医院,没有医生,没有药品,只有临时来的医生带来的“酵母片”。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病症,只有饥饿,饥饿,饥饿!我们的生命将被饥饿消灭。这残酷的历史纪录恐怕永远不为人知!

唉!我们的生死就在一瞬间,听天由命吧!

每天早上站队的第一件事,照例是互相探询昨夜哪些难友又上了那辆“殡车”?照例是一阵交头接耳,窃窃低声探询着:“XXX昨夜被拉走了。”“XXX也走了。”“XXX已经不行了,恐怕拖不过明天。”……恐怖气氛已在暗中折磨着每个人。在这个将近一千多“右派”的分场已经死了不少人。而且每天还继续有人被破席卷着送上那辆“殡车”。至于究竟死了多少人?因为平时按规定都不许串组,客观条件不允许我们统计,不可能有精确的数字,大体上估计,差不多有四分之一死掉了,应该是一个保守的估计。

在大跃进的喧嚣声中,中国的大饥荒灾难同时在全国已展开,后来才知道全国饿死人数竟达三千多万人。我们这些“右派”在大墙里并不知情,相比之下,于家岭劳教农场死个几百“右派分子”那实在是小菜一碟,无足挂齿。

北大法律系学生巍巍,在三分场是个棒劳动力,大战防洪堤的时候,他和民政部来的王臻抬土方是出了名的人物,他们俩一抬等于一般人四抬。看着那几百斤湿土快堆到扁担的挑子,真有点吓人。如今人却瘦得如同一个干瘪老头,脸上没有肌肉,只有一层皱皮。走起路来也是晃晃悠悠。有一天在伙房附近碰到他,他告诉我:“我本来体重138斤,刚才在伙房门口看见有一台秤,我秤了秤,现在只剩75斤了”。我只能向他道一声:“珍重”,还能说些什么呢?还敢说些什么呢?

死得人多了,就专门抽调一些人去挖“死人坑”。可是挖坑的人也是病号,根本无力挖掘,费上半天劲,也就能挖30公分深,把死人放进去,用周边挖出来的土,薄薄掩埋住尸体就算埋葬了。所谓的“坟”,也不过是高出地面20公分的一个条状凸起。然后,检一块砖头,用粉笔写上死者的名字,戳在“坟”头。这就是死者的“坟墓”和“墓碑”。这个简

陋的“墓碑”，只要经过一场雨雪，那粉笔碑文就会荡然无存。那一片“地面凸起来的土堆儿”经过一场雨雪，也会塌陷下去，而后春风拂过，大地又会杂草丛生，形成坑坑洼洼的一片难于辩认的，饥饿而死的“右派分子”的无名荒冢——乱坟岗子。多亏农场没有狼和狗，否则这些死尸埋得那样浅，恐怕早就被狼、狗啃成了支离破碎的枯骨碎片了。尽管如此，他们却“有幸”得到了“土葬”的优待，后来家属去凭吊，虽然找不到也无法辩认亲人的“坟墓”和“墓碑”在哪里，也许唯一可以得到的一丝安慰是“土葬全尸”吧？我不由得纳闷，这就是所谓的“行政处分”吗？这不是远远超过了《刑法》了吗？这批活人变成了白骨，谁负责？谁敢过问？世界历史上有过这种“行政处分”的记载吗？

夜深人静，我躺在冰冷的被窝里，瑟瑟颤抖，冻得无法入睡，唯一的声音就是那一阵有一阵无的“嘎噠噠——嘎噠噠——嘎噠噠……”特殊车轮声。那沉闷而又清晰的铁轮的声音，好像一把巨大的铁锤，有节奏地击打着我们半僵的躯体，也许是今天，也许是明天，可能我就会乘上那部豪华殡车走向极乐世界哩。

冻得无法入睡，免不了常常默默地想：解放之初，赶走了国民党，迎来了共产党。我们都抱着为国家建设献身的理想走上工作岗位。真的是兢兢业业，尽心尽力，努力地工作。总在想着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扪心自问，我并没有反对共产党，也没有反对社会主义。不过是希望通过整风，把党内的不健康的的东西整掉，以使党进一步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期望。而实际上有些党员解放以后环境一变，确实存在诸多毛病，特别是“特权思想”的广泛存在，这绝对是事实。整风时不是一再动员大家提意见吗？不是一再说什么要“帮助党整风”吗？不是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吗？怎么搞了半天，竟变成倒转来收拾提意见者的“阳谋”了？毛泽东远在1945年和黄炎培的谈话中不是说过：“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吗？而今，我们还没有监督政府，只是给确实有问题的个别党员提了点意见，不容分说，就被扣上了“右派”帽子，用对付政治犯的办法来对付

我们。甚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国家领导人能这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吗？

我反复在想，这个国家的建立，是以“人民”的名义，而人民的权利瞬间又会被剥夺得精光，过去被告知的理想社会像是一个美丽的梦，这美梦如今已被现实击打得粉碎，实际上这国家恐怕已经落入一个二十世纪新皇权手中，知识分子阶层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显得无力和软弱，似乎已经不是“夹着尾巴作人”了，而是一切都必须逆来顺受。但翻过来再想，我们至少是一个爱国者吧？我们根本没有作过为害国家民族的事，为什么把我们排斥在“人民”之外？为什么要妄加罪名剥夺我们热爱祖国的权利？“国家”是所有中国人的，并非一部分人的。当我们满腔热情，期望祖国富强，并付出自己的一分力量时，为什么竟能被推出“人民”的队伍，根据什么剥夺了我们作为人民的权利？此时，我似乎有一种受骗的感觉，不禁使我想起了莱蒙托夫的一首小诗：

我们闭起两眼，
饮啜着人生的酒杯，
把它的金边打湿了，
用我们自己的眼泪；

等到在死神的面前，
那幅帋幔从眼睛上落下，
而诱惑过我们的一切，
也随着帋幔消逝了；

那时候我们才看清楚，
金杯原来是空空的，
它里边也曾有过美酒——幻想，
而它——却不是我们的！

一个国家竟然只允许一部分人去爱它，而把另一部分人划出去，

不允许他们去爱国,历史上有过多少这样的事?难道国家也可以被人垄断?我们的国家究竟是什么体制?难道社会主义还能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现在是不是成了“率土之滨,莫非王奴”了?

唉!俗话说:“该死活不了,该活死不了”,一切听天由命吧!

就在恐怖和饥饿笼罩着农场,近1000“右派分子”死掉四分之一的非常时刻,大家都在无奈地等待死亡的当口,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农场开始从附近河北省的一些县里调来一些当年收获的白薯。于是,我们稀里咣当的粥里多了几块白薯。别小看这几块白薯,可真解决了不小问题,仅仅这几块白薯,就把走向酆都城的“右派”队伍又拉了回来,死人开始减少了。

大家仍然没有劳动能力,每天这群散兵稀稀拉拉晃悠出去,在地里找一处避风的地方,大多是作“精神会餐”。你说曾吃过什么美味佳肴,他又说什么地方的小吃如何如何的地道;这个说:“现在有一碗炸酱面,也能算最好的食品”,那位说:“就这白薯管我一顿饱,死了也值”……。只有我和张睿一言不发,不去谈论那种没用的事。但丁说过:“在不幸之日,回忆欢乐之时,是一个不能再大的痛苦。”我想,只有设法保存我们的生命,才是唯一应该考虑的问题。

好不容易熬过了冬天,白薯粥救了我们这批“右派分子”的命。随着春天暖和起来的气候,大家似乎摆脱了死亡的威胁,身体好像渐渐开始好转,至少估计自己不大可能死掉了。这时候突然又交了好运,不知道什么人,什么时候种的一批变萝卜冻在地里,让我们去收。

我们这批几乎走不动的“右派分子”,头一天下到这片地里,有些人马上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这些依然浮肿体弱,蹒跚而来,还在长期饥饿煎熬中的“右派分子”,忽然被这极为平常的食物——萝卜刺激了神经,那副衰弱不堪的病躯像刚注射了兴奋剂一样,突然迸发出一股力量,跌跌撞撞,两步并作一步地纷纷扑向那些红色的萝卜。他们拔出萝卜,根本不洗,在脏衣服上蹭一蹭,就等于洗过消毒了,没命的往嘴里塞。嘴里还没有嚼完,就又扑向另一个萝卜。这情景与其说是“收获”,不如说是“扫荡”。一群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机关、学

校、团体也曾体面地工作,在社会上也是体面而理性地生活。如今饥饿竟然使得他们像疯子一样,完全失去了理性。这场面也算得上是一幕悲剧性场面。

李队长平时总爱大声训斥大家,实际上他心地不错,现在看到人们的精神状态已经失控。当时,他也无力按部就班地布置“收获任务”,估计他知道大饥饿中,人会控制不住自己,吃得过饱而撑坏。他知道这批人长期处在饥饿中,一旦过量暴食会发生意外。他焦急地大声喊着:

“大家不要乱吃,乱吃会把人吃坏的!”

“注意!注意!不要没命的吃!”

“不是不让大家吃,乱吃是会出大问题的!”

“适可而止,适可而止,吃多会撑出大病的!”

.....

但是他喊他的,却没有多少人理睬。他只好跑到那些“疯吃”的人们面前去一一劝阻。另外一个高队长,也一再喊:

“不是不让你们吃,那么狂吃是要生病的。别的场有家属送来吃的,一下吃了三斤大饼,把胃撑破了,到医院作了手术,差点儿要了命!大家可得注意呀!.....”

杜兴昆不听那一套,一边“疯吃”,一边骂骂咧咧:

“我他妈听你那个?我还就要吃,操他大爷的!今儿个让我逮着了,我能不能吃?我他妈不吃是傻B!我还得他妈吃饱喽,就是死,也不能当他妈的饿死鬼儿!.....”

我和张睿是组长,他是个典型的书呆子知识分子,为人正派,思想纯正,小心谨慎,不敢作半点越轨的事。我和他可以说是一对“迂夫子”,虽然和大家一样饥饿,却受了“饿不苟食,死不苟生”古训的影响,农场指派我们担任组长,就该作出表率。在那种混乱的情况下,只有我们两个人宁肯忍着饥饿,也不肯伤害自己的自尊心,一口萝卜也没有尝过。

一连五、六天,天天出工时大家情绪挺高,因为那已经不是出工,而是去吃萝卜。这一阵比前几天好一点,多多少少一边吃,一边能干点

活,用箩筐装一点慢慢抬到地头,集中起来以备马车来了拉走。但是无论干什么,嘴是绝对不能让它闲着,边走边吃,边干边吃。这萝卜究竟有多少营养没人考虑,它能填饱肚子,能解决这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就是极大的满足。本来这一点萝卜,在正常情况下,用不了多少天就会收获完。如今处在大饥饿时期,里里拉拉差不多干了快一个月。大家真没想到萝卜居然成了救命的宝贝。借助这宝贝,我们这批“右派分子”的身体和精神状态还确实有了一点好转。

然而,人在长期饥饿以后,很自然地在精神上会产生一种反常意识,就是不懂得饥饱。肚子已经吃饱了,可心里仿佛依然没饱,还想吃。看见吃的东西,还要下意识地往嘴里塞。也许这是现代精神病学上还没有的新科目-----“饥饿精神病”。

在这种反常的精神状态下,许多人在田里,边干边吃,不停地吃。一说收工,他们总还要想尽办法,腰里扎一根草绳,把萝卜塞在后背;或者扎住裤脚,把萝卜塞到裤筒里;还有装在书包、背包里带回宿舍。晚饭喝完那碗白薯野菜粥,坐在宿舍,不断地发出:“格噌格噌……………”的声音,不停地嚼着。好像也成了一种病态。

杜兴昆就是一个典型,他不停的吃,但肚子毕竟有限,吃不下也在嘴里嚼着。他一边嚼,一边还叨唠:

“操他姥姥的,你们说,我他妈是怎么啦?怎么没他妈个饱?老他妈想吃。操他的,是不是得了他妈“饿痲”啦?这叫什么事儿?以前光听说有“饿痲”,可是没见过。嘿!这回让他妈我给摊上啦!这病还真他妈厉害,把人弄得跟疯了似的……。有时候我琢磨,都他妈四十的人啦,瞅瞅自个儿这德性!我他妈都是有儿女的人了,真他妈一点儿起子也没有,我这阵儿这德性样儿,让我家喽(妻子)看见这“饿痲”丈夫都恶心。孩子们看见我这叫花子爸爸也觉着丢人,唉,这人活成什么啦?唉!饿死就饿死得了,这他妈叫什么事儿!……”

后来,每天连吃带偷,比装上马车的还要多。场部让队长每天收工回来,在场门口收缴。大家站好队,一个一个地搜身,把搜出来的萝卜装在麻袋里拿走。尽管天天搜身,要偷的还是每天照偷不误。杜兴昆可

真叫“满不饔”，队长收他的萝卜，他和队长夺，还嘴里不干不净的嚷嚷：

“嗨，嗨，嗨，怎么着？你敢情吃饱啦，这他妈破萝卜也不让往饱吃？”队长把萝卜搜走了，不理他。队长也知道他是个没文化的农民，经常胡搅蛮缠耍无赖，也不和他计较。他还不依不饶地骂骂咧咧：

“你给我瞧瞧不让吃饱的法律，我就知道犯了错儿有枪毙的，没听说往死饿人的。再说啦，我他妈有什么罪过？自古以来没听说过吵嘴也算犯法的。我他妈没罪过，我就得吃！”一边叨唠，一边动手从麻袋里拿萝卜。气得队长也没办法。

有一天在队部开会。会后李队长把我叫住，问我带什么包没有。正巧我带着一个军用草绿色挎包，我还没有弄清楚他要干什么，他一把拿过挎包，从收缴萝卜的麻袋里给我装了一挎包萝卜，说：“拿回去吃去。没事。”

他这样作，使我很为难，怎么会没事呢？但又没办法拒绝。只好勉为其难地拿了回去，把挎包挂在我的铺位上方钉的一个木桩上。

没想到就在我出去上厕所的工夫，宿舍里就炸了窝。原来我刚出门，杜兴昆就去摸我的挎包，一摸是萝卜，就大喊：

“嗨，嗨，嗨，快瞧，当组长的偷了一挎包萝卜，咱他妈拿俩，队长就搜身，他一拿就是满满噹噹一挎包子，你们说怎么办吧？”

张志华和他争论起来：“他绝对不会偷萝卜，我敢保证，他不会干那种事！”

“嘿，我说你们这帮知识分子呵！？还真抱团儿，都他妈到这份儿上啦，你还护着他。你说他没偷，这萝卜是哪儿来的？嗨，你倒说呀！”杜兴昆和张志华边吵，边提着那包“赃物”嘲讽张志华：“哎，哎你光说不行，这是什么？我说，这是什么？”弄得张志华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其实，我从厕所回来，在门外已经听见了。我只好推门进了宿舍，看着这阵势也挺难堪，真不知道该怎么说。张志华和我平时关系好，他了解我的为人，所以为我辩护。但挎包里确有“赃物”——萝卜，而我又不好说是队长给的，真是有口难辩。张志华见我一言不发，也有点尴

尬。

就在此时，咚地一声，门被踹开了，李队长走了进来，一脸严肃地对杜兴昆说：“杜兴昆，我估计着你可能要捣乱，平常你油嘴滑舌，胡搅蛮缠，骂骂咧咧，我念你是农民，没文化，不跟你计较。你别把我惹火了，我有收拾你的办法，不信，你就试试。”

“哎，哎，哎，我，我怎么啦？我。我就是说他挎包里有这么多萝卜，这怎么啦？”

“我给的，就是我给的！你要干什么？”李队长有点生气。接着说：“我问你，大家从收萝卜以来，谁没吃过？没吃过的举手。”

没有人举手，我也没好意思举手。李队长说：“不要以为我们队长都是瞎子，在灾荒饥饿当中，大家都挨饿。这几天在地里收萝卜，我们并没有制止大家吃，恐怕没有不吃的吧？是不是？”

大家都没有说话。李队长说：“你们也不实事求是啊？！我们看得清楚，全队只有两个人没吃，你们说是谁？”

“老赵。”张志华说了一句。

“还有一个————张睿。这好象是小事，但反映了人的品质。对于这样的人，我该不该给他们也吃一点萝卜？杜兴昆，你说，该不该？！”李队长冲着杜兴昆质问了起来。

“我我，我没说不该，我是说他挎包里这萝卜还挺不错的。我，我没说别的。人家是没吃，这大伙儿都知道，这，这没错儿，人家是没吃。是该给，该给。”

“你看你那贼鬼溜滑的样儿，平时我懒得跟你斗贫嘴，你虽然没文化，可你也四十多岁的人了，别整天胡说八道，起哄架秧子。好好跟别人学学。”李队长又有些无奈的样子，责备着杜兴昆。然后对着大家说：“给你们说实话，我们也挨饿，情况比你们好一点也是事实。我们只能按照党和国家的规定办事。我们也没有多大权，也只不过按上级指示干具体活。希望大家能度过这一关，早日回到社会上去。”说罢，开门走了。

他走后，我把萝卜倒在床铺上让大家吃。大家边吃边议论，一致感

到李队长讲话还是合情合理的。确实，他们也不知道我们未来的命运。张志华跟我说：“我很奇怪，我们这群“右派分子”的生命力真是难以想象，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居然得病的人很少，就是在大饥饿中，只有饿死的，好像没有其他病死的，这可真是九死一生呀！”

“我也感到我们活得极为不易。看样子我们现在可以说已经闯过鬼门关了。”我也谈了我的想法。

“喂，喂，我可得病啦，得的是他妈的饿病！”杜兴昆插了一句。张说：“我们这次要是死了，你说冤不冤？”

“难道没死就不冤？”

“要我说，全他妈冤，冤大发啦！”杜兴昆又插了话。

张说：“你认为我们什么时候可能回去？”

“回哪儿？毛泽东说过：“在‘三反’中，在肃反中，在思想改造中，某些真正作错了的，都要公开改正，不论对什么人的。只有扣帽子一事，对‘右派’当别论。”根据此话，恐怕到现在对我们也还没完。我也真想不通，干嘛对知识分子如此过不去？”

“唉，咱们当年念这书实在念错了”

“也许。”

杜兴昆凑过来听我们的谈话。这位农民老二哥没心眼儿，冲着我不好意思地说：“老赵，我是一个粗人，刚才我对不住您。要说我在咱这一组还就是觉着你们俩正派，我信服。”

“信服你刚才对老赵来那一套？”张志华说。

“要不说我这人没他妈起子呢！操他大爷的，这都是挨饿把人饿他妈疯了。”杜冲着我笑笑，调侃了起来：“我不是说了吗，我他妈得‘饿病’啦，您别当回事。您甭计较我就行啦。”接着一阵哈哈大笑。这位农民老二哥真的是挺有趣的。

静下来以后，杜兴昆也感慨了起来：“你们刚才说出去的事儿，我也不是不想，你们出去没准儿还能当干部，我还回去种我那二亩地去，还他妈开我那洗衣店去。丫要连这也不叫我干，那我可就只得走邪路啦，操他大爷，没活路不来邪的怎么着。”

“你倒想得好，谁也干不了别的，都得继续在这农场劳动教养。”张志华说。

杜兴昆急了：“那我还不得疯了呵！”

也许是天不灭我们，就在白薯量增加以后，我们这批“右派分子”的身体略为有所好转，起码是逃过了死亡这一关了。我们这批人到了死亡绝境，居然能够挺过来，保住了自己的生命，这不能不算是一个奇迹。这真是绝处逢生啊！

这时候我忽然想到乞丐，以往我在城市里见过不少乞丐，他们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根本没有条件谈卫生，根本不洗手脸，讨来的食物不清洁，他们的手更不清洁。但是他们却不生病。我们现在实际上和乞丐相差无几，就某种条件来说，我们还不如乞丐。在这种饥饿状态下，居然没有一个人得其他的病，只有一种由饥饿而引发的浮肿病。（还有一位农民难友得的是“饿瘠”病）也许“大稔”为“洁”。这真是一个永远无法解释的问题。如果再要有其他的病传染，恐怕这个教养农场就会作为：“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活注脚了。未必能留下人，活人。

这就是行政处分，饿死了一大批人的“行政处分”！？

2003年，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第47期刊登了姚小平先生的文章《寻找消失的背影》。这是一份1963年7月编制的，茶淀农场饿死人罪恶的记录，居然失落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被这位姚小平先生发现而购得。从文中所附《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看来确实来自公安局的劳教管理部门。不过，作为当时的亲历者，我认为：

1， 统计表虽然列出了94位死难者，我认识的在于家岭死去的佟信顺、盛强等就没有列入名单，当时农场规定：不许串组，不许串队，这样一来就不可能认识和知道许多人名，相信这个死亡名单并不完全；

2， 死亡时间集中在1960年下半年至1961年上半年。符合实际情况。说明这些人全部是被饿死的。但所谓“死亡诊断”列明的死因是：“心脏病”、“风湿病”、“心力衰竭”、“肺病”……那里没有医院，没有医生，没有药物，也没有化验检测机构，也不需要这些，因为“饿死”，医

院、医生、药物都是无法救治的，“死亡诊断”是编造的一个“政治欺骗”。

随后姚先生在文章中谈到，1960年8月16日，在茶淀农场584分场饿死的张勳仁先生的家属，1979年被通知到北京公安局接待室。在那里，她被告知：“张先生已经被‘改正’了。发给200元人民币，作为补偿。”

张夫人荆美英接过那200元人民币，走出接待室，眼含泪水，悲痛地说：“噢，一条人命难道就值200元！”这真是浸满了血的话啊！

盛强是否也发了200元？

李志军是否也发了200元？

佟信顺是否也发了200元？

那些死去的人的性命是不是都值200元？

这是谁给饿死一个“右派分子”定的价？

从法理来讲，国家并没有赋予任何人，可以假“行政处分”之名，轻取这些“右派”的性命，而情况是国家的权力被极少数人剥夺了。他们可以指使人作任何事情。包括在“行政处分”的名义下，不承担任何责任，没有负罪感，没有良心的谴责，轻松地用饥饿耗干了他们的血肉之躯，结束他们的生命。

二十年后，随着政治的需要，他们又可以“人道”、“宽容”、“富有良知”的面貌出现，给予被他们折磨饿死的“右派分子”每人200元人民币的人道补助。但这200元并非出自别处，而是出自死者生前用自己的血汗积累的“劳动基金”（他们叫做“家属赡养费”和“安家立业”基金），用死者生前的血汗再来偿还死者的性命。

从宣传的角度，他们所有的都是世界第一，最好。处理“右派”的政策被宣传为体现了二十世纪的文明、人道、政治宽容，采取了非司法的“人民内部矛盾”的行政处分。然而实际上这不属于法律范畴的“行政处分”却能用饥饿夺去人的性命。最为歹毒、暴虐、阴险、残酷的是，当他们用“行政处分”饿死一批人之后，竟然编出谎言说死者是：“心脏病”、“心力衰竭”、“肺病”、“风湿病”……，一方面把他们的罪恶责任反

过来嫁祸予死者,另一方面则掩盖真实,欺骗家属、世人,乃至历史。

人们一但明白了这背后的文章,就不难悟出毛泽东和他的专政机关的狠毒并不比布痕瓦尔德、奥斯维辛和古拉格群岛温情多少!

这普普通通的“行政处分”竟然可以超越刑法,被用来杀人,多么可怕!

什么叫暴虐?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暴虐的吗?

走出大墙

大墙里的人,人人都想走出来,
大墙外的人,没有人愿意走进去。

——佚名

1961年3月12日,早上起来吃过早饭,正准备出工,农场的喇叭里忽然广播:“今天全体不出工,要开大会”。有人传说要给一些人摘帽子。这流言一传,许多人还真兴奋了起来。

我不相信。因为这之前曾经有过一次,1959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共中央给民主党派中央142人摘掉右派帽子,以及特赦国民党一批战犯的消息之后,也曾把我们集中起来,不劳动,洗澡,理发,换衣服,学习,还改善了伙食。说是要给大家摘帽安排工作。结果高兴了十来天,又通知回场继续劳动,也就是继续劳动教养。原来给那142个高层“右派”摘帽和特赦战犯是国庆十周年作的政治秀,论人数只不过占“右派”总数不足万分之2。实在是小意思,不足为奇,其目的不过是对外对内作政治宣传,着重于政治影响。结果,让我们这批人狗咬尿泡,空欢喜了一场。

接着,大家拿着马扎往食堂前面的空地上集中。坐定之后,互相接头接耳,低声议论。

张志华说:“整整三年了呀!辛辛苦苦干了差不多一千一百多天了,不容易啊!也该给一些人摘帽了。”

“如果也按划右派的比例算,百分之10%,我们1000多人,怎么也得摘个百八十人吧?”安树大说。

“假如按5%算呢?那也得有六、七十人。”

“这回你们老右有了希望,我们他妈什么时候解除呀!操他大爷的。”杜兴昆有点儿急了。

“这回是给给我矛盾的解决,你们人民内部矛盾的,过两天就会有车接你们会北京,还发一笔钱呢。”张志华和杜兴昆开着玩笑。

“嘿！你知识分子拿我们老农开心呵！”

引起了一阵笑声。

“不容易呀！经过三年的脱胎换骨，熬过了大饥荒的生死考验，不少人已经付出了生命，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些人又该怎么算呢？”张睿有点感伤地说。

“我总有点不相信，我们总愿往好处想，这几年的教训却是现实往和愿望相反，唉，等着瞧吧。我确实不抱太大希望。”我对张志华说。我们从来到农场就一直编在一组，住在一个房间，生活、劳动整天在一起，整整三年了。彼此相处得不错。

……

在场地上，坐在小马扎上的 1000 多“右派分子”，每个人几乎都怀着美好的愿望，都在盼望着摘掉紧箍咒的好事能轮到自己头上，早日回到人间。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欢乐和紧张的气氛笼罩着整个会场。土坡上高处，摆着一张桌子。有人敲了一下桌上的麦克风，“哒”，第一声响发出后，全场立刻就鸦雀无声，静了下来。

果然，正如大多数人所料，大会主持人宣布：“今天大会的内容是：根据总场的布置，给一些改造好的人，摘掉右派帽子，同时解除劳动教养。……解除教养的人，今天就调职工队。”……大家屏住呼吸，静静地等待宣布名单。此时的气氛，与其说是静听宣布，不如说又在等待一次“宣判”。心脏几乎紧张得要从喉咙里跳出来。

最后，宣布的名单只有四个人。非常意外的是，四人名单中的第二名居然是我。四人中，我只认识同一个队的周兴岐，他是北京铁道学院的学生。另外两人，我不认识，听说是在食堂劳动，来自哪里，不得而知。

然而一经宣布，绝大多数人全傻了眼，这倒应了暴君斯大林说过的一句话：“大希望变成了大失望。”〔注：斯大林全集中文版卷一 75 页《告公民书红旗万岁》〕1000 多人中，只有四个人被摘了帽子，解除了劳动教养。按比例说，只有大约千分之三。这和大家想象中的百儿八十人简直是差之千里！

这时候我的心情可以说是喜少忧多。喜的是终于出乎意料之外地摘了帽子,解除了劳动教养;忧的是调到职工队,意味着又要当“二劳改”。摘和不摘,解除和不解除并没有实际的区别。我牢牢记住的一句话是:“解除教养的人,今天就调职工队。”所谓职工队,就是历年刑满的劳改犯留场就业的人,人们通称作“二劳改”所编的队。这句话无异于另一种宣判:“你将成为‘二劳改’中的一员,下半生也许永远是这个队伍中的成员。什么回到人民队伍?什么摘帽?什么解除劳动教养?实际上都毫无意义,你将终生成为一个‘二劳改’,留在劳改农场劳动!”

同时,我也为大家的失望有些伤感。三年了呀!活下来的这些人难道只应该有四个人摘帽?行政处分的一大批人用饿死结束了处分,难道还应该对右派依然这样严酷?今天把这些从死亡的阴影中爬出来的1000多右派集中起来,把他们期盼了三年的脆弱神经绷了一阵之后,最后给他们的却是失望的松弛。这实在有点残酷。

坐在我旁边的张志华笑着伸过手来握着我的手,低声说:“我祝贺你,老赵,你总算先回到人民队伍中了,先走出去了。”

我真是苦笑着握握他的手。脑子里想的是:紧接着的“二劳改”的生活又将怎么熬法?

大会一散,许多和我熟悉的难友自然地围上来向我祝贺。

“你总算熬出头了。”

“你总算要回到人民队伍中去了。”

“不要忘了这一段友谊。”

……

但是这和学生毕业不一样,谁也不敢谈今后联系的问题。教训告诉了大家,那将会招来“小集团”、“团伙”等罪状。

“将来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我预祝大家也早日摘掉帽子。”我只能对这些同窗难友说这样一句安慰的套话。实际上,我对未来命运的安排也是不抱乐观。传统的习惯是刑满了应该回家,而我们这些右派受到的变相刑罚将无异于终身监禁。我一直记着那句话:“……今天就调到职工队。”和再作“二劳改”衔接得几乎没有空隙。

接着,李队长来,让我推一辆小车,把行李推着跟着他去职工队报到。一边走,李队长一边对我说:“我们给你的鉴定评语是很好的。在闹饥荒的时候,你的表现尤其不易。到职工队以后,好好干。”……

“感谢你,李队长。”“感谢你,李队长。”我只能说着这一句话。我知道我未来的命运他们也未必知道,正如他以前说的,那是党和领袖才能决定的。

走出大墙不到100米就是职工队。他对一位姓杜的队长作了几句交代,我就被编进了职工二队。进入宿舍,是一个三间房通着的大长房间。从中间房门进去,两旁是大通铺,一个房间可以睡将近30人。我把行李和杂物拿下来,一个外国人模样的人走过来帮我把铺位安置在一个角落。

看样子大概有50岁左右的外国人走过来,微笑着用纯正的北京话对我说,他是德国人,他在德国高中毕业后跟着父母来到北京。他家在海淀区办了一个鸭场。因为他的妻子被害身亡,他成了嫌疑人,一直没有搞清楚,他被判了几年刑,然后就一直在农场劳动。他就是我接触的第一个所谓“职工”。他知道大墙里是一帮知识分子,对我颇为客气。他还告诉我,这个组还有一个奥地利人。在这里的规矩是,彼此都不问对方的情况,他也不知道那个奥地利人是为了什么来到农场的。我来的第一天,他就破了这里的规矩,把他的历史告诉了我。我想,这些人无非是小偷、流氓、地痞、强奸犯……还有杀人嫌疑犯。今后我就成了这帮人中间的一员了。就是这帮人,按照共产党的政策,叫做“人民内部矛盾”,从政治上说,他们还比我高了一个政治等级。

这些职工队的人,在大饥饿的关键时期,比起被圈在大墙里的我们来,他们最大的幸运是有有限的自由。星期天可以在大农场(我们家岭农场只是一个分场,总场——清河农场是一个大农场)范围内搜寻能吃的东西,在刨过的白薯地拣没刨净的白薯,在河沟里捕鱼,在地里挖冬眠的青蛙和蛇。还可以去附近的汉沽、宁河县买高价食品。所以在饥荒中,他们身体的损伤远远没有我们严重。绝对没有达到我们饿死四——五分之一的程度。

第二天就去出工。

组长叫我从地头背多半麻袋种子送到播种机旁。我十分艰难地背起那多半麻袋种子，刚一往田埂下迈步，就晃晃悠悠，不由自主地跪倒在地，还把一些种子撒在地里，一时间也站不起来了。那个组长看到我竟是这样的无能，粗野地冲我吼道：“你他妈的劲都哪儿去了？他妈的，干不了滚蛋！”

忽然，三年来从未发过的无名火直冲我的脑门儿，我就倒霉到让一个“二劳改”这样骂我吗？我毫不示弱地马上回敬他：“你他妈的，你他妈的，就是背不动，你他妈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哦，他怔了一下，这个新来的家伙还挺难镇住呵。憋了五六分钟，说：“干不了你甭干！”

“不干就不干！”我把半麻袋种子扔在地里就气呼呼地回了宿舍。回到宿舍约摸半小时，姓杜的队长来了。当然，他是听了那个组长的汇报而来的。

“怎么回事？刚摘了帽子你就翘尾巴，说不干就不干啦？”

“不是我不干，我们在大院的伙食和健康情况同在外边的职工队不一样，到现在我还浮肿着，严格的说，还应该是病号，这情况你们当队长的应该清楚。就我的身体条件，我根本背不动那麻袋，他非让我背，我干不了，只好不干。”我也不考虑那么多了，大胆的和杜队长争辩起来。

“噢，原来是这样？那你就拿一把铁锹到地里撒肥吧！”姓杜的队长没有生气。“去，到后排工具房领一把铁锹，以后你就干撒肥的活儿吧！”

所谓撒肥，就是把地里不知道从哪儿拉来，一堆一堆象土一样的东西。用铁锹撒开来。这种活儿干起来没有定量，也不用费太大的力气。从那天以后，我每天就扛着一把铁锹，看到哪片地里有肥土，就去撒开。也不和其他人打交道。

这里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傍晚收工回来，吃完那一份够七成饱的晚饭，大家都在宿舍床上躺着。没有人说话。也许没有吃饱，在养精神，

又好象都在想心事。

实际上我倒是的的确确在想心事。大墙里的人以为我走出了大墙,一定非常愉快,我摘掉了右派帽子,解除了劳动教养,我获得了自由……。却不知道我又走进了流氓、盗窃、强奸犯、杀人嫌疑犯、刑事犯的群体,变成了“二劳改”的成员。而且未来的后半生很可能将要一直这样生活下去。这比劳动教养还要可怕百倍!这种可怕的“终身劳改制”不知道在斯大林暴政下的苏联有没有,只知道他们把大量的人,流放到西伯利亚,有的可是全家老小一齐流放去的。我们这“行政处分”是不是又会变成“终身劳改”搞不清楚。中国的这一创举实在恐怖,象我们这样“片言折罪”的“言论犯”,多么轻微也要改造终身,想想真是可怕!眼前的路看来是越走越暗下去了!

有一天早晨,我扛着铁锹正走在去往地里的路上,忽然听见后边有人喊我。回头一看,是我们刚到于家岭时当过我们队长的老张队长,骑着自行车过来了。他下了车向我走来,笑嘻嘻地问我:“听说你摘了帽子也解除教养了?”

“是啊,你怎么知道的?”我向张队长问道。

“我在总场开会时听说的,怎么样?在这儿。”

“不怎么样。”

“你到我那儿去吧。”

“张队长,我怎么可能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呢?再说你现在在哪儿?”

“我现在在畜牧队,离这儿不远。那么着吧,你不用管了,这事我来解决。现在顾不上多说,我要到总场开会去。”说罢张队长匆匆骑车走了。

我扛着铁锹一边走一边琢磨:他那里怎么样?能去吗?畜牧队?到那里去放羊?再演一出“苏武牧羊”?今后又会变成什么样?……我知道这位老张队长口头上对大家很严厉,实际上心眼儿挺好,谁有困难他都会给予善意的帮助。也许不会比这里更糟吧?……

第二天,早饭后我正在院子里站队准备出工,看见一个年轻人赶着一辆小毛驴拉的车进得院来。他拿着一封信,一边拢住小毛驴,一边

喊着：“杜队长！谁是杜队长？”

只见杜队长走过去说：“我是，我是，什么事？”他拿起那封信看了没有一分钟，就扭回头冲我喊：“赵文滔，把你的行李和东西装到车上，跟着他走，你调到畜牧队了！”

等我把行李装到车上，其他人都已经出工走了。赶车的小伙儿坐在车辕的左边，我坐在右边，毫无疑问，我这右派是应该坐在右边。他鞭子一扬，我们就上路了。

“你们那儿有多少人？”我先摸摸那里的情况。

“不算多，顶多六七十人。”

“有右派吗？”

“有，不多，四五个吧。”

“你在那里作什么？”

“赶车，拉东西。”

“你多大啦？”

“十九。”

“你是怎么来到农场的？”

“我爹在农场，我从老家也来了。”

“老家是哪儿？”

“河北。”

……

我用不着往下问，估计他的父亲大概是劳改以后终身留场就业的，把乡下的孩子也接了来。好端端的一个乡下孩子，就这样也陪着他爹成了“二劳改”。可怜，可悲呀！看样子他还单纯得不懂得“终身二劳改”生活的艰辛和苦难。唉！

大约走了半个小时，就到了畜牧队。

张队长先给我安置了住处。一间屋三个人，一个是右派，胡宏造，上海人，同济大学建筑系毕业，在建筑部建筑设计院被划了右派，现在还没有摘帽。另一个姓李的，是被北京市“水晶石”政策发落来的。（註：1958年处理完右派以后，彭真提出来一项政策：要把北京市那怕有一

丝丝他们认为是有问题的人和没有正当职业的人全部清除出北京市，使北京市纯洁得象水晶球一样。这批人就是在这一政策下，被清除的。清除的办法就是送劳动教养。)听说此人以前是小商贩。我就被安置在空下来的一个床位上。

这间房不知道是怎么建的，离场部和其他宿舍有 100 米，孤零零独一间，离场路(分场间通行的马路)只有 20 米。也没有围墙。这环境比起于家岭的大墙来，实在给人一种开阔、自由的感觉。使人精神上舒服了许多。

安置停当，张队长把我叫到队部，对我说：“这里连我一共 70 人，包括一部分家属。(劳改犯刑满后留场就业，家在农村的，把家属也接来，安家落户在农场)这些人大部分是喂猪，有少量的羊，有俩人放牧。这里就我一个队长，我把你调来是考虑我经常到总场开会，我走了，你就替我照料一下队里的这些人。别出什么问题。平常，你就带着六个人打猪草。你干活不干活不要紧，你把他们组织好，得打回猪草来，这些猪饿得够呛，人还吃不饱，哪有粮食喂呀，全靠猪草哩，有的小猪都饿死了。”

“张队长，你给我的实在是一项‘重任’呀，我只能尽力作好。这六个人是什么情况我还不知道。作到什么程度我心里可没底。”我对张队长表示着我的意见。

“这里只有你们三个是右派问题。你房间的胡宏造也是右派，还没有摘帽子。猪场那边还有一个右派，小毛，二十来岁，正在学兽医，听说他还爱写诗，笔名叫什么流沙河。也还没摘帽子。”

听他讲到这里，我不由得心中一怔。流沙河不是四川那个写《草木篇》的青年诗人吗？他可是四川人，怎么会来到这里？再说这个小兽医，张队长带我到队部时，正好他在院里，还穿着白大褂，和张队长说了几句话，我估计就是他。听口音是江、浙一带的人。怎么会成了流沙河？此事如果真是他自己说的，不是张队长误会的话，又是在劳动教养农场，这可是不得了了的欺骗呵。他有多大胆，敢在此地充“冒牌货”？

一时搞不清楚，我也不敢声张。

第二天早饭后，张队长带来四个人，把胡宏造和老李也叫过来，对大家说：“以后你们六个人由赵文滔带着去打猪草，猪现在没粮食吃，全靠吃猪草，卖点力气，尽量多打一些。劳动当中，听他的安排。那边有一辆车，出工时候拉着，收工回来时候，把猪草拉回来。这就是你们六个人的任务。好，就这样。”安排完任务他就走了。

我一打量那四个人，就看出来是文化程度极低的刑满就业者。接着就招呼大家一道去打猪草。

甭管是右派还是“二劳改”，我又不是队长，都得对付，不能采取“管人者”的姿态去对待。尤其不能指责。第一天就出师不利，收工时只打了小半车草。那四个“二劳改”基本上不干。

在回来的路上，我一直琢磨，这样下去怎么给张队长交代？

这时候，我发现那四个“二劳改”一路上四下里扫视，一旦发现一个“烟屁股”彼此还抢。这也是大饥荒时期的一大特点，和粮食一样，对香烟也实行了配给，烟鬼们根本就不够吸的。有烟瘾的人和吸毒者差不多，路边扔到泥土里的烟头儿，他们都会视如宝贝。我虽然不吸烟，每月也配给12盒极为低档的香烟。看了他们抢烟屁的贱象，我的头脑豁然开朗，我可以利用我的香烟！

第二天我们拉着车来到荒地，我立即宣布：“谁从这里一直割到地头，再割回来，奖励香烟一支。要快！早割完，早回去，闲话少说，现在开始！”

话音一落，只见那四个“二劳改”像注射了兴奋剂，镰刀飞舞，直冲地头杀去。胡宏造不吸烟，他也没有多大体力，只好慢悠悠落在后边。那老李是个动口不动手的家伙，是个草包瘦大个儿，弯不得腰，一会儿站起，一会儿蹲下，也干不了多少。即使这样，不到两小时，竟然割了满满当当冒尖儿的一大车。

我掏出四支香烟奖给那四个“二劳改”，喊一声：“收工，回！”

“刚刚十点多一点儿，行吗？”老胡说。

“走！没问题。”既然比昨天多打了六七倍，我也就敢作主了。

快到场部了，正赶上张队长骑车回来，看着那冒尖儿的一大车猪

草,高兴的说:“你们真行啊!”压根儿就没过问为什么没到点就收了工。

随着我月月积攒的香烟渐渐减少乃至告罄,时光也悄悄地进入秋季。

一个星期天,我洗了两件衣服,没有办法晾晒,只好摊开晾在屋后的几株枯草上,坐在土坎上看着,免得被人偷走。这时候,旁边的场路上走过来七八个人。忽然有一个人笑着朝我走过来,仔细一看,是刚到于家岭时同过组的小刘。

“喂,老赵,你怎么在这儿啊?这是那儿?”突然发现我在这儿他很意外。

“我解除以后就来到这儿,这是畜牧队。你们这是上哪儿去呀?”

“这儿条件怎么样?能吃饱吗?”他问道。

“嗨,吃不饱,饿不死。”我讲了实话。

“喂,今晚上三、四点钟,你带一个布书包,到前边儿大概二里路的桥上找我。”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有点莫名其妙。

他说:“我们是被派到桥上,夜间抓螃蟹的。那儿螃蟹多了去啦,你来,我给你拿点回来吃。”

他这一说,更让我摸不着头脑:“半夜三更的,哪儿去抓去呢?”

“你不懂,把一片荆条编的大蓖子,挡在上游的桥洞,螃蟹就会爬到桥面上过桥,我们在桥面上再放几盏马灯,螃蟹就往马灯周围爬。不用到处去抓,干脆就是拿着麻袋,拣着往里装。一晚上我们能拣六七麻袋。你来了给你装个一书包,简直跟玩儿似的。”

我听着觉得很新鲜:“那好,不会给你们带来什么麻烦吧?”

“没事儿,没事儿,就我们七个人,没人管,到时候你就来吧,我得快走了。”小刘说罢匆匆走了。

这小刘是15岁因为在学校好讲哥儿们意气,爱抱打不平,帮同学打架,拿砖头把人家头砸破,缝了五针,进了少年犯管教所。人很单纯,没有偷鸡摸狗的坏毛病。转眼今年已经快19岁了。刚到于家岭在我那

一组,我们都把他当小孩看,关系还不错。

半夜三点钟,我真的拿了一个布书包去了。好家伙,桥上螃蟹满地爬。小刘说:“你就自个儿尽管拣了往书包装吧。这玩意儿爬得特快,我们忙不过来。”

几分钟我就拣了一书包,坐在桥头等着他们,不一会儿,就装满了六麻袋。就听得有人喊了一声:“够啦,够啦,不管啦,叫他们爬去吧。歇会儿,歇会儿回。”

小刘走过来问我:“够吗?”

“够了,够了,谢谢你,谢谢大家。”我连忙道谢。

小刘接着招呼他们:“抽颗烟,歇会儿就回。”

小刘坐下来对我说:“你这儿有这条河,我告诉你一个抓鱼的办法。你找一段水深大概到膝盖的地方,

先下水在里头淌一圈儿,把水搅浑,然后,你从一角一步一步往对角走。摸鱼就是在你走的时候,当你要迈步,刚抬起脚,你就伸手到刚抬起脚的泥坑儿里去摸,准有鱼,一抓一条,不信回去试试。”

半夜三更这一趟真没白跑,我简直是又拣螃蟹又取经。急匆匆告别小刘,黑灯瞎火就往家跑。到家以后摸黑拣了一些柴草,架起两块砖头,用脸盆就煮。一刻钟就开吃,天亮前就吃了个饱。脸盆里给他俩剩了四个,倒头睡去。

我想,《精神病理学》上大概还没有“饥饿精神病”这个病名。然而在大饥饿的实际生活中,却确实确实显现出这样一个新的病种。饥饿使得许多人对食品产生了病态的欲望,有时候吃饱了也会下意识地感到饥饿。在大墙里我曾经固守“饿不苟食,死不苟生”的商子古训,度过了生死险关。如今,出了大墙,时间又是无限的,我也同样感到饥饿,我也有强烈寻求食物的欲望,我想,这也很正常。因此,我竟然不辞辛苦地去大桥跑了一个星期。仅仅单纯地为了早上有一顿饱饭,直到那批捕蟹者撤离了大桥。

到了一个星期天,我就去摸鱼。先把一个布书包的口缝住,只露一个可以装进鱼的小口,书包带挂在脖子上,书包垂在胸前。河水有点

凉,我卷起了裤管,先下去把水淌浑,然后一步步慢慢往前走,再顺着抬起的脚往泥坑里摸。果然十之六七有鱼。不过鱼很滑,不一定个个都摸住。两个多小时,摸到十五六条鲫鱼。因为茶淀晚秋的水已经很凉,就上岸回宿舍。这我才知道“浑水摸鱼”这成语原来是从生活中来。

老胡和老李没想到我能拿回这么多鲫鱼。忙着问我是怎么搞到的。我刚给他们传授,这时候队部来说张队长叫我去开会。

到了队部,已经坐了五六个人。张队长说:“今天星期天,把大家找来是根据总场的布置,给大家讲一讲关于生活上应注意的一些问题。过去一年多,农场遭到灾荒,直到现在,粮食还是不足。现在发现教养队有的人乱吃癞蛤蟆和蛇中了毒。还有的家属给送来点心、馒头、大饼等等食品,而有的人收到这些食品以后,控制不住自己。有的人吃病了。还有人家里送来的大饼一下子就吃了四斤多,再一喝水,肚子胀得直打滚儿,把胃给撑裂了,没办法,只得去开刀。咱们职工队倒还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但也要引起注意,千万不能因为吃不饱乱吃……”

有一个职工说:“上星期我到汉沽,看见商店卖点心,是棒子面的,二十块钱一斤,我咬咬牙给孩子买了一斤。回来以后,五岁半的孩子,三下五除二就把一斤点心吃光了。半个月的工资呀,吃不起呀!”我想,这位职工一定是带家属的职工,这个孩子还不到上学年龄,将来在农场能受什么教育?长大就得当“二劳改”。唉!可怕呀!

另一个职工说:“我去了一趟宁河县,商店里没什么东西,就有牛奶糖,三十块钱一斤,是从天津来的。掂量掂量没敢买。现在虽然粮食还不够,相信在党领导下,一定会克服困难,很快扭转这种情况的。相信大家都会有信心,都会克服眼前的小困难。”好一个“小困难”,我们在于家岭可是饿死了五分之一老右呀!这个职工说得未必是心里话,但这样说也是正常的。指不定他在这里劳改了多少年,经过多少年的洗脑,显然这是一套官话。

……

开会回来,老李把我摸的鲫鱼洗干净,拾掇出来作熟了。大家都在这里劳动,虽然我负一点责任,我们都是平等的,他这样作,使得我心

里实在有些过意不去。我只好分给他们两人一些。在给老李的时候，他一再坚持不要，这就让我更加不好意思。最后推让再四，总算接受了那几条小鱼。

吃罢晚饭，我和胡宏造到场路上散步，慢慢地他给我上了一课。

……“老赵，相处了半年多，我觉得你为人诚挚，是个大好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感慨起来了。”我没想到他挺严肃。

“我们知识分子实际上蛮傻的。我经过反右学到了一点，就是凡事都要仔细观察。要观察清楚，傻乎乎那就要吃亏，要上当，要倒霉。”

他话峰一转：“喂，你知道那个老李为什么那么好，帮你把鱼洗干净，还帮你弄熟？”

“不知道。”我的确不知道。

“一开始我也不知道。还以为这个人不错，也许他在拍老赵的马屁。后来，我就运用反右学来的‘观察’，真的，仔细一‘观察’，一思考，我真是大吃一惊。好家伙，这人真够复杂的，真够奸滑的，真够可怕的。经过‘观察’和‘思考’，他把鱼作好之后，把汤全喝掉了。绝就绝在这喝汤，你知道勿拉？鲫鱼汤是最富营养的，孕妇生完孩子补身体，往往要喝鲫鱼汤，他把鱼作熟，为的是他喝鲫鱼汤，给你留下没多少营养的鱼，你还得感谢他。你说我们知识分子傻不傻？要不是我运用‘观察’和‘思考’，我们简直是叫人家卖了，还得帮人家数钞票！啊！啊！”

胡宏造说得对。人确实是很复杂的。这个老李接近五十岁，在旧社会作小商贩，自然练得相当狡猾，这一套我们知识分子是望尘莫及的。我对老胡说：“你说的对，我们解放前都是学生，对社会不了解，我们解放后才毕业参加工作。依然是没有社会经验，接着就打成右派，的的确确是傻知识分子。要起花招来，我们真敌不过旧社会下层劳动者，我们真敌不过老李这样的小市民。不过他也能干这一次了，下个月就不能下河了。十一月的茶淀气温能达到零度。这第一回诡计，就被你识破，这说明胡宏造这个知识分子比小商贩高明。”

“哈……”我们都大笑起来。

晚上张队长把我叫到队部，让我替他抄写一些中医验方。我一看

他在桌上摊放着《本草纲目》、《民间验方》、《中医学》……。我很吃惊，怎么张队长在研究这些东西？

“你帮我抄写一下我在书上画了记号的这些验方。这本书人家明天要还。另外一本还有一部分没看完，明天都必须还人家，实在倒不过来了。”张队长笑着对我说。

我总觉得有点意外：“张队长，你怎么研究起这个来了？”

“有时候空闲下来，还是学点有用的东西，不要把光阴白白浪费掉。我借书不容易，很远，还必须准时还人家，要不人家不再借给了。”他一边翻着另一本书，一边说着。

抄了两个小时多，抄写完了。历来我写东西还是很快的，干了三年农活，手显得那么僵硬，字也看起来总是有点不顺眼。好象干完了一件别别扭扭的活儿。

张队长高兴的说：“我急着要还人家书，想起来抓了你的差。这我就不着急了。”

我知道张队长在我们刚来农场时，曾经参与过重新审查我们每个人的所谓“罪行”，他对我们的情况非常了解。趁机会我留下来给张队长聊聊我的心事：“张队长，你说我们这行政处分，解除之后难道就一辈子了到这儿啦？刑事犯判刑以后，刑期一到还有个‘刑满释放’吧？从古到今，哪有这么处理人的？我那点事你也知道，你说说，那点事就该劳改一辈子？”

“喂，别发牢骚，别钻牛角尖，也别那么悲观。你也该明白，你们右派的事，总场根本决定不了，甚至于北京市也决定不了。这是个特殊政策问题，恐怕得中央才能决定。现在叫你在这儿劳动，你就安心劳动，别老琢磨这事。你要老这么想这事，不满意，那就不好了。”张队长给我作起了思想工作。

“话是那么说，放在谁身上也想不通呀！”我说。

张队长说：“你要那么说，我还有情绪呢。”

我有点纳闷儿：“张队长，你有什么情绪呀？”

“实话给你说吧，解放前，我在北京作地下工作，解放以后，没有功

劳有苦劳吧？把我发落到这儿，这不是和你们一样吗？”

“张队长，可不能那么说，我们是被改造的，你是改造我们的队长，这可是有根本区别的，”我说。

张队长又说：“有多大区别？不是也起早贪黑吗？你们到哪儿我不是也得到哪儿吗？不是也得风里来雨里去吗？……我也整天琢磨这事，闹情绪，行吗？别老琢磨这事，这是个政策问题。不是个生活小事，我知道你们是解放以后大学毕业才工作的，又不是国民党军政人员，犯的是言论错误。我当个队长，权限有限，有的事在我的职权范围内的，我会帮助你，别一天老发牢骚，影响别人不好。明白了吧？回去吧？”

我感到张队长的话说的很中肯，他为人也很实在，是个好人。听罢他这一席话我高高兴兴回去了。

很快就进入了冬季，茶淀的冬天气温比北京要低6——10度，而且常常有6——8级大风。这时候根本没有猪草可打。只好干些零杂活儿。一天我去食堂买饭，看到了那位牧羊人。那并不是想象中穿着老羊皮袄，扎着腰带，拿一支鞭子的老羊倌。而是一位穿着水獭皮领礼服呢大衣，戴着水獭皮帽的老头。我觉得很奇怪。听他讲话是山西晋南口音，我走上前问他：“你是不是山西晋南人？”

“是的，是的，你怎么听出来的？”

“我也是山西人，抗日战争时期，我曾经到那地方逃难过。”我说。

“万荣县，万荣县。”

有了一个和平的气氛，接着我又问他：“你怎么来到这里的？”

“唉！我姓雷，是傅作义手下的师长，起义以后，因为年纪大了，不想干了，就辞职住在儿子家养老了。儿子是一个中学教师。不知道怎么的，这么也不行，把我就弄到这里来了。”

我很纳闷：“不是有起义的政策吗？”

“咱搞不清楚。这事咱搞不清楚。”

我刚参加工作时，有一个民主人士的领导王克俊，他原来是傅作义总部的秘书长。有病，常在家休假。逢年过节机关里发东西，常派我给他送去。他就住在史家胡同傅作义宅院的前院。我和他很熟。他给

我详细讲过北京“和平解放”的内部情况。来到农场以后，我在报上看到他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我想，这雷老头应该认识王。

我问他：“王克俊你认识吧？”

“认识，认识，我们都是一个县的嘛。傅作义也是万荣县人。”

“噢？赶情你们傅作义部队是个乡党队伍？”

他微微一笑：“是的，是的。请问你怎么来到这里的？怎么认识王克俊的？”

“我54年底，和王克俊因为单位撤销分开以后，到了第二机械工业部工作，1957年在那里划了右派，58年被送到这里于家岭分场劳动教养，摘帽解除以后来到这里。”我的这个身份就是如此。

和这位老头告别之后，一边回宿舍，一边想：不是有起义政策吗？难道放下屠刀，低头为民也不成？不要国家养活，在家当“赋闲翁”也不行吗？怎么这政策需要时冠冕堂皇，掷地有声，半路里杀出一个“水晶球”政策就什么也不讲了？这算不算说了不算呢？什么都说了不算，这……还考虑不考虑信誉？

过了些天，张队长要出外办事，得几天后才能回来。特别嘱咐我们要轮流值夜班，注意防火。

这里职工家属的宿舍，屋顶是按照当地农民的习惯方法建造的。屋顶装几根檩条，然后把芦苇捆扎成直径15—20公分的长条圆柱，然后在椽子的位置一个个从前沿搭到屋后，绑在檩条上，再在上面抹上泥和石灰。这种屋顶的特点是厚实，冬暖夏凉。最大的缺点是，取暖时极易起火。这里缺水，一旦发生火灾那就会酿成不堪设想的损失。

有一天，我和胡宏造值夜班。队部的里屋是张队长的宿舍，我们在外屋值班。房屋中间生着一个烧煤饼的土炉子。我们一边聊天，一边拨弄着火炉。老胡出去小便回来，放低了声音说：“喂，我发现后边有几个大缸，里面有不少冻死的小猪，我们搞一只来吃怎么样？”

“是不是病死的？吃出问题来可是不得了。”我还有点犹豫。

“全是冻死的，我提起几个看了看，全是硬帮帮，冰冻的是不会有细菌的吧。”

吃不饱的人总是有点谗，我也动摇了，犹犹豫豫说：“拿一只看看。”

老胡立刻出去提回来一只：“你看，这哪会有什么问题？”

果然利利落落，没有什么脏东西。还是有点不放心：“万一吃出大病，这里可是没有好医院的啊！，再说张队长知道怎么办？”

“半夜三更，张队长又不在，没有人会知道的。嗨，嘀咕什么？赶快弄吧。我去拿脸盆。”老胡说罢也不再问我有什么意见就回宿舍去拿脸盆。

十五分钟后，老胡把他和我的脸盆都拿来了，还拿来一把小刀。他倒是蛮熟练的，打了半盆水坐在火炉上，一会儿功夫，水开以后就开始烫猪拔毛，接着就开膛挖除内脏，一只黑不溜秋的小猪仔子，说话间就成了一只小白乳猪。我实在有感于老胡的麻利：“喂，我看你倒好象干过这事，收拾得挺快嘛。”

“谁干过这种事体？那个，人饿了就什么都会了！哈，哈哈。”

我们用脸盆把小乳猪放在火上煮，另一个脸盆当锅盖，扣在上面。不到半个小时，老胡尝尝说行了。为了让小猪迅速冷却好开吃，他把脸盆锅端到外边去晾着。

我们围坐在火炉旁就等开吃了。

这时候，我出去小便，走了没多远，忽然一阵肉香扑鼻而来，三年多了没有吃过这么香的肉，这味觉的刺激真是让我兴奋异常。忽然，又觉得不对，这香味随风飘去，万一被别人闻到，都是几年没吃肉的人必然也非常敏感，如果循味而来，那岂不是要惹祸？我赶快把肉端了回去。

“喂，喂，不要急，让晾一晾嘛。”老胡以为我急不可耐了。

我把香味的魅力可能惹祸的原因一说，老胡笑了：“这是什么世道？两个知识分子居然作了小偷，偷的是人家冻死不要的小猪，还提心掉胆，在担惊受怕中偷吃，这，这……。”

也就是十来分钟，每人半只乳猪，吃得干干净净。虽然开吃之前，那香喷喷的猪肉的香味，曾经给我的食欲神经以极大的刺激和诱惑，

然而吃起来狼吞虎咽,好象猪八戒偷吃人参果,急急忙忙吞进了我可怜的肚子,却食而不知其味,也没有体会到那佳肴的美味。吃罢,我拿了一把锹,把毛、骨头、内脏埋在屋后的坑里。老胡把火炉、脸盆也收拾干净。早晨七点多,我俩回宿舍睡觉。半路上碰见老李,老李招呼我们:“买饭去吧。”

老胡说:“我们有点不舒服,可能炉子有点煤气,先睡会儿觉再去。”然后偷偷冲我一乐。

二十三年之后,我在深圳工作,港商经常请客,每当要了“烤乳猪”这道菜的时候,不由得我就想起在茶淀农场畜牧队和难友胡宏造偷吃乳猪的那一段往事。唉!中国的知识分子右派的经历真是世界少有啊,今生难忘呀!

逃离死亡——回家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

——鲁迅

一天，我们正在地里干活儿，张队长来到地头喊我：“赵文滔，回去收拾行李，回家养病去！”

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说：“我……没有什么病呀！”

胡宏造急了：“嗨，傻不傻！叫你回家了，你胡说什么没病。赶快说有病，快去吧。”

这我才明白过来，朝着张队长跑去。张队长说：“总场批准一批人回家养病，有你，快点儿，去到别的分场去集中，快！”又是那个拉我来的小驴车在等我。

收拾好行李，坐着那辆小驴车，急匆匆我连去什么地方都忘了问那赶车的小伙儿了。只觉得走了没多大工夫就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有一两排房子。卸下行李，看到在于家岭和我同组的张睿，他走过来高兴的和我握手，帮我把行李搬到屋里，安置下来。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真叫回家吗？”

“不知道呢，说是回家养病，也没检查身体呀！”

旁边一位不认识的难友说：“嗨，这一帮饿殍还用检查身体？个个都够养病的。”

看样子集中了有三十多人，忽然看见在三分场曾同在一个队的穆守荫，他是京、津著名的“宏兴茶庄”的“少东家”，出身资本家，是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学生。因为他体型特别，是个特大的大胖子。他又喜欢和人开玩笑，人都叫他“大象”。有一年没见了，虽然经过大饥饿，他还是那个特殊体型，特大的大胖子一个。不过从面部的肌肉看，明显的有些松弛下垂的样子。看见我来了，走过来握着我的手说：“又聚一块儿啦，我说，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真是好事吗？”

“不清楚，看看听听再说吧。”我也搞不清究竟。

我开玩笑的问他：“多少人饿死了，你还是那么胖。”

“嗷，你可不知道，我们家隔三岔五来人给我送东西呀，要不早玩儿完啦！”他笑着说。

“嗷，听说你们于家岭饿死不少人哪。有多少人饿死了？”他又问。

“是呵，但是谁敢统计？究竟饿死多少人说不清。”

“哎呀，可怕呀。”

这时，有一只手从后边搭在我的肩上，回头一看，是我很熟悉的吴士俄，吴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从半步桥我们就在一起，到了三分场还在一个组，住在一个房间。一年前我们到于家岭，他留在三分场，我们才分开。

“喔，来啦，又聚在一起了。听到些什么了吗？”他说。

“我刚到，什么也没听说呀！”

……

在这里整体了两天，第三天早晨，来了一辆卡车，把我们30多人拉到茶淀火车站。这一次没有端着冲锋枪的武装警察“押解”，只有一个队长送我们回北京。可能他们心里在想：“量你们这帮饿殍也没可能搞出什么反动勾当来！”

车到了北京站，没有让各回各家。有一辆卡车等在车站接我们。坐在车上大家都不说话，搞不清这又要拉到哪儿，又要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情况。中午，拉到北京北郊的北苑农场，才知道目的地仍然还没有离开“公安”圈儿。接着，来了一个管教人员给我们训话：

“呵，党和政府考虑到你们身体不好，农场特意批准你们回家养病。呵，你们应该感谢党和政府对你们的照顾，呵，在回家养病期间，要老老实实，呵，每半个月必须到派出所，向民警汇报一次思想情况。如果有任何不法行为，到时候公安局对你们可不客气！呵，你们每个月的粮票、副食票，到半步桥公安局五处去领。那里有你们的名单。呵，我再重复一句，必须老老实实养病，不许搞非法活动！……”

我们已经多次听过这种口吻的训话。谁搞什么破坏活动了？谁不老实了？从1957年起，上边的精神病患者就把我们当作“假想敌”，神

经兮兮地老拿这种病态疯话教训人，好象我们真格是什么破坏分子、反革命分子，对于这类疯子的疯话，我简直烦透了。

训完疯话，我们就可以各自回家。我扛着行李走出北苑农场。站在路边等着过路的三轮车。当年，这里是郊区，极少有三轮车来这里拉活儿。

一边等车，一边在想：回家虽然是每个人都企盼的，但这一回家，原因是我们不能干活儿了，今后一文钱也不发给我们了，完全推给了家属。未来是什么生活真难想象。再说，我是回家吗？我的家是什么样儿？自从被劳动教养之后，我还不知道我的家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1956年我结婚，单位分给我一间房，在天安门广场旁边的四眼井胡同，当时，天安门广场还没有扩大，那是一个小院，没有人住，房子潮湿得离地面一米高都是水印，我没有去。后来住到单位的招待所。这倒好，既不要交房钱，还免费供应开水和洗澡。可是后来房产科不干了，住招待所的费用全由他们付，受不了。分房的老李跟我比较熟，不好意思催我搬，我又不去那四眼井胡同。他老去找我们的书记梁心明。那书记也不好催我。后来让那个老李磨得实在没办法了，梁书记干脆把他的三居室腾出一间来借给我。我也乐意去，我想，住一段时间他就得烦，烦了，他就会替我找房产科要房子。

住了也就是一个月，那天，梁书记的妻子来，她告我说：“老赵，吴司长来了，（吴司长即吴运铎，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他当时是二机部技术司副司长），部里新分给他一个三居室，他现在是一个二居室，他一搬家，你把他那二居室占了不就解决了房子问题啦。”

“那当然好啦，可是行吗？”我一时搞不明白那样作行不行。

她说：“明天他可能还来，他来了，你和他商量商量。”

第二天，吴运铎副司长来了。我问吴副司长：“您搬了家我能不能搬进去？”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可以把钥匙交给你，噯，有件事你一定得答应我。”吴副司长笑着说。

我说：“什么事？您尽管说。”

吴副司长说：“我搬家时，有一箱书暂时拿不走，那箱书都是作者朋友送给我的，有纪念意义，你得保证不能给我弄丢。过些天我来拿。”

“没问题，我保证，绝对弄不丢，弄不坏。”我当即向他作了保证。我和吴副司长商量的时候，梁书记都在场，他完全是一种默认的态度。我也就无所顾忌了。

于是，吴副司长一搬走，我就拿钥匙打开门，占了他原住的二居室。

过了几天房产科老李找我来了：“老赵呵，你怎么随便就把司、局长宿舍给占了？”

“那你给我找房，找到我就搬。”我对老李说。

过后，老李也没再找我。我发现楼里还有空房，我把信息告诉了我们司的王宝善、陈金耀，他们也搬去住了。我们就一直住在那里——北京甘家口8号西楼。当时那是第二机械工业部的司局长宿舍。

1958年二机部送我劳动教养，妻子把家母送到山西我姐姐家。她一人住了不久，她害怕二机部的人欺负她，孤身一人作为女性怕不安全，就放弃了那房子，把门一锁，搬到她们学校的集体宿舍去了。

[后来，团支部书记王宝善也被打成右派，被发落到北大荒监督劳动，妻子杨森想必也被调走。陈金耀在反右还没有结束，虽然没有被打成右派，但梁心明书记说：“他爱人在一机部工作，家有亲属在香港，叫做‘港澳关系’，不宜再留在部里。”会商一机部以后，把夫妻二人调到南昌工厂了。说不定这是梁书记给我们来了一个高明的手腕，有的打成右派，有的扣上“港澳关系”，一下子把我们全轰出了宿舍，还把我们全都赶出了北京。]

又过了一年多以后，妻的一个学生的家长，在自己的院落里租给她一间房。面积只有九平米的一间斗室。

如今，这间斗室就是我要回的家，我还没有见过的家。

终于等到了一辆三轮车，搭了车从北苑进了德胜门，再拐几个弯儿，走了一阵总算到了——西城区新街口高井胡同6号。

当我扛着那件在农场陪着我改造了三年多的破旧行李卷，穿着一

件已经风吹日晒了三年多,退色破旧的棉衣,走进那个陌生的居民小院,问起妻子的名字时,站在院里的一个老太太,一个老头儿,立刻投过来一种异样的警惕的疑惑的,我这一生第一次看到的目光。无疑这是一种审视“囚徒”的目光,这目光使得我倍感尴尬。好在妻子的工作不是坐班,那天正好在家。听到我的话音,就出来接我。

妻子没有想到我会突然回来,我告诉她我也是突然被送回,根本来不及写信。

吃罢饭,才开始慢慢聊起这三年来彼此互不知道的种种事件和经过……

此时,我才知道,第二机械部把我送劳动教养以后,给妻子的工作单位——北京师大二附中写了一份黑材料。检举诬告她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她的丈夫是“极右分子”,应该对她严加惩处云云。

在1957—1958年那种疯狂的,陷害好人成风的岁月里,师大二附中青年团不久就给她贴出“彻底批判大右派的妻子XX”,“XX必须交代和丈夫共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的大字报。紧接着又开了几次批判会,进行批判斗争。批判会的特点是:批判的内容都是第二机械部给我罗列的罪名。现在又作为黑材料转嫁到她头上。我在单位写的大字报没有带回家,妻子根本不知道。这种批斗搞得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尽管如此,批斗告一段落,就上报上级开除她团籍。好在上级团委还比较讲点政策,指出学校所批的内容都是我的所谓罪行,上报的也是二机部的情况,并没有她的问题。她也没有谈学校的问题。不同意张冠李戴拿我的问题处分她。驳回报告,不准开除团籍。

一整不成又来二整,先把她的教研组长撤了再说!反正也把她折腾了个六够。

原来妻子单独住的时候,把她的母亲从老家接来了。房子太小,住不开。岳母经常和隔壁4号一位老太太聊天,正巧那位老太太说要卖房搬家,岳母回去把老家的房子卖了,把4号正要卖的房买了下来。离得特别近,出这个门,进那个门。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知道那位卖房的李老太太是走红大陆的歌星费翔的姥姥。

没有多少天,不知怎么搞的,师大二附中的书记姜培良知道我回来了。他问我妻子:“听说老赵回来了。”

妻说:“是呵。”

“呵呀,他这样一回来,要是离开农场,是不是就没有组织关系了?那要没有组织关系,将来工作问题怎么办?我看你们是不是再考虑考虑?”

妻说:“我也不知道,也不懂,我回去问问他。”

妻回来给我讲了以后,我觉得姜的意见并无恶意。只是他这位共产党的书记对他们主席的反右政策还不了解。我给妻解释说:“姜并不了解共产党对右派的政策,他以为农场就是组织,劳动完就完了。右派摘帽后,农场就是右派的组织,就得依靠农场这个组织给安排工作。实际上农场是个劳改单位,他的任务是对右派改造,改造完,就走人,由社会给安排工作。那不是个‘组织’。要把它看成组织,那就得在农场作一辈子‘二劳改’,永远呆在农场。他最不清楚的是我们这叫做‘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一经开除,你就和原单位没有任何关系了,也就没有什么组织关系了。和谁也没有组织关系。至于将来,谁也不知道究竟。”

谁经过这事?妻也搞不清楚。我也不完全清楚,只能是推想。

过了几天,姜培良书记来到家,问了问我的大概情况。看样子并无恶意,略表同情而已。因为他们学校还没有处理的比我重的。我的那些问题二机部给我妻子的黑材料中已经说得够夸张的,他们也都知道。对照起来,可能他对这“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也有几分畏惧。

紧接着,民警也来了,是一个接近四十岁的中年人。很和气,说话和农场那些管教队长完全不同。没有“专政”的味道。他进门还没五分钟,微笑着给我提出个问题:“喂,老赵,怎么你那么点儿事,就那么处理了你?”

听他这话,显然他看了我的材料,认为我的那些问题并不是大问题。也好象认为我被处理的重了。这是一个第一次见面的民警,也是今后每一周要向他汇报思想的人。这突如其来的提问使得我感到回答起来很为难。当时,我也说不清从喉咙哼哼吱吱发出些什么声音给对付

过去了,脑门上还出了些汗。然后他说:“刚回来休息休息,有什么事找我。”说罢就走了。

这以后我也没有给他汇报过思想。从思想上我就对这件事反感。我们怎么了?谁有思想问题?我们的思维很正常,老拿这种疯话讲给我们,实在叫人心烦,反感。

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来了。一进门就说:“老赵,你的户口快来了。”我问他:“你怎么知道的?”

“他们(显然是指公安局五处)征求我们意见,我们说,他家在这儿,老婆在这儿工作,那他不回这儿回哪儿?”他坦然地把具体情况告诉了我。

这时候,我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感谢你,感谢你”。

“这下就方便多了,要不然你麻烦大啦。”

“是,是,真感谢你呀!”

“他们过些天会通知你,到时候你就拿着户口本去五处拿手续,然后再回派出所就把手续办妥了。”

“好,好,谢谢你。”我把他送出门外。

一个多星期之后,果然收到北京市公安局五处寄来一封信,信中装有一份通知,要我带着户口本去该处办手续。第二天我就带着户口本去了公安局五处。公安局五处就在半步桥第一监狱旁边,先把户口本验证以后,就给了我一份到派出所报户口的介绍信。

拿到手续,我还特意在半步桥第一监狱的大门外,仔细看了看这个曾经关押过我的地方,深灰色的大铁门紧闭着,门旁有一个持枪的卫兵。显得阴森可怖。三年前,我从搞不清的一个旁门进去,(坐了派出所的吉普车,什么也看不见)。过了二十天后的一个深夜,又被装在大公交车中,从这个大门中拉出来,押送到农场的。这个监狱清朝就建成了。在改朝换代中逐渐扩大。不知有多少仁人志士都是从这里拉到历史上著名的菜市口刑场砍了头的。时代在进步,死刑犯少了,关押的人多了,解放以后又有了“劳动改造”。不过“关押右派”在人数上恐怕是破了历史记录。无疑,1958年春季是它收容人数的历史最高峰。据说,

那个春季突击逮捕了右派分子七、八万至十万人。真算得上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大逮捕”了。也算得上中国历史乃至世界现代史上“文字狱”的最高记录了。

面对着这个庞大的监狱，不由得感叹：我这样的人，居然也能被投入这个大牢狱里关押过，这说明我们的所谓《宪法》的制定实在是一个荒唐的玩笑。我想起了亚·索尔仁尼琴的一段话：“当他回顾自己的囚徒生涯时，忍不住对‘培育过自己的灵魂’的牢狱高呼：‘祝福你，监狱！’”是的，似乎我也应该高喊：祝福你，祝福你把中国的好人，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关进来的监狱！

我的户口办妥之后不久，就是新年。听说和我们一道回来的那30人中，大部分又以“临近节日”，必须保证社会安全，避免发生破坏事件，把他们作为“可能搞破坏的分子”又送回农场。好象这批右派分子都是恐怖分子，甚至可能作出和阿拉伯恐怖组织一样的破坏来。唉，疯子愿意这样发疯，老是讲这种疯话，有什么办法呢？

我到老难友张睿家看望他，还好，他没有被遣送回农场。但对未来也十分渺茫。张睿的母亲年事已高，是一位慈祥的典型老母亲，为了张睿，经常偷偷流泪，眼眶红肿，显然流泪已经造成了疾病，面容悲愁，整天唉声叹气。看到她，不由得就想起被送到姐姐家已有几年没见的老母亲。这些善良慈祥而又苍老的老母亲，不知道为我们担忧而付出多少伤心的眼泪，今后还要为我们担惊受怕到几时。想到这里，不由得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唉！真的是家破人亡呀！

户口有了。可是工作怎么办呢？按着政府机构，我给劳动部写了一封信，请求帮助给解决工作问题。这封信由上而下繁文缛节一直转到市劳动局而西城区劳动局。西城这位办事人态度还不错。他没有回信，而是来到我家，他说：“老赵同志，信收到了，为什么没回信我自己来了，这样可以说得比较清楚。我很同情你，也愿意尽力帮你解决工作问题，但现在各单位都在精简，确实不好安排，你等等，一有机会，我会马上找你来。……”

也是一套不解决实际问题的话，尽管人很客气。

有一天,我正要去,刚要走出院门,突然山西省外贸局副局长郭荣昌走了进来。我万万没有想到他能来到这里。赶忙迎上前去:“郭局长,你怎么能找到这儿来?”

“啊呀,总算找到了,你在哪屋?咱们进屋说话。”

郭局长是我刚参加工作时的直接上司,1954年华北行委撤销时,我到了第二机械部,他去山西担任了省外外贸局副局长。反右前我们偶有书信联系,反右以后三年多当然不通音信,现在不知怎么他竟能找上门来。我把郭局长领进我那斗室,坐定之后,我这个落魄的摘帽右派拘谨地站在旁边,面对竟然能找来的我的老上司心中很不是滋味,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怎么出了这样的事?这两年一直找不到你,估计出了问题。你知道我怎么找到这儿的?”

“不清楚。我1961年初就摘了帽子,回到北京还不到半年。你怎么打听到这里的?”我简直想不出他究竟是怎么找到我这新的斗室的。“我是用外调的办法找到你妻子的单位,才又知道了你的住处的,啊呀,费了多大的事哩!你赶快给我说说你究竟作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

我取出一个笔记本,其中有我写的那三张大字报的底稿,递了过去:“我就写了三张大字报,这是留的底稿。”

郭局长接过去仔细的看起来。看完之后,他说:“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没有了,实际上是团小组开会时大家的意见,最后是我执笔写的,一反右也就全成了我的问题。”

他说:“就这点事就把你这样处理啦?连工作都没有了?我看不符合政策,处理得太重。我认为就你这些问题,应该是‘可划可不划’的。现在成了这样还真不好解决,这样,咱们先出去吃饭,然后再想想怎么办。走,吃饭去!”

我们出去一道乘车到了西单,在商场找了一个饭馆,他叫了几个菜,还一再让我:“好好吃,吃了几年的苦头,唉!这,这,是怎么搞的

……”

吃过饭从商场出来,他提出来要带我去过去我们在华北行委时的同事赵静家。赵后来在外贸部工作,她的丈夫郑思远原来是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书记,此时已担任了国务院副秘书长。反右之前,我曾经去过几次赵家,也几次见过郑秘书长。但是我现在已经成了阶级敌人“右派分子”,一般人都不敢接近的政治麻疯病患者,我也不想在这种时候去见熟人,更不想在这个时候去赵家,让人家误会成我是去求人家,让人家作难。我一再推拖不愿意去。

后来他说:“咱们去不是求他们解决什么具体问题,主要是了解一下政策。”

那我也不愿去,后来我就在胡同口外等他。他一人去了赵家。

等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他从赵家出来了。

“走,我们找个地方说话。”他过来带我走到西四,在缸瓦市砖塔胡同口一个牛奶店,每人要了一杯牛奶,坐下来他说:“这事还真不好办,这个运动一下子搞了几十万人,全都是知识分子呀,以前还没有这样干过,在政治上十分敏感,影响也比较大。现在没有政策,成了敏感问题,都在观察,谁也不敢乱动。他们说你几年没见,怎么就闯了这祸。我看这样吧!你跟我到山西,我想办法给你临时先安排个工作。”

“郭局长,我很感谢你。但我不能跟你去山西,那样你担的政治风险太大。我不能连累你,这事可是非同小可啊。我看我还是慢慢再等吧。”

郭说:“现在不是连工作也没有了吗?去那里我给你先安排个临时工作,不管多少先得有工资,先解决吃饭问题。如果出了问题,你大不了再不干回家。我大不了作检讨作检查。”

“我实在是怕为了我,让你再遭受一份‘政治错误’的麻烦,这事的确实不是一般的问题。在你看来只是给我安排临时工作的小事,但这又是政治立场的大事。何况现在又没有具体政策,一旦出事,恐怕还不只是检讨的问题。我觉得这事可不能贸然去办。”我给他解释着我的想法。

郭说：“要不这样吧，我还带着一些人，明天去广州，等我从广州回到山西，看看情况再给你来信。”

从牛奶店出来，他乘车回了招待所。

我一路回家，一路在想：共产党员中象郭局长这样以诚待人，不避政治影响，想方设法硬要找到我，不但看望我，还不怕政治风险，大胆地打算帮我先找个临时工作，实在是难能可贵。这也是以前我们在一起工作时，可能和我过去工作认真负责，办事快捷效率高，给他留下较好印象的关系。我想还有更重要的一点，1957年以前，人和人之间在讲求作人、道德、诚信的基础上有真正的友谊。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考虑再四，我绝对不能给这位好人带来麻烦。只能先自己克服困难，继续等下去。

已经快六点了，妻下班回来我还没把饭作好。赶忙去尽我家庭妇男的职责，收拾煤炉，作饭、炒菜……

晚上我才把郭局长来的这些事讲给妻听，她也觉得郭的一片好心只能心领。如果跟他去，安排了工作，再发生使他挨整的事，那就太对不起郭了。只好再等下去。

半个月后，他从广交会回来，又一次到家来看我。安抚我在家等政策，什么时候愿意去他那里工作，就给他写信。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老干部，对于一个右派分子，能如此不怕牵连，不避嫌疑，热情看望，给予帮助，可以说非常难得。也使我感激不已

……

岳母院里的一家住户搬走了。我们搬过去住了两间房，住的条件改善了许多。院子里一共五间房，我们自己占了四间，只有一小间是别人住着。基本上成了自己的一个小独院。房子质量不好，院子比较大，有差不多200平米。院里有一棵枣树，一棵杏树，我又种了葡萄、核桃、山里红树。心烦意乱，根本无心学习和看书，只能把鼓捣这些树，作为一种消磨时光和排除苦恼的办法。

“屋漏又逢连阴雨”，有一天，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发现眼睛的视野有一个角是黑的，到医院去看，大夫说是患了“视网膜脱离”，如果不马

上住院手术,就可能失明。不能住院的话,回去必须仰卧,争取赶快住院。天啊!这不是要命吗?我现在是一文不名的“失业者”,根本没有医疗关系,全家就妻一个月62元生活费,拿什么去住院?妻听说以后也非常焦急。在此艰难时刻,幸好妻的工作单位——师大二附中还有些有人性的同事,把情况告诉了工会,工会给了她80元的补助。这才得以住院作了手术。住了半个月医院,出院以后,休息了半个月,再去复查,总算保住了一只眼睛,没有沦为“瞎子”。假如成了“瞎子”那这一生就得终生失业,我也就得用自杀来了此一生了。

这时候我回来也有一年了。找工作实在是困难重重,整天简直是日坐愁城。

妻同一个教研组的同事胡佩英老师就住在附近,常来我们家,渐渐熟了。她是华侨。解放前父亲就在香港,现在是香港“国货公司”经理。丈夫也是华侨,同在北京工作,母亲跟着她住在北京。

一天,她来说她和丈夫已经申请回香港,谈起来她很伤心。她说:“这里的人心实在叫我住不下去,父亲每月都给我寄吃的东西,另外,我每月还可以领到一些‘侨汇券’,比大家条件好。我常常把自己剩余的‘侨汇券’拿给同事,无非是让他们可以在供给配额之外,再多买到一点食品,这也是同事之间的一点小小的帮忙。你大概想不到过后她们说什么,开会的时候,她们居然说我在‘拉拢腐蚀’她们,好心遭了恶报。你说,我拉拢她们作什么?我腐蚀她们又要干什么?怎么人心就坏到这样地步?谁还敢和谁交往?人和人交往应该是不害人,人也不害我。这里竟然是我好心帮他,他反而要害我。我实在搞不懂,人和人的关系怎么就成了这样?这样的环境人怎么再呆下去?所以我申请回香港了,不回不行,没法再呆下去了。我和田老师处得不错,今天才敢和你痛痛快快谈这番话。”

的确,从反右以后,人和人的关系就进入了一个人和兽共处的时代。今天是朋友,明天就可以成为敌人。你和他握手言笑,他可能咬你一口。有的人就靠出卖、攻击、诬陷、陷害别人去攀附、攀升、攀高位。而这种人还会得到政策公开的保护。这一现象似乎已经成了社会的主流

风气。确实可怕。华侨投奔祖国是爱国，却又让社会风气把他们再逼走，这算什么事呢？唉！

过了些天之后，她又来了。告诉我已经批准他们回香港了。不过老母亲还得暂时留住北京。她妹妹正在石油学院读书，不能常回来，打算委托我照顾一下老太太。我痛快地答应了。几天之后，她们夫妻带着一个三岁的儿子去了香港。

此后，过一段时间我就去看看胡的母亲。她的母亲是一位和善可亲的上海老太太，每次我去看望，她都非常客气。

文化革命中，我自身难保，早期没能去看望老太太。等到文革后期，我去看老太太，幸好红卫兵还没有为难她。她把以前让我看过的一个40X30公分的考究的丝绒盒子拿给我看，原来小格子里放满了钻戒、翡翠、戒指等贵重手饰，现在格子里全变成了毛泽东像章。根据当时的形势，她的小女儿把手饰和一些外汇都交了银行。等到落实政策，银行说他们没有银行的收据。没有凭据就无法退还。可那个时候谁敢要收据？银行又给谁开过收据？只登记了一下就完了，不知道银行还是谁发了这笔不义之财。坑害了老太太，席卷了老人毕生积攒的细软财物。后来老太太和小女儿也回了香港。全家人回来，全家人又走了。

胡佩英老师回到香港后不久，和丈夫、孩子去了美国。改革开放以后，胡来信说他们生活得很好。从北京走时只有三岁的儿子，已经从哈佛大学毕业作了工作。

.....

难友张睿来告诉我，他从图书馆一本日文杂志上选了一篇文章，翻译成中文。（张是日本庆应大学经济系毕业）。投稿到一份杂志，杂志来信说，稿子打算用，问他在什么单位工作。他老老实实告诉了编辑，他的右派身份（当时他还没有摘掉帽子）。以后，杂志再也没有理他。这件事说明，我们虽然回到北京，实际上没有一个单位敢和“右派”接触，都是谈“右”色变，敬而远之。尽管没有文件规定，却有文件统一规定一样，各单位和部门行动一致，这说明所有的路，对右派都被堵死。想要谋生，恐怕胜过登天！

吴士俄是我的老熟人了。这次他也回来了。他和我的妻子是一个系统——北京师范大学。他有时来聊聊，我有时也去看看他，他的户口还没有报上。一谈到工作彼此都感到前途的悲观和渺茫。

有一次我去他家看看有什么信息。正好他的妻子也在家。他的妻子是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58年老吴从北京师范大学送去劳动教养后，她带着三个孩子，生活十分艰巨，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我去之后，老吴给我打招呼说：“她精神受了刺激，说话和思维有点不太正常，我给你打个招呼，你注意点儿。”

其实他的妻子很健谈。她一直搞不通，为什么对右派处理这样重，几句话说得不对，一夜之间把几十万人整得家破人亡。她在房间里一边来来往往地踱步，一边和我聊天。忽然，她问我：“是谁发明的‘右派’这个词？”

我说：“好像是资产阶级议会，坐在右边席位上的叫右派。可我们是坐在‘阶下’的‘囚’，就不能这样理解了。也许是从老大哥那里搬过来的。斯大林把布哈林就叫做‘右派’，要说这个词的话，那是不是应该算是斯大林发明的？起码他是社会主义阵营第一个使用‘右派’的首脑吧？”

“那他们是怎么翻译过来的？俄文原文是什么？”她说。

“我是51年参加工作以后，业余学了一年俄文，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我好像记得俄文的‘右’是

Hanpabo，（没有俄文打字机，勉强用英文拼写出来）至于右派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那么英文的右派是什么呢？”她又发问了。

我说：“Rightist吧，可这有什么关系呢？”

“Right的主要意思是‘对的’，‘正确的’，还讲‘正义的’。‘右’只是第二位的意思。那么是否应该按第一个词义来解释，词义是‘正确’，正确的意见怎么解释成错误的，而且加罪于人呢？”

我和老吴听了她的这种独创性的说法都笑了。

老吴说：“你说她的思维是不是有点问题？她受了刺激，常常是这

样。知道的人知道她是受了刺激。不知道的人一听会吓一跳。你说,这说法不是要惹大麻烦吗?”

后来她听说我们住的是一个私房小院,话峰一转,她又提出:“喂,老赵,我给你好好把院子设计一下,让小院成为一个在北京绝对独具风格的院落。喂,你和老吴是朋友,我听老吴说过你,我是白尽义务,没问题。”

听了她的话,我和老吴又笑了。我说:“我相信你会设计的很好,可我哪儿有钱来盖呢?我们现在是一文收入也没有。连饭都快吃不上了,纯粹成了无业游民。就剩下去当叫花子了。叫花子盖房?这不成了穷折腾吗?”

老吴听了哈哈大笑。

她又说:“你们永远就这样了?一辈子没工作,一辈子当无业游民?”

“也许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把我们弄到农场,连游民也当不成。”老吴说。

“那太可怕了,我一个人的工资要养活四个人,我们又是低工资制,这不是一条死路吗?”她说。

“我们目前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作‘家庭妇男’,还会有什么出路呢?”老吴说。

我不敢再说什么了,免得无意中刺激到她——张工程师。匆匆告别,离开了老吴家。

是的,是的,我们的出路只能是“家庭妇男”了。中国的中文中又增加了一个字典里没有的词汇——“家庭妇男”。

妻子是1955年毕业,工资只有62元,她还要供养岳母,我们每月的生活费相当紧张。用计划经济也难以作到收支的平衡。每月的最后几天总是一文不名,不得不把我的存书拿一些到旧书店去卖。让我痛心的是这“卖”和“扔”差不了多少,挺好的书,也就给一个比废纸强一点的价,为了生活,也只能如此,没有别的办法。

时间一长,我觉得被我这个右派株连的人太多了,姐姐、弟弟不用

说了,连80岁的老母亲也跟着遭罪。如今未来茫然不知所终,这要把妻子拖累到几时?终于我决定和妻子离婚,我不能这样再连累她,只有离婚她才可以正常生活,我的出路恐怕只有再到农场,按照毛泽东的安排终身去作“二劳改”了。

我先写信给姐姐和弟弟,说明情况,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来信都表示不赞成,如果是妻子提出,那另当别论。让我三思。

起先我向妻提出,她总以为是开玩笑。后来我很严肃的对她讲,并且说明利害,她才知道我是认真的。反复谈了多次,最后她去和岳母商量。

岳母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家庭妇女。但她识字,能看信,也能对付着写信。当妻把离婚的事告诉她,并且征求她的意见时,老太太说:“我是一个没文化的老太太,新社会的事知道的不多,就知道旧社会的事。以前偷盗、抢劫、越货、强奸、杀人、……这都是犯罪,一个人不管他原来为人多好多正派,只要犯了罪,就证明他的真实品质很坏,他才能作出这些犯罪的坏事。如果他作了这类犯罪的事,要问我的话,我就同意你们离婚。现在的情况是他并没有作这些坏事,而是给当官的提了点意见,我弄不明白这也叫犯罪,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没有经见过这样的事。你要离婚那就得你自己拿主意了。我就不好说该不该离婚了。这事就得你们自己考虑了。”

妻估计老太太这一席话,实际上是不支持。本来妻也坚决不离,这一来妻说:“右派的问题牵涉到几十万,上百万的人,我还是主张再等等看。当然眼下生活是困难,但这种情况的人太多了。我的意见是你也不要再胡思乱想了,踏踏实实就先这样等着。你呀,你干脆就把家里这点事干好,只要你不惹祸,我去上班,咱们就这样生活着,等着。”

唉!这可悲的岁月就这样一年年又过了四年……

黑色风暴

历史是一场噩梦,我想醒都醒不过来。

——詹姆斯·乔伊斯

1966年的初夏,中国大地掀起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文革”风暴。

那时候,北京街头突然出现了许多言辞激烈的宣传品和小字报,内容直指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我预感到可能又将有一场政治运动要来临。

不久,街头就出现了一批批带着红袖标的“红卫兵”,打着破四旧的旗号开始轰赶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回乡,并且抄查这些人的家。接着,我住的院里东屋的住户王家,被他工作的单位,军区招待所(他的职业是服务员)指为地主。在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立刻把老夫妻俩赶出家门,叫他们回山东老家。6号院的邻居老曲,他父亲原本是耐火材料厂的东家,也就是共产党所说的资本家。公私合营以后已经把工厂交公,老头也已去世,老曲并没有参与“资本家”的任何活动和工作,他在厂里担任会计。这时候也被指为资本家,全家三口也立刻轰赶回山东黄县老家。一时间,光附近左邻右舍就被赶走六、七户,胡同里闹得一片混乱,人心慌慌。

就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篇社论,足以说明这次运动将比以往任何一次要疯狂。

我估计大祸又要来临,说不定什么时候门口一贴大字报,就不知道把我又会赶到哪里。总想抽空到街上看看动静,心里整天忐忑不安,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祸从天降。

有一天,民警老马来了。他紧张而严肃地对我说:“喂,老赵,不要上街去看那些大字报、小字报,上街买些菜就快回来,就在家呆着,能不出去就尽量别出去。记住,少出去!”说完就匆匆离去。老马是个好人,在这关键时刻他来给我讲这些话,我想他的话肯定有他的道理,那一段时间我基本没敢出去。

造反首先是从中学开始，妻子工作的学校——北京师大二附中，在学校红卫兵开始造反时，高中班学生中出现了宣扬“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一派，同时也有反对这一论点的另一派。其实两派的主力都是干部子弟，红卫兵，彼此争论，各不相让。并且由辩论发展到谩骂。后来前一派的红卫兵不太理智，追到后一派的红卫兵名叫曹滨海的家里“造反”。曹父是高级军官，母亲是铁道部干部学校党委书记，自然也不示弱，当时就一人在家，面对几个红卫兵，人少力薄，情急之下，抄起了菜刀。打斗中划伤了对方的一个红卫兵。红卫兵伤者立刻跑出门外大喊：“杀人啦！杀人啦！……”一边喊叫，一边跑去叫人，要叫一批红卫兵来报复。

曹姓学生住的是铁道部干校的宿舍，宿舍里有人立刻就报警了。警察来得很快，来了之后，就把曹滨海带走了。

等到大批师大二附中的红卫兵赶来，找不到曹滨海，就先把家给抄了个稀里哗啦，接着又去太平庄附近铁道部干部学校，把曹的母亲樊希曼（铁道部干部学校的党委书记）揪到二附中。拉到操场之后，宣布召开批斗大会。在一片混乱中，只听得红卫兵的首脑喊了几句樊的所谓罪状之后，就用皮带开始抽打。一阵皮带抽打之后，当场把樊打死了。（后来听说樊是个资深老干部，曾参加过长征，周恩来认识她，从开打打到打死，她一声没吭）。

也许是打得一时性起，接着把学校书记姜培良、副校长高云及语文老师靳正宇都拉到小食堂，并且责令教职工全部跪在四周，宣布了几句他们的罪状之后，一时间皮带叭，叭的抽打声，打人者的骂声，被打人的呻吟声、惨叫声，在小食堂构成了一种极其恐怖的气氛。跪在四周的教职工，尤其是女教师吓得瑟瑟发抖，一阵雨点般密集的皮带抽打后，书记、校长和一个教师已经躺在血泊中一动不动了。红卫兵说他们是装死，用冷水泼在他们的头上、脸上。此时，还有人从食堂拿了盐撒在他们身上。后来有人说：“姜培良不行了，搞一辆三轮车来，把他拉到医院”！据说，三轮车在拉往医院的路上，有学生说他“装死”，边走边打，还没到医院，姜培良就完全停止了呼吸。

实际上姜培良在业务上平时抓得很紧,学校整体质量的提高和他积极工作是分不开的。谁料他竟落得如此结局。最后,他的妻子双目失明,经常由她的弱智小男孩引着上街购物,其妻去世后,那个孩子无人照料,二附中只好把他送到一个专门收容弱智孩子的学校。也许是不习惯,那孩子不久就逃跑了。费了好大事把他找到,再送到学校,第二次他又逃跑后,就再也没有找到这个可怜的孩子。一家人也落得个家破人亡。

语文老师靳正宇被打了个半死,自料逃不过死亡,回到家,用一条带子,把脖颈挂在门拉手上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就在要把姜培良拉到医院之时,红卫兵开始拿笔记本逐个登记教职工的家庭地址,说是明天开始,要挨家逐户地去登门造反。面对刚才小食堂中间那血肉模糊,泥水滚了一身的三个挨打者不知死活的那一幕,有的女教师,当红卫兵走到面前拿着笔记本问话,登记住址时,早已浑身颤抖,牙齿上下磕打,战战兢兢,语不成声了。为此,又遭到一阵阵的训斥和责骂。

紧接着又组成了“牛鬼蛇神”队,把一些女老师剃了“阴阳头”。男老师则用墨水涂抹成黑脸,极力侮辱和丑化。

那些天妻子快下班的时候,岳母不放心,总在胡同口等她。这天正好他因病没去,第二天去学校听同事惊恐相告,才带回来这么骇人听闻的信息。晚饭后就商量该如何面对造反和抄家。我倒坦然起来,认为“是祸躲不过”,什么来了算什么。反正我不是资本家,也不是地主,只是把可能引起误解的书、信、照片烧掉了。我想也许会把我打死,要死最好是干脆的,不要折磨。我发愁的是轰赶回乡,因为我没有真正的故乡。我是满族人,属于正红旗,祖父清朝末年被派到山西右玉县境的杀虎口,作镇守武官。清朝覆亡,把满姓依尔根觉罗改为汉姓赵,自学中医,曾在当地行医。抗日战争时祖父、母就已经去世。我一生都没有见过他们。更没有去过祖父的居住地——右玉县。父亲在北京读书,二十年代毕业后在山西太原工作,我就出生在太原。那时候也不太重视填写籍贯对一个人有多大的影响。一般地我们就把籍贯填写成右玉

县。实际上祖父是从东北,还是北京派到那里的,我也搞不清楚,我们真正的祖籍是哪里?我也搞不清楚。五十年代初,我从图书馆查找,在一份资料上有这样的记载:清代编的《朔平府志》:杀虎口的历史情况为:“周征猷狁,秦伐匈奴,唐击突厥,宋讨契丹,明平鞑靼,清征蒙古……历代封建王朝出征,或者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均以杀虎口为进出口的咽喉。因此,清代亦为屯兵设防之地。清初又形成中原与塞外的通商要津。顺治年间设立了户部抽分署,征收大量的边口出入税,有日进斗金之说。清朝在该地所设税关曾存在280年之久。关门有康熙御题《杀虎关》匾额。晋商在此曾经把贸易作到蒙古、俄罗斯。规模巨大,“大盛魁”商号一家的本金即达一亿多两白银。由于‘十月革命’成功后,发行了新卢布,沙皇时代旧卢布作废,蒙古也采取同样措施,帝俄的旧卢布有七千多万流入蒙古,均为“大盛魁”所有,使得晋商的大量白银,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说明此处当年曾是长城分支的一个颇为重要的关口。山西民歌“走西口”所说的西口就是这个地方。

但是自从铁路修建以后,无论是军事还是经济的作用都不得不让位给先进的铁路。以致相对落后的“杀虎口”迅速沦为荒凉偏僻之地,昔日的盛况竟至一去不返,只留下一些断壁残垣任人凭吊。

如果把我放逐到那里,真的恐怕我就得孤身一人在荒漠中,创造“大漠孤烟直”的意境了。

那几天紧接着,师大二附中的红卫兵纠集了更多学校的红卫兵要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大会,用意是要把曹滨海拉去,说不定要当场批斗然后打死。也可能造成两派的恶斗。后来此事被周恩来知道了,(听说曹的父亲是军队高干,与其母已离婚,仍和子女有联系)指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亲到该校找红卫兵作工作,总算制止了这个大会的召开,避免了一场大规模的恶性事件。红卫兵也没有再顾及学校的事。

然而,批斗和打死人的后果对于当事人的家庭已经造成了凄惨的悲剧。曹滨海被派出所带走,实际上是起到了保护作用,虽然他有幸没有被红卫兵打死,但他听到母亲的遭遇以后,也立刻引起精神分裂,一生被毁。他的姐姐正在军医大读书,闻听母亲出事,赶回家来,得知母

亲的遭遇,看了弟弟的病况,她终于没有承受住血的惨剧对她的伤害,立刻精神崩溃,也成了精神分裂症,这个家庭就如此这般地在短短几天毁掉了。

幸好不久有了政策,在居民区不再轰赶人了,也不能再打人了,抄家也不能随便抄了。师大二附中红卫兵挨家逐户造反抄家的计划没能实现。我们也躲过了一场生死劫。

不知是怎么形成的,我们所住的街道上冒出了一批积极分子。原来因为经济困难,每天靠扫街挣点小钱的一个家庭妇女龙凤兰(丈夫是流动个体理发师)造反了。街不扫了,把她居住的院落里的房主,老夫妻俩轰赶到另一个院落的小屋里,她把人家的三间北房住了。房主老头原来开一间出售锅、碗、瓢、盆的小杂货店,她说老头是资本家兼地主。原来的街道主任师大毕业的退休者王先生,被“革”下去了,新上任的是一位家庭妇女陈国珍。这位主任好象每天不洗脸,衣服不穿好,习惯披在身上,“绿叶牌”(当时最廉价的)香烟不离嘴。两只萝卜脚走得飞快。

有一天,一群积极分子来了,说是要破四旧。进得门来把我们屋前铺的一畦水泥砖刨起来,说是四旧,要处理,结果用小车拉到龙凤兰家,铺在她刚弄来的三间北房的走道上。妻一听就火了,她挨批斗比较少,没有被戴过什么帽子,也就没有什么顾虑,立刻就指责积极分子(小脚侦击队)是“强盗”。这一下可就捅了马蜂窝。被侦击队包围起来,幸亏还没有打人,一群队员拥着她要去派出所。去就去,一齐去了派出所。

一群造反派进了派出所,七嘴八舌给妻扣了一大堆帽子,说他污蔑谩骂革命群众。

民警听完情况说:“你们都回去,田老师留一下。”

大批队员回来,路经我家院墙,已经夜里十点半了,停下来高喊:“田X被逮捕了!谁敢反对造反派绝没有好下场!……”

过了也就是二十分钟,妻回来了。

我问她:“积极分子在墙外喊叫说你被拘留了,怎么回事?”

“听他们胡说八道，民警把他们支走后，对我说：“田老师，现在是群众运动，不要和他们顶着干，你主要是参加学校的运动，不要惹他们。”后来我说：“他们来到家里，把我家的东西拿去变成他家的东西了，哪有这样的道理？我又不是资本家，也不是地主。”

后来民警又说：“你看这运动，谁也说不准会发展成什么样，你尽可能不要和他们发生矛盾。暂时受点物质损失也就算了，以后再说。眼下是不要和他们顶着干，你回去吧。不要发火，忍耐一点。”

我也劝妻说：“不要吃眼前亏就行，要容忍，不要引出大事来。将来会发展成什么样，谁也不知道。还是小心点为是。”……

有一天，妻的姐姐给岳母来了信，（她在外地工作）信中说她被轰赶下乡了，乡下的条件颇为艰苦云云。岳母看过信之后，我们还劝他，现在下了乡的人很多，将来运动结束总会有个解决的办法，不要着急。谁知道半夜我出来上厕所，发现她的房门大开，进去一看，她已经倒在床边，双目呆滞，流了许多口水，一看这样我知道是脑溢血的象征，立刻把她送到附近的东光门诊部。那里的医生说：“这是脑血栓，呼吸系统已经接近衰竭，必须送大医院。”

我们赶快叫了车，马上又送积水潭医院。当时正是文革开始不久，医院里人特别多，送去之后，大夫说：“病人呼吸中枢已经不行了，实话说吧，治是不可能了，你们家属如果要维持生命，那我们就只能维持。”

那也得维持生命，赶快交了费，打上吊针，我们一直守候在病房。第二天的早晨岳母就去世了。

打电话叫殡仪馆的车，还必须报死者的出身，好在岳母是“职员”出身，不是五类分子，很快就办妥手续。殡葬车来了，医院太平间门口也有红卫兵把着问出身，我报了“职员”，才允许把岳母抬上车。车上装有一个类似棺木的大木箱。让把岳母装在其中。（这个大木箱到了火葬场，取出死人，就又去装别的死人，是个长期使用的工具。现在允许你装进大木箱，竟然也是一种优待，有别于五类分子。）。司机说：“你跟着车到火葬场，还有两个要拉，反正你就跟着去办手续吧。”

上了车，卡车中间放着那个大木箱，我坐在车的槽帮上，脚卡在车

槽帮和大木箱之间。一会儿,车到了北大一院,从太平间抬出一具女尸,就放在我的腿边。看样子有四十多至五十岁,白衬衫上有一片片的血迹,一条腿的裤腿装车时擗到膝下,小腿上也有伤痕。车下有一个男人,一边哭,一边喊叫:“你们得让我去火葬场办手续呀!不办手续我到哪儿领骨灰呀!呵……。你冤呀,你有什么罪呀!……”旁边有三个带着红袖标的人,抓着老头的臂膀,不许他动,也不许他上车送那具女尸。车很快就开了。

我坐在车上一动不动,生怕碰到那位被打死的女士。我也在想,是啊!人不去火葬场办手续,真的是骨灰找谁要?

很快车又到了复兴医院,从太平间又扔上来一具女尸。看样子有六十岁上下,倒没有什么伤痕。放在大木箱的另一面,车走在路上,偶一颠簸,隔着大木箱老太太的一只手还摆来摆去的,我简直不知道什么叫做恐怖了,木呆呆地坐在卡车的槽帮上。

到了八宝山火葬场,我办完了交钱,交医院证明,领骨灰盒等手续才知道,火葬场已经是尸满为患了。许多在单位被打死的,没有家属的尸体,根本就不收费,根本也搞不清是谁从哪儿送来的。堆在一起,一片混乱,完全乱了套。

火葬场的人高喊着:“都先回去吧,还指不定得排到什么时候呢。甭在这儿等,没日子,回去等通知来领骨灰……”

看样子要火化的人很多,根本无法确定领骨灰的具体时间。我只好回家了。

这一阵儿过去之后,街道积极分子原来都是各在各家,有事到家叫,现在把被轰赶户的院子作了他们的办公室,吆五喝六的神气起来。开始把没有轰赶走的地、富、反、坏、右搞在一起学习。这个街道上有五个人,每星期有半天都集中在积极分子大院。由他们进行教育。我们当然要老老实实听他们的训话。

第一天先给我们来个下马威,街道主任说:

“你们都是反革命,地主、富农、右派,都算是反革命。要老老实实接受群众的监督。我们国家是世界第一,毛主席领导我们每人吐口吐

沫,就能把苏修和美帝淹死。我们还要解放地球嘞。你们不老实,有的是办法……”。

然后我们五个人坐到一间小屋里学习。我由衷地佩服他们吐沫的惊人威力。随时准备谛听他们的胜利消息。坐在那里,我观察另外的四个人。一个是国民党军队的团长,战争中投降,被宽大处理,现在在家,女儿大学毕业,靠他女儿供养。第二个是三青团骨干加右派,也是从茶淀农场回来的。(后来才知道这位老崔是动物园的会计。只不过在中学时参加过三青团,只是有这么一段历史,根本不是什么“骨干”。肃反中整了他,到整风时他略有意见,就成了三青团骨干,又说话,就成了三青团骨干加右派。最后也是被送茶淀劳动教养。他是在我回来后被送回来的。)一个就是我们前街的张老头,也就是三间北房刚被积极分子霸走的老头。他虽然开一间小小的日杂小店,他的两个儿子都是北大毕业。一个女儿还是留学苏联的研究生。如今都算“臭老九”,对他们老爹的挨整也是爱莫能助。(文革结束,这三个子女通过法院,终于把霸占他家房子的积极分子龙凤兰轰走,要回了自己的房产。)最后一个说是地主,我看是个神经病。他坐在那里,微闭着眼睛,嘴里念念有词:“麻黄附子细辛汤……除去细辛加艾草,少阴反热也能康。对,对,对,是细辛,是细辛……”

一个街道积极分子冲着他大喊:“你瞎唠叨什么!?”

“啊?啊?细辛,细辛。”

“好,你给我装傻充楞是不是?走!你给我下防空洞去!”积极分子发火了。

“嗷呀,领导,领导,我有病,有病才学中医嘛,我,我,我不能下去。”

“甭给我装蒜!走!”积极分子认为他是装疯卖傻,把他带走了。

我估计这老头说不定有神经病。把他带走以后,我们四个人每周在那里坐半天,学习半天。也没有材料,就在那里干坐一下午。

岳母去世以后,我们夫妇和孩子三人住四间房。我对妻说,迟早他们会瞄上我们的住房。果然不久街道居委会的副主任(不知道从哪儿

退休的一个职工,尖嘴猴腮,是个病秧子)一个姓刘的老头。领着几个侦缉队员来了。一进门就气势汹汹的说:“你们几个人?住几间房?”

妻说:“这是我们自己的房,你管我们住几间。”

那位姓刘的副主任火了:“什么你自己的?文化大革命了,你知道吗?你还当着你们从前哪?所有的房全充公了!哪儿还有什么你自己的!限你十天之内腾出两间来!”

“你有文件吗?哪个单位规定的?”妻和他争执起来。

“你甭管哪儿规定的,叫你腾你就腾!到时候腾不出来,革命群众有权造你的反!”那位主任嗓门越来越高,唾沫四溅,怒目而视。

我知道“造反”就意味着抄家、打人……。我想极力阻止妻再和他争吵,但又没有时间空隙。

妻也有点火了:“我就不腾,看你能怎么着!”

“你,你,你对抗文化大……”那位刘副主任气炸了。一边大喊,一边突然下蹲了一下,在地上摸了一把,妻以为他要抓一把土扬她,下意识的往后退了两步,从窗下抄起一个草帽准备遮挡。那刘副主任却迅速直起腰来,蹬,蹬,蹬快步走出了院子。他的这一动作使得妻搞不清是发生了什么事。回过头来问我:“喂,他这是怎么回事?”

“他是满口假牙,大,大,大的时候,那一整块上牙脱口掉在地上了,弄成泥牙了还能和你吵吗?”我这个旁观者当然看得清清楚楚。

妻和6号院在这里看热闹的邻居都笑了。

“不要高兴,这事并没有完,他必然还要卷土重来,等着吧。”我没有那么高兴。

果然过了些天来了一群侦缉队员。一进门就说:“根据上级的命令,要挖防空洞,你们院被选中了!”

搬出这个理由来我们只好一言不发。

一千队员干了七八天,从东到西挖了大约一米五宽,一米五深的一条深沟。沟的边沿离我们屋门口只有五十公分。把挖出来的土堆在两旁,我们一出门就得先上土坡再下沟壑。挖成这个样子之后,他们说:“土质不行,撤!另找地方!”

分明这是一个恶意的报复。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你能有什么办法。

为了能走出家门,能从院落中走出大门。我独自花了一个多月时间的劳动,借了一部手推车,从外边又把土推回来,才基本填得差不多平。因为地被整个翻挖了一米多深,一下雨,满院坑坑洼洼,有的地方说不定一脚踩下去会把脚陷进泥里。这就是积极分子对我们的革命行动。

最高指示:“深挖洞,广积粮”来了。街道上也开始脱坯、烧砖了。街道上哪来好土?北京街道上大多是炉灰渣土,根本就不能烧砖。但是也得脱坯,建窑,烧砖。侦缉队员们可以说纯粹是胡干,泥和得很稀,砖坯不能规矩成型,胡乱码到窑里就烧。我烧过几天窑,烧的是家俱,挺好的红木凳子,砸坏了就往火里扔,那红木还极不容易燃烧。有些是字画的轴木,那字画不知道扔哪儿去了。反正毁的大多是好东西,烧出来的砖却是没一块正品。和我一同烧火的一个老头说:“嗨,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反正天天就这么造(东北话,意即‘糟蹋’)呗!。多少好东西都让他们毁了,这算什么事儿?!”

冬天挖防空洞,也让我去。妻去上班,我只好带着两岁的小女儿去。把孩子放在上边,我下到洞底去挖,上边刮着五级大风,孩子虽小,也懂得我们肯定和一般人不同,天寒地冬,零下十多度的气温,冻得直哭,也不敢喊。其他挖洞的人实在看不下去了,一直让我回去。我抱起孩子就回了家。到家不久孩子就发烧了。赶忙又带孩子去医院看病。刚从医院回来,街道主任又来叫:“谁叫你回来啦?赶快去挖防空洞去!赶快去!”

那时候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对那个罗卜脚街道主任陈国珍说:“我孩子发高烧了,去不了。”

“谁都有病,谁没病呵,你得去,赶快去!”她开开屋门对我嚷。

我也火冒三丈:“去不了,就是不能去!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她气呼呼地可能去派出所告状了。但没有再回来。从此,我索性再没去挖防空洞。

真的是“屋漏又逢连阴雨”,家里的灯泡坏了。要买灯泡还必须找

街道主任陈国珍要“灯泡票”。我们把这位主任得罪够了，怎么去再找她？没办法，那也得找。有一天，妻在胡同遇到了陈，迎上去说：“陈主任，我家的灯泡坏了，请你给张灯泡票。”

陈带搭不理的说：“到办公室领。”

邻居 X 先生在旁边听到了，这位老北京调侃道：“哎吆呵，您瞧瞧，她也有了办公室啦！您瞅那劲儿，您没问问她是几级干部？赶明儿国务院是不是还得给配一辆车啊？”

妻无可奈何地笑了笑。

没想到 X 先生的话被她听到了。陈国珍回头用她那河南腔扯着嗓子喊：“俺这是为人民服务，说那些怪话干什么！”

X 先生笑着说：“为人民服务，你攥着票儿不撒手，干嘛不痛痛快快给人家？”

因为怕 X 先生再说什么不好听的话，陈国珍从兜儿里掏出一张灯泡票，给了妻。晚上我们总算不必再黑灯瞎火的摸黑了。

报纸登出一个消息，甘肃兰州有一位军人家属提出一个口号：“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接着街道也开展了这项工作。听说有几个作临时工的中年人，被从工作单位召回，动员他们下乡。具体地点听说是远郊区。有天晚上，街道主任陈国珍叫我去“办公室”。我一走进去，见她叼着卷烟坐在桌旁。一缕清烟飘过她的眼睛，她眯起一只眼，等了一会儿才说话：“你填张表吧！”

“什么表？”

“下乡的，人家都下乡。”她懒洋洋地说。

“人家都是谁？”

“你不用管人家啦，你填你的吧。”似乎她有点不耐烦。

“填表干什么？”我问。

“响应党的号召，不在城里吃闲饭，没工作就下乡”。

我说：“我让你给我开干临时工的介绍信，你不给开，这没工作是你造成的。”

“谁给你说那个，我叫你填表！”

“那这个表我不填。”

“啊？你不响应党的号召？！你抗拒党的政策！你为什么不填？”她有点生气了。可能她还没遇到敢于不填表的五类分子。

“我现在是家属，你搞清楚，户主是我老婆。她工作，我管家。她到什么地方，我就到什么地方。她调哪儿，我跟到哪儿。你要让我单独下乡，我不去。”我给她搬出道理来了。

一时间她气得不知该说什么。噎了一会儿，她说：“好，你不去，你公开反对党的政策，你回去，等我们给上级报告以后再找你！”

我站起来就走。

我知道她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她大概想着，要给派出所报告，不见得会把我强行押走。她们找到妻的工作单位——北京师大二附中。要求把妻搞去下乡。满心想着一石二鸟的高招儿，干脆把俩人全轰走。二附中的人事干部对她们说：“我们的干部调动是我们的上级师大才能决定。你们无权过问我们教师的工作问题，你让我们调，我们就调啦？这不是开玩笑吗？！”

碰了一个软钉子，他们回来没好说。妻去上班，人事干部对她说：“你们那个街道也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他们不知道他们该干什么。跑来让我们把你调走。可笑不可笑？”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这时，私人的房，房管所也介入管理，坚持自主已不可能。你不是不让副主任住你的房吗？这回我们联合房管所，给你安排一家街道上有名的流氓来往。这家夫妻极不讲理，三个儿子全是流氓小偷，判过刑。整天来的年轻人也是不三不四的小流氓。女儿也成天招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争风吃醋，打架斗殴。从生活上经常找岔儿，欺负了我们好几年。有一个时期，二附中的校长看不过去，在学校给我们安排了两间房，让我们躲开这家流氓。这也是文化革命带给我们的“好处”。直到文革结束，落实私房政策，此时，他的三个儿子也再度入狱，女儿也被单位开除，跑到外地。才通过法院把那家流氓搬走。要回来房子。

非常走运的是在文革中，尽管几次得罪过街道积极分子，他们始

终没有批斗过我。实际上他们心里早想整我,只是没有机会。差不多已经是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了,有一次,他们召集了一些积极分子在一个居民院要开会,通知我去参加。我一进到那个院落,看形势有点不对,大家围了一圈,在中间给我留了一个位置。看起来是批斗会的样子。我走到中间,刚在小板凳上坐下来,派出所副所长兼管我们这一片的老张来了。

“开会吗?什么会?”他问道。

积极分子说:“没什么事,随便学习学习。”

“学什么?”

“?……”他们没人说话。

“还没有找到材料。“有个积极分子说了这句错话。

老张一回头,看见我坐在中间。“哦,老赵来了?”

“嗷,嗷。”我应了一声。

“那么既然没有什么学的,就让老赵给大家念念昨天的报纸吧。时间你们自己掌握。”说着就从书包里拿出一份材料递给我。

我刚读了一条新闻,民警老张一走,那位街道主任陈国珍气急败坏地立刻宣布:“都回家!不学了!”

我更乐得不学,和这帮小脚侦缉队员在一起有什么好学的?已经被老张看到了,开会再批斗我,没有经过派出所,他们也怕承担责任。幸运的是派出所副所长无意中解救了我,搅散了积极分子们筹划的“右派批斗会”。

红色狂飙逐渐趋于和缓,紧接着又掀起了千年没有的“大串联”高潮。学校师生都不上课,乘火车、住宿、吃饭不要钱,全国师生打着各种“战斗队”的旗号,潮水般涌向各地大旅行。妻也跟着学校教师到四川,然后沿长江顺游而下,再到武汉。周游了一大圈。外地亲戚的孩子则来北京旅游,有的住在我家。家里也成了“接待站”,送往迎来,忙得不亦乐乎。

抽空去张睿家看看,他被遣送回农场了。到吴士俄家,他也被遣送回农场了。可怕呀!

工宣队进驻街道了。有一天,工宣队长来到我家。她是一个工厂的

女工。她一来就问起我：“你好象还没有40岁吧？”

我简单谈了一下我的右派历史和现状，她说：“你去作体力劳动行不行？”

我说：“当然可以，问题是街道办事处劳动调配站，没有街道主任开的条子他不给安排。我们这儿的街道主任陈国珍说我不困难，几年前我就让她开，她就是不给我开。”

“街道上老太太没文化，不懂政策。我给你开一个条子，我再给劳动调配站打个招呼。明天你就去。先找点体力劳动活儿干着。”她挺痛快的说。

我真没有料到，悬了几年的事，不到三分钟就顺利解决了。“太感谢你了。”一边谢她，一边我拿来了纸和笔，她马上就给我写好了介绍条子。然后我怀着感激的心情送走了这位真正的工人阶级。

晚上妻下班回来，我告诉她：“这下我可摆脱这帮小脚侦缉队，烦人的老太太了！”

毛泽东对于这帮忠心耿耿连唾沫都会当作武器的小脚侦缉队，给予了相当丰厚的奖赏——为他们成立了大量的街道工厂，把他们这帮无业者通通吸收为工人，终生享受养老金的待遇。与此同时，在文革中曾经冲锋陷阵，大破四旧，也立了汗马功劳的青年学生，成千上万的被送到乡下，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们在乡下历时数年，谱写了两代知青的历史悲歌。结局还不如这帮小脚侦缉队。

第二天，我就去了劳动调配站，把那张条子递给他以后，他说：“到外边等着，等用人单位来人，根据他们要人的人数和工种分配。”

院里有十几个人，都是在等分配工作。忽然我明白过来了，这不就是一个“人市”吗？一个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活人市场”吗？记得在电影上曾经看到过，解放前许多年，乡间贫农出卖劳力时，就是领口后边插一根稻草，蹲在农村集市上。和旁边拴着的牛、马、骡、驴一起，等着人来买！没想到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被打入了这只大军，有什么办法，那就照样也蹲在那里，等着人来买吧。

鲁班门下

世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条生活的路。

——亚·索尔仁尼琴

文革的中后期,在北京找一份干体力劳动的工作——临时工,也是很不容易的。我从农场回来几年,一直不能去作临时工,是因为妻子得罪了街道主任。这位小脚侦缉队长不给我开那张二指宽的小条,(给街道办事处开介绍干临时工的介绍纸条),没有这张纸条就不给安排作临时工,就能活活把我卡死。亏了碰见一位比她大的工宣队长,这才救了我,给我开了“介绍信”。才有了作临时工的资格。我哪能放过这个事关“饭碗”的机会呢。

清早吃罢早饭就去那个“人市”。劳动力分配站院子里已经有不少“劳力”等待分配。有些已经在这里混了很长时期的“劳力”,还互相探询着有哪些雇工单位。我第一次来,一边观察,一边坐在台阶上等雇主来雇我。忽然从大门外走进一个人,仔细一看,是我1951年刚参加工作在一起工作的张瑞。张是南开大学经济系毕业,和我同年参加工作,同在华北行委工作,而且很熟。三年后,把他调到河北雄县,让他在一个师范教书。他当然不会安心于那份工作,1955年北京招考“副博士”,他回来报考。谁知他回来了,“副博士”又停招了,从此就失掉了所谓的“组织关系”。没有政治、生活方面的任何错误,也沦为一个失业者。彼此都没有想到十五年后,我们又成了北京新街口街道办事处“人市”上等待出卖劳动力的苦力伙伴。

因为很熟,目前遭遇差不多,几句寒暄就切入了正题。一小时后,我们就一同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在六铺坑一个工地当小工。这是一处盖房的工地,房子已经盖到二层,没想到临时工当中也有“工头”,而且这些工头说不定原来也是一些作奸犯科的罪犯和流氓一类的人。

一开始,安排我俩用铁锹往二层的架子上给瓦工甩砖,所谓甩砖就是因为人手递砖已经达不到高度,要用铁锹往高处给瓦工甩上去。

这甩砖也有一定的技术，我俩根本控制不了方向和高度，铁锹一扬，砖头四处乱飞，工地上立刻炸了窝：

“嗨，嗨，嗨，这是干嘛呐！这他妈还能干活儿吗？工地上砖头满天飞，脑袋开了花谁负责？头儿，头儿，不行，这俩人不行，赶快换人！”

架子上的瓦工师傅也有点光火：“这哪儿行啊，这俩主儿饶了干不了活儿，这不是添乱吗？快换人，换人！”

工头走过来冲着我俩大喊：“干嘛来啦，玩儿来啦？玩儿出人命你们负得了责任吗？去，去，去那边干去！”

我们只好顺着他指的方向到旁边另一摊。那边的“工头”安排我俩用大平锹和拌水泥、沙子和碎石。这是小工活中最累的活儿。干了一个小时就已经累得满身大汗，气喘吁吁。我们紧张的干活，他们却坐在一旁评论：

“喂，喂，你们说这老哥儿俩呵，说是下放干部吧？不完全像。说是工人吧？更不像。他们到底是干嘛的？啊？”

“单凭那付眼镜儿，就不是工人。”

“没准儿犯了什么错误，让单位给开除了吧？”

“也说不定是从外地回来，不想回去了。”

“瞅他们干活儿那劲儿就是没干过。”

“得，让他们好好的练练吧。”

“……”

三天下来，我俩累得够呛不说，我们发觉又落入了一个受人欺负的环境。把重活儿派给我们，他们干轻活儿，还不时歇下来聊天，看我们干活儿。

我和张瑞商量，凭身体条件我们就是玩儿命也比不了他们，这样下去不行。我们今后要吃体力劳动这碗饭，不受人的欺负，必须掌握一门技术。不能简单的只卖劳动力。那时临时工中只有三种技术工，就是：瓦工、木工、水暖工。我们考虑瓦工干活儿泥来水去，爬上爬下，不好干。水暖工整天滚一身铁锈，铁工活儿也不好干。而且这两个工种都不是自己一个人能单独干的。唯独木工可以自己单独干，不太需要多

人配合。再说也比较干净。商量好我们就决定撂挑子不干了。第二天给他们来了个不辞而别,干脆没去,不干了!

俩人简单碰了一下情况和设想,对于作木工怎么学,我们绝对都是外行。商量不出个所以然来,最后决定各自想办法,去练木工,过十五天再碰头。

干木工需要一套工具,起码也得有个刨子和一把锯,上哪儿去找工具?我给一位在建筑系统工作的老同学写了封信。说明我已被划右派,还被开除公职,现在成了无业游民,打算以劳动为生,想作木工没有工具,请他帮忙。然后就去家具店,琢磨家具的结构。根据自己的想象,到木材公司买了些木板、胶合板;又到化工、五金商店买了胶和钉子。

第三天正好是个星期天,早晨正在院子里搬弄木板,我的那位老同学宋学斗,一手提着锯,一手拿着刨子走进院来。我简直高兴炸了,他没有因为我划成右派而回避我,还认真地帮助我,给我找来了我急需的工具。我们高高兴兴聊了一上午,自然,他也少不了真诚的规劝,责备我不该给共产党的高官提意见,作事太不慎重。留他吃过中饭才把他送走。

凭着自己瞎琢磨,瞎摸索,在家整整干了十一天,作成了一個下面是碗柜,连接着上面缩回去一半是杂品柜的组合柜。买了油漆,把柜子漆好,赶忙又去看张瑞。不谋而合,他也作了一个碗柜。从成品的内在质量和外观,我们的自我估计是两件产品都算合格。俩人高兴的立刻有了信心。然后商量从干活儿的体会中还需要凿子、米尺、钉锤、斧头,俩人一块儿去市场买来,整修妥当。次日,又一道去“人市场”出卖自己。这回我们每人背了一个工具袋,里边装模装样也有几件工具。管他像不像,干了干不了,为了生活,为了吃饭,什么也不多考虑,反正到“人市”“蒙事儿”去了。

那时候,社会上各单位打派仗还没有停止。有个工厂的老木工当了造反派的头头。木工活没人干了,他到这“人市”来雇木工。他一进门,我就迎上去:“师傅,请问你找什么工?”

他说：“我想找几个木工。”

“师傅，我们俩就是木工，不过实话给你说，我们光会作家具，不会盖房。”我忙着给他解释。

“嗨，我本身就是木工，那我还不知道，只要会作家具，盖房的事给你一说你就会。”

“我们俩愿意去，你看怎么样？有盖房的活我们学，请你到分配站给我们办个手续好吧？”张瑞说罢，用企求的目光看着老师傅。

“好，就要你俩啦，走，办手续。”老师傅非常痛快。

不料这位老师傅走进分配站办公室，对管分配的人一说：“我就要这俩木工了，办手续。”

那管分配的人抬头看了看我们俩，用极其轻蔑的口气说：“什么木工？你看清楚，你看这俩人哪儿像木工？刚来两天半，怎么就成木工了？”

当时我心里直打鼓，看来蒙不过去，这个家伙赶情一直盯着我们。我们的美好计划大概要泡汤。老木工回头一看张瑞，正好和张瑞企求的目光相遇，也许第一印象在他的头脑中一闪，他总觉得这俩人老实，也许我们俩该着走运，那老师傅说：“甭管像不像，我就要他俩啦！”

分配站的人员不耐烦地说：“你要坚持要也行，你不知道，他俩干临时工也就是几天儿，只能算作学徒木工。”（木工每天工钱 2.5 元，学徒木工每天工钱 1.5 元）

那老师傅有点儿和他较上劲儿了：“学徒工就学徒工，那我也要了！”

我们这两个“人货”，经过他们讨价还价，终于成交了，价钱是一天一块五！

我的天！我们第一次想作木工的愿望就在这老师傅一念之中成功了。我衷心的感谢中国木匠师傅的祖师爷——鲁班！谢谢你的保佑！

填完一张表，老师傅说工厂就在附近，带着我们就走。到了工厂，进了木工房，这才知道作木工需要许多工具。远不是我们想的只要有锯和刨就行。我们自己瞎鼓捣，固然也作出一件成品，那完全不合木工

的工作程序。木工干活有些流程和方法我们都得从头学起。既然雇的是学徒工,那就开始当学徒吧。

俗话说:“三十不学艺”,意思是说学一门技术,必须从青少年时期开始。青少年时期头脑清楚,体力条件好,能吃苦,坚持几年才能学好技术。我俩都是三十大几的人了,从小又没有干过体力劳动,现在被生活所迫,要在人间混一碗饭吃,才开始学这门技术,自然有一定困难。但是生活的压力是不容多考虑主、客观条件的,不能再优柔寡断,必须硬着头皮从头学起。

知识分子也有知识分子的长处,作木工活比较难的是计算和画线,我们很快就掌握了这项技术。老师傅对我们也很满意,每天一上班,他来给我们一指点,这俩徒弟准能给他对付出来成品。他教完我们,尽管去开他的会,造他的反。我们叫作边学边干,有理论,有实践,进度满快。我们俩知识分子虽然也“傻”,但从各种遭遇和环境,也学乖了点。工厂里有的是木材,一边学技术,一边干活,一边还不失时机地抓时间找好的木料,照着木工房的工具,偷偷一件件仿制,一个月下来。什么锯、刨、凿、斧、锤、角尺,作了一整套。下班的时候,也一件件顺回了家。

在工厂边干边学了三个月,经过另外一位木工李师傅的考核,认为我可以单独工作了,他把我介绍到机械进出口公司,稀里马虎也没有经过街道办事处劳动力分配站,就作了被认可的木工师傅。我也为了多挣从1.5元跳到2.5元的工钱,只好和我那老伙伴张瑞告别,单鸟先飞,自己去闯荡了。

那是文革的后期,单位、工厂上班都不正常,叫做上而不干,上而少干。我到了机械公司起先是和难友——中央调查部的“右派”赵越(也是开除公职,劳教完毕)配合,他作瓦工负责盖房,我作木工制作房架、门窗。盖房的木料都是软木料,照着工厂老师傅教我的作法,干起来比作家具省力多了。那个公司被打成走资派的经理和一个科长批斗完以后,在单位劳动,作我们的小工。房子盖完,赵越走了,完工就走,这是临时工的特点,干一天,拿一天的钱。我被留下来从工地到公司修

理桌、椅。

第一次到公司，中午我在木工房休息。有位工作人员走进来，个头不高，是个胖子。出于礼貌，我对他点点头，打个招呼，说明我是新来的临时工木匠。他自我介绍是公司办公室工作人员，叫史建德。然后紧接着就有点神秘地笑着对我说：“师傅，你不是木工。”

“没错儿，是木工，我是街道办事处介绍来的临时工。可我从小就学徒，干木工快二十年了。”我以为他要考核我的技术够不够，也许要辞退？我也学会了，要在社会上混，就不能再有“书生气”。管他干什么，先唬他一下。

他依然神秘兮兮地直看着我，微微笑着说：“师傅，我怎么看你也不像。”

“木工还能看长相？我因为近视眼，戴了副眼镜，所以你看着不太像。”

“不，不光是眼镜，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不一样。这怎么说呢？反正是我怎么看怎么不像。你绝对不是木工。”他一边说，一边看着我神秘地微笑着。

“嗨，看干活儿就像了，熟习就像了。”看来他对这种怀疑的探究还挺执著，我继续给他解释。

他突然从口袋掏出一个小纸条，略带神秘，笑咪咪地说：“这是你开的买料单吧？”

我看了看，说：“是啊！”心想：怎么回事？他们吝啬这一点费用？难道让我作无米之炊？

他用手指点击着那个买料单，严肃地说：“全公司没有一个人能写出你这两笔字。”

唔，没想到此人挺有心眼儿：“嗨，我就会写那俩字，那是蒙人的事。”

“这俩字？没有点功夫谁能写出这俩字？”

他态度严肃了起来：“师傅，请你别误会，你怎么说原来也不是木工。在那边盖房，门、窗作好了，一看，挺好。这师傅手艺不错。来这边

作文件柜,修办公桌,也不错。尽管你也穿一身工作服,可一看你这个人,你的言语、行动都不像,怎么看你怎么不像木工,你瞒不了人。我问你绝对没有一点恶意,我愿意和你作朋友,我绝对不是调查,也没有恶意,请你相信我。”

唉!我从于家岭炼狱逃过死亡回来,又吃了几年苦头,现在学到了一点技术,准备挤进工人阶级队伍,下半生用劳动混一碗饭吃。孙悟空七十二变,我刚变了一变,就让人看出了我的原形,依然逃不过人的眼睛。这真是改头换面易,脱胎换骨难呀!我看他挺诚恳,“右派”也算公开身分,只好告诉他我的摘帽右派简单经历。

“你看,我没有看错吧。‘右派’那事儿别提了,谁也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儿。”看来他对反“右派”运动有他的认识和看法,我也就不便深问了。

.....

后来我们真成了相处不错的朋友。工作上他给了不少关照。

夏天,我修一张桌子,重新粘合好破裂的桌面要刨平,木工房小,耍不开,我只好搬到院子里干。我穿着一件圆领衫,干活儿干得满头大汗。当时是文革后期,上班不太正常。这个公司是反右以后才成立的,没赶上反右派。大部分年轻人从年龄上看,1957年可能还是初中学生。对反右恐怕只有道听途说的认识。有几个年轻人经常来木工房用探究的神情和我攀谈几句。一到院子里干活,当时他们上班也不正规,有些人渐渐围拢过来看我干活儿,慢慢的也展开了一场议论。

“哎,你们看,这师傅要换身衣服,像不像个经理?”

“是有那么点儿,挺像的。”

“人家师傅干活儿,别在这儿起哄。”

“哎,哎,师傅,别干了,休息会儿,休息会儿。”

“这师傅不是木工。”有人用手遮挡着嘴低声说:

“我也瞅着不像嘛!”

“大学毕业,1957年成了‘右派’,让人干这活儿,真够惨的。”

.....

我一概不予理睬，埋头干我的活儿。从后边过来一位大高个儿，我知道这位姓冯的，在我们此前盖房的工地就知道他是监督“走资派”（这个公司的经理林某，科长王某当时被定为走资派、批斗对象，被监督劳动，在我们盖房的工地作小工）的监督者。他是这里的什么人，我不知道。但我也一眼看出他是个没文化的粗人。只见他拿着个劲儿，背抄着手走过来冲着我神气活现地说：“你干你的活儿，招这么多人干嘛？”

我没理他，也不辩解。尽管我认为他的话毫无道理。这些年我接受共产党的教育，对社会的认识有了提高，知道社会本来就没有什么平等。人欺负人，狗欺负人，都很正常。既然我又以劳动者的身份，又走进这个社会，就得承受一切不愉快，不合理，不公平的伤害。正如莎士比亚说的：“一条得势的狗，也可使人惟命是从”。我们“右派”的作人原则是少管闲事，少说话，多干活儿，能忍就忍。不能忘记自己头上还有一顶“摘帽右派”的政治帽子。

史建德大概早在后边站着，听到这个人的话，立刻大声说：“你看见师傅招他们来啦？”

那人说：“我没看见，我就那么一说。”

老史勃然大怒，冲他喊道：“你他妈狗眼看人低！看人家新来想欺负人是怎么着？你就那么一说？你倒说得轻巧，你那叫放屁！”

旁边一位年轻人仲连顺（此人后来和我关系不错，担任了机械公司副经理）也责备他：“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谁派你来这儿监督啦！？”

老史还有点不依不饶：“谁派你来多管闲事来的？你以为你是谁？看什么事都想管，你他妈算老几？”一边骂，一边冲着那人走过来。

然后，那人悻悻然离开了。事后我感到很没意思，此人不过是条听命于人的狗，和他计较实在太无聊。干完活儿我去洗脸，仲连顺过来对我说：“没事，别理他，他是个水暖工。见人就想监督，什么玩艺儿！老史是个好人，就那种脾气，谁也惹不起他，”呵呵呵笑着走了。

果然，他不过是个水暖工，也是一个工人，他却要走过来向我寻衅，显示他比我高一等。他要进一步知道我是“右派”，恐怕还要拿阶级

优势来对我搞点名堂。人啊，人，人类就是这样。没想到，这“右派”在社会上夹着尾巴作人，混一碗饭吃也不容易。

过了几天，老史来了。他说：“老赵，有件事我想和你商量，这公司有个别人不地道，在这儿干活儿难免和人发生不痛快的事。再者，公司很快要搬家，这一搬，离这儿就远了，所以我想介绍你到另外一个公司工作，你看怎么样？”

我没加考虑就告诉他：“我的情况你也知道了，临时工，无所谓，我是干活儿吃饭，我们被人欺负的事多了，我不在乎。再说那天那个人也没说什么，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不过公司要远了，倒是个问题。因为我下班还得去接孩子。远了就不大方便了。这倒是个该考虑的问题。”

老史说：“我想介绍你到轻工进出口公司去工作，那个公司管这一摊事的是一个女的，叫顾静华，人很好的，和我关系不错。地点也离你家不太远。在西长安街。你要同意我就先给她打个电话。”

临时工，临时工，本来就是临时的，到哪儿也一样，不过离家近对我来说还是方便，我当时也表示同意接受他的介绍。和他讲好之后，他出去大约二十分钟，回来告诉我已经和那边讲好明天就去。

第二天，我背着工具袋去了新介绍的单位。顾静华，不到40岁的一位女士，上海人，人很和气，领我到公司后院的木工房放置好工具。两大间房，一个人干活儿，挺好。临时工也有好处，除了干活儿，公司的任何活动包括学习都不参加。干完活儿就回家。

公司在南苑的槐房村有一个不小的仓库，存放着准备出口的货物。仓库就近从农村也雇有一个木工，平时在仓库，城里有盖房的活儿就把他叫来。此人叫杨增禄，人很年轻，二十岁出头，是个农民，人很憨厚，身体很棒。来城里干活，总是包揽了所有的重活儿，有一次来城里干活儿，他对我说：“赵师傅，有什么重活儿你留着，等我来了干。”然后笑笑又说：“我知道，你不是干这个的。”看来这世上好人还是不少呀。

我走到哪儿，很快人们就知道了我的右派身份。虽然我脸上没有“黥刑”的印记。但绝大多数人都是友善的，同情的。

有一天，顾静华来到我的木工房。她当然早从老史那儿知道了我

的右派身份。聊起来以后,我知道了她从外贸部来的原因了。因为她在初中时期在上海读的是教会学校,参加过童子军。这就成了政治历史问题,外贸部说她不宜作机要工作,从机要室调出来安排到这里。看来我们都是生不逢辰,那童子军听说是早年从英国创立,逐渐发展到许多国家的。创建时的用意是训练儿童户外活动和自我救助能力。使得小学儿童在遇到意外事故和情况时有一定应对能力,并且教育儿童和平相处,互相帮助。这样一个儿童活动也要给涂上政治色彩。全中国的人都要生在延安大概就没有这么多扯淡的政治历史问题了。三十年代抗日战争年代你们为什么不在上海发展发展共青团?这政治简直荒唐得幼稚可笑!看来杨贵星式的人事干部哪个单位也有。谁碰到谁倒霉就是了。

后来,我在2006年11月4日的《北京晚报》看到李扬、李邓元合写的一篇记述《北京象鼻子中坑小学》的文章,文章说:“……记得1946年的晚春,校长站在领操台上宣布,象小成立童子军。从二年级到四年级全体都得参加,而且还得自费购买童子军的服装。……1948年初冬,北京和平解放。随着市民大众欢迎解放军入城,童子军也自动消亡了。”这里说得如此轻松,好一个“自动消亡”。从顾静华的遭遇看,后来凡是参加过童子军的学生恐怕都没有躲过“政治历史问题”的严酷帽子,并在工作中受到政治影响。全国有多少小学?当时多少小学生参加了童子军?多少人后来为此受到政治审查,成了毕生的“政治历史问题”?我奇怪文章的作者难道不知道所谓“童子军”后来当真象他们说的那样轻松?

因为外贸部我也认识一些人,我俩原来都是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所以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

过了一段时间,她来问我:“你认识陈明吗?”

顾的丈夫冯禄勋是外贸部部长助理杜毓云的秘书,所以她们住在外贸部宿舍,她们楼上住的就是陈明。

我说:“认识,还比较熟。我们当年一道在华北行委工作,李哲人是我们的局长,他是李的秘书,李调到外贸部任第一副部长,把他带到了

外贸部。”她听后笑笑,说:“是的,李副部长已经调走了,他现在是外贸部办公厅主任。”

我没想到:“啊,他升官了呵。”

又过了一段时间,她来对我说:“喂,老赵,陈明让你去找他,真的。”

我看看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她说:“我已经把你的情况告诉他了。”言外之意是把我的“右派”和木工师傅的身份宣扬到陈明那里了。

“我不能去,他现在是外贸部办公厅主任,我是第一类被处理的极右分子,现在虽然摘了帽子,还算‘摘帽右派’,如今他升了高官,我落魄成一个“苦力”,我怎么能去找他呢?”

“他可没摆架子,他要摆架子就不会让你去了。”

“我绝对不能去,我们可以说已经不是同路人了。他是办公厅主任,我是个木匠。我也不想给别人惹麻烦,我也不想求别人,作人要有自知之明。记得徐悲鸿先生说过一句话:‘人不可有傲态,但不可无傲骨’。我现在靠劳动吃饭,当我的木工,挺好。不能给他惹麻烦。请你转告他,谢谢他。”

“唉,”她笑笑走了。

此后,她又一次对我说,陈明让我去他家。我还是婉言谢绝了。

公司的总务就是她,我们都作过机关工作,能谈得来,很快我们也成了朋友。我在这里作木工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于是就在这里安安稳稳独自一人,在一间木工房里,与世无争的作起了我的鲁班门下——木工师傅。

几年中,我就这样安安稳稳的作我的木工。当时心想,就这样干我的木工师傅恐怕就是我的后半生了。每月有80元的收入,生活也还过得去,等到60岁退休时再说。

我的那位老朋友张瑞,后来也“单挑儿”离开工厂去当木工师傅了。

这位朋友非常不幸的是在1978年落实平反冤假错案中,他既不是右派,又没有别的帽子,没有被列入平反之列,仅仅是“失掉组织关

系”这种莫名其妙的“问题”，大学毕业只工作了三年，就赶上了只有“胆敢随便离开组织者，就不给你饭吃”的严酷扼制人的政策，却没有“人尽其材”的些许机会。落得一生划入临时工队伍，这不能不算作中国知识分子政策的牺牲者。真正作了多半辈子木工师傅，按木工办理了退休手续。

退休以后，我们住得很近，作为同为鲁班门下的老朋友，经常来往。

残酷的株连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孟郊

1969年,我作教师的姐姐挨了批斗之后,被从山西省会太原市下放到清徐县的农村。

按政策的规定,教师是不下放的,但是她的弟弟——我,是大右派,二机部那帮人间少有的所谓“左棍”,肯定给她们单位发去了胡编乱造的黑材料。借着文革,又要整她。什么政策不政策的,需要就是政策。因此,尽管政策规定不下放,造反者有权,也饶不了你!

姐夫也是教师,在一个中专教书,虽然没有下放,也是整天写检查、这个会,那个会,参加劳动,一天忙到晚,没有一点顾家的时间。三个男孩不分年龄大小,全部下了乡,都正在读书的年龄,学业全荒废了。搞得一个家庭四分五散,谁也顾不了谁。如果她一人下乡,八十多岁双目失明的老母亲和刚刚上小学的小女儿就没人照顾。条件所迫,不得已,只得把老母亲和小女儿带着一同下乡。干脆把太原的家扔掉,一齐走,这应该叫做“毁家下放”吧。

接到姐姐的来信,我立刻请了一周的事假,赶到山西清徐去看她们。

从北京坐火车到山西的榆次,还需要坐一段汽车到清徐。然后再走十几里路才能到那个村子。姐姐的信上告诉我,下放干部只有两个女的,只要问带老太太和小姑娘的女干部,就会有人告诉你我们住在什么地方。一进村,遇见一个中年农民,我一问他,就热情地把我领到那个院落。指一指东屋说:“就在那间东屋。”

我朝着那间东屋走去。轻轻推开门,母亲听到门的响声,问道:“谁?”

母亲本来是一个性格开朗的人,如今却因为白内障双眼失明,茫然坐在炕边,(当时医院白内障手术技术还比较落后,母亲有高血压,

大夫不敢给作手术,以至双目失明)。我走上前拉住母亲的手,这是一双含辛茹苦呵护了我们一生的手,为我们操劳一生的手,为我们担惊受怕了一生的,年已84岁老母亲的手。我看着母亲由于失去视力,着重利用听力而变得木然的面孔和动作,已经没有了往日的欢笑和任何表情。显然苍老了许多。我只叫了一声“妈”,就哽咽得再也说不出话来。我怕母亲听见我哽咽,也怕母亲知道我落泪。我极力抑制着自己,稍稍控制了悲痛的情感,就问母亲厕所的位置,为的是逃避在母亲面前实在无法继续抑制的悲伤。

母亲告诉我,向北走,从两间房中间的夹道进去。还嘱咐我农村的厕所不好上,要注意。我进到厕所,真想号啕大哭一场,宣泄我心中的悲痛。但是我又不能,男性的特点和环境不允许我那样。我只能在厕所中利用短暂的时间偷偷的哭泣并尽快抑止悲痛,避免让老母亲知道我落泪。

回到屋里,我也坐在炕边,母亲问我:“找到工作啦?”

我说:“是的,找了个临时工作,先干着。”

“好,先得把吃饭问题解决了。”

“你放心,别再担心我啦。”我安慰着母亲。

“过一会儿我们就吃饭,饭已经作好了,就放在炉子旁边,菜也放在那里。”

我说:“等姐姐和孩子回来吧。”

“你姐每天晚上十点以后才能回来,等不了她。孩子六点能到家,回来一起吃。”

我不安的问母亲:“这火你怎么弄?上厕所怎么办?”

“都得自己弄,有什么办法,情况多么艰难,也得活着,就这样摸索着弄火,摸索着上厕所。习惯了以后也能对付。”

谁家84岁的老母亲不是在家养老?为什么我84岁双眼失明的老母亲要被发落到农村受这一份煎熬?我实在太无能了。四十岁了,连母亲都不能供养,还让她受这样的苦罪。好在母亲看不见,我忍不住一直在偷偷的流泪。听母亲给我诉说1958年我被劳动教养以后,把她送到

姐姐家的经过

“把你抓走，那个梁书记的老婆，丈母娘都骂他。他说不是他干的，是众人干的。谁是众人？他那个老丈母娘尤其对他不满意。”

……

我说：“谁知道她们是不是真心话。世道就是这样，她们说什么也没用。别听他们的。”

六点钟多一点，在农村小学借读的小外甥女下课回来了。长时间生活不规律，使得孩子又瘦又黑。问起学校的情况，自然和城市无法相比，不管怎样，能不失学就是万幸。

我们吃的就是火炉上半温半烤的窝头和菜，喝一些开水。

晚上没有灯，我们只能坐在炕上聊天。小外甥女靠在被子上，不一会儿就入睡了。我和母亲讲着话。一钩冷月从窗外照进来，算作灯光。那苍白色的月光照着母亲，原来开朗高声说话的神态没有了。现在就好象照着一尊雕像，失明折磨得她对周围环境好象失去了反应功能，只能木然地端端正正的坐在那里娓娓地给我诉说着：

“清朝灭亡，民国来了，也没有把咱们满人都抓进监狱。日本鬼子来了，你们和你爸商量，不作亡国奴。把一个好好的家全扔掉去逃难。一逃就是八年，八年呀。没受日本人的害，可受尽了人间的罪，把八十多岁的姥爷饿死在外。我们剩下的人，总算活着回来了。可什么也没有了。就留下了命。逃难回来，你爸病得不能工作，整整病了十一年去世了。要不是你姐姐当了教员，我们这一家人后来还不知道要落成什么样儿呢。好不容易你念完书了，工作没几年，我们盼着生活会好一点，没想到说话也犯罪，不知道你说了人家当官的什么话了，被人家抓进监狱。现在你没在监狱饿死，又逃过一劫。你看你姐受的这份罪。当一个老师，整天忙忙碌碌，高了兴年年把她选成模范，还选成人民代表。不高兴说她这个啦，那个啦，她也没干什么，为什么要批斗她。唉！……”

母亲没有文化，没有读过书，不识字。我的祖父母，外祖父母都是满族人。所以说我们一家应该是正宗的满族人。他们都经历过清朝。母

亲会说满语。我听着,我偷偷流着泪。母亲说的这一段的后期,也就是抗日战争年代,我十三岁,独自一人离开家,到陕西投考了当时教育部办的所谓战时救助中学。也就是说专门招收日寇占领区的失学儿童。管饭,一年发一身衣服。我的中学就是在这样的学校读完的。当时有一段时间和父母、姐弟没有在一起。

“唉!你姐忠厚,待人好,可现在这社会人心都坏了。你待他好,反过来他说你叫什么来?叫腐蚀。叫你待人坏,可咱们又不会,那就是说成了待人好的人是坏人;待人坏的人反倒成了好人。要都成了这样,那好人还有活路没有?就那么批斗,什么鬼话都说,什么叫批斗?唉,那就是平白无故的侮辱人,都是没有的事,往你头上扣。天天把人欺负到九十点钟才能回家,有时候连饭也不想吃,回来就哭。这好人简直眼看着就没活路。我从清朝活到现在了,日本鬼子怎么样咱们逃难了,不知道,满清都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真没见过这样儿的社会。我怕她想不开,寻了死,扔下孩子怎么办呐?我不怕死,我都活了八十多啦,死很容易,我一头撞到墙上就能死,可我这时候怎么能丢下她呀?我天天给她说宽心话,怕她想不开。……”

听到这里,我也非常难过。从抗日战争逃难,父亲生病,不能工作,就靠姐姐当教师养家。虽然我读大学靠的是奖学金,没有姐姐养家我也不可能念大学,姐姐简直和母亲一样,多方面照顾我们。如今姐姐无端被整,而是因为我这个“右派”弟弟挨整,每次被批斗回来,母亲总是掩饰着内心的痛楚,强作刚强,极力宽慰她,但老人毕竟没有遭遇过这样的打击,姐姐上班后,家里没人时,却又以泪洗面,以致泪腺出了毛病,眼睛老是流泪。谁知道在她们相依为命的苦难关头,全家又被下放。这一步步的悲惨遭遇无疑正是受了我的连累。我真是对他们有愧呀!按道理说,时代在进步,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连罪责自负也作不到?这残酷的株连和封建社会又有多大区别?我要知道有这样几乎要灭门的残酷株连,我真是宁可去死,也不能让我的老母亲和姐姐承受这么大的苦难。现在我只能懊悔,自责。我摘帽子已经十一年了,依然是“摘帽右派”,生活没有出路。不能奉养老母亲。我的老母亲和姐姐何时才

能解脱这残酷的株连？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有过这样严酷的整人手段吗？谁能告诉我？

“三个男孩全下了乡。他们哪儿离开过家？十二岁的孩子，生活上哪能自理？老二在农村有一次救火，光顾拼命钻进火海救火，差点儿烧死。等抬到家，躺在床上看了真吓人，整个脸烧成黑的，头发都没有了。让人揪心不揪心。他们是孩子，他们也有罪？”老母亲讲到这里也流出了眼泪。

十点多钟，姐姐回来了。看到我回来，她很高兴。

我问她：“怎么搞得这么晚？”

“哎呀，天天这样，晚上都要学习、开会。没办法。”

姐匆匆把火炉上的窝头和菜吃了，一边和我说话，一边已经不由自主的打起盹来。我赶快催他们睡觉，明天一早还得起床上班。晚上我久久不能入睡，唉！这真是罪过呀！

第二天早晨大约九点多钟。一位身高体壮的大汉，看样子五十岁左右，提着一个暖瓶走进屋来喊了一声：“大娘。给你一壶开水。”

母亲连声道谢，接着给我介绍：“这是房东老郑。老好人，常关照我们。”一边也给那位大汉介绍：“我的儿子，来看我的。”

我和那位大汉相互客气地招呼。

农民是很直爽的，问我作什么工作，我只得撒了一个谎：“我也正在单位劳动。”那位老郑的方言还比较好懂：“劳动，劳动，好人都日倒得叫你劳动，……你说，这现在叫甚的事？八十多岁的老人和六、七岁的娃娃也弄到这里。这也叫下放？这是甚毬的政策？这是甚毬的领导？他们缺不缺德？他们咋不把他妈下放嘞？我看了这事都气得不行，操他外八辈子祖宗！你说，老人身体没毛病还对付，老人两眼看不见，弄得来，别的不说，这看不见还要整天摆弄火炉子，要失了火咋办？烧了房子咱不怕，咱家房子不少，烧就烧啦。要把老人烧了，出了人命外成了甚事咧？咱这粗人不会说话，我就知道骂这伙狗日的！真是操他们八辈子祖宗也解不了气，这一伙狗日的！……”

母亲说：“老郑是好人，常常给我们送水，送他们收下来的水果。老

郑,别骂他们了,没有用,我也习惯了,我会小心的。”

“他们这事太缺德。你说,教书的老师,你就叫人家教书,娃娃们也不耽误上学,这该干甚就叫人家干甚,这才叫正道儿,你们他娘的吃饱了没事干,非要搞甚甚的斗争,下放。你当他们下放的来,我们也得腾房,要粮食,耽误甚了不知道多少工时。他们好吃好喝没甚事干,日得他外祖宗的!到处害人。这是咱们悄悄说哩,比他娘的日本鬼子还坏,操他八辈祖宗的……”

一边叨唠一边回家抗了一把铁锹出来:“好,你陪老人说说话,咱还得到地里干活。”

母亲笑了笑:“唉,给他们也添了不少麻烦,老郑人不错,常叫他的儿子过来帮忙,有时候还给送水果。我们也不能白要人家帮忙,外甥们有时候从太原来,也给他们带些东西。”

母亲问起我在农场的情况。因为我自被送劳动教养以后,也考虑到连累的问题,我只给妻一人偶尔通信,好久才让妻转给姐姐一封信,一般地也是“平安家信”,不谈我在农场受的“阳罪”,更不谈差一点儿饿死。不愿意让他们为我担心。所以母亲问起,我也是谎称一切都好。

母亲又说起大饥荒的事:“那两年人人都吃不饱,三个男孩(我的三个外甥)都在长身体,每天放学回来我得让他们吃饱,你姐上班,我也得让她吃饱。起先,我少吃,后来我走不动了,还得给一家人作出饭来,实在不行,大家都喝稀的。唉呀,比日本鬼子来了逃难还困难。听说多少人饿死了。咱们总算没饿死。熬过来了。你在监狱吃什么?”

母亲不懂得什么劳动教养,他从清朝、民国到日寇侵华没听说过个什么“劳动教养”,他认为“弄走”就是弄进了监狱。实际上我们受的“行政处分”还真如同监狱。这些都不能讲给他听。

我只好给母亲编故事:“我们那是个农场,农场自己就是种粮食的。倒是也实行了定量,总还能对付的有饭吃。就是劳动的活我没干过,受了几年累。”

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儿进来了:“奶奶,给你拿来几块煤糕(当地人把煤饼叫做煤糕)。”

母亲说：“这是老郑的孩子，十九岁了。”

那小伙儿冲我笑笑。正好他父亲老郑回来，小伙儿回了家。老郑对我说：“看见了吧，那是我小子（当地人把儿子叫小子），起先也想叫他念书，我多干点活儿，将来他也好有点出息。你看这忽子（当地话这阵儿的意思）谁能念书？谁念得书多，就整谁。日得他外祖宗的，世道变了，干脆，在家干活儿，念毬得外（当地话那的意思）书干甚哩！弄得你干什么也灰心丧气，就叫人天天混日子，没法正经过日子。”

母亲说：“父子俩壮劳动力干活儿，老郑老婆管家，他们生活挺好。生活比我们好。”

“他们是甚毬也不懂，还管毬的事太宽，你们在城里教书，他不叫你好好教。你当他们在农村也是瞎毬闹的嘞。该种这哩，他叫你种外，叫你白辛苦半年。赶到收的时候，收毬不了多少。他们没毬事老祸害人，你说这地咋种？”农民老郑端着一碗莽面面条，蹲在院里，一边吃还一边叨唠。

转眼间一周的假期已满。临时工不能请假时间太长，又怕被雇主辞退。住了一周，不得不赶回北京。

人回来了，却总是放不下心来。总是担心母亲在弄火炉时会不会出问题，上厕所时会不会出问题，姐姐那瘦弱的身体，整天劳动，夜间还得学习，这种变相劳改，能不能坚持下来……想起来就不由得只能偷偷流泪，有时不免神思恍惚。

我虽然是木工，单位有了什么其他工种的事也常常找我。有一次，食堂的压面条机出了故障，食堂的王师傅找我去给看看。没想到修好机器试运转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鬼使神差的我竟把手伸进机器，差一点儿把我的一只手压残废。幸亏我在关键时刻，神经反应还算及时，瞬间把手抽出，只是两个指端受了伤，到医院缝了几针。如果把我的右手压残废，那就也不能劳动，也不能写字，今生恐怕要么终生残废，乞讨为生；要么自杀。

越是担心越出问题，姐姐在清徐下放，由于生活不规律，饮食不当，劳动、学习时间过长，突然患了肠梗阻。从乡下辗转换车送到太原

医院,经过诊断,立刻开刀,剖腹切掉一段肠子,才算救了一命。手术后,大夫说:“多危险,再晚来半小时就救不了啦。”

因为身体过分虚弱,出院后怕母亲担心,在太原休养了十天又赶回乡下,带病参加劳动。这份罪遭得太悲惨,让许多旁观者说起来都唏嘘不已。

直到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一家老小在清徐已经下放了一年多了,终于有了要调姐姐回城的消息。政治往往叫人莫名其妙,这整人下乡不知道和林彪事件能有什么关系?把人无端的整了一年,也不给你说出个缘由,还说是组织的关心,才决定给予照顾,调你回城。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伤害他们的同事?他们谁也不给你说清楚。

记得好象是西哲叔本华说过:“人们给同类施加痛苦,并无其他原因,仅仅是出于恶意。在所有的动物中唯有人这么做。”看来动物中的人,也有不如动物的家伙。害人,是这些家伙的本性。

接到姐姐的来信,我和弟弟请假从两地赶赴清徐,雇了一辆卡车,把母亲和小甥女以及他们的行李杂物一道拉到太原。此前,姐姐已经先期回到太原去租房子。抗日战争,我们为了不作亡国奴,毁家逃难。坚持了整整八年。逃过了日本鬼子的伤害。两年前,又毁了一个家,被中国人,被同事下放农村。经过两年,总算熬到头。如今又得重新安一个家。这一毁一安,一毁又一安,又得花费多少?谁管你?他们就是这样的折腾人,往死的折腾你!原因很简单,就是要株连,株连,这残酷而可怕的株连!

折腾完好人,老实人,当然,积极分子们就该升官发财了。真的是:“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纓。”人啊,人,这真叫:看破世事惊破胆,阅透人情伤透心啊!

安置好这个新家,我和弟弟住了几天就分别回了北京和宁夏。

半年后,母亲病重,我赶回探视后过了不久,母亲溘然去世。呵护了我一生,为我受尽了人间悲苦,我没有能尽孝,没有能奉养的母亲去世了。这是我一生最悲痛的事!

沾了尼克松的光

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新约·马太福音

1972年，中美建交。

二十多年来，毛泽东一心想打倒的美帝，一夜之间与中国握手言和了。毛泽东和尼克松成了朋友。这真是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也许是为了制衡赫鲁晓夫所谓“苏修”，自诩代表正统社会主义的毛泽东要和他认为代表资本主义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二人和平交锋，要面对面的讲道。那么，首先就得作些“优势条件”的准备，好亮出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大牌。毛泽东为了显示社会主义没有“失业”，当即作出了一项“临时工转正”的应急政策，并且立刻在北京推行起来。只要在某单位作了一定时间的临时工，工作勤奋，没有出什么问题，经过政治审查就可以转为正式工，也就是可以转成当时所谓的“铁饭碗”。

其实，尼克松根本不可能到一些单位去了解有没有临时工。更不会提出劳工转正的问题。但这项政策却真的戏剧性地随着毛的主观随意性出现了。转正之后，他们终身的生活福利将会有了保证，这给临时工带来了莫大的福音。再也不用过那种吃了今天又愁明天的日子。要不是尼克松来，这些沦为社会底层的临时工想都不会想到居然有“转正”的这一天。都感到这好事似乎是天外飞来。

当时，在我工作的公司有四个临时工。

瓦工李克明，也四十几岁了。原本是科班儿出身的京剧演员。童年就进了京剧的科班儿，学练武生。旧社会的戏班儿，那楞是打出来的。长大以后，没有过了要命的“倒仓”关，只好作了武生教师，有时候也跑跑龙套。曾经在北京的奚啸伯京剧团工作。反右以后，文艺单位大改革，大精简，把他调到武汉京剧学校，教孩子练武打基础功。他比我早来二年，木工瓦工得经常合作，我来了以后，他常到木工房和我聊他的

经历，一提起来他的经历，就满腹牢骚感慨万千：

“我到武汉那时候，正赶上挨饿。……我教学生练功，我不能光耍嘴皮子，起码我也得比划比划吧？嘿，吃不饱饭，这玩艺儿，这他妈怎么练？是不是？”

“亏了我是光棍儿一个，吃饱了全家不饿。这饥荒当时没日子，你哪儿知道多咎完呐？时间一长，把人饿得有点儿急啦。我在武汉大街上带着学生看见卖烤白薯的，管他学生在不在跟前儿，花五块钱买了一块。还他妈没到学校，三两口就给它开啦。没想到这事还惹漏子啦，饶了我挨宰，还叫我检查。你要是给我吃饱喽，我吃那破烤白薯干嘛？是不是？”

再说啦，那地方米多面少，米还全是糙米，你想想，吃不饱还吃不好，这玩艺儿哪行呵。后来实在顶不住了，得！我他妈不干了，卷铺盖卷儿就回了北京。咱哪儿知道和解放前不一样啦，没想到回来以后更操蛋，找不到工作。没法子，人总得吃饭，给人家当小工，卖苦力，给工地抬土。夏天这汗出的，老了去啦。冬天出完汗就挨冻，甭提受的这份儿罪啦，我这一辈子活得，真他姥姥的，罪受大发啦。

“喂，你怎么学的木匠？我瞅你的活儿干得还真可以，这是咱们俩说呐，我这瓦工那就叫“汤泡饭”，反正这公司也没瓦工，你有两下子，还是三下子，谁他妈知道？他们哪儿懂啊，喂！咱们这就叫“蒙事儿”，谁让不给咱们饭吃呢？咱们也他妈不想“蒙事”，你说是不是？……”

我常常默然听他有趣的谈话。我也很同情他的遭遇。他来公司已经二年了，没有政治历史问题。他作为一个科班儿出身的艺人，抛弃了“国粹”的专长，混成了一个瓦工，也不容易，这结局也很悲凉。再说也有二年的工作考验，现在面临“转正”的政治审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他人挺好，我也希望他能转正，好结束他那孤身一人漂泊的生活，组织一个家庭，过正常的生活。

还有一个，刘树江。原本是一个相声演员，当然算不上“著名”。他是一个体重190斤的大胖子，因为太胖，动作自然不太灵活，只好干杂活儿，公司让他烧锅炉。此人为人憨厚，具有说相声的特点，整天嘻嘻哈哈，纯粹是个不管不顾的乐天派。这次转正，政治审查应该也没什么

问题。这也是个老好人。我们相处得也不错。我也祝愿他能转正。再有一个是旧社会沿街打小鼓收破烂儿的,叫朱包。这个人我没有接触,就凭他解放前那份儿穷职业,旧社会生活底层的劳动者,也应该给他转正。

惟独我这个“摘帽右派”,恐怕就成了重点审查对象,而且能不能转正还是个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把这件事看得“有一搭,无一搭”。我知道成千上万的难友一直还在茶淀农场被劳动教养着,前途可以说已经完全绝望了。我已经算幸运者,能回北京作临时工的“摘帽右派”为数极少极少。教训告诉我,凡事要朝最坏处想,不要有任何幻想。能转就转,不能转就还干这临时工。

负责审查“转正”工作的是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商渭清和政工科长张学禄。老张是个有水平,有知识的人,曾经在党校当过老师,办事稳重;人也很和气,偶尔也来和我聊天。有一天他来我的木工房,坦诚地告诉我:“老赵,你原来的工作单位,第二机械工业部1959年就撤销了。那时候你还没有摘帽呢。”

“是的,我知道。”我插话说。

接着他说:“这回临时工转正,你也是公司考虑的,要作一些必要的外调。但你的原单位没有了,那我们就找人吧。我们找到了原来你单位的一个搞人事工作的人,叫杨贵星。你知道此人吧?”

“知道,他是管我们下属学校的人事工作的,我们司人事方面的工作不归他管。管我们的人事部门是干部司干部科。”我给他解释当时的工作关系。

一提到此人,我就想起了他的卑鄙和恶行。

那还是在反右以前。杨是我们司搞人事工作的。但和我们没有工作关系。第二机械工业部教育司的人事关系属于部里的干部司,教育司并没有单独设立一个专管人事的机构。只是让他一人管部属中等专业学校的人事工作。实际上这份工作完全是“虚设”。因为各中专都有自己的人事科,学校的人事调动、安排、晋升、奖惩完全由这个科和校

长、书记来办。根本就用不着部、司来管。学校根本就不上报部、司。因此他也就没有真正实际的工作。他要去了解一下下属某中专的人事情况,学校也不拒绝,学校的人事工作也不主动告诉他。他的工作实际上干也行,不干也行。

他上过小学,从河北曲阳县来。只是一个没文化,能说话的人。写一份便函能撕掉半本便函纸;人能说话这是本能。别人的一点鸡毛蒜皮的事,他能夸张成政治问题;他到四川,借口出差,实际上是去找对象。有个未婚女性愿意和他交朋友,为的是让他帮助她到北京工作,那女人历史上曾参加过三青团,当然不见得有多大问题,但他另有动机,一来就先入为主的拉着他那曲阳腔儿说:“她那是为了打球——儿——,没有事。”他就是:你和我谈恋爱,你有政治问题也就没有了政治问题。这事要搁到别人身上,他会说人家是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整天没事他坐不住。三十大几,快四十了还没结婚(也许是结过又离了)。上班时,经常串办公室,和年轻女同事挤在一起,叽叽咕咕,掐一下,捏一把的。我平时比较严肃,我一走进办公室,他们就散了。有一次,他们散开以后,我说了一句:“这种行为用法律的语言说,是不是应该叫作‘猥亵’?”这话大概有人传给他了。估计他对此话怀恨在心,萌生了报复的念头。

这些女同事并非有心和他厮混,因为他是党支部组织委员,那些年轻人都想入党,要想入党,谁敢得罪组织委员?他也就借着这种特点搞些名堂。我当时使用“猥亵”这一说法也欠妥当、准确。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准确的说法——“性骚扰”。

1956年,我们父辈是朋友而认识的一个女孩,在北京医学院就要毕业,她在一种大概是“社会关系调查表”中填写了我的姓名和工作单位。没想到我去看她时,她告诉我:“学校团组织到你们单位了解你的情况回来说,你政治情况复杂。这是怎么回事?”我当时没法给她解释,因为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政治复杂”了。等到那女孩分配时,一个风华正茂,满怀憧憬,政治清白,高兴得要走向工作的女孩,一下把她分配到黑龙江,离中苏边境不到100里,条件极差的地方。这时候我才感

觉到这事不对头。可能这事和她听说的“我的政治复杂”有关。但我仍然不知道事情的原委,对于这个女孩,多少年我心里一直怀着一份愧疚之情。

后来,我才听人说,他在单位曾经给人说我:“他政治比较复杂,上中学时就和美国人有关。”

那么,“和美国人有关”是怎么回事呢?那是1946年,我读高中的时候。当时的“善后救济总署”给学生发了一批衣服。我班的一位同学领到一件大衣,大衣兜里有一张纸条,用英文写着:“收到衣服请写信给我,我愿意和你作朋友。”后边是通信地址。那位同学是位体育爱好者,英文水平比较差,他把纸条给了我,让我写。后来我就按地址写了一封信去。没想到我在写信时出了一个错,我没有搞清那大衣是女式的,糊里糊涂写了封信去,那位女士认为女大衣必然发给女性,写信者必然是女性,结果又寄来一件女式连衣裙,还要我寄照片去,显然把我误会成了女性。这时候我才知道完全搞错了。此时我要说明自己是男性,岂不成了大笑话?再要转给其他女性,姓名、地址又不相同。这样就无法再回信了,于是再也没有联系。要说这件事根本不是政治问题,然而这位姓杨的来自农村,不要说知识,他连常识也没有,再加他怀有报复性,把这件事说成一种模棱两可,容易使人误会成政治问题的:“他中学时就和美国人有关。”在五十年代,中、美为敌之时,也就会被看作“严重的政治问题。”

按照政治条件,杨贵星是支部组织委员,从政治资本说条件不错,但他的人格道德绝对是个卑鄙恶劣的家伙。你说他政治立场坚定吧,如果一个政治问题严重,但又十分漂亮的女性,只要向他飞去媚眼,他就会完全不考虑政治。你说他工作有水平吧,他小学还没毕业,来自曲阳山区,没见过大场面。但他会利用党员、组织委员的身分干些害人的勾当。他一句话就可以把人害掉,把毫不相干的人害掉!

张学禄一说找到了这个人,我就知道他还得害人。我也就不要再考虑什么转正不转正的事了。

我问张:“这个人现在干什么?”

张说：“在电子工业部下属的一个单位当了人事处副处长。”

果然不错，这种家伙居然也能升官，我对张说：“你们去调查吧，他会告诉你们，这个人不但是“右派”，政治还很复杂，中学时期就和美国人有联系。”

“噢，那是怎么回事？你和美国人是怎么回事？”他好奇地问我。

我把这一档子事一说，他笑了，说：“这简直是笑话，这根本不是什么政治历史问题。”

过了一段时间，老张来了。他说：“杨贵星正患着严重肝炎，他正在住院。我们到医院找到他。让他谈谈你在二机部的情况。他倒没提和美国人联系的事。可是一再教育我们：‘你们必须认识到他是‘右派’，是有严重‘右派’罪行的，你们要给他转正，那可是敌我矛盾，你们就要犯严重的政治错误。你们是党员，就应该以党的政治路线为前提。绝对不应该作没有政治立场的错事。’后来我们说，我们了解的主要是他在二机部的情况。至于转不转正，我们会按党的政策办事。”

然后他还强调说：“你们作人事工作要立场坚定，给‘右派’转正是严重的立场问题，你们要好好考虑。”

我估计他没有再说什么“和美国人联系”的事，是因为正式外调是要再调查的，只要一调查，他编的政治故事就会被拆穿。他只能拿那张不负责任的嘴来咬住“右派”不放来害人。

因为我在这个公司处人比较好，我已经工作了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我的为人大家也看得出来，事后我听说在讨论我的转正问题时，把杨贵星的外调情况谈了以后，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商渭清说：“……这个人是怎么回事，揪住人家不放。人家摘帽子都已经十年了，没再出现问题，你还要人家怎么样？他一个劲说党的政策，给临时工转正也是党的政策嘛，现在我们落实政策就是犯政治错误？可笑不可笑，这个人怎么一点儿与人为善的态度也没有？……”

最后，经过公司有关部门研究讨论，决定批准我从1972年4月开始转为正式工。

我真没有想到我能意外的转为正式工，而且竟然是沾了尼克松的

光。

转正以后，因为工具要公有，我把工具卖给了公司，拿了170元，买了一辆自行车。这一下，我每月拿80元的工资。天天骑车按时上班，今后就不必再担心失业。工人的工作也好，不费脑筋，我也就死心塌地作体力劳动的木工了。

回想我从小读书十六年到参加工作七年，绝对没有想到又能作了鲁班的门徒。苏轼说：“人生识字忧患始”，早知如此，何必十六年寒窗苦读？争了个社会主义第九类人——臭老九。最后还被戴了一个政治帽子——“右派”。唉，人生啊，人生！

转正以后，我每周六下午被安排和公司办公室的干部一道政治学习。李克明和刘树江却免了政治学习这一关。我自然还得谨小慎微，老老实实参加政治学习。

1976年，周恩来去世了。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花圈、小字报、诗词汇成了海洋。还有人聚众演讲。单位离广场很近，骑车6、7分钟可到，我去匆匆看了一下，觉得气氛不对，显然那气氛是捧周抑毛，我预感到又要出事。作为摘帽“右派”，最好不要参与这类事情，特别是四人帮当政的时候。赶快回来呆在我的木工房。

我正在作一件工具，办公室主任吴士孝来了，吴是解放前夕辅仁大学社会系毕业参加工作的。他一进门就说：“走，别干啦，到天安门广场看看去。”

我心里直含糊：“我不去，你叫别人去好吧。”

他笑着说：“你说，我找谁去？”

“公司人多啦，随便找一个。”

“喂——，你就走吧。”他还一个劲儿叫我走。

“我，我这些事一般不参与。”我给他说实话了。

“老赵，咱们处了有四、五年了。我知道你是好人，你那点儿事我也知道，我从来没把你当给你扣的帽子那样看，（这公司的头头也愿意和我接近，但又有点顾虑，我常常被当作一种‘中性人’，既不当工人看，又不当干部看）你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老吴绝不是害人的

人。走吧！”

他这一说，我有些不好意思，但我还是不打算去：“公司那么多人，你就随便找一个好了。”

“嗨，你还不相信我，我给你说吧，我找你是为了咱们一边看，一边还可以议论议论，哪个诗好啦，哪个词合不合词牌啦，有兴致。别人能聊这个吗？”

“实在说，我也不是学文学的，我也不懂那些。公司那么多人找谁不行？”我还是不想去。

“这么着吧，有了任何事我负责，顶多开除我党籍，绝不给你带来麻烦。这行吧？”

我实在不好再推了，就和他一道去了天安门。我们在那花圈和诗的海洋里看了三个多小时，对一些诗也作了一些谨慎的评论，但我心中有数，说话还是有分寸的。绝对不能忘却自己的“摘帽右派”身份。

几天之后，上边就传达下来，（当时正是四人帮当政）天安门的悼念活动已经定性成“反革命事件”。去过天安门的由各科室登记上报公司。我心里直埋怨老吴，作为摘帽“右派”，我实在不想招来任何麻烦。我只想就作一个体力劳动的木工，现在有了“铁饭碗”，就无声无息地过我的后半生，不要再出政治问题也就完了。

那一天在办公室开学习会。老吴作为办公室主任，对大家宣布：

“大家注意了，咱们办公室这些人，前两天谁去天安门看那些花圈、诗词，听演讲的，来登个记。这是上边布置的。我反正去了，咱们这儿也就老赵没去。你们去的就登记。”

哎呀，没想到这老吴居然来了这么一手。他这一来，打消了我的顾虑。

紧接着天安门被清了场，四人帮下令：天安门左近的每个单位都抽出若干人，每人发几个面包，一根木棍，埋伏在中山公园和泰庙，一旦有人再献花圈，就立即出去阻止。这拿棍子阻止，分明是去作四人帮的“打手”，要去打再献花圈的群众。

总务科的党小组长梁桂秋来到木工房，他说：“老赵，走，领一份面

包,到劳动人民文化宫。”

他不会糊涂了吧?这种事怎么能找“摘帽右派”去呢?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说好,嗫嚅了一阵才说:“我,我不能去。”

“不干了!有什么活儿也不干了,走!”他还直催我。

我干脆给他挑明了:“这种事你不该叫一个‘摘帽右派’去,再说我也不能参加这类政治活动。”

“摘了帽子就不是右派了,摘了还算右派,那还给人家摘帽干什么?再说啦,你现在是正式工作人员,你怕什么?”

看来这位老梁虽是党员,政治上也有些糊涂,他全然不考虑“阶级立场”。我进一步给他说明:“这种事应该是党员积极分子才能去的,你怎么能让我去呢?你不要忘了我是‘摘帽右派’。”

“既然给人家摘了帽子,就不能再说人家是什么‘摘帽右派’,我既然叫你去,一切我负责。有任何责任由我来承担,走,我负责,走,……”

我实在不好再推,只好跟着他,领了一份面包,还有一根木棍,和一帮人去了泰庙(劳动人民文化宫)。

从早上去,一直蹲到下午,我一直心里犯嘀咕:“这真要有群众来献花圈,这帮人拿着棍子出去,我绝对不能干‘武斗’的蠢事,这……”

多亏再没人来献花圈,也没发生其他问题。唉,这也叫作:作人难,作“摘帽右派”更难。

转正之后,久悬在心的一件事是:我一直没有忘记救我于炼狱的老张队长。要不是他把我作为病号送回来,毫无疑问我还得留在茶淀,说不定现在早已命丧黄泉了。我几次想买一箱香烟去探望他,(我知道他的嗜好是香烟)。但是,我考虑再四,没有敢去。倒不是我怕什么,而是我怕给他带去麻烦。

根据政治常规,我如果去看他,不见得会对我作出什么处理。倒是很可能给他造成问题。比如说:

“为什么一个离开农场的右派`会来看你?”

“你们是什么关系?”

“你作为公安干部,和这个在农场劳教过的右派,到底是什么关

系？”

“他离开农场十年多了，为什么要来看你？”

“为什么单看你不上看望别人？”

.....

共产党的政治审查和无端猜疑我领教得太多了。考虑再再，我没有敢去，但这也是我留在心底的一件永远难忘的憾事。我只能默默地祝福老张队长，希望他工作顺当，健康长寿！

新词儿——“改正”

人间没有永恒的夜晚,世界没有永恒的冬天。

——艾青

1978年4月份,经历了漫长的二十一年艰辛苦难和生关死劫的“右派分子”群体,终于听说有一个中央批复五部《关于摘掉全部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的通知,也就是中发[1978]11号文件。文件中有这样一段话:“从1957年到1964年,遵照毛主席提出的关于分期分批摘掉改好了的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先后五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还没有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右派分子,经过长期的改造,大多数人有了转变,表现较好。现在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是必要的……”从这一段话里我感到时间概念有点不对。1957年还正在打右派,不可能没打完就处理。1958年才开始处理右派,实际上也不可能刚给右派戴上帽子就摘。这里应该是1959年到1964年。从这一点看,此事确也拖得时间太长了,以至这五部写文件的人的时间概念也糊涂了。

对于这近百万的“右派分子”,经过二十一年的苦难经历,如今才当真要“摘帽子”了,回想这漫长岁月的政治歧视,对“右派分子”的伤害,不由得使我感慨万千。前苏联作家亚·索尔仁尼琴在举世闻名的“古拉格群岛”的地狱度过了十一年的光阴,而中国的思想囚徒却比索氏多一倍的苦难煎熬。这二十一年虽说是“行政处分”,却大大超过了刑事犯罪的“最高刑期”,使“右派分子”们承受了不能承受之政治迫害,乃至于多少人已经被冤屈而丢掉了性命。亲属被株连者何止数百万。尽管死掉的人有多少万,这些恐怕都将是不了了之的事了。这个反右运动的始作俑者虽然西去,其左祸遗毒依然浓重,活下来的“右派分子”只不过获得一些正直的人给予“不幸”的些微同情。没有任何人承担道义和法律的责任。党能发明一个新词汇——“改正”,给这些人“改正”,只能证明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右派分子”恐怕只有到阎王老头那儿去找责任人了。文件的口气霸气依旧。哪里是把事情搞“扩大

化”了的“搞错者”，依然是“专政者”对“被专政者”的居高临下的气势。过去批判过的：“宁可错杀 1000，也不漏掉一个”的反动思想不对了，我们现在是，说百分之百错太丢脸，编造出五个‘右派’，给世人捏造一个：“宁可错打二十万，也不放过一个”的说法，“错了”错得有理。“改正”也使用得有理。人民信不信，反正话说一千遍你们就得相信，不行，我有权再说一万遍，这作法管他是马列主义的还是什么戈倍尔的，你不信也得信！

实在说，如果共产党内没有胡耀邦这位大智大勇者，恐怕也没有冤、假、错案的平反和“改正”。党内左势仍然是主力。那些当年在运动中培养起来的所谓“积极分子”们，二十一年已经擢升了不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被重用升官，获得优厚的待遇，在物质生活上高于常人。他们的价值天平，良心一端已空无一物。“伤天害理”在他们看来属于封建思想，不值一顾。他们醉心享受自己用“积极”和“左祸”换来的幸福美好生活。打心眼儿里他们对给“右派”“改正”，不是积极的。

就 1978——1980 年那种“早期改革开放”的情况下，他们的子女已经有不少人去到不同资本主义国家去寻求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去了。而“右派分子”的子女和家属才刚刚给予了人民的“待遇”。他们大都沦入了社会底层。株连的家属在工作、地区、生活、待遇诸方面的伤害已经形成，再也无法改变了。那些“左先生”们，这些年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有权，有钱，有势的上层“阶级”，和政治上受到迫害，其本人和家庭成员大都被发落到边远地区，艰苦地区，作着下层工作的底层“阶级”。似乎这就是社会阶级关系的新构成。那些作恶的人倒比说良心话的人得到了承认，这也是一种新的社会道德进步吧。

一批水平极低，思想左倾的干部，真正实际的工作干不了多少，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在党和领袖的庇护下，作了不少有损党的政策的事，由此也就伤害了许多好人。另一方面，他们很满足于“积极”换来的，职位大大超过他们能力的“升迁”。而真正胜任与否没有人去理会，小学水平荣任厅级干部，高中水平，荣任大学副校长，初师水平荣任副省级干部。说起来这种事在中国也不算新鲜，记得清朝的李鸿章说过

一句话：“世上最好作的事就是作官，如果一个人连官也不会作，那这个人就太没用了。”1950年，陈寅恪先生在他所写的《元白诗笺证稿》中有一段话：“……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气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我想，也许任何社会也脱不开这个规律。

其实，党内也有一些开明的人。在“改正”政策下达时，国务院参事、原人民大学党委委员、常委李逸三1980年11月20日写给胡耀邦的信中有如下一段话：

“……划葛佩琦右派我是举过手的，我们作了多少祸国殃民的事，大家都平安无事。

……目前流行一种说法：“当时有右派，我们搞反右派运动还是正确的；其中问题是反右扩大化。”我现在认为：57年反右运动，是我们党内左倾社会主义路线的产物，它的性质和文化革命同一性质，是祸国殃民的大错。

当时的阴谋是“请党外帮助党内整风”，阳谋是“引蛇出洞”。实践已经证明，55万多“毒蛇”里，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是冤、假、错案，万分之一是“右派”。

留这万分之一的尾巴，我看不能给我们增加光彩，相反，后辈人会耻笑我们拖泥带水。

反右派运动本身是错误的，保留万分之一左右的“右派”帽子，作用不大，意义不多，我建议来个一风吹，彻底翻。

这位李逸三老人后来还亲自找到人民大学的“右派分子”葛佩琦。在葛四处碰壁，对于“改正”绝望的时候，他告诉了葛，胡耀邦家的地址，帮助葛找到胡耀邦，使得葛得以获得“改正”。

可惜，党内这样开明的老人太少了。

截至中共中央中发[1978]55号文件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文件下达时，欺凌摘帽右派的事仍在发生着，中科院电子所的难友韩大钧是1963年已经摘帽的“摘帽右派”，还继续在劳改农场劳改。1978年请假

回京探亲,正赶上中发[1978]55号文件下发,公安部三十多个右派全部改正的消息已见诸报端,他想等等看文件的精神和情况,假期过了五天,他所在的山西永济县伍姓湖劳改农场就迫不及待地派人,带着手铐来抓他。罪名是“摘帽右派”逾期不归。这就是已经摘了帽子的右派的待遇。所以这一次所谓“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我想应该是针对“未摘帽右派”的,但对“摘帽右派”也同样含有“真正”摘帽的意思。以前的摘帽子,恐怕并没有实际意义,搞不清是谁骗“右派”?

“左”病的根深蒂固,给“右派”的真正改正,以及以后留下了不少难于想象的伤害。

我在《书屋》杂志上看到一位雷池月先生的文章,文章说,他被改正后,要求进步,入了党。鉴于他的工作能力,单位决定提拔他担任某个职务。材料报到组织部门,组织部门的答复说:“由于该同志有政治历史问题(即曾被错划过“右派”),不同意……。“这真是一个叫人啼笑皆非的现象。这也反映了”左”病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是如何的严重。

1978年落实改正政策时,有位朋友董荫嘉,他当年在北京工业学院工作,那是属于第二机械工业部的学院。我们在反右运动之前因工作关系就认识,该校就是个“左”的窝子。按照政策规定,他是“保留公职”的,应该回原单位工作,但那个学院就是不要他回去,而且不管他的工作安排问题。后来是北京高教局出面安排了他的工作。就有这种“左”的堡垒,中央的政策都拿不下来

中共中央55号文件的附录中说:“不补发工资”!好,二十一年了,这笔账不太好算。按照马克思关于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理论,我们二十一年在农场付出的劳动是每天12小时,乃至14小时。而我们的月工资是不足三十元。也就是说每天不足一元。这一元的价值,我们劳动三小时就会创造出来。而每天另外的九到十一小时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按二十一年计算下来就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这一部分价值被标榜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给剥削走了,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你们是不是双手沾满了鲜血?

现在证明我们是冤屈了,是被搞错了。是被“扩大化”了。既然是整

错了,那么这二十一年中我们自己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谁拿去了?只有剥削阶级才会剥削工人(包括农工)的剩余劳动。那么我们被剥削的那么多剩余劳力产生的价值,被谁贪污了?那的确是我们的血汗啊!谁能解释清楚这个问题?能向谁去领教?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中第二条规定:“……可以酌量扣出其一部分工资,作为其家属赡养费或者本人安家立业的储备金。”经过二十一年积累的这笔赡养费和储备金哪儿去了?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发的文件还算不算数?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还有没有一点信誉和严肃性?难道国务院也骗人?我们找谁去说理去呢?

作为一个以马克思理论和思想为宗旨的政党,对这件事总得有个合乎马克思主义政党身份的说法吧?

在落实右派政策的前后,<人民日报>接连发表了一些与其1957年大吹反右号角截然不同的文章。1980年初,它在一篇文章中说:“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向党争夺领导权,而是党不善于领导(在一个时期内,甚至是粗暴打击)知识分子。”

就连1957—1958年猛力批判马寅初先生1957年3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的“控制人口”的建议,后来进一步诬蔑为“马尔萨斯新人口论”,也逐渐变成了:“计划生育是毛泽东人口思想上的核心,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创举。”这变化简直令人头晕目眩。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不知道讲这些话的人知不知道中国有“无耻”二字?

在后来的许多经济、文教、科技、政策中,实际上有许多是当年“右派分子”的主张和意见。那些被改造了二十一年的“右派”,目睹着这些情景,不免傻呆呆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

许许多多的问题足够人无休止地去思索。有些问题永远也搞不清楚。

1978年时,尽管中发[1978]55号文件对“改正”政策阐述得比较清楚,然而,“右派分子”群体经受了过多的苦难教训,一时间,敢于主动“申诉”的恐怕是寥若晨星。谁都怕再坠入又一个“阳谋”。不知道这算

不算：“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大部分人都是观望的态度，不敢贸然去“申请”。

有一天，我在长安街（当时我的工作单位位于西长安街，在热闹的西单十字路口附近）居然遇到了几位难友。好多年来，由于我们这种身份，没有敢和任何一位难友有过联系。现在虽然彼此离开时隔十七年，一见面就如同老朋友重逢一样，互相热情地握起手来。此时，我才知道我还算是幸运者。1961年我就回到北京，而且落下了户口。1972年又成了“铁饭碗”的正式“工人阶级”。不管怎样，每月还有80元的收入。而和我同在一起度过三年生死时光的徐鸣珂（原来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作编审工作），二十一年后，尽管老家早就没有亲人了，却也把他发落到农村。村里把他孤身一人安置住在一间四面透风的破烂不堪的破庙里，用麦秸搭个地铺，捡些土坯围着就算张床。没有门，不分冬夏就挂一个稻草帘子。房顶的一角还露着天。每逢下雨、雪，他就得东躲西闪瑟缩在一个偏高的角落里忍受着。过着一种难于想象的日子。他听到“改正”的消息，倾其所有买了火车票，怀着满腔希望来了北京。过了不久，他的兜儿就像熨斗熨了一样地瘪了。安徽实在太穷了，凭他的劳动力，一年出满勤，扣除了粮草钱，一年下来也就能挣二、三十元，买点衣服、鞋子，还能剩多少钱呢？

我把他领到我的单位，从食堂买了两份饭，坐在我独自占用的“木工房”里，一边吃，一边讲起了这许多年来各自的苦难遭遇……。我知道他口袋里已经几乎一文不名了，我让他每天中午到我单位吃饭。并且劝他一定要坚持不懈的找单位，不然，他是回不来的。（后来他终于回到原单位中央编译局工作。）

听说当时负责处理右派“改正”工作的是中央统战部。统战部离我的单位很近，第二天我们约好早上九点，到统战部去看看。一进统战部所在的府右街口，就看见那里排着长长的队伍，传达室门口聚集了許多人。赶快走过去向那些人打听，才知道确有给右派“改正”的事。既然这么多的人来这里“申请”改正，那我们何不也去试试？

我迟疑了一会儿，慢慢走进统战部传达室。我向一位负责接待的

人说：

“我是原来 1958 年时候的第二机械工业部划了“右派”处理的。1959 年二机部整个儿撤销了，像我这情况应该找谁？”

接待的那个人很客气，他说：“那就找他的上级。他的上级就是国务院。”

“国务院？那我怎么去找？”我为难地嗫嚅着说。

“嗨，那当然是找国务院啰，我给你开介绍信。”一边说，他一边拿出一本印好格式的本子，撕下来一张，填好了介绍内容和国务院人事局的地址，递给我。

我感到很意外，没想到事情会如此的顺利。我拿着介绍信匆匆离开，赶回单位。吃过午饭，就骑车直奔北河沿儿大街。等到到了那里，我才发现，那就是原来二机部没搬到三里河四部一会大楼之前的老办公楼。一进大门，就看见 1955 年我所在的办公室的绿色窗户，一直没有整新，还是老样子。那大院我很熟悉，向左一拐，就找到了国务院人事局。

一位姓 S 的同志接待了我。那时候还没有人去国务院人事局办给“右派”摘帽子的事，只有我一个人。我把统战部的介绍信递给他，S 同志看过信以后，谈话很客气。他微笑着说：“二十一年了，吃苦了。你是不是先写一个‘申请’，说明当年是因为什么问题被划成了右派，现在要求给予‘改正’……”

实在说，我对写“申请”有我的看法。

所以，他一让我写“申请”，我就赶忙把我带去的一个笔记本拿出来，对他说：

“我是不是先不写‘申请’，我的问题就是三张大字报。今天我把保留下来的底稿带来了，请你先审阅一下，看我能不能‘改正’？”

他笑一笑，说：“我来看看。”

于是，我把抄写了当年三张大字报的笔记本递给他。就在它看我的笔记本时，不由得头脑里闪出一连串的想法：共产党呀，共产党，在毛泽东教育下，怎么你们总是政治强权，居高临下？给“右派”改正，是

共产党给“右派”改,并不是“右派”要求改。为什么要给“右派”改?错了的事才有改,不管你是扩大化还是别的,是你错了,怎么叫受害人还得‘申请’来再请求你改错?这难道不是起码的思维逻辑混乱?这难道不是进一步‘不讲理’?”我一边想着,一边准备在他提出要我写“申请”时打算和他辩论一番。

他大概看了十几分钟,抬起头来笑着对我说:“改正,改正,改正,你这问题,我认为百分之百应该给你改正。没问题,百分之百。不过,我实实在在告诉你,11号文件虽然发了,现在上边意见还有分歧,今天你先回去,一旦上边意见统一了,我打电话通知你。你把你的电话告诉我。”正好,他压根儿没再提“申请”的事。

我把我的电话号码写在他的记事本上以后,他对我‘说:“你就等好消息吧,分歧很快就会统一,我很快就会给你打电话。”

这位S同志不但客气,还很热情,他微笑着把我送到办公室门口,和我握握手,还说:“就那么点事,受害二十多年,吃了那么多年苦,现在总算有了出头之日了。好,回去等着吧!”

我向他道谢之后,骑车回了单位,这些事我没有向任何人提起。

过了两天,我又去统战部门口观察,这一阵儿人更多了。在人群中,我看到了几个难友。北大俄语系助教刘佐汉、冶金工业部翻译阎希智、北师大讲师吴士俄、建筑研究院的李邕光……大家相遇,除了简单谈谈这些年来的经历,主要是交流关于“改正”的信息。

过了几天,国务院人事局的S同志给我打来电话,让我去一趟人事局。

我接完电话,当即骑车去了国务院人事局。一路上我还想着,他要让我写“申请”,我是得和他辩论辩论。进到他的办公室,他热情地走过来对我说:“好,现在可以正式解决你的问题了。中央55号文件已经明确了一些新的精神。行啦,你也不必写申诉了,你现在工作单位的书记叫什么名字?他的电话号码是多少?你给我写下来就行了。你回去等好消息吧!放心吧,你的问题很快就会解决的。”

临走时,他还送我到办公室门外,热情地说:“不容易,吃了那么多

年苦，总算盼到解决问题的的时候了。”

我再次向他道别、感谢。心里还庆幸没有写那个什么“申请书”！

大概我走后不久，他就给公司的书记雷斌打了电话。第二天一上班，我刚到办公室坐下来，雷斌书记走进来对我说：

“老赵，你去找过国务院啦？”

“是啊，我去找了国务院人事局了。现在中央已经发了关于给右派落实改正政策的文件，我原来工作的第二机械部撤销了，统战部给我开了介绍信，让我找国务院人事局，我昨天去找过人事局。有什么事吗？”我回答道。

雷斌书记笑笑，说：“国务院的同志来了个电话，可落实政策是件大事，你能不能让他给咱公司来个书面的东西？”

我立刻说：“可以，可以。下午我就去一趟。”

雷斌书记刚走出办公室，一位年轻同事小马说：“老雷头没什么水平，没准儿他还怀疑你是不是叫朋友冒充国务院，给他来电话蒙他呢。他丫也不看报，公安部的右派全落实的消息，《人民日报》都登了，白纸黑字，清清楚楚，这还有假是怎么着？没水平，小心眼儿，瞎嘀咕！”

“哎，哎，别那么说，还是有个书面的东西好，可以作为办事的依据。这没有什么难的，下午我就去一趟。”我赶忙给小马解释，免得这楞小伙子再说出什么出格的话来。

下午，我又去了国务院人事局。我把雷斌书记的意见告诉了S同志，请他给出具一份书面材料。

S同志很干脆的说：“那没问题，你回去吧，我很快通过文件渠道给你单位发去。”从上次打电话的事，我估计他办事一定会很快的。

仅仅过了两天，我正在行政科办公室，出口科一位科长李岫，他是党委委员之一，笑咪咪地站在门口向我招手：“来一下，来一下。”

还没有等我走出去，他又走了进来，满脸高兴的对我说：“老赵，这一回我可看得清清楚楚，盖着带国徽的国务院大印的文件来了。雷老头（书记）正召集我们开会，研究给你落实政策的事。我借口上厕所，出来先给你透个信儿，有盼儿啦，很快就给你落实。”

我所在的公司——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北京分公司，是反右以后成立的。年轻人比较多，文化革命后期我到公司作木工。无论我穿什么样的，多破烂的工作服，别人也能看出我不是地地道道的木工。许多人总到我的木工房和我聊天。连政工科的几个同志也是我那木工房的常客。我知道他们对我是同情、善意的。所以我和许多人都相处得挺好。后来，我属于公司办公室管，政治学习就和公司办公室的同志在一起学。

就在落实“改正”政策的当儿，原来二机部划我右派的书记梁心明给我来了一封信。其时，他理所当然的已经擢升了，担任了郑州市委统战部长。接到信，我忍不住失笑起来，中国有些事实在微妙。1958年反右前，我们司有位会计陈金耀。他爱人在一机部工作。她是广东人，家里有亲戚在香港。其实广东人在香港有亲戚极为普遍，也是非常正常的。我们的这位书记就说人家：“他爱人有港澳关系，属于内控使用，陈也不适于在我们国防工业部门工作。”再加反右前陈说了几句实话，不久，陈就被调到江西工作了。还极为恶劣地通知一机部把陈的爱人也调走。

没想到这种见有香港亲戚的，就认为是不可靠分子、海外特嫌的人就要收拾人家的“左棍”，国民党时代他是特务组织“蓝衣社”的成员，共产党时期他又是支部书记，每次政治运动的杀手。如今摇身一变，竟然当上了统战部长了，又要蒙统战对象了。唉，滑稽呀，滑稽。万一他左病一犯，那些统战对象被他当作不可靠分子、海外特嫌，又想过过整人瘾，那不是又热闹了吗？唉，唉，天晓得？

他的信里是这样说的：

“……当时我不主张把你划成右派，他们一定要划，后来就划了。现在既然落实了政策，希望你能发挥你的才能，为党工作……。至于你的工资少了一级，我给你单位写了一份证明，你可以转交组织。……”

他抬出一个“他们”这无所指的第三人称代词，就把当年的事推得一干二净。说不定这几句骗人的话，也是在共产党政策下不得不编的鬼话。把六个人害得二十一年吃尽了非人的苦难，在他眼里若无其事，

随口就能编出骗人的鬼话来。

不久,原来处理我的副司长王万春也来了信,这个嘴边经常挂着“妈勒个B”的副司长,在二机部撤销时,听说把小保姆的肚子给搞大了,耽搁了一段新上任的时间,最后大概小保姆的肚子算“小节”,反右的功勋卓著,还是荣升为吉林省经济委员会主任。他的来信大意是:

“……在落实右派政策中,其他同志我都打听到了,一直没有打听到你。现在才知道了你的情况。我感到很对不起你。二机部已经撤销了,如果你在那里安排工作不满意,欢迎你来我这里,我会给你安排你满意的工作……”

这位当年一听见提意见,就想拿机关枪嘟嘟对方的军人出身的副司长,现在已是副省级干部,在中央落实政策的感召下,也许他对二十一年前的作法,当真有了一点愧疚之心,说不定是受到良心的谴责而真的有了一丝愧怍吧?

同时,我对他担任经委主任总觉得有点不可思议,那比较含糊的教育工作还不懂,怎么去作经济工作?难道用“妈勒个B”也能领导经济工作?噢,还得用李鸿章的话去解释:“世界上最好作的事就是作官。”他大概没想到,我这个落魄的“改正右派”打心眼儿里看不起他那个“妈勒个B”的混事的家伙。我怎么会投奔他去?真是笑话!

说实话,我真搞不清他们的这些看来有点愧疚的话是真是假。亚里士多德有句至里名言:“人们为善的道路只有一条,作恶的道路可以有許多条。”唉,人呀,人!这人太复杂了。

两天之后,政工科通知我,已经决定分配我去作进口工作。唉,二十一年了,我从干部到右派,从右派又到农工,从农工又成了工人,如今又成了干部。仔细想想,不由得想起苏轼的诗:

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
何用草书夸神速;开卷惆怅令人愁。

我作木工倒换过几个地方,最后落在这个公司已经作木工一十三年了。为了纪念这个时间,我自己给我刻了一枚闲章,叫做:“鲁班门下十三年”。这枚闲章将会伴我终生,永远铭记。

在这个公司十几年来,和一些年轻同志相处比较好,在我恢复工作后,他们执意要为我“祝贺”一下。我也愿意表示这许多年来,在我作为“摘帽右派”第五类人的这许多年里,他们给予我的是真诚的友谊而表示感谢。有一天,我拿钱,由张玉卿筹划,在西长安街,北京比较好的“鸿宾楼饭庄”,十个人高高兴兴聚餐一顿。

几天之后,我下班回家,有三个人在家里等我。看我一进门,有一个年纪大的对我说:

“赵文滔同志吧? 嗷呀,总算找到你了。”

我不认识这三个人,不由得好奇地回问:“你们是哪儿的?”

“我们是五机部的,中央责成原二机部右派落实‘改正’政策,由五机部具体办理。咱们找你好久了,总算找到了。以前二机部对你的错误处理,我们向你道歉。不要计较了,回部里来吧。”

这时,我才搞清楚来人是给我落实政策的,我说:“我已经有人给落实政策了,我不回去了。”

来人似乎有点着急:“嗷嗷,老赵同志,请不要计较以前的事了,还是回去吧。级别,房子一些问题都好解决,还是回去吧。”

“我现在工作的单位已经给我落实了,我不想回去。”我确实不想再到那什么保密的国防工业部门工作。那里讲究政治条件,大部分是党员,除了一些技术人员以外,都是所谓政治条件好的。而这些人政治条件好,文化、道德、品质方面实在不敢恭维。我原来的副司长是位上过两年师范的文化水平,工作能力极差,干出过把小裸姆肚子搞大的勾当。支部书记当过国民党特务(他自己说的)。组织委员成天搞些“性骚扰”的坏事。这些人又是积极分子,政治上可以整人。能够容纳这类人作骨干的单位,那就可想而知了。我怎么还能再回这种环境里去工作呢?

“不管怎么样,我们也得先给你落实政策呀!”

“这里已经给我落实完了”。

“咱们这是中央规定专门落实原二机部政策的单位,现单位是现单位,那我们也得给你落实政策。将来落实的文件还得给你现单位一

份。喂,我说,老赵,还是回部里吧,你回来什么手续都给你办好,别计较了,还是回来吧。”

我一百个不想再和那劳什子军工部门打交道,我说:“你们回去该办什么办什么吧,将来把你们搞出来的“改正书”发给我现在工作的单位一份就行了。”

“老赵,老赵,这两天你抽空来一趟……”

‘好,好,好“

送走了这几个人,我知道他们是原二机部下属业务局调上来新成立了五机部,他们对原来二机部的事可以说一无所知。反正这里已经给我安排了工作,我也就懒得再去那国防工业单位了。此后再也没理他们。

我已经正式上班了。有一天难友阎希智找我来。他焦急又气愤地告诉我他的“改正“情况。

就在我们纷纷找原单位落实“改正”政策的时候,阎希智也去找他的原单位——冶金工业部。没想到冶金工业部“摘帽办”查完资料对他说:

“名单没有你,你不是右派。”

“我不是右派,你们凭什么送我劳动教养二十一年?!”阎希智简直气坏了。

“这个,这个不知道,名单没有你的名字呀!”

“你们谁给我定的右派?”

“这个,我们搞不清楚,这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我们调到这儿工作还没五年,这,这实在是搞不清楚。”那个工作人员给阎希智也解释不清楚。

正在吵吵的时候,从里边出来一位大概是负责人:“老阎同志,请你谅解,二十多年时间太长了,我们都不了解当时的具体情况,这样吧,我们立即请示领导,明天上午你来,我们好给你个答复,今天请先回去吧。”

阎希智第二天去,冶金工业部“摘帽办”说:“对不起,名单确实没

有你。经过研究，我们决定先给你安排工作，先解决工作、生活问题，然后再查。”

老阎身上也快一文不明了，只好先答应下来。当天就分配他到该部一个研究所去作翻译。

几个月后，老阎结婚了，带着夫人来我家。问起他究竟算怎么回事。他确实没定成“右派”，但也劳动教养了二十一年，谁的责任查不清，也没法查，这可真是一档荒唐事！但这笔账怎么算？和谁算？这反右运动中真是有算不清的千千万万的问题！

罪恶的档案

当人是善时，他比善还坏。

——泰戈尔

1978年，全国都在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时，弟弟突然从宁夏银川来了。往常他来之时，总会先写信来，或者打电话来，这一次的来到，感到有点意外。他一走进家来我不由得好奇地问他：“你怎么突然来了？”

他笑笑说：“我也来落实政策来了。”

我一时不解的说：“你落实什么政策？”

“唉，听我慢慢道来吧。”

他洗完脸，坐下来，我给他沏好一杯茶，我们慢慢谈了起来。

弟弟1936年出生，一岁多就赶上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七·七事变”。一家老小尽管经济困难，也不甘心作亡国奴。那时候，全家人带着他逃难，坐火车，乘马车，父亲背着他，全家从山西的太原爬山涉水跑到晋西南的山区，他可以说是在国难的战火中长大。抗战八年，他从一岁成长到九岁。1945年日寇投降，他随父母姐姐到了山西太原，就读于太原新道街小学。1949年太原解放，他小学毕业，考入太原中学（后改为太原五中）。1955年高中毕业后考入天津大学五年制机械系。按照共产党的说法，他应该是百分之百的“政治历史清白。”

就在他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1957年，我被打成了“右派”。根据共产党的株连政策，他必然要被给予政治歧视和牵连。1960年他毕业。尽管毕业前北京已经有单位要他，但他已经成了右派的弟弟，自然要半明半暗地惩处他，把他分配到偏远艰苦的大西北——宁夏工学院去教书。

这个学校估计是大跃进的产物，对付了没有两年就“下马”了。把他又分配在拖拉机配件厂。

弟弟找了个妻子是从上海大学毕业分配到宁夏的，担任中学教

师。后来生了孩子，两人都上班，在宁夏当地没有抚养条件，只好把孩子放在上海岳母家。每年寒暑假，都要从大西北回上海，不远万里去看孩子。六十年代两人的工资除了必须的生活费，积攒的余钱可以说全部作为车费送给了铁道部，一年年疲于奔命。

一直捱到落实政策的年份——1978年，那时候他的妻子在苏州工作，单位也讲起了对职工“两地分居”的“照顾”。他在那里整整工作了十八年，属于“照顾”之列。单位和江苏人事厅及几个单位联系，帮助他和在苏州工作的妻子团聚。

联系的公函发去，说明他是1960年，天津大学五年制机械系毕业，对方几个单位立即来信表示要人。但把档案寄去之后，却又回信说“不好安排”。一连联系了几个单位都是如此。弟弟心中好生纳闷：“哥哥的‘右派’已经改正了，这株连还要连到几时？”

他们厂长和他关系不错，看到这连连的诧异结果，有一天，他终于找弟弟说明了底细：

“老赵，你看这联系的结果实在使人失望。咱们相处十几年了，我了解你，你是个好人的，业务能力强，为人正派。但不知道怎么搞的，有些事厂里和你大概都想不到，今天我把情况全部告诉你吧。”

“公函一去，都表示立即要人，档案一去，又变成‘不好安排’这其中是有原因的。因为你档案里有一份属于‘未查清的问题’的材料。关于档案制度和规定可能你不太清楚。不管你是什么问题，只要已经查清楚就好办，就怕有没查清的问题，悬在那里，搞不清楚。”

这是一份什么材料呢？是盖着[中共第二机械工业部教育司支部]印章，发给天津大学的信，内容是：

……我司工作人员赵文滔系反革命分子，X月X日其妻田滨曾去你校看望赵弟赵文浩。当时我公安人员尾随田到你校，因为距离不便太近，他们谈了些什么未听清楚，希望你们对赵文浩严加注意……

我们曾经仔细研究过这份材料，虽然他把情况说得如同反特小说，实际上它没有真实内容。可以说它是一封诬陷信。为什么这样说

呢？

第一，我们正式通过组织关系调查了你哥的情况。首先他不是‘反革命’，没有‘反革命’的结论。他是右派，61年就摘了帽子。72年已经被转为正式职工。现在又落实了改正政策。完全不是这封信所说的情况。

第二，你嫂不是右派，也不是反革命，她去天津大学去看你，完全是她的自由，是正常亲属看望，不可能公安尾随。再说如果公安部门已经立案，进行尾随，也不会告诉二机部教育司支部。

第三，至于他们怎么知道你嫂去天津大学去看你，这就不知道了。

第四，这份文件的发出不符合规定。按照文件往来的规定，第二机械工业部对外发文，只能用[第二机械工业部]或者[第二机械工业部党委]的名义。[中共二机部教育司支部]只能在二机部系统内部作为发文单位。二机部1959年已经撤销，对于这封信的调查就很困难。

第五，按道理，天津大学收到这份材料，应该调查核实，核实清楚再入档。结果天津大学没有核实就装进了档案，我们调查清楚这是一份有问题的材料，但人事档案制度有规定，有问题的材料必须原提供单位撤出，其他单位不能撤出。现在国务院有文件规定：二机部已于1959年撤销，凡原二机部的遗留问题，由五机部负责办理。这就有头绪好找了。

我看调动工作的事先停下来，先把这份材料的问题解决了，再办调动工作的事。现在厂里给你开封介绍信，你先去找五机部，看他们是什么意见，然后我们再研究。”

弟弟听得目瞪口呆，怎么自己竟成了好象特务活动的嫌疑人？只好按照他们厂长的意见，带着介绍信到北京找五机部来了。

这就是他到北京也落实政策的原委。

第二天，弟弟去找了五机部，五机部干部司的人员说：“需要把档案要过来看看，看过之后，两个单位再商量。你先回住所等着。”回来以

后,他就打电话,把情况告诉了他们厂长。

一星期左右,档案来了,五机部经过研究,认为这封信属于“不实之词”,由于二机部早于1959年撤销,人员已很难找到,无法查证,当即决定立即从弟弟的档案中撤掉这份“诬陷材料”。

档案也立即退还工厂。

那天晚上,我就已经知道的情况想了想,根据我的分析,这份材料只有两个人可能是编造者。第一个是当时的支部书记梁心明,第二个是当时担任组织委员的杨贵星。我的根据是:

1.[中共第二机械部教育司支部]这枚章,只能由书记和组织委员保管,其他党员都不可能使用这枚章子。

2.书记梁心明为人阴险狡诈,整人狠毒,既然把我打成右派,自然就要狠到底。出于他的人格,为了讨好上级,升级获利,他极有作出这种事的可能。

3.杨贵星是个来自农村心胸狭窄的小人,高小文化程度,他将近40岁了还没有结婚,(也许原来结过婚,是农村的,离了)他干的是一份“闲差”,名为人事干部,主管下属中专学校的人事工作,实际上下边学校的人事工作学校自己都管了,根本没他的事。所以他常常上班没事串办公室,和一些年轻女同事在一起叽叽咕咕,动手动脚,那些年轻女同事都想入党,要入党谁敢得罪“组织委员”?我上班比较严肃,往往我一进办公室,他们就散开了。有一次我对人说:“这算不算猥亵?”(我的这一说法确实不太合适,当时还没有比较合适的说法——“性骚扰”)后来他知道我的评论,自然怀恨在心,他也可能作出这一害人的事。

4.诬陷者怎么会知道我妻子去天津看望我弟弟的呢?必然是他们偷偷拆看了我弟给我的来信。

这两个嫌疑人一位是书记,一位是组织委员。按理说他们都是党员,可谁又会想到特殊材料也能制造出这种玩意儿来?

想想我们并没有作什么为害国家社会,有害共产党的事,为什么要这样收拾我们?尤其是由共产党员诬陷,其目的几乎是要置我们于死地。中国当真完全没有法律?这社会已经对我们不公平了二十年,这

种伤害已经构成了“犯法”，而不是简单的“不实”的问题了。我主张研究一下，应不应该到法庭控告这两个坏蛋。

有一个星期天，我把在大学法律系担任教授的老同学找来，把情况讲给他，能不能考虑“诉诸法律”，向他请教，听听他的意见。

经过他详细分析，我感到十分失望。他说：——

“……，首先，法庭不可能接受这项控告。历史上还没有告共产党员利用党的名义害人的案例。你想想，法院也是共产党领导，怎么可能立案受理？

其次，法院讲证据，你们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来。不要说法院，就是一个单位的组织去问这两个人，他们肯定不会承认。你们能提供什么证据，使得他们无可辩驳，无法抵赖，证明就是他们干的？现在的情况是：从道理上说，他们有极大可能，但他们完全可以不承认，完全可以赖掉，你们怎么办？法庭又能怎么办？

再说，这两个人还很得势，就算你们不向法院控告，向他们所在单位的组织去告，他们那个组织也必然会替他们说话。他们要不承认，一点办法也没有。

你们要探索“公平”，实在说，社会上本没有什么公平。刘少奇、彭德怀等人怎么样？不也给他们扣上种种罪名？最后，折腾死人给你平反已经是很好的了。你们这问题，现在把“不实之词”给你撤了也就完了。你们要打算通过法律追究责任人，那不可能。

至于责任由谁来负？没有人负责，你能把他们怎么样？……

是的，没有人负责，没有人负责。六十年代饿死 3000 多万人，有谁负过责任？全国有多少冤、假、错案？比你们冤的有多少？你们要告党的主要成员，弄不好要给你们再带来麻烦怎么办？再说了，你们又没有后台，我看还是认点倒霉就算完了，别再惹麻烦了……”

这就是一个法律教授对中国法律的看法。

谈了一个下午，我只好失望地把老同学送走。

五机部撤销了那份“不实之词”的诬陷材料，把档案退回工厂后，厂里立即把档案发到江苏人事厅。请他们按照“照顾两地分居”政策给

弟弟安排工作。同时,厂里认为江苏必然会按政策办理,干脆发了一个月的工资,让弟弟先回苏州等候。

谁料江苏人事厅早先看过他的装有“不实之词”的原档案,等了半个月,没想到机械系毕业的机械工程师竟然分配到“蚕种厂”。我接到弟弟电话,主张不去,弟弟则要去,说看看江苏还能来什么花样。

到“蚕种厂”报到以后,那个厂长坐不住了。他对弟弟说:“老赵同志,你先等等,我马上找人事厅,还没有听说有这么干的人事厅,把机械工程师分配来‘蚕种厂’工作的……”。

弟弟坐等了一个月,也看了一个月笑话,总算调令又来了,调林业机械厂。

这就是一个历史上毫无问题的,解放后才上中学、大学的知识分子,一个高级工程师,在共产党领导下,被党员诬陷无法申诉,郁郁无奈的一生。

这件事给了任何人也会气疯。我退休之后,每每和弟弟谈起这一生我给他带来的麻烦时,总是郁郁于心。1978年,落实“改正”政策时,当时的书记梁心明来过一封信,无非是说过来他没责任,说过去他也没责任的话。说什么:“当初我不主张打你右派,他们要打你右派……”。谁是他们?他们又是谁?看了信我没有理他。到了1994年,想起我和弟弟的遭遇,忍不住我给梁心明写了一封信。想和他讲讲道理,内容大致如下:

……我究竟和你是有杀父之仇,还是有夺妻之恨?你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还担任着支部书记,怎么能干出这种诬陷好人的卑鄙勾当?你为什么非要对我无辜的弟弟下此毒手?

我所以指出是你干出来的,是因为那个“中共第二机械工业部教育司支部”的章,只有你和杨贵星别人不可能保管。如果不是你,那就是杨贵星,没有第三个人。……

过了些天,他还真回来一封信。信的内容是:——

……所说教育司党支部给天津大学的信,我一点印象也没有,我绝对不是推卸责任,我连你弟弟在天津大学读书的事也不记得。当年

反右中期,我被派随同钱志道助理到西安了解当地部属学校、工厂反右情况,我回来时部里的反右已经基本结束。对你的处理我是奉命宣布的。王宝善、刘增智定为右派我也没有参加过讨论,司里反右成员是王万春、杨贵星、叶英,是他们确定的。

……对于天津大学收到的那封信,我的看法是:第一,没有给你定过“反革命分子”,这样说是不负责任的;第二,说我公安人员尾随监视是不可能的事,纯属幼稚可笑,瞎诈唬;第三,但不能认为这封信是百分之百的诬陷信。它确实客观上起到了很坏的诬陷作用。特别是使你弟弟蒙受了不白之冤,吃了十几年苦头。他们和你个人有何恩怨,特别是你当时正上学的弟弟,为什么要下此毒手?这就是反右派斗争中发生的种种偏差,失误。……

他的这封来信,不是知情人猛一看,似乎还有一点道理。但是此人十分狡猾,他作为一个曾经参加过国民党“蓝衣社”的人,(他在肃反时亲口对我说的,意在说明他只要交代清楚,照样可以又能当共产党的支部书记,)完全证明了他的手段的高超。他一生不知坑害了多少人而往上爬,靠的大概就是这种八面玲珑的本领。正如莎士比亚说的:“人假如作了无耻的事,总免不了还要用加倍的无耻来抵赖”。

对于他的这封信,我的看法是:——

第一,他是党支部书记,搞运动都是他负责,他却一推六二五;他是主要负责人,他却说所有右派都是别人定的,有的他还没有参加意见。

第二,他去西安没几天就回来了。因为西安只有一个西北工大属于二机部,再者,哪个单位的反右不是自己搞?哪个单位反右是依靠上级来人?他的这个说法,意在说他“人不在”,推得一干二净。

第三,把人都诬陷成和特务一样的反革命了,他却说:“不能认为是百分之百诬陷,而是客观上起到了很坏的诬陷作用”。这叫什么话?他一向玩弄颠过来有理,倒过去也有理的所谓“辩证法”,强词夺理,害了人还得说自己是正确的。

第四,“对你弟弟下毒手不是我们这些人”,我们都是好人,那都属

于“反右派斗争中的偏差”。

那么偏差是不是具体的人造成的？共产党、毛泽东发动反右派，“改正”不就是搞错了吗？共产党、毛泽东没有叫你写诬陷信吧？这个责任你能推给谁？

第五，从他的来信里也可以看出反右的积极分子都是什么人：

副司长王万春，上过一年初师，作风粗野，张口就来“妈勒个B”，没看出来他有什么长处，后来听说他把小裸姆肚子搞大了。说不定这方面就是他的强项。

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杨贵星，平时没工作，利用“组织委员”的身份搞“性骚扰”，谁要揭露他就写诬陷信害人。

调走的李承文司长常常评价：“他能干了什么？他究竟能干什么？！”的叶英，平时谈工作什么也讲不出来，但一有运动，就会立刻来神儿，无限上纲，乱扣帽子，疯狂咬人。

由这些人组成的反右小组，再加上书记，看看这个班子，能作出什么合乎政策的事来？

由这些人组成的工作班底，能在工作上作出什么成绩？托尔斯泰说过：“好人都是相似的，人‘坏’的时候，却各有各的坏法”。要把“坏”集中起来，那可怕是可想而知的。

1958年反右运动结束，1959年就把第二机械工业部整个撤销了。从这一点看，中央有没有这个部都无所谓。一个部大部分干部都是这一类人，不干工作白拿工资，还生是非，害人，我看撤销的好。

一个国家，总是在谈“依法治国”，但害人者可以不受法律的惩处，不，是没有法律能惩处他，这算个什么国家？

十年琐记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河依旧枕寒流。

——刘禹锡

成为“改正右派”以后，我工作了十年。这十年时间虽说不短，却也没有“戴帽右派”——“摘帽右派”整整二十一年艰辛岁月留下的记忆为多。我只能把几件在思想上有点印象的小事记述下来：

一、广交会

1978年，落实“改正”政策以后，分配我作进口工作。工作中的函、电，合同都是英文，我还得把已经二十七年没用过的英文再拾起来。逐渐熟悉了工作，这工作就是询价、谈判、研究、签约。周而复始，一年差不多要签八九十份合同。

1979年，派我去参加“广交会”，在广州交易会的轻工进口交易团，总公司孟祥安、刘兰荪知道我是“改正右派”，他们给予了热情关照。后来，听大连进出口公司的一位与会者谈起他的情况，我才知道参加“广交会”，在以前也是一种“政治待遇”。他在进出口公司工作了十几年，这是第一次参加“广交会”。我这落实政策刚赶上改革开放，取消了不合理的政治规定，所以一落实政策就派我参加了“广交会”，享受了这项“政治待遇”。我实在想不通，以前的阶级斗争简直有点荒唐、可笑，到处划设政治界限，人为地树立“假想敌”，在人和人之间制造种种矛盾。你既然吸收人家在外贸公司工作，又不让人家参加业务活动。损失的是谁？

其实“广交会”是个纯业务性的活动。作出口业务的人员，在这里主要是推销他们所经管的出口产品。作进口工作的人员则是替偏远地区的外贸公司签约定货。因为偏远地区的公司虽然叫作外贸公司，却没有对外签约权。

没有太多的工作，分给我的合同很快就签完了。然后我就是坐在交易团的走廊里和外商闲谈。交流业务情况。那时我们进口商品主要是日本产品。了解日本公司和厂矿的代理关系，以及经营方式和有关习惯。

等到“广交会”快结束时,我才明白。作进口工作的人员参加“广交会”完全是替别人干活。自己在公司的业务,没人替你作,压下的许多工作,回去还得你作。所以,这是我唯一参加的一次,以后的“广交会”我再也不去了。再也不想享受这种“政治待遇”了。这种“政治待遇”,作为作进口工作者来说,实际上不享受倒比享受为好。

二、“挪用公款,涉闲贪污”的辩解

1980年去日本出差。

给北京钟表厂买了日本“西铁城”公司一套定时器生产线。在他们发货之前,带着该厂厂长和三个工程师先去做个技术验收。免得货到发生问题处理起来麻烦很多。

我们一行五人到了东京,该厂工程师曾启平是女性,(还有一位也是女性)她们出去总要和男性就伴儿。再加外事规定:外出必须二人同行,她们往往是跟着男性走,总怕出去找不回来。有个星期天,我去东京神保町书店区,曾启平也一道去了,转来转去往回走,正好走到一个“免税店”门前,(免税店是专为外国人设的,外国人在这里买了东西,在他们回国出境时海关可以免税,实际上来日本带东西出境,主要是中国人)。

曾启平来日本时自己带了一些美元,想买一件免税品。走进店里,她看上了一台收录机。但商店只收日元,不收美元。再说,不许单独活动,以后还要到其他地方,有没有机会再来?很难保证,为此她很着急。当时我们五人的费用都在我身上,我决定先拿大家的生活费日元,先给他买了。第二天一早,我带她到东京第一劝业银行,帮她把她的美元换成日元,立即归还了我。

没料到这小事一桩,也生出了问题。

一个多月以后回到北京,有一天人事科叫我去一趟,说是有“外调”的要了解情况。

走进他们办公室,副科长周湘君说:“老赵,这是一轻局人事处的同志,她要了解什么情况你们直接谈吧。”

接着那位来人就說:“我们局所属钟表厂工程师曾启平去日本出

差,你们是一道去的吧?”

“是啊。你要了解什么问题?”我想先搞清楚她要调查什么问题。

“你们回来后,有人反映她‘挪用公款,涉嫌贪污’”。

“什么叫‘挪用公款,涉嫌贪污’?你先给我讲讲”。我给她提了个问题。

这个人没有说话。沉默不语。

她不说话,我说话:“你不说话,那我就得给你说说了。举例来说,你到上海出差,从财务处借了旅差费 2000 元。办完事要回来时,还剩 500 元,这时候你看上了一件衣服,花 100 元买了。回来以后,你拿 1500 元单据,和现金 500 元,向财务报了账,请问你,你买衣服那 100 元,是不是‘挪用公款,涉嫌贪污’?”

“我向你了解问题,你就按我的要求来谈。”她又开口了。

我说:“我看我们双方先把看法,认识搞一致,再谈问题吧。你先说曾启平的买东西,用自己的钱,没占公家一文钱,她是怎样构成‘挪用公款,涉嫌贪污’的?你要非给她扣帽子,那日元是我动的,要说挪用那首先就是我了?”

“你,你搞清楚,我是外调的,你必须按我的要求谈问题!”噤!摆起了政治架子。

“我看你先搞搞清楚,这已经不是‘四人帮’时代了,你这个人需要好好学习学习,作人事工作要与人为善,国家没有叫你整天琢磨给同事栽赃、扣帽子、陷害人,啊!只有先具备了作人的条件,才好作人事工作。所以我建议你回去好好学学怎样作人。”

没等我说完,她就急了,她冲着我们的人事副科长周湘君嚷嚷:“喂,喂,喂,你们这个同志怎么这种态度!这,这……”

我往小周那边看去,只见小周偷偷捂着嘴在笑,顾不上和她搭话。

“好了,我的话就谈到这儿,再见,”说完我就准备走。

她又急了:“你不能走,你必须按我的要求写一份材料!”

“我今天还就不给你写材料,现在我知道了,你想害人,我绝对不给你写,我还要告诉你,你找周湘君,你找公司经理都没用,我说不写就是

不写！”开门我就走出了人事科。

.....

过了大约两个月，曾启平找我，一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老赵，我是特意来谢你来了，我真是难得碰上你这位好人。总算没让我背上一条罪状。”

“你太客气，我不能给人写害人的材料。作人要有道德良心。”

“这个人事处我实在害怕了，还算好，我总算调离开这个单位，调到市经委模具研究所了……”

实在说，我作过人事工作，我也曾经是人事工作的受害者，当然我不能写害人的什么材料。我已经不是“右派”，而且经过二十多年的磨难，我仍然要作一个正派人，害人的事我绝不作。

三、老友黄君

五十年代参加工作就在一起的朋友黄君为人忠厚老实，后来说不清为什么，55年被他所在的某外贸公司发落到河北定县，妻子也随之调往。后来我被划右派，彼此失掉了联系。

1979年初，他打听到我的工作单位，来找我，说起他在定县商业局呆了二十多年，现在恢复高校，中央财经学院招考教师，他报名投考被录取了。他的妻子仍留在定县，也想让妻子回来参加考试。当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也在招考教师。谈起又要面临两地分居的诸多困难，那时走后门之风已然抬头，又怕被有后门的人顶掉，情绪低落而沮丧。

又过了些天，他来告诉我，妻子已经报名了，就看命运了。我想应该是没问题的，她是燕京大学外语系毕业，在定县她也没完全丢掉专业，在当地中学教英语。要真正按考试结果考虑，应该没问题，但那时候不正之风已经开始，不是走后门的问题，而是怕被“后门”顶掉的问题。能否录取就很难说了。

我的老友夫妇，都是老实人，看着他那愁苦的样子，我实在对老好人在社会上受人欺负愤然不平。但是我也是没有门路的人，想帮他也帮不上忙。后来我对他说：“老朋友，我也没办法帮你，不过有一个门路可以一试。那就得找我的‘仇人’去”。

他一时搞不懂是怎么回事：“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弄不明白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原来我在第二机械工业部工作时，被司长李承文评价为：“他能干了什么？干了什——么？”的党员积极分子，在反右时给我无限上纲上线的叶英，1959年，该部被撤消后，不知他经过什么途径，已经擢升为北京市高教局大学处处长，主管属于北京市的高校。我说的“仇人”就是此人。当我把情况讲给他时，他也觉得很为难。

但我认为他对我有亏欠，未必好拒绝。

中午饭后，我们就去高教局找他。一见我，他就装出一副热情的样子，一边握手，一边说：“老赵，反右时对不起你，让你吃了那么多年苦……”

“过去的事不谈了，今天来是谈谈现在的事。”尽管实际上是求他，我还摆出一副不是低三下四求人，还有点趾高气扬的样子，心想：“你小子屁本事也没有，拿‘害人’换来的这官，我打心里看不起！”

“暖好，什么事你说。”

“我的这位老朋友的妻子，现在报考北京二外教师。刚去报了名，姓名乐XX，1952年燕京大学英语系毕业，业务没问题，找你来希望办的事是：我们肯定能考上，要求是别让后门给顶了。咱这可不是走后门，是希望别开后门，把我们正门儿给顶掉。”

“没问题，没问题，一定办，一定办。暖，老赵，你放心。……”

……

二外的考试一结束，老黄就来告诉我，乐老师已经录取了。因为在澳大利亚教授口试时，当时就说：“很好，很好，这位老师录取了。”

第二天，叶英到公司找我，他显摆帮我办了件事（其实我早知道澳大利亚考试教授的决定了）。他看着我们办公室摆了许多收录机的样品，我把他送到公司门口时，他说：“能不能帮我弄一台收录机？什么样的好，我不懂，孩子学外语用。”

我也瞎应酬着：“好，好，碰机会。”

再后来老黄来，非要谢叶英。他听了我说叶找我的情况，认为叶实

实际上是暗示要一台收录机。他坚持一定要送叶一台收录机。我说：“你听我的，什么也不送，虽然咱们找过他，但录取的关键人物是澳大利亚教授。不是他。所以什么也不送他。”老黄还坚持要送。这回我也决心要办一件不客气的事，我说：“你一定要买，我不管，但只要你送，我立刻去高教局检举他。说他索贿！”

老黄只好退缩。最后谈好，请他吃烤鸭。那天他去吃烤鸭，面孔已经流露出一丝不满意，仍然多次谈起收录机。一再说：“老赵，给咱弄一台。”我则老是一句话：“好，好，有机会的话。”

我认为他的话已经表示了出来。什么叫“弄”，这就是他不出钱。他不买，还要这件东西。当然是向老黄要。我心想，今天请你吃烤鸭就不错，要按我的意思连烤鸭也不请你！当年你害我二十一年，如今靠害人爬上去，我还没向你算害我的账，你倒不顾廉耻，向我来“索贿”了。又一次暴露了这积极分子的党性。此后我再也没理这个小入！

又过了两年，我和汽车进出口公司副经理去友谊宾馆一家公司谈业务，没想到和叶英不期而遇。他大概刚办完事要走，我和他打了个招呼就告别了。后来听这家公司一个经理说：“这改革开放也不等于人人可以乱捞钱呀。刚才这两位，又不是干经济工作的，要介绍一个工程项目。八字还没半撇，就要‘好处费’30万。这叫什么事儿？”

我不得不叹服这位共产党员的“紧跟形势”。搞工作没本事，搞运动象疯狗一样乱咬人。死命地给人上纲上线，大扣帽子，不惜坑害别人。现在改革开放了，贪污受贿刚刚抬头，为了捞钱，他居然也背后搞起了这一套。特殊材料真格制造出不少这样的优秀人才呀！后来此人在退休前居然调任北京外语师范学院副院长。以往，只有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学者才可以担任大学的校长、副校长。59年二机部撤销后，没读过大学的梁心明就曾担任过吉林工业大学副校长，如今，他的门生竟然也混一个学院的副院长。这高等教育能办好吗？这真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悲哀！

四、自由人

公司地处西单十字路口附近，人流如潮，经常会碰到熟人。斜对面不远就是商业部。有一天商业部主管“侨汇”的孙士英找我，她是我五十

年代在华北行委的同事。

一见面她就说：“老赵，前几天碰到赵静，她可能要调到进出口委担任一个局长，她希望我能调到她那儿去。后来她问起我还知道哪些熟人，我谈起你，她让我找你，赶快去他家一趟，她家地址是……”

赵静也是我在华北行委时的同事，那时她是科长，后来外贸部工作。如今是外贸部政策研究室主任。1961年山西外贸局副局长郭荣昌要带我去她家，我因为自己是摘帽右派，失业在家，始终不好意思进她家门的那位。

现在我改正了，她让我去，仍然有点犯难。因为她的丈夫郑思远五十年代是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书记，后来又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虽然五十年代我去过她家，也见过郑秘书长几次，也认识，只是不熟。有些人总想方设法走门路，拉关系，我则最不愿意拉关系，最怵去找大官。

过了几天，孙士英又来了。她直埋怨我为什么没去。第二天我只好去她家，赵静说话直爽，口无遮拦，一见面就一阵抱怨：

“你说你怎么回事，我们住在劈才胡同你不是来过几回嘛，怎么后来就不来了？你要常来，反右派，我们给你打个招呼，也许打不了右派。就是打你右派，那时候老郑是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书记，你们部长他全认识，说个话也许会处理的轻一点，你看，这点事一闹叫人家闹了二十一年，你说你怎么熬这二十一年来的……”

郑秘书长坐在沙发上微微笑着。我也不好意思讲什么，只能坐在那里听。

“你那点事我早就听郭荣昌说了，不是大姐我说你，你说你，人家搞了二十来个女的，你就给人家贴大字报，人家就是搞了一百来个，和你有啥关系？你管人家那闲事干啥？啊？”

郑副秘书长笑了。她仍然在说。

“水至清则无鱼，共产党也是这样，要让我说，共产党里的坏蛋，都让你碰上啦。”

郑副秘书长说：“1962年，李维汉他们曾提出给右派甄别平反的建议，主席一批，以后谁也不敢再提了。当初谁也不知道会搞二十一年。”

赵静又接起话茬儿：“原来我给孙士英说，我要调到进出口委，把你俩也调去，现在又大变动，进出口委合到外贸部，实行离退休制度，说不定我很快就离休。这事也恐怕办不成了。”

“那无所谓，我到哪儿干也一样。”我表示去和不去都无所谓。

……

过了一段时间，我去赵静家，她没在家，我就和郑副秘书长闲聊天。门铃一响，来了两个客人。一番客套之后，他们坐在沙发那边说话，因为我不认识，我就在书桌看报。一会儿工夫，赵静回来了。经过一阵寒暄，他们继续谈话。她好象忽然想起什么事似的冲我喊道：“喂，文滔，你们不认识？”我怔然看着那两位客人，他俩也看着我，几乎同时说：“不认识。”

“这是你们北京外贸领导机关——外经贸委冯迈伦主任，这是于处长。”

我走过去打个招呼，和他们握握手。也坐在旁边的沙发上。

“这是我们五十年代的同事，年轻时聪明能干，后来叫二机部把人家打了个右派。现在在你们北京外贸系统，你们那儿怎么使用人家？有点不象话，……”

那姓冯的给姓于的低声嘀咕几句，然后说：“赵主任，我们回去研究，我们回去研究。”

……

客人走后不久，我也回单位了。

第二天那位处长来电话，他说要调我到外经贸委工作。我问他搞什么工作，他说：“到各外贸公司去检查工作。”我当时就对他说不愿意去。拒绝了这一工作。为什么我拒绝这份工作呢？主要是考虑：A。有些公司的经理、副经理我认识，检查出问题不上报，不合适。上报，又会得罪他们。B。我不是党员，也不打算入党。不适于搞这项工作。

后来可能是受外经贸委的指示，进口部经理对我说：“老赵，你的工作不大好安排，（安排当头儿，你不入党，又不是党员，安排一般工作，上级又有意见）我们决定，你自己愿到哪儿工作就到哪儿工作，公司给你

工资就是了。”

啊，这倒好，成了自由人。

赵静此前曾让冯迈伦帮他找两个人，帮她工作。她已经自己申办了一个公司。当那位处长打电话告诉她，已经找好两个人的时候，她却说：“我不要你那两个人，你把我那老同事给我就行了。”接着她就打电话，叫我去她家，动员我到她的公司工作。

公司叫作“中外商品信息公司”，两天后我去她家开会。成员有外贸部两个处长，机械总公司一位处长，《国际贸易参考消息》的编辑，国家商检研究所副所长，还有郑副秘书长担任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书记时的生活秘书徐潮。简单谈了一下分工就要开始工作。办公地点就在她家。我不好意思推托，只好就这样开始工作了。

等到正式工作开始，我才知道那些人都是兼职，只有我和徐潮是专职，也就是说，每天正常上班的只有我们俩。先创办了一个刊物《中外商品信息》，组稿、写稿、编辑由赵静负责，改稿、印刷、发行等事务工作由我和徐潮作。郑副秘书长年老了，只上半天班，有时候我们忙，下午可以蹭用他的专车。工作轻闲下来也聊天。忙起来也还够忙的。有时候兼职的人来了，也一起工作。

一晃就过去了几个月。

有一次和郑副秘书长聊天，说起了“反右”，赵静总把我写的大字报当笑料，一说起来就调侃：“还有你这个专攻击人家搞了多少女人的。”引得大家发笑。

郑副秘书长有一次说：“你那点事要在我单位，我不会打你右派。谈的那些事和党、社会主义一点关系也没有嘛！”

我说：“郑老，我不是党员，怎么可能在你那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工作呢？”

郑说：“那不一定，当时徐潮在那儿就不是党员。”徐潮是李希凡的妻子。文化大革命离开机关党委，到了北京文化局工作。

后来，这种工作实在太单调不说，因为赵静处理人和事上都有问题，兼职的人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里里拉拉都不来了。工作量都加在我

和徐潮身上,后来徐也隔三差五地缺勤了。我也就越干越没劲了。这时候,有位国家教委的同学找我。说是教委从全国28个教育厅、局,集中了数千万资金,在深圳办了一家公司,贸易部没有一个人干过,想找个干过的人,问我去不去。我当即答应“去”。

这边怎么办?我找了一位老同学,他是大夫,请他给开了一个“患有肝炎”的证明,交给了赵静。她一看就说:“你什么病不得,偏偏得个传染病。赶快长期休息吧。”正好郑副秘书长下班回来,赵说:“老郑,老赵得了肝炎,这事闹的”。郑一边呵,呵,一边走进了他的房间。五、六分钟之后,他开门招呼我:“来,来,来。”

我进去之后,郑副秘书长微笑着说:“得病是真的吗?”

我在郑老家上了近一年的班,他待人和蔼、宽厚,没有架子,常常和我聊天。虽然他不多说话,他头脑十分清楚,他一下就猜出我的文章,我不能瞒他,只好把实情告诉他。他笑笑说:“她那脾气和谁也不能长期共事,想走就走吧。有什么事还可以找我们来。”他们快开饭了,我匆匆告别就回家了。

后来,教委的人员从深圳来接我,就离开北京到深圳去工作了。

五、退休

深圳公司资金是省、市教育厅、局拿的,人员除了教委的以外,大部分也是个省、市派来的。表面马马虎虎,实际各为自己的地区服务。有时候各干各的。再加深圳刚开发,他们不但没经验,还总认为我保守。我去不久,就在我和贸易部负责人出差三天的时间,一个年轻人自作主张,和香港人签了个合同,不开信用证,用现金交了定金。这方式内贸也不允许,外贸那就必然被骗。我们回来发现此事后,我当时就肯定“必成骗局”。那年轻人还说我:“深圳方式,就这样干脆,北京那手续太保守,太复杂。”

拿走订金之后,再找人已经找不到了。买方立即上诉到法院,最后那年轻人被判三年。

贸易部负责人是个老好人,老干部又上了北师大,相处不错。一直对我说:“只要我在这儿一天,你就别离开,帮我帮到底。”所以不管工作

怎么样,我们一直工作到 1988 年。

1988 年 9 月,我回到北京,到公司人事处,说我不干了,退休。负责人事的副经理说:“老赵,再干一段时间再退吧。”

我已经决定要退,就不再和他商量了:“按规定办,到年龄就退。”

他说:“好,你等等,我给你办手续。”

我坐在他办公室边看报,边等着。

一会儿工夫,他来了。给了我一个红色塑料封皮,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干部退休证”和“劳动人事部制”字样的一个小本子。然后他说:“老赵,你是正处级。”

我差一点失声笑出来,但没有说话。

拿着小红本,和他道别后,走出公司大门,不由得哑然失笑:“正处级。”这也是只有在中国才有的词汇。你级别够处长,你不是党员,也不让你作处长,于是就给你来一个“XX 级”,或者是“XX 级待遇”。不知情还以为真是“处长”,实际上是共产党和非党员开的一个玩笑。

向右一拐,穿过神路街,过马路在东岳庙门附近工交车站等车,一抬头,街对面已经建了近 700 年的,琉璃面砖瓦建造的拱门牌楼,虽然不免年久自然浸蚀的斑驳,却依然矗立在这闹市的街口,没有在文革中被毁。明代严嵩书写的四个大字仍旧完好——“永延帝祚”。

“永延帝祚”和“毛泽东万岁”应该是一样的。从秦朝到明代,皇帝们为了“永延帝祚”一直在寻求长生不老之道,东岳庙就是明代皇帝尊信道教,谋求长寿密技的所在。可惜两千多年来,他们都没有找到这种“秘方”。

站在车站,心想:工作了六年,被打成右派,又经过二十一年的磨难,总算又恢复了工作。干了十年,这一生工作的路就走完了。人生的路真的是艰难啊。

车来了,我坐在车上看着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忽然想到:大自然的规律是神奇的,如果毛泽东要能“永延帝祚”的话,那中国人不知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四十二年才有了“改正书”

共产党里的坏蛋都让你碰上了。

——一个老同事的谈话

退休以后有了充分的时间,经常借一些书看。那已经是1999年5月份了,在看到几位也是右派难友写的书中,都谈到他们在1978年,落实右派“改正”政策时,每人都有一份“改正书”。而且,这份“改正书”当时单位起草好以后,要拿给本人看过并同意后,才正式打印盖章,一式二份,一份给本人,一份存档。

噫?我怎么没有?打电话问朋友老徐,他说有,还拿到我家让我看。又打电话给别的朋友,都说他们有。他们还说,78年落实“改正”政策时有明文规定:第一,发给本人“改正书”;第二,烧毁反右黑材料;第三,发文给反右受到株连和影响的亲友,消除影响。这三件事都要求本人看到。

我当时也太粗心大意,一说“改正”,安排了工作,就投入工作,忽略了这些重要细节。以为主办的人自然会按政策去办的。如今发现不对了,既然文件有规定,当然我也应该有。但我没有见过,于是给公司人事处长王彬打电话询问。没想到王彬说:“没有”。

这就奇怪了,78年我在轻工进出口公司,是国务院人事局通知公司给我落实政策的,他们应该按文件规定办理。难道真没有办?后来国务院又规定:“凡原来第二机械部划的右派,由第五机械部负责办理具体‘改正’工作”。78年10月,第五机械部三个人还找到我家,说是即使我坚持不回去,这改正工作也必须他们作。将来要把改正手续发给我现在的工作单位。按理说,我应该有现单位和五机部两份“改正书”,现在怎么一份也没有?

这又过去的二十一年变化也不小。84年我离开轻工进出口公司,到外贸总公司进口部工作。退休后,公司又和北京技术进出口公司、北京经济建设总公司合并,改名为北京国际贸易公司。王彬是现在公司的人事处长,对以前的情况不了解。他来电话说:“老赵,你最好来一趟吧”。

第二天我到公司人事处，王彬拿出我的档案让我看，他说：“你自己看，就这点材料，哪个单位也没有作过什么‘改正书’呀！”

事情已经明白了。

我回去就给兵器工业部（第五机械部也改成了兵器工业部）党委写了一封信追问此事。

一周之后，收到该部信访办的回信说：“经查，我部此项工作早已完成结束。材料也已无法查找。因此，你提的问题无法解决。”好！干脆利落，来了个一推六二五。

接着，我给中共中央组织部写了一封信。大体内容是：

“……1978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中发[1978]55号文批准的，由贵部牵头的五部《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的实施方案》开展了全国给右派‘改正’工作。鉴于1957年我的右派原划单位——第二机械工业部已于1959年撤销。国务院新近责成第五机械部负责落实原二机部的右派改正工作。1978年10月，五机部落实办找到我家，承诺办理改正手续。然而时至今日，已经过去了二十一个年头，我的档案里并没有什么‘改正书’，也就是说，什么也没有办。

现在五机部又改成了兵器工业部，我给该部党委写信询问，该部回信说：‘我部改正工作早于78年结束。相关材料也无从查找。因此，你的问题无法解决，’我很奇怪，我这里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他那里就宣称工作早已完成。打右派经过二十一年才给予改正，兵器部居然把落实政策也延长了二十一年，这纯粹是一个极不负责任的单位对中央政策的消极抵制！他们的承诺竟然是一场骗局！这件事应该说是全国给右派改正工作中最为荒唐的典型！

1978年，五部文件既然是贵部牵头，现在我就请问贵部，我这问题究竟算怎么回事？现在应该怎么办？请尽快给予答复。”

信发出的第五天，兵器工业部信访处一个叫刘春生的来电话：“老赵同志吗？很对不起，材料找到了，当时办理此事负责人也找到了，请你来部里一趟，详细谈谈”。

嘿，这是什么玩艺儿？！给我回信的说不定就是此人。不是说工作

早已结束了吗？材料也找不到了吗？怎么中组部一出面就什么都有了？我在这个部门工作过，这个部门是全吃人饭，办人事的不多。也可以说，我不知道有多少好人，但坏人，不办人事的不少。现在又证明了这一点。

我去到兵器部以后，这个叫作刘春生的说：“老赵，很对不起，我把当年‘摘帽办公室’的负责人也找到了，这位老同志已经离休。我去他家问起这些事，他什么都忘了，当初那些工作人员都是从下面调上来的，作完这项工作就回去了，现在都想不起他们的名字。你还记得去你家找你那几个人的名字吗？”

“我又不是五机部的，我要是‘五机部摘帽办’的，我就会记得他们的名字。你们这位负责人是不是患有痴呆症？神经不正常吧？”我说。刘春生说：“病是没有，就是有点儿糊涂。老赵，我给你说吧，这个老同志要什么也不知道，我就更不好办了。请你理解我，我1957年刚出生，你想，对于40年前的事我根本就不了解。咱们商量商量，能不能请当初给你改正的单位——轻工进出口公司给你出具‘改正书’他们总比我们了解情况”。

“你大概知道吧，原二机部所划右派，一律由五机部负责落实办理。这是国务院的规定。你是不是认为，你又改成兵器工业部就可以不负责了”？

“不，不，不是那个意思。……”

我说：“我现在按国务院的规定，向你们要。你们有责任给我，必须给我。至于你想和轻工公司商量，那是你的事，我不管，你自己去办”。

那个姓刘的忙说：“好，好，我去找他们，就不麻烦你再跑路了。我和他们商量后，我再给你打电话”。

在他们联系商量的时候，我仔细回想了78年的情况，也找当年轻工公司搞这项工作的人了解一些情况。当初，国务院人事局给轻工公司发公文让给我落实“改正”政策，书记雷斌立刻开会决定给我改正，恢复干部级别，安排工作。但是具体工作诸如：作“改正书”，销毁黑材料，发函消除影响等就叫给一个叫作白家芳的去作。

白家芳此人原为食堂卖饭票的，此人文化不高，当过兵，为人奸诈狡猾，政治上极会钻营。入党以后，很快由政工干部升为副科长。他寻思：给全国右派“改正”可是件大事，这其中有没有政治风险？说不定谁会犯大错误。近几年政治变化太大了，周恩来去世，闹成了反革命事件，邓小平复出，毛泽东逝世，华国峰上台，四人帮倒台，华国峰再下台……。随着这种形势，大批的人爬上去了；同时大批的人摔下来了。这就是政治机遇。如今胡耀邦竟然推翻毛泽东几十年的政策，把几十万阶级敌人给“改正”了。说不定再过不久，胡耀邦就会犯重大政治错误，如果能把握机会，说不定会在政治上窜升几级。于是“改正书”、销毁黑材料、发函消除影响，大概都成了他的政治梦想的筹码了。这些工作他偷偷的都没有作。在这二十一年中，他虽然没有等到大批胡耀邦的政治机遇，却也向上爬了不少，爬到了北京化工进出口公司书记。最为滑稽的是还捞了一顶“高级经济师”的桂冠，尽管他连26个英文字母也认不全。

有位好事的XX公司经理问他：你一天业务也没搞过，怎么能混“高级经济师”的？再说你英文有几个都说不清，你怎么能考试“？”

听说他嘻皮笑脸，恬不知耻的说：“喂，喂，找人代考的，嘻嘻，嘻嘻”。

唉，这特殊材料怎么总是制造出这样的伟大人物？

听说我的右派档案也没有烧毁，他把档案交给了上级。后来“上级”机关变化也很大，实在找不到头绪了。好在那材料即使公开了也无所谓。

他已经离开了轻工公司，这些后遗症也就留给年轻人给他擦屁股了。

经过兵器部刘春生和轻工几天的商量，决定由兵器部、轻工、国贸和我，作一次四方会谈，共同商定怎样解决。

到了开会那天，事情很清楚，就是一个出具“改正书”的问题。当然王彬不管，他管的是你们作好，他来收入我的档案。实际上问题只有一个，“改正书”是兵器部出？还是轻工出？

因为兵器部党委收到我的信，态度很坏，所以我坚持必须兵器部出具。尽管兵器部姓刘的一再请求轻工的同志理解他，希望由轻工来出具。他一直在说：“我57年才出生，对反右运动搞不清楚，78年‘改正’又是别人搞的。而且78年他还没有参加工作……”

我一再坚持必须兵器部出具，但轻工的张旗涛认为 78 年轻工的经办人太对不起我，应该办的手续竟然二十一年没办，要不是我提出，他们还不知道。责任应该由轻工来负。而且连连向我道歉，好象只有由他们办，才对得起我。他作为现在的经办人一定要主动把工作作好，来补偿 78 年轻工经办人的过失。搞得我再再坚持让兵器部出具成了我一家的意见；他们两家倒一致愿意由轻工出具。这样我也不好再坚持我的意见，就由轻工给我出具了一份“改正书”。

“改正书”形式如下：

北京轻工业品进出口责任有限公司

关于赵文滔同志 1957 年被错划为右派的改正决定

(99)京出党办字第 005 号

赵文滔同志 1957 年被原在单位第二机械工业部错划为右派。1971 年赵文滔同志成为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北京分公司职工。即现在的北京轻工业品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1979 年 1 月，按照中共中央(78)55 号文件精神，赵文滔同志由当时的轻工公司党委平反落实政策，由于当时的经办人员对文件要求的具体作法理解肤浅，没有给赵文滔同志作出结论。现经本人要求，根据中共中央(78)55 号文件精神，重新对赵文滔同志被划右派补行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干部和原工资待遇。

北京轻工业品进出口责任有限公司

(章)

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签发人：孙占华

校对：张旗涛

抄送：北京国际贸易公司

至此,从1978年落实“改正”政策,又经历了二十一年才拿到了这份“改正书”。这的确在右派改正中恐怕是独一份,也是这项工作中最为荒唐的典型。

“改正书”由轻工出具了。兵器工业部倒落了个逍遥。本来应该他们作的事,他们却没有作。后来我写信送给他们党委一副对联。这对联不是我作的,是陈希同送给和他有同居关系的小姨子,挂在厅堂里的。

上联是:世外人法无定法方知非法法也

下联是:天下事了犹未了不如不了了之

可惜没有给配上横批。

半个世纪的一次通信

没有别的错误比永远正确更错。

——勃特勒

2007年,反右已经五十年,无情的岁月已经把全国百万老右折磨得仅仅剩下9000多人了。然而“改正”之前欠发的工资依然杳若黄鹤。按理说,“扩大化”也好,“改正”也罢,都是你错了,而不是99.99%的老右错了。既然你错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那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就该补发,那还赖什么劲儿呢?还死抱住伟大、光荣、正确的空话不放,只能留给后人耻笑,不可能有别的结果。

2007年3月3日,61名老右签名上书中央,要求补偿所欠工资,尽管预料到仍然是“不予答复”(或曰“无法答复”,“继续赖账”),来人征集签名,我也签了名。

没有料到的是,如今的中央对“改正右派”的合理要求竟视为“闹事”,对于带头的61人,实行了公安和群众的联合监控。——先由公安局登门造访。他们怎么访,如何谈,颇有意思。那一天的谈话简单记录如下:——

【2007年9月7日,公安局来家,一位30多岁的公安问话,另两位20多岁的一言未发。】

公安:我们来看看您,生活怎么样?

老赵:公安局的职责是抓流氓、小偷、反革命、杀人犯,你们今天来,请问你们,我犯了哪一条?

公安:老先生,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来看看,有什么困难没有。

老赵:不对吧。这种工作是我们单位应该作的工作,不是你们应该作的工作。

公安:啊——听说您书法不错,

老赵:(打断对方的话,料他不过是假斯文)对不起,我不和你谈书法,你不必绕弯子,还是言归正传吧。

公安:这个……

老赵：你不说，我给你点吧。是不是为那 61 人签名而来？

公安：（面露得意之色，立刻收起废话）其实你们那签名一上网，我们就知道了。

老赵：知道了，这很正常，公开信嘛，虽然是给中央的，谁都可以看。你看到没有用，上级让你作什么，你才能作什么。上级没有话，你看了和没看没什么区别，是不是？今天是上级让你们来的，你们既然来了，我倒要问一句：“你们知道五十年前的‘反右派运动’是怎回事吗？”

公安：一分钟沉默，两位年轻的倒也坦白：“不知道”。30 多岁的嘎嘣着说：“听说过一点儿”。

老赵：不知道情况却来作这方面的工作来了。你们的上级就是这样给你们布置工作的？怎么？就这么蒙着干工作？那你们这工作怎么作？

你们既然不知道，我就简单给你们讲讲。50 年前，毛泽东动员大家帮助党整风，让给党提意见。提完意见把 100 多万提意见的人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21 年后，1978 年，共产党说“扩大化”了，给百分之 99。99 的右派，作了“改正”。

不论“扩大化”也好，给“改正”也罢。是毛泽东共产党错了，打右派打错了，不是我们这百分之 99。99 的“右派”错了。

既然不是我们的错，而是你们的错，为什么克扣我们 20 多年的工资不补？你们说，我们现在要求补偿合理不合理？这有错吗？难道这不是我们的合法权利？为了这事，派你们来干什么？我们犯法了吗？

公安：没有补啊？

老赵：谁给补？

公安：噢，原来是这样！（点点头，不说话了）。

（看来他们很多情况根本不知道，只不过那个阴毒的，无理赖账的“上级”派他们来捣乱，他们也就糊里糊涂地服从命令而来。）

老赵：拿我的具体情况来说，我当年提的意见是：一个，走后门问题；一个，乱搞多个女人问题。给这种人提意见就属于“反党

反社会主义”？现在过了50年了，你们平心静气讲，就现在来说，没考上大学，走后门不考上了大学，对不对？

公安：那当然不对啦。

老赵：假如你们提了这样的意见，扣你21年工资，你们认为合理吗？

公安：（他们直点头）。

老赵：当年二机部有个局长搞了二十多个女的，我提了意见，就给我扣右派帽子。那么现在与时俱进了，兴起了“包二奶”，还享有性专用权。最高记录是146个，这算什么问题？合理合法的？如果公安局头头这样干，你们提了意见，就打你们右派，扣21年工资不补，你们认为对吗？你们说合理吗？我们要求补，有错吗？

公安：点点头，不说话。（显然是默认我的话有理）。

老赵：我知道你们是奉命而来，用老百姓的话说，你们是吃着这碗饭。不干没饭吃。不过你们要搞清楚，真正养育你们的是人民，是老百姓。公安局是个群体，任何群体中都有好人，也有坏人。你们的工作直接关系到人，希望你们能有作人的正气和良知，作有益于人的事，不要作有害于人的事。凡事认真思考，不要盲目行事。我打成右派以后，和公安局有了交道，这期间有两个人给了我重大帮助。现在我不告诉你们他们的姓名，免得你们去检举人家！

公安：老先生，您把我们看成什么人啦，我们哪能那么干呢。今后我们一来一往就熟了。

老赵：不对，你们的“来”是奉命而来，没有“往”，我不会去找你们。

公安：好，今天就到这儿，您今天给我们上了一课，我们就告辞了。

老赵：再见，不送。

送走了这三位公安，我在想：上级就这样给下级布置工作？过了五十年了，怎么还有“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怪事？难道实质上就没有一点进步？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亚洲研究中心都相继主办了《反右运动 5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香港也决定 9 月份召开《反右运动 50 周年座谈会》。我收到该会的一份邀请信,让我去参加。实在说,主持和发起人是什么背景我不知道,也不认识。但讨论一个 50 年前的老话题,从任何角度说都无所谓。所以我决定去看看。

八月底,我到西城公安局办理了“港澳通行证”,和另一位被邀人冯志轩买好了从北京直达九龙的火车票准备同行。

那天我到了车站,经过“边防”验证时,验证人客气的说,：“请坐那边等等”。

我往那边一看,同行冯志轩已经坐在那里。我立刻意识到“不对劲儿”。我们被“卡”了。

接着边防站的站长、副站长来了。很客气地对我们说：“实在对不起,我们是接到他们(不言而喻,我们彼此会心地都知道“他们”是公安——或者安全局)的通知,让把你们留下的。实在说,我们也是头一回。这是干嘛呀?两位都是老同志。实在对不起,那就等等吧”。

我说：“赶快叫他们来人。我们得和他们谈谈,这算怎么回事”?

又一个副站长来了,说：“他们来电话让先把你们的票退掉”。

“退票是要受损失的,他们要退我的票,损失他们必须包赔”!不由得我有点光火。

边防站仍很客气,给我们送来了茶水和“盒饭”,一再解释,饭是他们在附近饭店为他们边防站员工长期订的,质量不好请我们谅解。

有两位边防工作人员知道我们都是作经济工作的之后,请我们给他们讲美元贬值的利弊,不觉得聊到 12 点半,车已开走了。

我们再再催他们赶快叫那些“始作俑者”来,赶快露面。副站长说：“他们说很快就到”。

我还以为公安这回要露面了。过了一会儿,人来了,来的不是公安,是我们住区的街道办事处。三个干部,一个民警,一辆汽车。

两个不同办事处的人,把我和冯簇拥到不同的车旁,用北京百姓的话说,那就是死说活说,非让我们上车。考虑到公安是他们的幕后唆使者,和来人讲道理没有太大意义。所以我们也就上车回程。

回到街道办事处，和街道主任等四个人讲了一个多小时的道理。事实上他们也不了解反右是怎么回事，现在作这件头疼的差事，也是奉了公安局之命。而所有这些人都是听命“党”。一个没有人能说清楚的“党”，我一再要见公安的面，要和他们讲讲政策，但他们则始终躲在幕后，不露面，让一些没法谈政策的人和我周旋。和最基层的人没法谈政策，我只得回家。

此事过后，街道上送来牛奶、鸡蛋，单位也两次来人探望，送来不少食品。一时间不知道他们这叫什么政策。反右派运动既然中共中央承认“扩大化”了，那也是你们错了，因为你错了，所以才来了“改正”。都已经给“改正”三十年了，现在右派要求补发 21 年的工资，怎么竟给右派送食品，送点饮料就算“打发”了？这叫什么名堂，你们还有点政策水平没有？

接着，听说这 61 人，有的街道给送去几瓶饮料，有的给送去了食用油，有的则被安全局“盯梢”，有个别的安全局还在门口给安装了“监视器”。对 61 个老右似乎又实行了“改正”30 年后的新的全面专政。北大医院有位教授，当年也是右派，是专门研究养生的，他在医院联系好食堂，想给老右朋友讲讲养生，以帮助大家提高健康水平。结果被公安通知：“不允许”！

有的老右说：“一百多万已经把你们折腾成 9000 人了，恨不得立刻把你们整得一个不留，你们还想研究养生，想多活几年，现在只能让你们早死，不能让你们多活”，这是政策。

此后，我才听说，香港当时从国内邀请了十个人。北京二人，上海二人，南京二人，兰州二人，重庆二人。这十个人在赴港时，只有重庆一人去了，其余九人全部被扣留。从这一全国性扣留看，这一措施并非一地，而是全国性措施。也就是来自安全部。

后来又听说我们并不是简单地被截押回来，实际上监控我们的是共产党的组织——政法委。五十年前，共产党假国家之名，篡改了《宪法》第 100 条，用国务院的名义，搞出一个《劳动教养决定》，打了 100 多万右派。五十年后，现在收拾我们的并非国家机构，而是共产党的组织——政法委直接露面了。在政法委的领导下，由公安、安全、街道共

同组成一个监控办公室。我们二人竟然是上了共产党的黑名单。

我们公开上书,要求补偿欠发工资,作为共产党就应该正面给予回答,没想到“债务人”对“债权人”采取了一种“债务人”不露面,让手下一批人搞了个和谐三部曲。这本来是政策问题,可这么一来又好像是帮会的作法,真搞不懂。

首先让公安找你。现在存活的老右都是七老八十的老头,老太太,自打“改正”以来,一直没有作过任何违法的事,都在谨谨慎慎作人,兢兢业业作事,都是大大的良民。公安的突然登门,实际上其用意是一种恫吓、威胁。

接着是第二步,来了鸡蛋、牛奶、饮料、食用油。你要问:“这就是二十一年工资的补偿?”。他们肯定说“不是”,但不论你清楚还是糊涂,这二十一年所欠工资难道就给折成几个鸡蛋,几袋牛奶,实际上就这样懵懵懂懂和你清账,这笔账就是这样还法。这算什么事儿?

这第三步,你要还不“闭嘴”,那就是监控。你的信件、电邮、行动完全暗中受到检查、跟踪。你等于暗中失去了自由。

最为歹毒的莫过于第四步,“上级”叫他们带话给老右:“你们就不考虑?你们有子女,子女还有子女”。这平平稳稳的告诫的背后,无异于咬牙切齿地说:“你该知道文革中,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北京大兴县大辛庄三天灭门22户,宰了325人,最老的80岁,最小的出生38天,这一桩革命举措吧”?赤裸裸宣示其封建法西斯“灭九族”的政策。

真没有想到对右派的政治打压竟然使尽了计谋,搞成了如此的终身制。可悲呀,可悲!

历史上有过这样的“债务人”给“债权人”还债的方式吗?

这像一个自诩为伟大、光荣、正确的政党的所作所为吗?

直到快到春节,我一直郁郁在心,我估计当时的书记梁心明还在世,写了一封名为贺年,实为清算的信给他。我的去信是:——

梁心明先生:(以前你是书记,后来你是部长,现在退了,我还是称你先生为好)

五十年了,我们不曾谋面,真可以算得上是久违了。

五十年前的春节前,你和那个开口就来“妈勒个B”的王万春副司长用特殊形式(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把我送走,至今倏忽半个世纪了。时光把我们都带到了耄耋之年,想必你如今已在乐享天伦,含饴弄孙,消闲纳福,安度余年了。

值此新春佳节,我也给你送上一份祝福,祝你寿比南山。

而我,作为一个受了伤的老年人,特别是有苦难经历的人,免不了要回忆,在世事纷繁中加以梳理,重新再作认识,思想永远得检查。

你是这段历史的一位“当事人”,如今我们都已行将就木,但愿你能回归人性,我们共同探讨那一段历史的真实。彼此也好有个正确的认识。也算晚年的一种慰藉吧。

(一)1956年,我调到第二机械工业部也就是一年,开展了肃反运动,你忽然把马世聪打成“汉奸”。一个二十岁出头的青年团员,一夜之间就成了曾经“通敌”的要犯。接着发动群众批斗,变相拘禁隔离。我是学生出身,没有政治运动经验,再加生性耿直,凡事较真,当时在讨论会上说了如下一段话:——

“‘汉奸’这罪名是很重的,是一种‘通敌’行为。因此,在确定此罪名时必须十分慎重。‘汉奸’是在日寇侵华的特定时间发生的一种犯罪行为。1945年日寇投降后,就可以说没有‘汉奸’了。按马世聪的年龄推算,1945年,他当时10岁。一个10岁的孩子当了‘汉奸’,他究竟有什么具体罪行?是给日寇送过情报?还是陷害过八路军?只有拿出他的具体罪行才能给他确定是不是‘汉奸’”……

我的这个发言惹恼了你,把我也给批斗晾晒了几个月。按规定我本该提级,也给我免了。可你们那帮没工作成绩,搞运动积极害人者都提了级。这我才明白了用昧良心能够换来经济、政治利益的真谛。但我的作人原则是:绝不害人。不羡慕那种利益。

把人整了近一年,马世聪是“汉奸”吗?没有事实根据,就不是。

把好端端一个年轻人说成是“通敌”的“汉奸”，肆意侮辱，政治诬陷，这对人是多么大的精神伤害？结果错了，没有安抚，更没有道谦，不声不响把他发落到外地就算完事了。事后你就不想想：他到外地，乃至一生背了这个曾经有“汉奸”之嫌的罪名，要承受多大的苦难？（我不知道他在“反右”、“清队”、“文革”中是什样的情况，但我估计，即使没打成“汉奸”，就凭档案里你们给弄的材料【我本人就领教了你们的黑材料】这辈子他也安生不了。）

时过境迁，现在再认识起来，我不知道你在闲暇时回忆不回忆往事，但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你执行的这项政策是正确的。从作人的角度说，难道你就不觉得谦疚？

刘增智是我来前几年来的，他了解马世聪，后来刘和你谈起此事，你的说法是：“啊——当时说他是‘汉奸’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后来没定他‘汉奸’也是合理的。”并且说这叫“辩证法”。1957年他为此写了一张大字报，你就把他打成右派，发落到甘肃。你对待此事的态度是自己错了还不许别人提及。如今我们实事求是地探讨一下，究竟马是不是“汉奸”？不是的话，整错了，该不该承认是错了？道一声“对不起”？这可是关系到一个年轻人一生的“政治”结论的呀。

（二）1957年反右，大家让我根据小组讨论整理出一张大字报：

胡闹和特权

几个月前，黑板报揭发了杨局长一家五口，住房300多平米，公家还特意花了13000余元装修费之后，张连奎副部长说这叫“胡闹”。

张副部长说的是黑板报在“胡闹”，我们说杨局长一家五口住房300平米，浪费13000余元装修费才叫做“胡闹”。杨局长为什么能这样胡闹，而且得到张副部长的同情呢？显然这是官官相护各自的特权思想。

在旧社会，特权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愚蠢浪、荡的少爷小姐，只要闹到一个特权者的“面子”，就可以免试进如最好的学校。但是谁又会想到今天仍然还有很多类似的怪事呢。

1956年，外贸部办公厅主任胡仁奎的女儿没有考上大学，张

副部长一封信，就免试送进北京工业学院第九专业。遗憾的是这位小姐太不争面子，暑假大有留级的危险。如果留级，白学一年，就等于浪费掉12个农民一年的劳动所得。说起来这种事还多得很，诸如，谭政的儿子，彭革华的儿子，薄一波的女儿，不都是靠面子入学的吗？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当我们接受了这种上级交给的特殊任务的时候，如果稍稍流露出一点不满情绪，领导还会指责你“固执”、“不好领导”、“不服从领导”……让我们蒙受一种莫名其妙的冤屈。

看来“特权”可以代替真理，这才叫“胡闹”！

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危害很大，特权思想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但愿在这次整风中能真正整掉特权思想，不许特权者再“胡闹”。

实际上，这张大字报的内容主要是刘国海讲的。我调来不久，这些事我根本都不知道。我是根据小组会上他们的意见整理的。整理完，小组讨论修改后才定稿的。责任本不应该由我一人承担。但大字报是我执笔的，这就已经误入了白虎堂，在那种情况下，不承担也得承担。最让人费解的是，你们胡乱编了一个荒唐理由，就把王宝善的团支部书记给“撤”了，立刻打成了右派。王是党员，聪明能干，竟然把那个“放”的最多的刘国海委以重任，火线上任，反倒当了团支部书记。这其中究竟是什么道理？我至今搞不明白。

在整风座谈会上，杨贵星的发言比谁也不少，而且激烈程度比谁也高昂，等到反右一开始，他成了掌握反右的中心人物。这划右实际上是因人而定，并非按言论而定。这是实事求是吗？是不是其中也有一定的帮派性？

(三)后来，赵尔陆部长的秘书刘智到办公室找我，谈起部党组刚处理完张召局长的事。他认为太不公道，此时，领导干部科科长盖剑英也来了。为了张召的事，他和王彬司长争论过。一群人议论写一张大字报。本来是让刘智写的，刘说部长给他布置的事太多，实在忙不过来，又推给让我写。于是写了这一张：

呼吁部长维护国法

绰号“西门庆”的二局副局长张召，干了一连串诱奸、通奸的犯罪勾当之后，竟然逍遥法外，对这件事谁不气愤？

奇怪的是，王彬助理却挺身而出，给这个罪犯作辩护律师。说什么：“在国外愿意和谁搞就和谁搞！”“中国是受封建思想的影响，才不那么随便。”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甚至无理地给提出不通意见的同志扣了一顶帽子——“你的思想是想把人一棍子打死！”

“外国”不知道王彬指的是哪个国家？如果是指资本主义国家，乱搞男女关系，除了少数荒淫无耻之徒外，正直的人们是会同声谴责的；如果是指社会主义家，那简直是污蔑。把新中国、党所维护的共产主义道德说成是：“因为受封建思想的影响”更是天大的污蔑。

身为党委委员兼干部司司长的王彬，对那种“封建思想的影响”大概是深恶痛绝的，但是，他又念念不忘另一种封建思想——“刑不上大夫”，在法律面前不能人人平等。因此，在这位辩护律师的庇护下，相张召、樊雨生等不少犯罪分子才得以逍遥法外。

犯错误就应该受到处分。比如教育司的某科员，因为流氓行为受到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行政司某科员，不但被开除了团籍，还被判了徒刑。这是维护维护共产主义道德，对犯错误的同志进行教育的公正处理。然而有的领导干部犯了加倍的错误，还是一贯的，却只给了似乎起点缀作用的轻微处分，这说明有些人是受到王彬的庇护，同时也不能不令人怀疑，参与研究国这类问题的大部分党委委员跟王彬有着同样的思想。

我们呼吁部长、副部长以共产党员的党性来维护共产主义道德，维护党纪，维护国家法制的尊严。

按理说，这张大字报的实际情况只有刘智和盖剑英知道，刘智在讨论此事的部党组会上担任记录，而盖是领导干部科长，研究处理张召的问题是他的职责，有些话就是他和王彬助理为此事争执的意见。其余人等都不知道。结果刘智当然赵部长保了他。后来，作为首先组织谈此事的他，几十年后，落了个从国防科工委办公厅主任的岗位上退休。我这个“不知情者”又因为是执笔人，再一次误闯了白虎堂，处理最

重；王宝善、盖剑英为了这张大字报，也全都被打成右派。失掉了正常工作的条件，被整了几十年。这让我们说什么才是好呢？

（四）1978年，中共中央落实对“右派”的“改正”政策。承认“扩大化”了百分之99.99（薄一波语）。共产党承认“扩大化”错了，毋庸讳言，实际上是毛泽东错了。难道基层执行者就没问题？我看基层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那时候你来信说：“当时我不主张打你右派，是他们要那样作。”他们是谁？谁又是他们？听起来你这话真有点好笑。又好像你在说：“啊——，当时是可以理解的，现在‘改正’也还是合理的。”这就叫“辩证法”。

78年，落实中共中央对右派的改正政策，那时候我的新单位政工科的人才告诉我：

“当初，二机部开除你送劳动教养还真费了点事啊。第一次报送公安局，公安局以‘此人不够条件’为由打回去了。第二次又送，又以‘不符合政策规定’打回。第三次二机部坚持非送不可，公安局才收下来。”

我很奇怪，问他：“你怎么知道？”他说：“这些档案里有。”那应该说此话不假。

我就想不通，你们怎么连一点起码的实事求是精神也没有？你就那么仇恨我？我们之间难道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何以非要置我于死地而后快？

你用整我、王宝善、刘增智换来点什么？无非是升一级，加点工资，可是良心呢？刚调来司里，还没有正式作工作的邓启仕、邹志勇也打成了右派。（邹79年落实“改正”政策时，已经50开外了，他找到的妻子肯定已过了生育年龄，你知道你们给他的实际处分是“断子绝孙”吗？）你们给这些人的亲属、朋友发了多少编造的陷害信？你们给天津大学发信，诬陷我妻子田滨去看我正上大学的弟弟，“后面公安局尾随，听不清他们说了些什么，”胡编得和反特小说一样，诬陷他们有反革命活动（你怎么知道我妻子去天津看我弟弟？那就是偷拆偷看我弟给我的来信。你说，你们怎么净干一些偷鸡摸狗的事？难道你们这作法不像“特务”？现在让别人听了真不知道该说你们什么是好。）我妻子不是右

派,为什么不能看望我弟?我弟解放时才小学毕业,与你们素不相识,为什么也想置他于死地?也许你会说:“搞运动嘛!”你那可是偷偷摸摸写的黑信。搞运动应该放在桌面上,怎么能写黑信?黑材料塞在他的档案里,整整让我弟弟在不知情中,背了18年“有不清楚的问题”罪名。一直到1978年,他们领导实在看不过,才告诉他档案中有份黑材料,并且说:“这材料实质是诬陷,公安局要尾随根本不会告诉他,天当初没有核实就不该编入档案。”最后和五机部交涉,才从他的档案中,通过组织手续撤销了这份黑材料。严格的说,你这是百分之百的犯罪行为!干了如此缺德的勾当以后,78年我写信问你,你说不是你干的。毫不以为然地说:“那是瞎诈唬”。什么叫“瞎诈唬”?谁干的这“瞎诈唬”?害人一辈子,那叫“瞎诈唬”?你怎么把害人就不当回事呢?

干部下放本来不包括教师,你们写了黑材料,把和我的右派问题毫不相干的姐姐下放农村,她供养的老母也只好下放农村。农村的老乡说:“哪能把85岁,双目白内障,和瞎子差不多的老太太也给我们送来,谁干的这事?他妈的,缺德不缺德?”

古代有所谓“满门抄斩”,现代文明不允许那么干了,但你们这作法与之相比岂不是异曲同工?这符合政策吗?

不管有多大的错误,只要有所认识就好。

我和王宝善历经了20多年的苦难,几乎丢掉了性命。这些就不提了。

陈金耀其实工作上还是有能力的,他比我来得早,而且已经在司里工作了五、六年,就因为他说了那张大字报是刘增智写的,不是我写的,找陈的毛病不好找,你就联系他妻子的单位,说:“她家香港有亲戚,属不可靠分子,不宜在部里工作。”把他们夫妻调往江西。广东人香港有亲戚的多的是,难道都是不可靠分子?香港人都是特务?听说你后来荣任统战部长,难道你能把统战对象都当特务?把港、澳同胞都当成特嫌,我就不知道你后来那统战工作是怎么作的?

司里一共31——32人,打了6个右派。大大超过了毛泽东主席规定的10%,达到了18.75%的高水平。估计你后来为此功劳也许连连高升,二机部要不撤销,你还不弄个副部长当当?难道你这样作,为的就

是这个？人总要有做人的道德品质，用这种方式换来的官阶，恐怕也不好向自己的夫人、儿女提起吧？我们都已成了耄耋老人，难道不考虑给子孙后代留下些什么道德精神方面的东西吗？很难想象你平时是怎样教育你的儿女的，教育他们如何做人的。孩子是单纯的，他们纯真的心灵一但知道作父亲的对待别人竟是如此这般，他们又会怎样去想？

我见过你的大孩子，那时候他还正上小学，看得出来，是一个老实忠厚的孩子。性格像你的夫人。

你狠下毒手，把我们打成右派，实际上我们哪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把学校当成自己家开的，想送谁上大学就送，有权的都这样干行吗？这不就乱了套了？还考试干嘛？这不是特权是什么？就是现在来说，党的政策允许这样干吗？对个别人的特权思想提出意见，怎么就是反党？这扯得上关系吗？乱搞了20多个女人，不处分，不许提意见，提意见就是反党？当头儿的都这么干行吗？社会还要不要道德、法纪来约束和管理？说张召搞女人的事，怎么也和反党反社会主义挂上了钩？你们这不是“乱弹琴”是什么？（这里说一句多余的话：“当初如果能正确处理何至于发展到大量‘包二奶’？‘包百奶’这种腐败现象？”）把“提意见”楞说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实际上那不都是你操纵“捏咕”的吗？21年后，由党中央承认是搞错了，所以才给我们作了“改正”。这是党中央的政策。那么你在这个运动中作了些什么？你执行的政策有没有问题？你对我们五个人的处理作了怎样的认识？都是共产党、毛泽东干的？和你没关系？

列宁说过：“世界上不犯错误的只有两种人，一是婴儿，一是死人。”错误，过左，狠毒处理同事，应不应该重新认识？你在工作中，向来是：“当时那么处理是合适的；现在再作这样的解释也是合理的。”反正你是永远正确，没有不对的时候，反过来有理，倒过去也有理，你比共产党、毛泽东还正确！现在大家都成耄耋老叟了，难道还要抱住一贯奉行的“文过饰非”的错误思想至老不化？

承认错误才是提高认识的前提，一个人到老年，能虚心，能反省，能理智，能面对实际，能承认对错，才是体验其道德修养的关键。

作为我个人，回首一生，可以说虚掷青春，枉度年华，对国家没有

什么贡献,碌碌无为了一生,心中自是万分惭愧!然而却没有干过那些搞得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命断中年的缺德事,这也是一份慰藉。

如今国家经济大发展,人民生活质量大大提高,希望我们思想认识方面也能有所提高,在此基础上的精神也能舒畅。

即此 顺祝

春节快乐 健康长寿

赵文滔 1/2/08

梁心明的回信

赵文滔先生:

收到你的信,晚了几天。我无法回答你提出的许多问题和意见。我只能就我把你打成右派,送公安局劳教问题答复如下:——

这是我为主干的。给你造成苦难的一生,这是我的罪过。向你赔礼道歉。

由于这是当时反右派运动中发生的偏差和错误,而不是个人之间的恩怨造成的。当时我们怀疑你和山西反动派有联系,并没找到真凭实据。有些情况也许你不知道,就是有一个多月,我被派去参加部属西安工厂、学校的反右派工作组。我回来时部教育局的反右斗争基本结束,进入宣布处理阶段。局领导让我出面宣布处理。因为我是教育局的党支部书记。所以有些细节,我也不太清楚。你有何意见和问题,请通过组织向我提出。以示正(郑)重。

此外,关于马世聪的汉奸问题,是指他是汉奸家的子弟,不能当国家干部。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不符合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

以上都是我在后来党和国家对反右派运动纠偏的工作中认识到的。我内心感到疚愧。

梁心明 2008,2月21日

这相隔半个世纪，一来一往的信件 2008 年三月经朋友介绍给了《往事》，4 月 3 日该报刊登了出来。一位编辑先生写了一段公正、寓意深邃的如下话语：

《往事》第六十八期【编者的话】

这是一位姓赵的老人写给一位姓梁的老人的信。五十年前，在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迫害中，赵是受害者，梁是迫害者。自那以后，招先生断送了前程，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梁先生则循着“害人者亦挨整”的逻辑，在另一场运动中，“几乎丧命”。

在给梁的信中，赵先生回顾那些痛苦的往事，只是为了唤醒梁先生的回忆和良心。从梁先生的回信中可以看出，他或许不是“恶人”，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原本不是恶人的人犯下了迫害同类的罪行，以至于引发了一次又一次的巨大的灾难？

研究极权主义的学者阿伦特曾经采访纳粹刽子手艾希曼的审判。阿伦特发现，艾希曼并非一心想作个恶人。他的症结在于缺乏换位思考的能力，“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在经过一番调查分析之后，阿伦特得出的结论是：“这种对现实的隔膜、这种无思想性(thoughtlessness)，远比人类与生俱来所有罪恶本能加在一起，更能引发灾难加浩劫”。阿伦特把这种人格特征称作“平庸的恶”。

在梁先生的回信中我们看到了道歉，但更多的是回避和推托。为此，他提到非个人因素，诸如运动、领导、组织、党和国家等等。他强调受害者的境遇是“由于这是当时反右运动中发生的偏差和错误，而不是个人之间的恩怨造成的”。

这是一个控诉者和辩护者都在引证的理据，即犯罪者是国家机器上的“齿轮”，他是在“执行命令”，而真正犯罪的是国家。因为每个人都在“执行”，就连制定命令的人也是在执行更高的命令，即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或者阶级利益等等。这一理据，最后会成为犯罪人推卸责任的托辞。阿伦特说，希特勒梦寐以求的就是那种不能追究个人责任的社会体制。

这种“非人化”是双重的，罪犯既可以在国家这个抽象的字眼下逃脱，也可以在“齿轮”这个具体的物象后溜走，最终导致有罪行而无罪

人的局面。

因此,必须将“国家”和“齿轮”还原为人,才能实现全面和有效的裁决。即:如果犯罪人被判断为正常的成年人,他就能够也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法律责任。

至于赵先生和梁先生的这段公案,以上的论证也成立。不同之处在于,此案的背景是:迫害的主体至今依旧倚仗权力,回避历史责任,因此无一个法庭可以受理此案。也就是说:“有罪行而无罪人”的局面仍将持续,受害者仍在面临压制。

唯其如此,赵先生不但有追究的权利,也有追究的责任和义务。这一追究不仅仅是因为“耿耿于怀”,而且事关人类的公正和国家的命运。正如赵先生所说:“整人者可以不受追究,被整者不能讨还公道,这算个什么国家”?

编辑先生用汉娜·阿伦特的理论,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分析了运动中的责任问题,法理和“恶”的问题,“谁之罪”的问题,这些分析都是很到位的。

汉娜·阿伦特还有一段话:“必须在法律犯罪与政治、道德上的问题作出区分,不但要从政治体制方面追究历史责任,还要从人性道德方面追究个人和集体的责任。所谓历史的反思,就是反思责任。正如究诘共同罪责一样,认为共同无罪也是不成立的。”

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道理,人类都需要反思,对空前的摧残上百万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从人类历史的角度,当然应当反思。然而,尽管“始作俑者”早已“驾崩”,历史进入的“后毛时代”,却并没有多少转变,仍然竭尽全力在彻底湮灭这一段历史。只不过政治方式更其诡诈而已。因此,阿伦特的道理,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太理想化,似乎这些正确的理论只适合于政治和道德标准完善的环境。在“特色”的环境中,特别是政治方式异常诡诈的环境中,这种理论的付诸实施对我们来说,恐怕还是一个无法测知的时日。

网 上 文 章

近年我在网上写了一些文章,现将几篇内容有关反右运动的收录于后,请读者一併指正。

不是《刑法》，胜过《刑法》的“劳动教养”

——谈谈中国的“劳动教养”

许多人都知道二战中德国的“集中营”，前苏联的“劳改营”。其实中国的“劳动教养”无论在苦役的程度、草菅人命、无视法律和人权等方面，比起前二者来，更具有特色。

探本溯源，中国的“劳教”是从前苏联学来的。1924年10月，前苏联制定了苏俄第一部《劳动改造法典》。1933年8月，又通过了第二个《苏俄劳动改造法典》。《法典》规定劳改分为：“劳动改造营”、“监狱”和“劳动教养营”三种形式。当年中国共产党一边倒学“苏联老大哥”的时候，可能也没有全闹明白，只顾照搬；听起来容易使人概念模糊，容易误会为处理较轻的处罚形式，说穿了也无非是易于掩人耳目的“劳动教养”。却没有弄清楚前苏联的“劳动教养”是收容未成年人和女性的，实际上在劳动强度、休假、学习、收入等条件和中国的“劳动教养”差池颇大。最终中国只是用了“劳动教养”的“名”，干的却是胜过“劳改”的“实”。

早年，中国共产党都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布重要文件。对于“劳动教养”，那时候可以说知情面比较窄，对于这类文件的内容，除开相关的机关，知情者也甚少。

1956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就发布了《关于省、市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强调：“把肃反中被审查，不够判刑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政治上又不适合留用的，把这些人集中起来，送到一定地方，让他们替国家作工，自食其力。并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的改造工作”。实际上这是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依照前苏联实行的那一套，把大大小小给前政权工作过的人员和一部分政治犯、政治上认为不可靠者，集中管理起来的办法。这和斯大林在西伯利亚、中亚等边远、荒芜地区办的“流放劳改营”是一脉相承，根本没有什么两样。

接着,中共中央又在《转批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意见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文件中规定:“某些直系亲属在土改、镇反和社会主义改造中,被杀、被关、被斗者的家属……可送劳动教养”。这样就明文确认了“株连”有理,把一些无辜的人都送去“劳动教养”了。实际上“劳动教养”在某种意义上说,正如马克思说的:“惩罚思想方式的法律,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不属于其党派的法律”。[註1]

到了1957年7月,毛泽东玩弄他蓄谋已久的反右“阳谋”,在青岛全国省、市委书记会上,他一边布置反右,一边已开始策划处理右派的办法。他说:“把一些右派搞去劳动教养……搞裴多菲俱乐部的教养他一、二十年”。此话出口不久,8月3日,国务院紧接着就发布了已经准备就绪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这就是以国家的名义,正式推行“劳动教养”这个非法的法的开始。谁都知道这个《决定》完全是针对“右派”的!

《决定》一开始,就堂而皇之的说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00条的规定[註2],为了把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为了进一步维护公共秩序,有利于社会建设,对劳动教养作如下决定……”

乍看起来这个《决定》似乎振振有词,是根据国家根本大法——《宪法》制定的,其实它和《宪法》毫不相干。《宪法》第100条的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这一条跟《决定》所依据的《宪法》第100条则是偷梁换柱篡改了的内容,以及毛泽东强加于“右派”的所谓罪行,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他们从宪法上找不到相应的条文,也不能自圆其说,便硬着头皮,不顾违宪,擅自用《决定》去篡改《宪法》,在《决定》中写上了宪法100条所没有的文字。他们说什么这是为了给“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人一条悔过自新的出路。试问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出路?实际上,他们在给别人罗织罪名的同时,却在犯着

“篡改”宪法的重大罪行！如果国家根本大法可以听命一个人“篡改”，这《宪法》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难怪中国没有设置宪法法院和宪法维护委员会一类的机构？（即使有，也必然是一个徒有虚名的幌子）。

仅仅是根据篡改了的《宪法》第 100 条的内容颁布的《决定》，在 1958 年，就把 500,000 多“右派分子”投入了劳动教养。[註 3]他们被流放到边远、荒漠之地，在那里忍饥饿、服苦役，每天要劳动 12—14 小时。作为知识分子干部、大学教师、大学生、工程师和各类专业人才，被扣上“右派”帽子后，每天都得接受只有初中甚或不够初中程度的管教人员的“教育”和“培养”。整天不得不谛听喋喋不休的，那一套套让人啼笑皆非的训话。口口声声要大家“低头认罪，接受改造”。在劳教过程中，由于超体力劳动和饥饿，致使甘肃夹边沟劳教农场 3000 多右派分子，大多数因为饥寒交迫而死亡，没饿死的只剩下 200 多人。死者中有不少学有所长的专门人才。付作义万没有想到被他从美国叫回来的水利专家付某是他的亲弟弟，也去夹边沟送了一条命。[註 4]北京最大的劳教农场茶淀农场、兴凯湖农场，饿死的右派分子也以万计。著名翻译家、美学家吕荧，只因为在批判胡风的大会上说了一句：“胡风不是反革命”，就被发配到茶淀农场活活饿死。这位著名翻译家死前已经被改造得骨瘦如柴，衣衫褴褛，盖的被子成了一团破烂棉絮，破棉絮里生满了吸人血的虱子和虻子。这就是所谓的“行政处分”？这就是“劳动教养”？难道这些被饿死的右派分子都是“罪所应该”吗？[註 5]对于这些被“行政处分”饿死的人，共产党讲过半句负责的话吗？表示过半点给予赔偿的意愿吗？这些已经被揭露出来的事实，对全国被劳教的右派分子来说，只不过是一鳞半爪，其他没有被揭露出来的，在“宜粗不宜细”的理论下，都被掩盖起来了，又有谁能作出精确的统计呢？

据说，1957 年前，全国被劳教的人数还不到一万人。1958 年《决定》的一声令下，仅仅一年的时间，又赶上当时的“跃进”狂风一吹，全国立即建起一百四十二个劳教场所。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有的地方大搞县办劳教、社办劳教。乃至生产队也办劳教。大大小小的共产党头儿，想抓谁就抓谁。全国劳教人数很快就收容到了超过百万。1961 年，

公安部不得不承认：“扩大了收容范围和收容对象，错收了一批不够劳动教养的人，在管理上和劳改犯等同了起来，生活管理和劳动生产上搞了一些超体力劳动，造成了劳教人员非正常死亡的严重现象”。拐弯摸角，轻描淡写，避重就轻地道出了一星点真实。尽管发现了严重的饿死人现象，但没有一个人敢说一个不字，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走向死亡！

在劳动教养中，最为恶劣的是“教养”没有期限。同时，却又可以随心所欲地确定期限。1958年被送到茶淀农场的右派，到了1962年，已经被劳教了四年，有少数人已经第一批摘了帽子。农场却对大批没摘帽子的右派宣布：“以前教养多久不算了，现在有了期限，重新开始，教养期有的一年，有的二年，有的三年……”。这是“法规”还是“玩笑”？从形式上看，有了期限，有了盼头。实际上期限到了，却又编造种种借口，不给你摘掉帽子解除劳动教养。这叫什么“法规”！

有的右派分子已经第二次重新确定教养期为：二年，三年，但一直拖到文化大革命，全国都乱了套，共产党光顾了全国大斗争，早把服了十几年苦役的几十万右派扔在一边，谁还管你教养了多少年的事？大概北京教养农场这批二十多万人就一直拖到1978年，落实“改正”政策。整整熬过了长夜难眠的二十一个春秋！难道这也算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在实施自己公布的“法规”？世界历史上有过这种“拿人不当人”的“法规”吗？除了德国的“集中营”和前苏联的“流放劳改营”之外，还有哪个国家是如此践踏人权，妄加罪名，搞“刑期无限”的呢？

自从1958年以来，这个劳教《决定》不受法律制约，在全国广泛实行，一直过了22年，当权者觉得实在不象话，才又通过人大的议程形式抛出个《补充规定》。说是：“劳教可以一年至三年，必要时延长一年。”作为全国最高权力机构的人大，这些吃着纳税人的所谓“公务员”，经过漫长的二十多年才作出这样一个过时的、走形式的规定，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这样制定“法规”的？这点工作，人大费时22年，该不该算作“不作为”？如果劳教了21年的右派问他们：“我们超期劳教21年算怎么回事”？他们无言作答，死皮赖账了！

1978年,中共中央给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落实“改正”政策,当时没摘帽子的右派据统战部说有二十多万,摘了帽子的也有二十多万,大都还在劳教农场,一直被劳动教养着。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40条规定:“有期徒刑的期限,为六个月以上,十五年以下。”这就是说,对于众多被错划右派劳教了二十一年,刑期竟然仅次于“死刑、死缓、和无期徒刑”!这种所谓“行政处分”竟然比“刑事判决”还要厉害得多。这就不得不使人困惑:劳动教养究竟算个什么“法规”?能够制定出这样的“法规”的国家,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后来才听说,封建王朝统治时期的“流放”、“充军”、“发配”等惩罚,实际上就是“刑期无限”。“劳动教养”的无期,是不是封建王朝传承下来的?可是,说“行政处分”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没有说它是封建王朝。我们国家究竟算什么社会制度呢?求教高明,谁能解释得清楚?

再者,《决定》的第二条有这样一段话:“……并且可以酌量扣出一部分工资,作为其家属赡养费,或者本人安家立业的储备金。”但是那些服了二十一年苦役的右派分子们,谁也没有见到一文这样的所谓“储备金”。究竟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说话不算数?还是被什么人贪污了?还是被什么人挥霍了?你要去问,共产党也好,国务院也罢,都好象没长嘴巴,拿不会说话,给你赖账!

从1958年公布《决定》,到1978年侮辱右派告一段落,《决定》的施行说明了一个真相:劳动教养实际上是赋予了每个单位的负责人以一种特权。他们可以不受法律的制约,仅凭个人的意愿,就可以为所欲为地把本单位的,认为不顺眼的人,送去劳动教养。这完全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大大有利于某些当权者,借以整治他们随心所欲收拾的人。这种法规助长了当权者的肆意横行,助其得已任意惩罚百姓。对于弱势群体来说,这是一种伤害他们最深的恶劣罪行。

历史毕竟在前进,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落实政策,国家对于被劳动教养了几十年的群体也作了些许“清理”和“安置”。但一个始料不及的问题应运而生,社会上遍地冤、假、错案,又不能有效解决,形成了大量上访者的“上访潮”滚滚而来。由于信访机构设置不合理,党和政府

各有一套,两套班子又各行其“是”,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致使上访材料被层层转了下去,最后,把“状子”都转变到“被告”手中。于是形成了告状——报复——再告——再报复的恶性循环。(河北省检举大贪污犯程维高的检举人就被投入劳动教养农场数年之久)。人民的实际问题得不到解决,上访的人越来越多,而政府又不体察民情,改革机制,为民撑腰,依然是“状子照转”,所以许多违法乱纪的事情层出不穷,如同滚雪球一样,冤案之上又加冤案。进而,“劳动教养”又成了收容“上访者”的一种手段,许多上访者陆续被关进了劳教所。

几十年来,实行劳动教养,其中一个最不切合实际的歪理就是“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说它是歪理,因为被拘押者本来都有自己的生产、生活能力,而被强制关押以后,才被迫失去了原有的生产、生活条件。硬说他们以前不是“自食其力”,实在是“有权者”迫害“无权者”的不讲理说词。不管它合理不合理,反正只有“有权者”给老百姓定罪名的权力,而老百姓没有任何辩解的权利。

要送人去劳动教养,事先就得把这些人集中起来,便于集中遣送和安置。这种集中地就是所谓的“收容所”。

1980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将强制劳动与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1982年,国务院转发了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的办法》(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1957年正式颁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而且已经实行了24年,却又被它的下属机构——公安部又决定要“试行”,这简直是乱了套,滑天下之大稽!)办法针对的对象是:“家居农村而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作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这就给农民进城者立了一条规矩。所谓“符合劳动教养条件”那就是当权者的一句話。说你符合,你就符合!

1986年,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通过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90年12月,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禁毒的决定》。1991年9月,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又通过了《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把这些法规要处理的吸毒者、卖淫者、嫖娼者、小偷流氓、“符合劳教者”,通通都纳入了劳动教养的范畴。这

就大大地扩大了劳动教养的人数。据说,目前全国被劳动教养的人数已达 400 万人。或者已经超过了这个数字,这是多么骇人听闻的数字啊!

2003 年,青年知识分子孙志刚被收容到广州“收容所”。下一步等着他的大概就是到劳教场所进行劳动教养了。意外的是他在“收容所”被打死了。试问,如果他在天高皇帝远的劳教农场被打死,又有谁知道呢?无辜的青年知识分子孙志刚用一条命,换来了国务院“撤销收容所”的“令”。但“收容所”并不是弱势群体最终的归宿,他们都是要被送到劳教场所的。现在国家的《民法》和《刑法》对各种犯法行为都有相应的处理条款,我们有法不用,却仍然死死抱住这个超法律、不受任何约束的“劳教决定”不放,别有用心地灵活运用,转而针对农民和弱势群体了。《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中反映的事实,着实令人触目惊心。

如果国家真正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话,我们能够允许这种超乎法律之外,类似“集中营”的劳动教养制度继续存在吗?能够让“有权者”用它来对付弱势群体,乃至打击报复向邪恶势力作斗争的人吗?

[註 1] 《马、恩全集》卷一, P16——17

[註 2] 1954 年《宪法》

[註 3] 《回忆和研究》李维汉

[註 4] 《夹边沟记事》杨显惠

[註 5] 《走向混沌》丛维熙

中国的“劳动教养”是怎样教养右派的

——再谈中国的“劳动教养”

1957年，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从始至终都是他一手具体操纵的。当年夏季，他在上海干部会议上，以及稍后的青岛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在反右派运动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就两次谈到了处理右派的办法是：“把右派送去劳动教养”。

虽然以前曾用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布过，关于要求各地建立劳动教养机构的文件，那只不过是根据“百分比大师”随意推测出来的，百分比极小的特定人群的，一般人并不知情。

反右运动中，所谓的“右派”提出了许多关于人治、党治、法治的意见，尽管这些正确意见当时被诬为“向党猖狂进攻”，实际上估计毛也可能有他特别的考虑。因此，在处理为数众多的右派时，一改以往一切均用“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布的惯例，首次出现了处理右派的“法律形式”。那就是从表面上改而为“尊重”《宪法》，用“国家”的名义，继而“根据人民政府长期的考虑和研究”（1957年8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要实行劳动教养」一文中的话），在中国的法律中，实在找不出“言论罪”、“思想罪”，最后竟然找出个《宪法》第100条。把条文加以篡改，作为依据，用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的名义，通过人大的“形式”，才颁布了一个《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作为处理右派的所谓“法律依据”。

这个《决定》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法规”。中共中央也在不同场合再再说明：“……对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一种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劳动教养同劳动改造罪犯是有区别的”……

虽说这《决定》是“长期研究”制定的，实际上谁都明白这是专为收拾右派仓促弄就，漏洞百出的一个文件。因为是匆匆拟定，这《决定》本

身就存在一些问题。首先,他依据的《宪法》(1954年《宪法》)第100条,其原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那么,哪个右派违反宪法和法律了?哪个右派没有遵守劳动纪律?哪个右派没有遵守公共秩序?哪个右派不讲社会公德了?他们仅仅是根据《宪法》第8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来行使自己的权利。[仅仅施行其中一项——“言论自由”,还是被骗而去“施行”的]给行使合法权利的公民扣种种帽子,以镇压的手段阻止公民行使合法权利,才是真正违反宪法和法律!他们强行这样作,只是因为他们有强权而已。

其次,毛泽东还说:“只要他们不当特务,不再进行破坏活动,也给他们一点事作”。哪个右派是特务?谁从事过“特务活动”?这简直是“帽子大王”的疯话!40年代延安整风,他就毫无根据的随意给王实味扣上叛徒、特务、托派、国民党探子等等帽子。反胡风运动中,他又给所谓“胡风分子”毫无根据地扣上:“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托洛茨基分子、反动军官、共产党的叛徒……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註1]他几乎搜集尽,创造尽了世界上这类的词句,给一切他不满意、怀疑的人扣上“莫须有”的大帽子。最后,他的这些疯话,被历史证明都是毫无根据的编造和诬陷。在反右运动中,他又一次玩弄了这一可耻的手法。使用这种手法固然他觉得得心应手,然而他却全然不想,在相当数量正直人民的心底,他已经失去了被敬如神明的伟大领袖形象,沦为一个疯狂的,好话说尽,坏事作绝的暴君。

《决定》在主要针对右派的第二条中说:“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显然,在这里他又故伎重演,又在没有事实的情况下编造了一些“莫须有”的罪名,牵强附会,含含糊糊地给右派分子扣上了“反革命分子”、“反动分子”等等纯属诬陷的政治大帽子。

《决定》所说的:“需要劳动教养的人,由民政、公安部门、所在机

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或者家长、监护人提出申请,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或者他们委托的机关批准”。这完全是愚弄人民的假话。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声明过,他是一个“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人。在处理右派时,为了扫清那些碍手碍脚的“法规”的羁绊和干扰,以便从上到下充分按照其主观随意性办事,给各级负责人创造一种任意使用权力的条件,才编造了这么一条。这一条的实际内容乃是:“只要单位的书记和负责人说‘你需要实行劳动教养,就可以送你去劳动教养’,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而执行机关公安部门则是:“只要单位送,这里就收,反正咱们都是共产党领导的”。所谓的民政部门根本没有参与这项工作。至于什么“人民委员会或委托机构批准”一说,更是子虚乌有,根本就没有这个机构。

那么,这个《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对右派分子是怎样实行劳动教养的呢?

(一)

1957年底至1958年的4、5月,是集中处理右派的高潮时期,当时,处理右派的单位对毛泽东思想精神下的中央政策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兰州的单位送右派去劳教农场(包括著名的夹边沟农场)时,是由单位的人事干部去送的。[註2]他们大概认为:对右派是“行政处分”,属于“人民内部问题”,还是自己人。而在天子眼皮底下的北京就不同了,对于右派的处理可以说完全体现了毛泽东的意愿。当时的北京,中央、市级机关、团体、企业、学校被划为右派的人有10万之众。(时至今日也无法得知或统计到确切的数字,10万之说有少无多)。一批批从单位被公安局带走,实行的是空前大逮捕。分别被送到诸如:草岚子监狱、半步桥第一监狱、地藏庵(炮局)监狱、北郊监狱等各个监狱。一进监狱就先收走手表、指甲剪、钥匙、水果折刀一类金属类的用品。三十多人挤在一间监房里,窗户一律铁栅栏封闭,门上只有一个20公分见方的小洞,是打饭用的,也是巡逻者夜间的窥视孔。就这样没有经过检察院、法院的任何司法程序逮捕入狱了,完全剥夺了他们

的自由。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行政处分”，“和劳改罪犯是有区别的”，“也是给了他们人权的”。

在监狱经过一个时期的拘押和集中(半个月到一、两个月不等)凑够一大批一大批人之后，将会被武装押运到不同的劳改农场去“劳动教养”。

已经关押在监狱的右派，说不定哪天的深更半夜，突然会把他们叫醒，让他们扛着行李到院子里集合。这批右派站在院子中间，四周楼顶的探照灯一亮，照得院里通明，隐约可以看到楼顶的阴暗处架着机枪，直对着这群手无寸铁的右派。数九寒天，这批右派也不知道是吓得还是冻得，个个瑟瑟发抖，惊恐万状地排好队，被押上一辆辆大汽车。车厢前后都有荷枪实弹的冲锋枪手把着车门。也许是为了掩人耳目，遣送都是在夜深人静，街上行人极少的时候。遣送队伍相当壮观，前有武装摩托开道，后有押解官的武装吉普车断后，如同押解着一批“江洋大盗”，浩浩荡荡，直奔火车站。上了劳动教养“专列”，前后门仍然是冲锋枪手把门，而且还不断地喊喝着：

“不许乱动！”

“不许开窗！”

“不许讲话！”……

车到农场附近的火车站，下车徒步向农场进发，周围又有全副武装的骑兵，马不停蹄地在前后左右打趑巡视，造成一种恐怖气氛。

进了农场，那里是电网、高墙，四方岗楼上有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日夜警戒。这种剥夺了人权的作法就叫做“行政处分”？这难道不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空前的，人数最多的，详细情况不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知的现代文字狱？

(二)

住进农场，首先被告知：“给任何人写信，必须一律交到队部，由管教人员审阅后，代为发出；所有‘劳教’人员的来信，先由管教人员拆阅后，再发给本人”。这就是说，接着又剥夺了右派“通信自由”的权利。

安定下来,悬在他们心头的大问题是:究竟要劳动教养到几时?《决定》中说:“劳动的期限也可以由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酌情批准”。而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机构。

1959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写给刘少奇的一封信里谈到:“……我认为,积以时日,至少可以争取70%的右派分子改变过来。例如说,在今后七年中(或更多时间),每年争取转变和摘掉帽子10%左右是有可能的。”这大概就是劳教没有时限的一个原则——由他随意掌握。他没有点头,《决定》岂敢擅自规定时限?

到了1960年,在北戴河会议上,毛又提出要大抓阶级斗争以后,这个“七年(或者更多时间)”自然就又打水漂了。

时至1962年9月29日,毛泽东在中宣部的《宣教动态》增刊第63期上作了一个让右派分子们寒心的批示。批示说:“刘、周、邓三同志阅,请邓查一下,此事是谁布置的?是组织部,中直党委,还是国家机关党委自己?此事出自中央机关内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加以推广。事件出在6、7月间,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阅后付还,查后告我。”这个批语说明,中央上层有人想给右派“甄别”,也是一种对处理右派有看法的反映。岂不知毛的独断专行、反复无常,焉能允许别人作出决断?所以,引得老毛大怒之后,再也没人敢提右派甄别的问题。顺理成章,被劳教的右派分子的劳教时日也就又没有个时限了。

1963年,集中在茶淀劳改农场的右派分子们,突然得到农场的通知:“以前劳教的四年不算数了,从现在开始,按新规定劳教有了时限,分为一年、二年、三年三种……”这些右派分子听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难道也算国家的“法规”?哪个国家能拿“法规”开玩笑?这里还有一点国家法规的严肃性?哪个国家有坐了牢四年不算数,重新从头坐起的?哪个国家能拿“法规”来戏弄人折腾人的?

以后的两三年内,确也有极少数右派摘掉了帽子,然而摘和不摘没有太大的区别,摘掉和没摘的依然还在同一农场继续劳动,实际上等于还是继续劳动教养,只不过获得了一个戏谑的称呼——“二劳

改”。

一直又拖过了最高教养期(三年)五倍的时间——十五年。到了1978年,毛泽东已经驾鹤西游了,中共中央才终于决定给右派落实“改正”政策,这几十万右派分子竟然被整整劳动教养了二十一个苦难的年头。比《刑法》规定的最高刑期——十五年,还多了六年。二十一年的劳动教养期,按刑期排列,仅仅可以排列在“死刑”、“死缓”、“无期”之后,列为重刑的第四位。这就是中国的“行政处分”?究竟是谁违法?世界历史上哪个国家曾经把“权力”和“法律”戏耍玩弄到如此程度的?

(三)

《决定》的第二条规定:“对于被劳动教养的人,应当按照其劳动成果发给适当的工资;并且可以酌量扣出其一部分工资,作为其家属的赡养费或者本人安家立业的储备金”。

应该说,这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的明文规定。右派分子在劳动教养时,已经是家破人亡,一贫如洗了。这一规定可以作为他们的唯一经济希望。但二十一年来,他们始终搞不清这笔储备金是怎么计算的。每月的伙食费,无论你吃窝窝头管饱,还是一天给你四个糜子面窝头;无论每天给你六个乒乓球大的白薯面窝头,还是是一天二两玉米面加野菜的三碗汤;无论每天给你根本不是食品的所谓“代食品”,还是一天三碗白薯粥;奇怪的是都扣除同样的伙食费,价值和价格一律均等。每个月扣除了这昂贵的伙食费之后,剩下的也就能买一条毛巾,一块肥皂。在这种“克扣”条件下,《决定》所说的“赡养费”和“安家立业储备金”究竟积累了多少?经过50年了也没有个交代。到底有多少?贪污了多少?还剩多少?国务院说话算不算数?难道国务院也骗人?哪个没有良心者会狠心骗取这群饿殍二十一年的“血汗钱”?

1959—1960年,农场饿死了一批人(劳教右派),有些人没死也成了饿殍,农场没有条件让他们恢复健康,留在农场必然是“死”路一条,最后决定把他们送回家去“养病”。此时,不但没有什么“赡养费”,什么“储备金”,因为病得不能劳动,连工资也没有。回到自己破碎的家,还

得剥削自己的家人,生活真的是雪上加霜。有的人实在忍受不了生活精神的折磨而自杀了;有的只好再回到农场,在毛泽东的“不给饭吃”的政策下,被逼得主动劳动教养,真是凄惨至极。

1978年,中共中央给右派落实“改正”政策,不但不补工资,甚至连国务院明文规定的“家属赡养费”和本人的“安家立业储备金”都一文没有了。这笔积累了二十一年的“赡养费”和“安家立业储备金”哪儿去了?是被贪污了?被骗了?没有人说话。堂堂国务院怎么能作出这种赖账的丑事呢?

(四)

1958年开始对右派劳教时,从年龄上说,除了极其少数20岁以下的,年龄较小的是当时的大学生。那时候他们也不过22—24岁,其他大部分是中年人,也有少数年龄大的。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二十一年中,他们已经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当时正在谈恋爱的,你就是铁鸳鸯,也经不住“左”字号政治大棒的打击,不得不划清界限,各奔东西了。“改正”的时候,二十一年的岁月,把他们都作了无情的转换,当年的青年学生已经成了近五十岁的准老年人了,中年人也快退休了,老年人也该养老了。对于他们个人来说,紧接着,现实又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安家”,也就是要组织家庭。但客观是无情的,哪里还会有年龄、性格、文化水平、喜好等条件相当的女性会等着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要说他们组织了“美满幸福”家庭的,实在是太少太少了。他们结婚的对象,要么是已婚丧偶,要么是离婚的,和他们结婚的相当多数是为了供养带过来的前夫的孩子。间或也有因为种种原因没有结婚的老处女,性格往往有点古怪。不管怎样,双方的一个不可否认的共同特点是,绝大部分人都已超过了生育年龄。

在这种情况下组织的家庭,可以说,相当一部分家庭,免不了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晚年的精神生活也是凄惨、孤寂、难以对人诉说的。

古代有所谓“宫刑”,可以使人断子绝孙。那么这种具有中国特色断子绝孙效果,无异于鲁迅先生所说的“软刀子”的新式狠毒作法,比

起“宫刑”不是高明了许多吗？又该称作什么“刑法”呢？

(五)

在长期的劳动教养中,相当一部分人丢掉了性命。有饿死的、累死的、病死的、触电的、上吊的、投河的、卧轨的、工伤的、意外的……

不论是哪一种死,可以说,如果没有劳动教养,肯定他们不会死,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那么这些种种的不幸事件,究竟应该由谁来负责?应不应该有人负责?该由谁来承担责任?

运动的始作俑者和组织不承担任何责任,还转换成了施恩者。当年,借机以害人往上爬的人,爬上去了,没有受到任何行政和道义上的追究和责备,他们依然得势,依然不时闪动着狡诈的目光,又在窥探着动向,又在捕捉新的政治利益。在近百万右派的血肉躯体和血迹中踏来踏去,在数百万亲属的哭号的泪河中,曾经挥拳蹬脚,暗下毒手的打手们也不负责。这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人性、法制?

劳动教养这个行政处分也可以“取人性命”的吗?而且致人死亡也不负任何责任的吗?一个好好的活人,折腾死你就死了,难道我们又回到原始社会了?难道我们能和当年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一样吗?

(六)

当真是彻底“改正”了吗?当真“平反”了吗?

不是有朱镕基作了不歧视、不欺凌、不压迫的样板吗?

在历届运动中,在毛泽东“保护积极分子”的政策下,一批批积极分子非但在政治、经济、生活上获得了血腥的好处,而且他们仍然一直继续以“极左”的面目活动着。他们积运动之经验,深深地懂得“积左”在任何情况下,只会获得好处。记得有人说过:“革命队伍从来都是由理想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组成。而最后,所有权力和利益的获得者则是机会主义者。”几十年来他们大都坐了“官”,弄了“钱”,成了各单位上上下下的主要成员。他们认为给右派落实政策无异于是对他们当年

反右时,用伤天害理换来的“积极分子”荣誉的否定。更是对他们如今获得的利益、声誉、官阶等的嘲讽。所以,给右派落实政策他们打心眼儿里不满意。

1978年,给右派落实“改正”政策时,本来处理右派有一种“保留公职,送劳动教养”的二类处理办法。按理说,既然保留公职,就该回原单位,但是有的单位硬是扛住不接收。因为这个活人的回来就等于在他们身边安放了一面可以显现出他们当年作为“积极分子”丑态的镜子。“拒绝接收”分明是违反政策,然而“保护积极分子”的余荫一直阴魂不散,袒护着他们,使得这批人对任何事件都无所畏惧。所谓的“组织”也奈何不得他们。

当时还听说,为了落实政策的需要,中央批给10万进京名额指标。有些有权者却假公济私,把他们的亲友借机搞到北京,有些该回来的右派只得留在外地。

一位右派落实政策后参加了党,当工作需要提拔他担任某个职务时,材料报到组织部门,竟然说:“他有右派的历史问题,不能批。”[註3]

有的单位在评定职称时,“左派”说:“他们(右派)二十多年没干工作,那怎么可以评职称呢?”于是,“左派”又升级,又加顶戴。连A、B、C、D二十六个字母也不认识者,居然恬不知耻地也戴一顶“高级XX师”、“高级YY师”的职称桂冠。似乎这些“左派积极分子”只是脸皮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无限地“厚”,没有“知觉”,只要有利可图,没有他们不沾的,任何时候都不知道什么是脸红,良心,什么是廉耻!

直到2001年,已经落实右派政策二十三个年头,仍然有一个叫做陈瑞华的人,在《中外法学》(此刊听说是北大法学院编)杂志上撰文说:“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劳动教养制度显示出了空前的生命力,在全国被划为右派的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中,劳动教养是处理这些‘右派分子’的主要方式和首要手段。”大加赞扬这个非法之法的“劳动教养”。为好人被错划为右派,被人利用“劳动教养”这个“恶法”冤狱二十一年而拍手叫好。

香港《凤凰周刊》2004年四季度有一期载文说:黑龙江某地一个劳

教农场,直到2004年,在农场被教养右派,因为原单位变更,原住城市没有房(划右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没有了房);还有在大学时,被哈军工送劳教,落实政策时,哈军工已撤销,无人受理安排,只能继续留在劳教农场劳动,直到退休时,也从劳教农场退休。未来的坟场也是农场。把一生葬送在“劳教农场”。对于这难道不是世界少有的人间惨剧?

由此,忽然想到,右派分子林希翎后来被正式逮捕。在监狱里,有一位审判人员审判她的时候,对她说了一段恶狠狠的话:“你看着吧,共产党还对付不了你这黄毛丫头!我要让你年轻地进我这监狱,而把你关到白发苍苍,我要关你一辈子,我要让你断子绝孙!” [註4]

是的,不少右派分子确实被教养得白发苍苍了。林希翎倒没有断子绝孙,而相当数量被教养了二十一年的右派分子,却有不少人真格的是断子绝孙了!这难道不是一场世界历史少有的人间悲剧?这就是劳动教养的所谓“生命力”?

这就是所谓的“行政处分”?

这就是所谓的“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方式?

这就是“不是刑法,胜过刑法”的中国特色的《决定》?

[註1]毛选五卷 P163

[註2]和凤鸣:《经历——我的1957年》

[註3]《书屋》杂志

[註4]卢弘:《右派活化石——林希翎》

1957年究竟打了多少右派？

1957年究竟打了多少右派，已经四十九年了，仍然是说法不一，尚待继续考查、研究、挖掘，以期找出一个确切的记录数字。

从1957年反右以来及以后的49年来，有如下说法和记录：——

1957年6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中说：“全国大约有右派4,000人左右。”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央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的通知》中说：“准确的骨干名单扩大了一倍，全国不是4,000人，而是8,000人。”

1957年9月，中央八届三中全会时，全国又划了6,200人，当时估计的是150,000人。接着又向全国发出划右派的百分比。

1958年，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说：“全国有右派300,000人，把300,000右派搞臭了！”

1959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指示》中说：“……全国揭发出右派分子约450,000人。”

1960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批发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统战部《关于右派分子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中说：“……在全国440,000右派分子中……”

197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汇编的报告中说：“在整个反右运动中，有2,013,300余人被定为右派。有72,000多人被捕，22,100多人自杀，有3,500多人非正常死亡和失踪。”

1978年9月，中共中央批准中央五部门《关于继续执行中央[1978]55号文件几个问题的请示》中说：“……至七月中旬，属于错划改正的有493,000人，占所划右派的百分之90。”按此推算，百分之百应该是：548,111人。

1979年2月17日，刘澜涛在“改正右派工作经验交流会”讲话说：“当时共划了右派540,000人，占当时干部人数9,530,000人的百分

之 5.7。”

1979年,中共中央中发[1979]65号文件《关于继续执行中央[1978]55号文件几个问题的请示》中说:“……在反右中被定为‘中右分子’及‘反社会主义分子……其中仅失去公职的就有160,000人,这些人虽未戴右派帽子,但有的所受处分,比右派还重,处境困难……”(右派分子一般除了枪毙,编个罪名判刑,就是劳动教养21年。在教养时有饿死、累死、自杀、致病、致残各种悲惨结局。不知道“比右派还重”重到什么水平?详情从未听说过,至今也没有人披露,也许写文件人不好说出口。)“此外,当年在农村小学教师和基层干部也划了不少右派,虽然后来中央下令不许在农村小学和基层干部中划右派,但是为时已晚,划和不划已经乱了套。这部分人也不在少数。这两者大体上也有几十万,戴或没戴右派帽子,却按右派,甚至重于右派的处理办法处理的‘中右分子’。”按照这个没有数字的说法,已划右派的和当作右派处理的人,实际上恐怕超过了百万。显然,这个文件说明中共中央默认的数字大于刘澜涛、薄一波所说的数字。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第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为57年反右辩护时说:“57,58年的反右派是「正确的」,「必须的」……我们反了2,900,000右派,约500,000多右派受到镇压。”(台湾新闻周刊出版沙兹伯里著,林君彦译《新皇朝》,第161页)。

1985年出版的叶永烈先生所著《反右始末》中说:“1980年,右派分子的改正工作基本结束,全国的右派有了精确的统计,即550,000多人。当然这仅仅是指‘正宗’的右派分子,还不包括‘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如果把这些‘分子’和受牵连的家属们计算在内,那就达数百万之众!”

198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从进先生著《曲折发展的岁月》一书中说:“全国右派共划了:552,877人。”

1990年6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说:“57年划右派估计有40—70万人。”

1991年,香港九十年代出版社出版的丁抒先生所著《阳谋》一书中

说：“根据调查，反右运动总共被打成右派的人是：1,300,000人。”

1993年，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错划了右派：550,000人。”

1993年，朝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左祸》中说：“57年划右派552,973人。”

1998年5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朱正先生著《1957年的夏季》中有一种说法是：“德国乌利·弗朗茨著《邓小平——中国式的政治传奇》一书中说：‘57年划右派800,000人，株连2,900,000人。’”

后来，处理右派的统战部、公安部在处理完“改正”问题，也没有公布一个确切的右派总人数。匆匆了结了这宗历时21年的政治大冤案。

1958年，处理完大城市的右派后，已经到了1962年，中共中央还发了一个中共中央[1962]544号文件，强调“不经过中央和省委批准不得再划右派。”可见当时划右真格是“放开”了，所有的党组织都有权划，谁划得多，谁立场坚定，也有的是借机大报复。各单位、各地在毛泽东的鼓动下大力划右，以至连中央也控制不了，1958年已经处理完北京的右派了，全国还没有划完，弄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了。

实际上1979年中共中央中发[1979]55号文件的说法，已经否定了50多万的数字，不明确地说实际情况已经达到百万。

2006年2月，传来一个信息。香港杂志《争鸣》1月号上有一篇文章说：——

“1958年5月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定性为右派集团22,071个，右倾集团17,433个，反党集团4,127个；定为右派分子3,178,470人，列为中右1,437,562人；其中党员右派分子278,932人，高等院校教职员右派分子36,428人，高等院校学生右派分子20,745人。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

这一数字披露后，没有看到任何承认或否认的信息。

就知道的这些说法看，数字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公布了许多苏共以往见不得人的罪恶档案。这一举措，一方面让人民了解真象，公开了历史的真实；另一方面

也反映了俄罗斯国家领导人思想的开明并具有人类的良知。

在二战期间,斯大林屠杀了波兰两万多军、教、科精英,栽赃给德国纳粹,而波兰爱国力量在伦敦的流亡政府仍然不知底细,还要继续派青年到苏联培训,加入打击纳粹的队伍,继续遭受欺骗。这真是一起连环政治谋杀的卑鄙无耻的罪恶勾当。

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在纽伦堡国际法庭对德国的审判中,斯大林竟然提供了假报告,把斯大林屠杀两万多波兰精英的“卡廷事件”,转嫁到战败的纳粹德国,企图把他们的罪行随着法西斯的消亡而消亡。

1991年12月23日,戈尔巴乔夫在移交权力时和叶利钦看到了这份秘密档案,由于良知战胜了罪恶,他们共同提出:“不论后果如何,也应向波兰方面通报。”终于将这一罪恶的秘密档案交给了时任波兰总统的瓦文萨,澄清了这一罪恶冤案。在这件事的处理上,戈、叶二人没有泯灭良知,没有继续欺骗波兰人民的壮举,实在值得钦佩!

我们什么时候也能公布一些历史档案,让人民能了解历史的真实呢?这就有待于中国领导人也具有人的良知。对待历史和现实,真正能作到“实事求是”。

2006.6.14

小议 1978 年给右派“改正”和反右“扩大化”

1978 年 4 月,经历了漫长的二十一年艰辛苦难和生关死劫的右派分子群体,终于听说中央有一个中央批复五部《关于摘掉全部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的通知,即中发[1978]11 号文件。

文件中有这样一段话:“从 1957 年到 1964 年,遵照毛主席提出的关于分期分批摘掉改好了的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先后五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还没有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右派分子,经过长期的改造,大多数人有了转变,表现较好,现在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是必要的……”

从这一段话来看,也可以体会到二十一年的光阴确实不短,以至写文件的人的时间概念都有些糊涂。1957 年正在打右派,不可能边打边摘,1958 年才处理右派,更不可能刚处理就摘。1959 年国庆十周年,在特赦“战犯”的同时,为了显示政治宽大,让世人看看,作个样子,把民主党派上层的右派分子 142 人的“摘帽”和战犯的“特赦”放在一起进行。这大概就是所谓第一批摘帽。通观起来,这第一批实在是个小小的“批量”。用毛泽东惯用的“百分比”计算,也不过是万分之 1.42(按 100 万右派计算)。文件在这里谈的是摘帽,不是谈反右,确切地说,这一段时间应该是 1959 年到 1964 年。怎么能说成是 1957 年到 1964 年呢?

俗话说:“一日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右派分子群体自从坠入那说不清,道不明,是“阳谋”还是“阴谋”的陷阱之后,又经历了生死攸关的 21 个年头,他们碰到过太多太多的政治上说了不算,上当受骗的事。再加上长期超体力的劳动改造,已经把他们的头脑改造得木木呆呆,浑浑噩噩,胆小怕事,谨小慎微,当初听到这个信息,相当一部分右派分子真假都不敢相信,大都疑疑惑惑不敢打问。只敢在“难友”间偷偷打听。

“真有那么回事吗?”

“很可能,无风不起浪,说是要给所有右派都摘帽。”

“说是凡右派问题都‘改正’。”

“那就是说我们没错吧?谁弄错了?”

“应该是共产党错了。不过我们还得提出‘申请’。”

“这‘申请’该不会又设陷阱吧?”

.....

没有多少人敢提出申请。

有些被发落到小地方和农村的,消息闭塞,纷纷写信到城市亲友处,将信将疑地小心询问。

等到《人民日报》刊登了消息,才给大多数右派作了证实。唉!可怜的右派分子,罪恶的二十一年哟!

右派分子沦为特殊的“阶下囚”二十一年了,好不容易盼来了恩赐的活路,谁还去考虑什么“改正”和“平反”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接着中央[1978]55文件下来,明确了给右派分子落实政策,不是“平反”,而是一个以往中共从未用过的新词儿——“改正”。

共产党纠错历来是“平反”,惟独对右派何以就编出一个创造性的新词儿——“改正”?如果从字面上去理解,“平反”是根本被搞错了,要把错了的翻过来,恢复其本来的面目,叫“平反”。那么“改正”应该是把错了的再改正过来。这两者在字义上并没有太大区别,然而在编造这些词儿的人来说,政治概念却有原则上的不同。“改正”这个字眼儿可能责任轻点;而“平反”则是彻头彻尾的错了。说“平反”太伤自己的面子,为了保全面子,那就不能“实事求是”地说成“平反”,只能策略性地说是“改正”。

中央统战部早在1962年7月26日,曾经给中共中央写过一个《关于右派分子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报告》,打算给一些右派分子甄别平反(此时,这里说的是“甄别平反”,并非“改正”)。不料,8月17日,经毛泽东批示的“批复”指出:

“不应当给右派分子甄别平反;表现不好的再把帽子给他们戴上;完全搞错了的,即确实不曾有过右派言论、行动的,才作为个别人的问

题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说不定这个“御批”，就是1978年落实右派政策不讲“平反”而讲“改正”的根据。

后来，“摘掉全部右派分子帽子”又变成有五个右派不予“改正”。而这不予“改正”的五名右派分子，是妙不可言的一个点缀，旨在证明反右不是全错，而是“扩大化”了。他们是从一份27人的名单中，加以筛选，最后确定的。据说，那时候留这五名右派，一方面要给这段历史一个说法；另一方面又要从“某种需要”考虑，既要作为“扩大化”的明证，又要避免引起诸方面的议论。所以根据“某种”需要，最后选定了具有各方代表性的五个人。这“扩大化”比差是二十万倍的滑稽比例，竟然构不成“全错”，而要用1,000,000比5的诡异比例作为“扩大化”的佐证。这作法和说法固然绕了半天辩证法的圈子，但这诡异的数学题无异于：一方面是留给国际上一道难度极大的，没人能求证出来的新哥德巴赫猜想题；另一方面则又是谁看了也会发笑的幼稚、无赖的政治笑话。

再说，若干年前，不是也曾声色俱厉地谴责过历史上曾有的的一种：“反动政策”——“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吗？怎么若干年后自己竟然跃进到：“宁可错划二十万，也不放过一个”的“扩大化”新水平了？也许正是照此发展轨迹，文化革命中已经失控，百分比大师也没有提出什么百分比，罹难者已经无法计数。

至于“扩大化”，传说是邓小平的意见，在反右期间，他是贯彻毛政策的头号人物。1957年9月23日，他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作了一个《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报告中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城乡各种反社会主义分子，对于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进攻，是极为猖獗，极为恶毒的，他们是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使资本主义和反动统治复辟。”他的这篇讲话和毛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在反右中被称为是无限上纲，造谣诬蔑的唱和典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就在中共上层对反右有看法，酝酿应该给右派甄别平反的时候，

邓小平仍然鼓吹反右的正确性，诬蔑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认为打右派打得好。1959年2月20日，他在上海市委工业会议上说：“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前年整风起，一直到去年一整年，着重于批判，这是完全必要的，因为他们翘起尾巴。在反右斗争之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有些人的尾巴还在翘，无非是说我们不行，非他们不行。此外，我们的路线也不合他们的口味。所以不进行批判，不打这个仗是不行的。打这一仗的结果，批判的结果，效果很好。”

现在经过漫长的二十一年，要给右派“改正”了，要来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要说反右运动是错了。毛已经不在人世了，无所谓。而邓小平还正在当权，要按中共中央[1987]11号文件说的“全部给右派摘帽子”的话，那他的面子往哪里放？大概灵机一动，就居心叵测地想出“扩大化”这个绝妙好词。

虽然说定为“扩大化”了，但谁都含糊邓小平怎么愣说一比二十万也能叫“扩大化”呢？这件事全世界都知道，拿这种笑话怎么能面对世人呢？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一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解决历史问题要粗，不要太细，太细了要伤到我们自己头上，伤到我们党的机体，伤到我们国家的机体。”（这段讲话在收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时被删掉了）。这就是为什么不能“平反”，而要搞个“扩大化”的政治原因。

看来无论是领导人还是普通人，无论是政党和团体，无论他是马列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只要他在空间存在，都会有个“私”字，对我有利就干，对我不利不干。说是为人民、为国家服务，实际上都是为我服务。恐怕这才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哪里有什么“实事求是”、“认真负责”？政治就是欺骗。

1998年9月，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牛汉、邓九平主编的《六月雪》一书透露了一个信息：中共中央为了佐证“扩大化”，还对保留的右派作了工作。当初，中共中央统战部把章伯钧的夫人李健生约到统战部谈话，对李说了这样一段话：“既然中央给反右定性为扩大化，那么

就需要保留一些右派,要保留右派,就需要保留右派中的头面人物;要保留右派的头面人物,自然就需要保留章伯钧先生。”

还说:“当年给章先生划右的材料都不确实,从政治设计院到反对文字改革,都不能成立。而‘轮流坐庄’则是程潜批判右派时说的,也被安到章伯钧先生头上。现在我们重新整理了材料,右派定性用的是孙大光的揭发材料。”[註1]

这叫什么话?承认反右时给章氏罗织的所谓“罪行”都是莫须有的同时,却又对已经故去的章氏再施以第二次“阴谋”。在世界历史上也没有听说过有如此这般的政治手段。难道这就是一个一向自诩“伟大、光荣、正确”政党的所作所为吗?这算一种什么样的光明磊落行为?所谓五个不给摘帽的右派就是这样搞出来的?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说:“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註2]马克思说得好!近百万知识分子因为讲真话,被“扩大化”成“右派”,蒙冤受屈二十多年,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命丧黄泉(也叫非正常死亡,还叫自绝于人民)这难道不是一个历史悲剧?经过二十多年的伤害,结果说是二十万比一地“扩大化”了,不给平反,就给“改正”,还不补发工资,这难道不是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政治笑剧吗?

[註1]《六月雪》牛汉、邓九平编,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

[註2]《马恩选集》卷一 603页

一部悲凉的宪法

——一九五四年第一部《宪法》颁布 52 周年

1953 年 12 月 27 日至 1954 年 3 月 14 日,毛泽东带着中共党内的宪法起草小组,在杭州景色漪丽的西子湖畔的刘庄,历时两个多月,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

当时按照毛泽东急于进入社会主义的想法认为,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临时宪法”——《共同纲领》,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了。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带有资本主义成份的《共同纲领》也必然要被社会主义的《宪法》所取代。

1954 年 9 月,经过全国人大第一次大会较大范围的讨论,终以表决机器 1197 票的全票通过了毛泽东参加起草工作而制定的《宪法》。并于 9 月 20 日正式颁布。

说起《宪法》来,它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在与封建专制阶级进行斗争中,逐渐认识立宪主义思想的重要,认识到人民应该用直接民主或代议制度参与国家的统治,国家应该有一个永久性的根本法,而产生的。它的用意是防止封建势力复辟,限制政府的权力使用范围,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被政府伤害。因此,在十七、八世纪具有积极的意义。由于它的“人民性”,进而使欧洲和美国的宪法得以一直延续至今。

中国《宪法》的制定是参考了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集团”的宪法,还研究了解放前的宪法制订的。从理论宣传上说是社会主义宪法优于资本主义。实际上一部《宪法》能严格实行其内容就是好的《宪法》,如果只是“摆设”,说得再好,也没有实际意义。

不管怎样,对于当时这部《宪法》中宣示的: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以及公民的人身不受侵犯;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公民通信自由……等权利的具体规定,对民主党派、工农大众、知识分子及广大国

人确也有过莫大鼓舞。

那时候，和毛泽东的霸气同步的个人崇拜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当时竟有人提出要把宪法叫做“毛泽东宪法”，后来总算没有通过。

此前，在讨论宪法草案的时候，人们都忽略了黄炎培先生的一段谈话。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讨论宪法草案时，毛泽东说：“……全国人民每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在一片拥护和万岁声中，唯独黄炎培先生当时提出：“我有一种顾虑，我万分恳切要求各方面对于宪法予以高度的重视来正确执行，所有领导、管理、监督、检查各方面对于宪法执行工作，特别予以严重重视……”很可能黄炎培先生这一席话，是他1945年7月初在延安考察时，和毛作了著名的“窑洞对”之后，经过8—9年的亲身体验和考察，已经发觉毛的“言而无信”或者“说了不算”的特点，面对国家根本大法的讨论，不由得流露出他的一种善意的担心。

后来，他的这种善意的担心，不幸终于成了严酷的现实。庄严的《宪法》终至成了几页废纸。这都是后话了。

虽然毛泽东参与了《宪法》的起草工作，但是，他的头脑里根深蒂固的是“和尚打伞”，压根儿就没有接受任何约束的考虑。他的一生可以说只有一个信念：“天下是我打下的，天下也是我的！”和他的哲学思想：“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

《宪法》颁布以后，首先，甩开《宪法》的约束，他炮制的就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毛把一个文艺观点的争论有意识地枉加了反革命罪名，作为他“与人斗”的靶子。不许申辩，强行判刑，完全抛弃开司法程序、法律取证和宪法精神。最后公布：涉案人员2100人；逮捕92人；隔离72人。最后确定“胡风分子”23人。都是由他确定以后再交给司法部门去办的。

胡风案完全是一种歇斯的理发作的“与人斗”。毛具体亲手办理此案后，有多大问题都没人敢再说话。整个共产党都得顺着他的旨意一意孤行。他的飞扬跋扈就如同是一个封建大家庭中的家长。家长一发

指令,只能高呼万岁,共产党没有一个人敢于提出任何一点不同意见。好象根本就没有《宪法》一样。

[二十多年后,毛已去世,落实政策时,负责外调胡风问题的人员说:“这些人根本不是什么反革命,而且他们还作了一些对革命有贡献的工作。被定为‘胡风分子’的翻译家丽尼,当时在国民党国防部工作,他伺机搞到一份重要情报,交给胡风,胡风把情报交给了廖梦醒,廖又设法转交给廖承志。这份材料在淮海战役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当时就是调查清楚,在这位飞扬跋扈封建大家长面前,谁又敢如实说明真相?]

最后,经过三次平反,证明当年给胡风强扣的罪名,没有一项是真实的。

这一“胡风案”搞完,还不过瘾。还要追求无穷的“乐”,紧接着又发起了“肃反运动”。在他又一次掀起“与人斗”的风浪时,依然是把《宪法》抛在脑后。

这一次“肃反运动”的规模更大,更是完全甩开了宪法的人权规定和司法程序。机关、团体、学校……在单位党的领导下,代替和抛开了司法机关,都可以私自设立拘禁室,都可以剥夺被审查人的人身自由、通信自由。审查时还使用了一定的逼、供、信手段。有的人因为根本没有问题,又忍受不了人格的凌辱,走上了自杀的不归路。(又叫“非正常死亡”,也叫“自绝于人民”)。仍然是党的机构整完,交由司法部门按意见去处理。把司法部门当成了他的“小使”。

经过近一年的折腾,官方公布:被立案审查者共140余万;查出来的“反革命”共计3800人(真实的数字不得而知);占被审查人数百分之0.27。陪绑者占了百分之99.73。这一运动也是完全无视《宪法》精神的。

肃反运动结束之后不久,正赶上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毛对“秘密报告”谴责斯大林,只赞许过一次,就转向维护。他警告国人:“不能把斯大林的刀子丢掉!”他又坚决支持赫鲁晓夫出兵匈牙利。他认定匈牙利事件的罪魁祸首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裴多菲俱乐部”。匈牙利

事件的发生是因为镇反不力。这大概就是在他的头脑中对知识分子开始策划“阴谋”或“阳谋”的动因。

1957年他推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接着又发起了党内整风。表面上象是要认真整改，甚至于在开始鸣放以后，对群众提出的意见表示：“大学里如果对党委制有意见，可以考虑取消；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用来迷惑群众。

不到一个月，他在青岛干部会议上则说：“对右派要实行劳动教养，……搞‘裴多菲俱乐部’的，改造他一二十年……”

最后，整风变成了反右派，竟然任意地篡改了宪法第100条的具体内容，抛出个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把无辜的提意见者百万人送去劳改。《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通信自由、人身不受侵犯……全都被实际废止了。

毛用反右派运动整肃了所谓的“右派”。同时，也用高压手段震慑了全国人民。反右派运动结束后，全国进入了“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时代。这就更有利于他的独断专行。

扫除了可能的障碍，于是，他又吹起了“与天斗，与地斗”的号角。两年超英，三年赶美，粮食亩产数万斤。宣布：“公社吃饭不要钱，进入了社会主义。”此时，不要说《宪法》，连“规矩”也没有，完全是他一个人充分发挥他的“主观随意性”，狂人用呓语推行了所谓的“大跃进”。

结果的代价是，他“和天斗、和地斗”悲惨地败下阵来，既没有“赶上”，也没有“超过”，劳民伤财还饿死3000多万中国人。比八年抗日战争死亡的军、民还要多。

对于如此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惨痛后果，他在7000人大会上不得已的所谓“检讨”是：“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是要受惩罚，要检讨。我现在受处罚，土地瘦了，牲畜瘦了，人瘦了，这‘三瘦’不是惩罚是什么？”

这是谁检讨？这是惩罚谁？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逻辑？！这也能算检讨？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把3000多万中国人的性命当回事。他毫不隐晦地承认自己是皇帝（陆定一、方毅等人说他是“暴君”），自己一

再说：“我从不下‘罪己诏’！”害死多少中国人他都不会检讨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经过太多的运动，作过太多的检查，写过太多的检讨交代材料，谁见过如此荒诞的所谓“检讨”？这就是饿死 3000 多万人的大事件的“检讨”？这就是对 3000 万被饿死者的，四十四个字血淋淋的字的检讨？

如果别人犯了破坏国家经济，饿死 3000 万人的严重罪行，让他来处理，毫无疑问，他肯定是要“枪毙”人。他肯定会说“重罪当诛”！

说起来，毛泽东也曾“用”过两次《宪法》，只不过那是两次好笑的“闹剧”。

第一次是 1964 年，中央工作会议上刘、邓和毛有一点小小的争执，第二天，他想起了《宪法》，毛一手拿《党章》，一手拿《宪法》，气冲冲质问刘、邓：“你们两个人，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不知道是《宪法》给了他权利，还是他给了《宪法》权利？）”他是共产党大家庭的“家长”，谁敢剥夺他的权利？这好象一个家长对小辈们的耍赖示威。小辈们也只好连哄带检讨诚惶诚恐地连连说着：“我们错了，我们错了。”谁能说这不是一场笑剧？

第二次是文革之初，王洪文在上海成立了“工总司”。当时还摸不清文革底细的陶铸和陈丕显把“工总司”看作是非法组织，应该取缔。中央文革的张春桥、陈伯达却力挺“工总司”。陈丕显当时质问陈伯达：“一个中央文革的成员，居然越过中央政治局和上海市委，支持擅自成立的群众组织，还有没有国法？”

双方争执不下，官司打到“家长”那里，毛泽东表态说：“宪法中有‘结社自由’的条款，为什么不能成立工总司？”这就是他第二次利用《宪法》。拿《宪法》教训了阻碍文革的陈丕显。这庄严的《宪法》成了只能为他所用，别无他用的特殊“摆设”。

当年，在 7000 人大会上，刘少奇毕竟还有点良心，3000 多万条人命，可不是小事。他大概也想总结教训，打个圆场。他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原本是既承认一点问题，又给毛一个台阶下。没想到毛根

本不认账,而且此话竟给他带来杀身之祸。

毛此时非但无视 3000 万人命,认真检查,相反,在一片万岁声中,他想的似乎是他的“王位”。而且疑心越来越大。一向宣传的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不过是用来愚弄人民;他推崇的是李自成式的农民革命,“打下天下坐天下”。李先念说过:“第一个皇帝都是英明的,但也是厉害的。”彭德怀后来在庐山开会时对张闻天说过:“中国皇帝第一朝是厉害,因为他不厉害就搞不起来。”当时的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也说过:“历史上的第一任(皇帝)都很厉害,比如秦始皇、毛主席。”毛泽东自己也自诩:“超过秦始皇 100 倍。”

封建王朝和民主宪法当然是不相容的。从此,在他的主观随意性之下,1954 年《宪法》就好象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不但《宪法》消失了,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他的淫威下也整整停开了十年,被取消了十年!

这就是毛泽东式的民主。什么《宪法》? 什么人民代表大会? 我一人说了算!

1966 年,一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毛更是开始了一场更大的“与人斗”的无穷乐剧。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操纵者毛和其妻江青,都没有对“大跃进”造成 3000 万人死亡的重大灾难有半点正确的认识,把被破坏了了的国民经济推给别人去“调整”之后,他则又投入了另一场“与人斗”的波澜之中。早在 1962 年,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时,毛就对巴卢库表示,7000 人大会上,有人要“推翻他”。文革开始,江青也讲过类似的话。因此,文革的开始,也是他们复仇的开始。夫妻都表示该是报“7000 人大会议之仇”的时候了。没有多久,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就被红卫兵小将打翻在地。

当孙悟空们(毛泽东指红卫兵语)杀进了中南海,刘少奇几次被批斗,被人身侮辱之后,此时,刘少奇也想起了《宪法》,他愤然拿着一本《宪法》(五四年《宪法》)去找毛泽东。

当刘拿着《宪法》去找毛理论时,毛泽东根本就不谈《宪法》,而是用“革命就是最大的法”的理论,教训了刘少奇。当时毛刘有过一段精

彩对话：-

“文化大革命这样搞下去，究竟有没有法律依据？”刘少奇首先发问。

“我现在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你们剥夺了我的权力，还不让我说话，这叫什么革命？我想不通。我要求依照法律，给我在人大和中央政治局讲话的权力，我陈述完我的理由后，我宣布辞职。这样你们总可以结束这场文化大革命了吧？”

毛泽东微笑道：“看来，你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对马列主义的常识，的确是一窍不通。我们当年造国民党的反时，和他们讲过法律吗？法律，在阶级的社会里，是有阶级性的。我们同资产阶级从来就不讲什么民主，也没有同一个意义上的法律。对资产阶级，我毛泽东从来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也要造共产党的反吗？”刘少奇问道。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在共产党内，造他们的反，不从党里抓要从哪里抓呢？……我们的修正主义者很奇怪，当他们打击左派的时候，从来也不讲法律，不讲民主，专门搜集左派的材料。他们对我们可狠哪。无产阶级刚刚准备反击，他们要法律，要民主的舆论就都来了，这难道是平等的吗？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那以你之见，就这么闹下去吗？”刘少奇困惑地问道。“就不需要指定一定的规矩吗？”

“又是你们那一套党有党规，国有国法，是不是？”毛泽东说。“以我看，革命就是要打烂一切条条框框，让群众起来彻底革命。在推翻走资派的统治中，是不能给造反派指定那些陈规旧习的。要不然还有什么革命二字？”

“主席的这些话，我实在是不可理解。我保留我的看法和意见。”

“你可以保留，可以按照你的那一套继续干下去。反正我是要搞革命的。我号召各地的孙悟空来大闹天宫，看你们怎么办？”

刘少奇说：“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就让历史来作最后的结论吧。”

[註]

这个不愉快的谈话结束了。在这《宪法》和“王权”的交锋中,刘的力量显得那么纤弱,不得不屈服于毛泽东的“枪杆子”和“孙悟空”。当刘退出这个谈话,悻悻而返时,一方面留下的是毛泽东得意的窃笑,另一方面则是,这部 1954 年制定的国家根本大法,经历了不平凡的被弃置的十二个年头,此时则无声无息地从“国家主席”刘少奇手中很自然地像几页废纸一样滑落在地了……

这就是 1954 年颁布的,中国的第一部《宪法》的结局。

[註]师东兵:《中国第一大冤案》

他还是个孩子

1957年7月毛泽东在青岛干部会上点明了“右派要送劳动教养”，8月3日抛出《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又经过几个月，作了一番筹划，1958年初，丁酉春节之前，北京市把半步桥第一监狱、地藏庵监狱、北苑收容所、……都腾出了地方，开始了对右派的大逮捕。据说当时逮捕的右派人数约有七、八万（有说十万）之众。破了北京乃至中国历史上文字狱的逮捕记录，恐怕也打破了世界记录！

笔者当时也落入了这场大逮捕，被送到半步桥第一监狱。

这些人几个月来挨批判，受孤立，虽然心情沮丧而愤怒，进得监房却又象“囚室遇故知”，“同是挨整受难人”。立刻，三个一群，五个一伙聊遭遇，谈政策，猜未来……

“不是说人民内部矛盾吗？怎么又送公安局、监狱了？逮捕了？”

“想怎么处理你就怎么处理你，你敢说什么？”

……

谈论间，忽然发现墙旮旯儿有个孩子，大约15、6岁，坐在一个小行李卷儿上，默然地听着大家的议论。

“哎，这小孩儿是怎么回事？”我好奇地发问。

吴士俄（北师大讲师）说：“这大概应该是最小的右派了，16岁”。

“这符合政策吗？这可是未成年人呀！”

“什么叫政策？哪儿有政策？谁给你讲政策？”刘佐汉（北大助教）说。

安树大（冶金部干部）笑笑：“划右派不是有百分比吗，是不是老少也有比例呀？”

……………

半个月后，我们被发落到茶淀农场正式“劳动教养”。没想到这个小孩儿和我分到一个组。他叫佟信顺。北京冶金中专学生。

从开始，劳动强度就比较大，每天起床他都还在梦中。睡在他旁边

的刘佐汉经常得叫他：“小佟！小佟！起床，起床，快起床！”

一边叫，一边不免总要笑着说：“这叫什么事儿？把咱们撩到这儿劳教，还把一个孩子也撩到这儿，还得叫他起床”。

“快，快，快点儿，上学了，起床。”你该这样儿叫，安树大调侃着。

石油学院调干生王惠云凑到我身旁压低声音用他那唐山口音说：“哎，咋儿把这小的孩子也搞的这儿来了？我说，这还有没有政策？这不闹着玩儿了？”

……………

我们这个组十六、七人，成员是讲师、助教、大学生，原来当干部的都是大学毕业，只有他是个中专生。也许他自己知道这些人都是可以作他的老师，文化程度和年龄的差异，使得他很少和大家交谈。

后来，我担任了组长，在劳动上也对他格外照顾，安排干轻活儿，不计较效率。所以有时候他还找我说话。

不久，农场让大家在小组再交代一次自己的所谓“罪行”。这大家才知道小佟的“罪行”原来是57年整风，他给艾森豪威尔写了一封信，问美国的民主是怎么搞的。他嗫嗫嚅嚅地说：“信搁邮筒了，不知怎么那信又到书记那儿了，书记说，就凭你给我们头号敌人——美帝的头子写信，就能打你个‘极右分子’，就把我送这儿了。”

当时他谈完他的“罪行”，不少人都笑了，高光明（自然博物馆工程师）还脱口而出：“傻小子！”

1960年，我们集体搬迁于家岭分场，队、组都打乱重编，小佟被编到其他队，我们就分开了。

陷入“大饥饿”已经有半年了，我们一群浮肿病号收工后蹒跚在回场的路上，没料到小佟也在这群人中间。他看到我以后，两腿艰难地快走了几步，赶到我身旁嗫嚅而结巴地说：“我，我，我饿，饿得晚上睡，睡，睡不着，俩腿都不听使唤了，走，走道都走，走不，不，不动了，我，我……”

我回头瞥了一眼，这是那个孩子吗？今年应该是18岁了，该进入成年了，怎么还是那么矮小？一身蓝色棉衣经过风吹日晒，已经成了破

烂不堪的土灰色“丐装”。棉帽子的两个护耳随着走步,像两只翅膀,有节奏地扇动着,“翅膀”中间是一张小小饿殍的削瘦得只剩一层乾瘪老皮的脸庞,颧骨突起,两腮陷下,面色黄绿,说话间已经感伤得泣不成声。

迫于环境,我只能劝他:“不要哭,不要哭,让别人看见不好,大家都一样挨饿,没办法,只能尽力忍耐,这时候千万不要乱说话。一定记住,不能乱说话。”

大约一个月后,小佟终于倒下,再也不能起来了。他的家人是三代工人,来收尸的是他的哥哥,哭得非常凄惨,反复哭喊着一句话:“他还是个孩子呀,他还是个孩子呀……”

是的,他还是个孩子!孩子也被网进了“阳谋”政治恶网。还没有成年,劳教了两年,就被“饿刑”残酷地轻取了他的小命!

后 记

二十世纪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世纪。我在三十年代上小学,发生了“七·七事变”,祖国半壁河山被日寇侵占。九岁开始过着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十三岁指靠救济读中学,后来又靠奖学金和助学金勉强读完大学,在整个求学过程中,可以说吃尽了苦头。1951年,我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走上工作岗位,满以为未来再也不会再有战争、苦难、贫穷……,展现在眼前的将是和平建设国家的美好憧憬和自由、民主的政治生活。不料,这种喜悦只是昙花一现,接下来的竟是一场胜过一场,骇人听闻的从未经过的政治运动。

在这一系列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中,尽管也曾听到过“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因素”的赞语,然而在历次运动中,首当其冲惨遭凌辱的总是一批又一批敢说真话的知识分子。他们本来一无所有,既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又没有剥削过别人的剩余价值,然而,毛泽东却反其道而行之,背离他一向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轨迹,发挥主观随意性,而把知识分子定为他的对立面——“资产阶级”。进一步玩弄“阳谋”诡计,唯我独尊,钦定百万无辜者为所谓“右派”,使之沦为“九儒十丐”以外的第十一类人,在精神上遭受难以言喻的不公、歧视和折磨。

然而,“右派”所深受的这种凄风苦雨的遭遇和经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却鲜为世人所知。作为艺术表现形式的《牧马人》、《天云山传奇》那两部影片,虽然拍摄者对“右派”生活也想暴露真实,但在政治高压下,也只能作一些蜻蜓点水般的表述。蒙在鼓里的不知情者看后,可能信以为真,也许还会洒下几滴同情的泪水;而身历其境的亲历者看后,真是哭笑不得,对那种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人为的编排,与实际不符,富有诗意的“生活”,简直是“艳羨不已”。

今年,香港杂志披露:“据说中共当局不久前作过调查统计,原右

派分子,全国现有九千八百名,港澳台四百二十名,欧美八十名。总共一万零三百名。”这是多么可怕的数字!100多万(有说300多万)右派,经过五十多年种种手段的磨难,不少人已经过早的走向天国。而剩下为数不多的年迈右派,眼看也要一个一个走光了。(如果秦始皇在九泉之下有知,应该深感他玩的“焚书坑儒”,是公元前原始性的“坑”,也不过坑了460个儒生;而杀人不见血的反右运动,是二十世纪先进的“毒招”,受害人则是他的2500倍,相比之下该是自愧弗如吧!)这批耄耋老人死掉,这一段历史岂不也将灰飞烟灭,被人淡忘了?

为了保留历史的真实,为了让人们了解近百万“右派”分子的那段叹为观止的悲惨经历,我作为一个经济工作者,不善写作,义无反顾地拿起我的拙笔,记述了我深受其害的二十二年亲身经历的片段,以期折射真实历史的一个小小的层面,奉献给愿意了解这一段历史的人。也奉献给即将湮没的反右历史。

在表述的过程中,承蒙难友朱正、刘皓宇的鼓励和帮助,在此谨表谢忱。

-
- 人类的历史在很忍耐地等待着被侮辱者的胜利。
——泰戈尔
 - 最极端的不公正在于，不正义的东西竟被称为是正义的。
——蒙田
 - 真理是时间的产物，而不是权威的产物。
——培跟
 - 真理的细胞逐渐浸透到充斥着谎言的生活的躯体之中，最终将导致其土崩瓦解。
——哈维尔
 - 人们给同类施加痛苦并无其他原因，仅仅是出于恶意，在所有的动物中唯有人这样作。
——叔本华
-

ISBN 962938065-X



ISBN 962-938-065-X
HKD: 40 RMB: 20